东欧当代文学丛书

匈牙利
短篇小说选



新华出版社

匈牙利短篇小说选

张春风　夏悦文
旭遇桢　冯植生　译

新华出版社

匈牙利短篇小说选
张春风　夏悦文
旭遇桢　冯植生　译
*
新华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箭杆河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3.5印张　260,000字
1985年5月第一版　1985年5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1—18,600册
统一书号：10203·144　定价：1.65元

东欧当代文学丛书

冯植生　樊　石　余志和　主编

出 版 说 明

东欧各国具有悠久的文化传统，其文学是世界文学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革命文学先驱者鲁迅、茅盾早在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就致力于向我国读者介绍东欧各国的优秀作家和作品。解放后，东欧各国著名作家的杰作更多地被介绍到我国，受到读者的欢迎。

本丛书介绍东欧各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优秀作品，分册陆续出版。举凡这些国家当代文学的名篇佳作，或具有一定代表性的作品，均在编选之列。选材注重思想性和艺术性，同时也兼顾作品题材的广泛和艺术风格的多样化。

本丛书是我国首次系统地介绍东欧各国当代文学。我们期待这套丛书的出版，会使我国广大读者了解东欧各国当代文学发展概况和人民的生活及思想风貌，并从中得到艺术欣赏和借鉴，同时也进一步增进我们与东欧国家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

目　录

维莱什·彼得

牧羊人和他的狗

〔**作者简介**〕 维莱什·彼得(1897—1970)，匈牙利当代著名作家，出生于贫苦农民家庭，当过雇工、牧羊人等。早年从事农业工人运动，通过自学成为作家。1945年作为民族农民党主席进行过一个时期的政治活动，参加领导土地改革工作。后转入文艺界，曾任匈作协主席。他的作品大都反映农民的生活与斗争。曾获柯苏特奖。主要作品有：《考验》、《铁路工人》、《苹果园》等；他的自传体长篇巨著《三代人》描写近半个世纪匈牙利农村的苦难及其变化；晚年还著有长篇小说《在公路上》和短篇小说集《秋天的变迁》、《向日葵》等。

在农业社耕地区域的大型灌溉渠旁，说得更准确些，在堤坝的尽头处，居住着两位牧人，一个放羊，另一个放牛。堤坝正面东北方向吹来的风，使堤岸的这一带地方特别凉爽。

一般地说，人和牲畜只有在闷热的夏天才希望有风，别的时候对刮风是不很感兴趣的。现在，正是炎热的五月上旬。

这两个牧人，看样子并不象童话里所常常见到的那样，骑在牛背上，横吹着笛子，悠然自得，或者是安闲地坐在草地上聊天；不，不是那样。这两个牧人喜欢赌博。现在他们正在玩二十一点①呢。地上放着一些银币。同银币摆在一起的还有一个锈迹斑斑、黑不溜秋的香烟盒和一个褪了色的花边烟袋。他们的神情都很紧张，可以说是全神贯注，看样子他们正在进行最后的拼搏。

牲畜在草地上恬静地吃草，强劲的夏风把那些企图叮在它们身上的苍蝇全部赶跑。牛群散落在牧场上，它们时不时甩动着尾巴，并不是为了驱赶苍蝇，而是出于一种习惯动作。羊儿也不象往常那样，在酷热的阳光下，习惯地用没有长毛的鼻子去拱同伴的胯下，而是三五成群地聚在一块，闲适地咀嚼着香甜、嫩绿的青草。

萨乌是一头大绒毛狗，正躺在离主人较远的地方，因为它向来不喜欢挨近人们或者靠近牧人的牧杖。它伏卧在一个土堆上，伸长着躯体，十足象一具僵尸。远远看去，它又象一个贪睡的懒汉，正在倒头酣睡。小牧狗菲尔奇却依偎在主人米斯柯的脚旁；它趴在地上，把头歪搁在伸直的两条前腿上，它显然很警觉，不拘什么时候，只要主人向它点点头或者稍稍暗示一下，它都能一跃而起。

---

① 匈牙利的一种纸牌。

其实，它并没有睡觉，或者说，它是很少睡着的；即便在睡觉时，也是很惊醒的。如果说有时候它也微微闭上眼睛，那仅仅是一眨眼功夫，马上又睁开眼睛，看看周围有什么动静。它懂得，一个好样的、出色的仆人，是每时每刻都应该做好准备听从主人吩咐的。

但是，现在这里并没有出什么事。畜群在咀嚼着青草，而它的主人在玩纸牌。菲尔奇对自己的主人是不了解的——至少可以说是不够了解的。它是头刚满一岁半的小狗，正处在驯养阶段。它实在弄不懂，这两个人到底在摆弄些什么。当这样或者那样的事情结束时，他们都高声咒骂或者放声纵笑；有时露出胜利的喜悦，或者干脆令人难以琢磨地抿着嘴笑，有时脸色又变得十分严峻。看来这里面并没有什么可以吃的和喝的，或者叫人开心或生气的东西——这四样，菲尔奇大体上是理解的——可是对于他们目前的情形，它怎么也搞不清楚。它虽然懂得什么是咒骂——这正是它从米斯柯那儿学到的——而且明白那是桩坏事；它也懂得，要是人们哈哈大笑，那是件大好事。但把咒骂、放声纵笑、恶狠狠地瞪眼和眨巴眼睛搀杂在一起，这叫它怎么能透彻地加以理解呢？

菲尔奇是头很聪明的小牧羊狗，它也象所有的小狗那样非常贪玩。可是，现在它又何尝知道这两个人在玩些什么呢？它有时也玩，但并不是它喜欢玩多久就能玩多久。跟这些怯懦的绵羊是没有什么可玩头的，它们跟本不懂得开玩笑。对于它们，只能当懦夫来欺负。萨乌却又是那样令人讨厌，经

常睡大觉；有时候，菲尔奇也跟它玩，但只要稍稍过点头，它就呲牙咧嘴，露出一副凶神恶煞相，全身毛发耸立，大声狂吠。因此，菲尔奇只好观察主人的神色，主人高兴时，便会跟它玩一阵子。不管牧人把牧杖举得多高，它都能一跃而过。主人把一个圆轱隆咚的东西往前方掷去，它便风驰电掣般追去，即使有冰冷的水坑挡道，也要蹚过去。只要看到主人高兴，它就是围绕着主人或者畜群再跑一百圈也心甘情愿。一般来说，当主人开心地欢笑、唱歌或吹笛子时，它能凭直觉意识到那时的主人是较容易亲近的。如果笛声悠扬、动听，说明主人情绪很好；这种时候，它觉得特别幸福，那条小小尾巴就摆动得更起劲了，象一面欢快的旗帜在草原上随风飘扬。

可是，现在看来不是玩这种游戏的时候。狗是喜欢游戏的，但好玩的游戏并不多。现在，菲尔奇不知道应该高兴还是需要进行警戒？因为主人抓起放在地上的牧杖敲敲它的脑袋，自己也站了起来，末了还把它赶开去——就象往常那样——因为它有好一阵子没有照看牲口了。要知道，牧人是不习惯这么久呆在一个地方放牧的。

人毕竟是不好理解的，尤其是它的主人——米斯柯。突然，他会放声哈哈大笑——这是好兆头，但接着他又会叫骂起来，这时，菲尔奇的心几乎快要蹦到嗓子眼来了：——唉哟！出了什么事？难道我做错了什么？——狗向来是凭主人的眼色、声音和动作来判断主人是否高兴的。可是现在又该凭什么来辨别主人是否高兴呢？米斯柯时而把帽子往后脑勺一推，

时而又抓耳挠腮。那位年轻牧人波迪用十五点压过他的十三点，一下子把他下的赌注全拿过去了。波迪象位银行家那样，神气活现地摆出他的十五点，仿佛早就料到米斯柯拿不出比十五点更大的牌来。但这一切，菲尔奇是无法理解的，因为它既看不透，也听不懂人们的言行。这一堆花花绿绿的杂色纸牌对它确实是一个很大的谜呢。

牛群漫不经心地在自己牧区里啃草。两位玩纸牌的牧人时不时朝牛群那里张望，但很快又把注意力放回到纸牌上来。这时，菲尔奇象是发现什么似的，凝视着在牧场吃草的牛群渐渐远去的方向。它有点担心，因为往常在没有主人照管下，是不允许牛群走离那么远的。它朝前伸直两条前腿，顺势站了起来，这时要是主人冲它说一句话或稍微向它示意一下，它会立刻蹦起来，向牛群的方向奔跑过去，因为它认为这是它的职责。关于这一点，它无疑已经知道得非常清楚。

要是没有得到吩咐，就不许乱动，这是主人教过它的。现在要不要约束一下牛群？难道就这样让它们走远去吗？菲尔奇几次咬了咬牧人的牧杖，却没有看到任何反应。不，不，看来这种主动精神是得不到鼓励的。

也许牛群不会发生任何意外，因为主人没有向它作出任何示意呀。它又重新松懈下来，接着观看主人们玩的、而它又无法理解的游戏。

这时候，牛群真的越走越远了。没关系，它们不会走失，也不会越过别的牧区的地界的。

这一带草地分为放牛场和放羊场两个牧区，其所以要这

样划分，是因为牛受不了绵羊的膻气，不吃放羊场的青草；即使那里没有羊群，它们也不吃，因为凡是羊群呆过的地方，必然在草丛中间留下小小的黑羊屎豆，连在沟渠的水里也留下刺鼻的羊臊味。在这一片灰蒙蒙的土地上，远处显露出灰暗的轮廓；就在那里，展现着一片宽阔的牧场，仿佛看不到它的尽头；也就是在那里，常常出现海市蜃楼。

在牧场的这一边，当牧人来到这里放牧时，总喜欢坐下来歇息。老鹰在空中盘旋，偶尔也会象抓田鼠或飞鸟似的偷偷叼走一只小绵羊。由于雨水的冲刷和牲畜的践踏，牧场上每年夏天都出现一些小土坑；秋天，雨水往往注满这些土坑；到了春天，大片大片葱绿的青草又都把它们遮盖起来。是的，在这碧绿的原野上也有着它自己的规律，就象世界上任何地方一样，牧人和牲畜都必须根据草原的自然法则无声无臭地度过自己的一生。

当然，天然形成的地界并不是那些呆头呆脑的绵羊所能辨认出来的；或者说，至少它们辨别不清楚这种界限。牛群一般是不会走到牧草长得并不太好的放羊场去的；但绵羊却愿意到放牛场来，因为这里的青草总是长得非常茂盛，味道也很鲜美。绵羊是特别喜欢这种草地的。

在放牛场的尽头早就出现羊群，有一些绵羊已经开始走过来了；大部分绵羊闻到鲜草的香味，便相继从原来呆的地方跑了过来。它们拥挤着飞快地奔跑，因为它们似乎懂得，凡是好吃的东西，必定是味道鲜美可口的嫩草，可惜对它们却是禁物，因此，事不宜迟，动作越快越好。

绵羊是不害怕牛群的。牛群已经开始退让，朝井旁的水槽走去，聪明的牛群看到提水的木杆子在上下移动呢。一个年轻人正在那里汲水，片刻功夫就把水槽注得满满的；显然他已经看见干渴的牲畜正朝这边走过来。

就在这一时刻，小牧狗睁大眼睛盯视着主人。米斯柯在输掉仅剩下的一堆灰不溜丢的银币后，象其他赌徒那样，索性把烟袋作赌注，期待着能把本钱扳回来。

羊群已经从原来它们呆的地区蜂拥跑到放牛场来了。看到这一情景，年轻牧人波迪站起来，说："喂，米斯柯，你的羊群已经从那边跑到我们的牧场来了，赶快叫菲尔奇去把它们赶回去吧。要是让我老头子看见，他会生气的。"

"行，行，你快坐下来，咱们再玩一会儿。只要你有本事赢我，就把烟袋拿走。"米斯柯态度非常强硬。

"可是现在牛群已经朝水井那儿走去了。你瞧，它们都不肯吃草啦，只管往水井那儿走……"波迪想乘机罢手。而米斯柯刚才那番话分明是想赖着不走，因为他把所有的钱都输光了。波迪却不愿意再接着赌，他想，再也找不到比这更能摆脱掉米斯柯纠缠的借口了。他们俩都各有责任看管好各自的牲畜。

可是米斯柯死活就是不肯放他走。

"为什么不接着干？"听米斯柯的口气显然是有点动怒了。"你赢了钱就想溜啦？"说着，他冲菲尔奇挥挥手。"等一等，我马上叫菲尔奇去把它们赶回去。"

"喂，菲尔奇，快到前面去，"米斯柯用牧杖朝羊群正在

奔跑而来的方向指了指。

菲尔奇早已作好准备。它全神贯注，不象那些差劲儿的士兵只是冷漠地、无精打彩地站着；相反，它是那样兴高彩烈而又精神抖擞地注视着。它满怀对生活和战斗的乐趣，竖着一对机警的耳朵，眼睛里闪烁着亮光；一听到主人的话语和示意，它就象一颗出膛的子弹，直朝羊群的方向射去。

米斯柯没有立即坐下来，因为他发现那头小牧狗把羊群朝相反的方向驱赶，也就是从后面把羊群赶到禁止它们入内的放牛场来了。

不，应当相信菲尔奇。不错，它是一头勤奋的小狗，头脑清醒，又非常热心，可惜干起活来总是冒冒失失，还经常闯祸。吩咐它跑到羊群正面去的话算是白说了。疯狂般的奔跑已经使它忘乎所以。不过话又说回来，它懂得什么呀，它怎么能知道那一面是正面呢。在它的头脑里，这么一大片扇形牧场，对牧人来说，凡是青草长得茂盛的地方，就该把牲口赶到那里去。

当菲尔奇快要接近羊群的时候，它站住了，转过头来，似乎是在等待主人的新指示。米斯柯等候的也正是这一时刻。现在应该赶快告诉它需要做些什么。然而他遇到一道难题：从这么远的地方，能否把任务精确地交代给一头年幼的小狗——菲尔奇去执行？

原因很简单，在这之前，牧羊人并不懂得用科学方法来训练牧羊狗；不过，在他看来，他的工作还算顺利。他训练菲尔奇的方法是通过声音，比如说，他经常对小狗发出这样

的命令："菲尔奇，到前面去！喂，菲尔奇，打个滚！"或者"喂，菲尔奇，过来。喂，菲尔奇，回去！"最后，他会吹起口哨，菲尔奇听到悦耳的口哨声，便领会了主人的意图：好，行了。于是，它就谄媚地跑回到主人身边，摇头摆尾，得意洋洋。

但是，他现在同小狗相隔那么远，又是逆风，即便喊话，声音也会被风吹送到相反的方向去的。菲尔奇依然站在那里，伸着舌头在喘息。

它看主人没有对它下达新指示，满以为自己干对了。现在它又象冒险家似的朝前奔跑。羊群也在奔跑，它们觉得，这头怒冲冲的小狗快追上来了。它要它们再向前跑，不要回头，继续朝前跑，直跑到放牛场去。

现在，绵羊似乎也觉察到，得赶快跑到禁地去。羊群对这种情况早已习以为常：如果牧羊狗在它们正面又蹦又跳，一般说来是要拦阻它们，要它们回头；而现在菲尔奇是从后面来的，它们当然只好拼命再朝前奔跑啰。

米斯柯终于发火了，他知道要出乱子了，便扯着嗓门叫喊：

"喂，菲尔奇，跑到前头去！"他用牧杖冲它挥舞，还把帽子扣在上面，好让它容易辨认出来，能按照他的吩咐去做。仿佛帽子上写着字：菲尔奇应该把绵羊赶到一块，然后把它们驱赶回原地去。

最后，菲尔奇终于明白过来了，它不愧是头受过训练的牧羊狗。它从左侧包抄过去，竭尽全力来到跑得呼呼作响的

羊群前面；这些胆小如鼠的小流氓有勇气跑进禁地，却没有胆量停下来。

终于成功了。菲尔奇跑到羊群前面去了。它伸长舌头，呼哧呼哧地边喘气，边扑向羊群。这些怯懦的绵羊果然调转头往回跑了。

米斯柯还在费劲地伸直着脖子，用牧杖指给它方向——回到羊栏的水槽旁去，到那里后再把羊群驱散开。但现在，当菲尔奇——这是它的过错——最终把羊群赶回去时，就不再理会，也不再听主人的呼喊了。只要能把牲口赶回原地，并把它们制服，就可以在主人面前高昂着脑袋，幸福地摇摆着尾巴，仿佛在说：亲爱的主人，你瞧，大功告成了；这一大群绵羊，已经被关到比它们的犄角还要高得多的羊栏里。这一切都是我干的；是我——一头小黑牧狗干的。我虽然是一头小狗，却能把羊群赶回到主人身边。

倘若主人果真是命令它这么做的，问题自然好办得多。事实上，它的脑子只能理解到这种程度：应该把羊儿赶到一块。可现在主人要它把羊群赶到另一个方向去时，就发生困难了。遗憾的是，菲尔奇并没有清楚地理解到这一点；它开心得几乎发狂似地奔跑着，还咬了几口那些被它追赶上的绵羊。

米斯柯冲它呼喊也是白费劲："喂，菲尔奇，站住！去你妈的，喂，菲尔奇，到这儿来！"总之，看来一切都无法挽救了，原因是菲尔奇已被胜利冲昏了头脑。

比这更严重的是，菲尔奇又犯了一个大错误。现在它不

拼命追逐羊群了，而是选择一只闪了腿的绵羊作为追击目标。这只绵羊实在跑不动了，只好落在大队绵羊后面。菲尔奇大概是这样想的：这只绵羊正是它的攻击对象。后来，这竟成了它的主要罪过。它攫住这只绵羊，用牙齿狠狠咬住它的后腿，齿尖已经扎进绵羊的皮肉里去了，鲜血立刻喷射出来。那只被咬得疼痛而又软弱无力的绵羊被菲尔奇拖来拖去，象是在跳华尔兹舞。羊腿没有被咬折，这是不幸中的大幸，因为绵羊身上有一层厚厚的浓密的羊毛保护着，菲尔奇最后只咬下一撮带膻气的羊毛。

它把咬着羊毛的牙齿松开，边跑边把羊毛吐出来；然而它仍然紧跟着那只绵羊跑，一刻也不放松。这时，它又想去咬绵羊的鼻子或者耳朵，却始终咬不着，因为绵羊总是高高地仰着头，鼻子朝天。菲尔奇费尽力气想跳上去抓住绵羊鼻子，又总是够不着。经过几次尝试，它只好放弃这种企图，重新咬住绵羊那条粗大、强壮，但现在已经一瘸一拐的后腿，然后又扑到它身上，死劲地咬、咬，象是遇到不共戴天之敌，非把它置于死地而后快不可。

这时，被惊吓的羊群正继续朝前奔跑，在靠近灌溉渠的洼地里簇拥成一团。米斯柯已经跑到这里堵住它们的去路，不许它们蜂拥跑上堤坝去。他担心它们受惊后会失足掉进深水里去；特别是那些小羊羔，更容易发生这种危险，因为它们被吓呆了，正依偎在自己母亲或别的老绵羊身旁，可怜巴巴地咩咩乱叫。羊群拥挤在一块，仰着头咩咩地叫唤；它们两只前腿腾空而立，身体相互碰撞着，小羊羔则在大绵羊肚

皮底下钻来钻去。那些站在后边或是站在外圈的绵羊都想拼命钻进羊群中央，以躲避牧狗的袭击。原来这就是弱者保护自己的一种办法。

米斯柯又冲菲尔奇呼喊。最后它终于清醒过来了，仰起头，竖着耳朵听着。这时，它不但听到主人的叫喊，还发觉羊群已经离开它很远了。在这宽阔的草原上，只剩下它和那头瘸腿的绵羊。

“坏啦。”这个念头在它脑海里一闪而过。跟着它便舍弃绵羊，而这头象是获救似的绵羊也就不顾一切，一拐一瘸地向羊群跑去。而它——菲尔奇却朝主人的方向望去，盯着他手中的牧杖，想知道主人是否会发出新的命令，主人对自己的成绩是否满意。它相信自己已尽了最大努力，也完成了自己的职责：它已经从牧牛场把大群绵羊赶回去了。

可是从主人那儿传来的声音是可怕的，他正用牧杖朝它恫吓：

“站住，站住，你这坏家伙，”主人威吓地叫喊着，“到这儿来，我会给你一点颜色看看的。马上就给你一点厉害尝尝。我知道你会叫苦的。”

波迪一直用凶狠的目光注视着菲尔奇的冒险行为；这时，他又从旁怂恿说：

“敲掉它的狗牙。象它这种狗一辈子也成不了好牧羊狗的。”

“把它的牙齿敲掉？”米斯柯粗暴地问。“我也是这么想的。不过它还小，牙齿还没有长齐呢。我会立刻惩罚它的。把它

吊起来……”

菲尔奇仿佛也意识到这一点。因此，它满心的欢喜顷刻间化为乌有。它耷拉着脑袋，夹着尾巴，悄悄地、一步一停留地蹭到堤坝上来。堤坝下面的羊群已经安静下来，开始吃草了。主人把羊群安顿好以后，便朝菲尔奇走来。开始，他没有发觉菲尔奇已经呆在那里许久了．因为他以为菲尔奇是不敢走到他跟前来的。根据以往的经验，菲尔奇应该懂得，主人怒气未消时，最好不要走近他。

哎哟！你听，毫不留情的命令下达了：“菲尔奇，到这儿来！”不管天是否塌下来，也得硬着头皮走过去。面对暴君，菲尔奇反而不觉得有什么可怕的了。它低着脑袋，垂着尾巴，四条腿贴着地面，艰难、沉重地往前蹭。它慢慢地匍匐到米斯柯跟前，最后躺在他的脚旁。但是，意想不到的拳头象雨点般落在它的身上和腿上。“哎哟，我的上帝，这叫我怎么活呢？”这时候，它突然感到一阵剧疼，尤其是头部更是疼痛难忍。

这一课它早就领教过了。这一顿痛打，主要不是因为它犯了过错，或者是它好吃懒做引起的。米斯柯是个喜欢恪守老习惯，墨守陈规的牧人；当年轻牧人波迪撺掇他的时候，他要是不这样做，似乎就显示不出做主人的威风；特别是现在，他手气不济，更要在菲尔奇身上出气了。他的牧杖、拳头接二连三地落在这头弱小的绒毛狗身上。

他边打边训斥，象师傅对待徒弟，老子对待儿子般边打骂边教训。他就象对人说话那样对它说：

“我告诉你什么来着……你……你……笨蛋！我是怎么告诉你的？不是叫你跑到正面去吗？哼，你从来就不想认真理解人话。”说到这里，他那似乎刚要降下去的怒火又升了起来；牧杖、拳头又象雨点般落在躺在地上、已经吓得缩做一团、几乎都叫不出声来的菲尔奇身上。

好在米斯柯立即意识到，这样狠命毒打会伤害小狗的筋骨。他改变主意，一把抓住菲尔奇的绒毛，把它提了起来。

“你，你，你这畜生，我该怎么对付你呢？你是经不起一顿打的。”说完，便把它扔到地上。

菲尔奇趴在地上，一声不吭地躺着。说真的，这么一点大的小狗，怎么能象一个受尽折磨的奴隶那样，承受得住主人的痛打呢？

波迪却幸灾乐祸地站在一旁。他不仅不生气，反而感到高兴和舒服，因为米斯柯的全部现钱和烟袋已落入他的腰包。不过，他实在不忍目睹这种暴行，便带着教训的口吻对米斯柯说：

“得啦，别再虐待这可怜的家伙了，它也没把那头绵羊咬死嘛……”

正好这个时候，农业社主席奇斯·格保尔走了过来。他在堤坝前面推着自行车走，但立刻又骑上自行车往这边来，不一会工夫就来到他们跟前。奇斯放慢速度，向他们打招呼：

“日安，你们在做什么？”

米斯柯跳了起来。这下可糟了，农业社主席把一切全都

看在眼里啦。

“没做什么……”他显然不愿意往下说。

“哼，没做什么……这可能吗？……跟这小狗发什么脾气呀？……你们刚才到底在干什么？”他朝堤坝的另一端挤挤眼；就在那里，一副零乱的纸牌还没有来得及收拾呢。他又接着说：“牧人玩纸牌的时候，还能关照好牲畜？喂，你这头倒霉的小狗，为什么要自告奋勇呢？你到底从主人那里分到多少个劳动日的报酬？”

农业社主席从自行车上下来，把车子搁在一旁，朝躺在草地上的小狗走去，说：

“菲尔奇，菲尔奇，你怎么啦？你选择了一个坏主人，对吗？他是一个冷酷无情的人，对不对？”

菲尔奇并不立即作出反应，它的头和尾巴微微动弹了一下，用它那双恐惧的眼睛望了望这位新来的客人。对这个新来的人是不是也需要提防呢？

其实，对它来说，现在一切都无所谓了，它已经被打得半死不活。它感到伤心和委屈，觉得不如死去了清闲，因为生活对它来说并没有留下什么值得回忆的乐趣。倘若它愚蠢地干了坏事也罢，或者忠诚、热情地干了好事，完成了自己的任务也罢，都同样遭到痛打，那么这种生活还有什么值得留恋呢？

米斯柯有些赌气地说：

“这狗是我家的。我喂养它，只要我愿意，我可以叫它……”

“这些绵羊是我们大伙的，可是我们并没有向你提出更多的要求。我们只要求你根据社务委员会的决定去做，完成一个社员应尽的职责。现在我告诉你：你真是一个挺会盘算的人，妻子是属于你的，所以你拿她的劳动日。在放牧时，不是你，而是菲尔奇看护着牲畜。在它的主人玩二十一点的时候，它虽然只得到一些吃剩的面包，却要负起全部责任。”

农业社主席批评了米斯柯一顿，见他不吱声了，才骑上自行车离去。社里还有许多事情等待着他去处理呢。这里发生的只不过是一件偶然的事。他在车上瞟了畜群几眼，就顺着堤坝往谷仓的方向去了。

当农业社主席奇斯·格保尔看见那头被痛打的小狗，并狠狠教训米斯柯一顿的时候，波迪却站在一旁，无动于衷，还点头微笑呢。是的，这跟他有何相干？米斯柯的银币和烟袋不都藏在他的口袋里了吗？大绒毛狗萨乌，当它听见菲尔奇的呼叫声中夹杂着牧杖的飞舞声和咒骂时，先是朝那儿眨巴了两下眼睛，看到底出了什么事，然后站起来走开了。它想，离开愈远愈好，围观打架总不是一件好事。走到一定距离，它又蹲下，等着看主人将怎样处治自己，会不会也遭到同菲尔奇一样的命运。看着没有什么动静，它又躺下；它现在不是侧着身子，而是整个身体趴伏在地上睡去。由于它一向听不到主人叫它干什么，因此，它干脆什么也不干；也许这也是一种错误，谁知道人们的脑瓜子里都藏着些什么呢？现在发生的这件事跟它无关。它不负责看管牲畜，它的主要职责是防范狐狸和小偷。不过，现在牧场上已经没有狐狸和

小偷。晚上，牧人们大可以高枕无忧地睡大觉。随之萨乌也成了点缀品。它的一举一动都很本份，在厨房里吃了点东西后，便心满意足地走开去，不象菲尔奇，吃完东西还瞪着眼睛叫喊。萨乌表现出来的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人们给它吃，它就吃，不给它吃，它就走到牲口棚阴凉处躺下；夏天，那里特别凉爽。有时候，它那灵敏的鼻子嗅到从远处飘来的死尸的臭气，便顺着风向寻去，在那里一呆就是几天不回来。狗的祖先本来就是最聪明的榜样，它们从来不奉承那些暴君和愚汉。但它们仍能活下来；如果它们死去，也绝对不会是因饥饿致死，而是被枪弹击毙，或者是染上什么可怕的疾病而亡。现在，萨乌同样不去奉承那个拗脾气的主人，总是懒洋洋地跟随在牲畜后面。

菲尔奇躺在草地上呻吟。它的主人已经走开。那些绵羊也过于健忘了，竟然很快就把刚才发生的一切忘得一干二净。只有菲尔奇伏卧在那里，一动不动。

它伤心极了，它的思想若是能够用人的语言来表达，肯定会是这样的：——走，走，赶快离开这个残酷的主人。到深山野地里去，管它呢，死活听天由命好啦！

哎哟！那也是非常可怕的。肚子，肚子问题如何解决呢？可怕的饥饿会折磨这头小狗。在那陌生的可怕的世界里，它，一头小牧羊狗，怎么开始生活呢？它能忍受得住饥肠辘辘的折磨吗？不错，田鼠或者野鼠也可以充饥，可是要对付这些小家伙，得有耐心，甚至须要蜷伏在地上好几个钟头呢。即便如此，也不一定能经常捉到它们；它们都住在很深的洞里，

又是那么机灵……是的，这么一来就有许许多多困难等待着它去克服。可见要想获得自由与解放，也必然要经受痛苦……面包就凉水的生活总比饥一顿饱一顿的流浪生活强得多。这就是狗的命运，它是作为人的奴才而生存于世的。

米斯柯连头也不回，根本不想看看菲尔奇到底躺在哪里。他只管自己气鼓鼓地跟随在畜群后边走。他的气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波迪赢了他的钱和心爱的烟袋，这使他生气；奇斯·格保尔又在这里剋了他一顿，这也使他生气；最后，他还生菲尔奇的气，把奇斯·格保尔看见他打狗怪罪于它；另外，他还发现羊群里有一头瘸了腿的绵羊。

他想到这里，便回头朝菲尔奇瞥了一眼。相比之下，他还算得上是个软心肠的牧人；往菲尔奇身上撒气，并非出自他的本意。他冲菲尔奇说：

"起来！难道魔鬼吃掉你的心肝啦？等着瞧吧！要是你有胆量走进厨房，我会给你吃的。"

大概菲尔奇还没有被打糊涂，听到主人的声音便站了起来。但它觉得主人的气还没有全消，不敢跟在他后面走，只得支撑着疼痛的身躯，拖着沉重的腿，一拐一瘸地走在绵羊群的旁边。

米斯柯是个既缺心眼又古怪的人，他现在又想到旁的事情上去了。他在琢磨如何向社领导交差。他们一定会盘问他的。这时，他又突然感到一种莫明其妙的空虚感向他袭来，好象还有什么事没有办妥似的。他四下看了看，在寻找菲尔奇，看它是否跟上来了。菲尔奇本来是头活泼的小狗，总喜

欢在主人面前蹦蹦跳跳，看到它现在这样不声不响地跟着走，米斯柯不免感到有点内疚。那些怯懦的绵羊也懂得，要是菲尔奇伸着舌头，精神抖擞地站在主人面前听候命令，那它们大概就要被赶到别的地方去了；只有当牧人默默地走着，它们才用不着害怕这头小牧狗。米斯柯一向都是粗声粗气地呼唤它的，现在却一反常态，声音变得温和多了。

"喂，菲尔奇，到这儿来吧！"接着他又吹了一声口哨，因为狗对口哨比起话语要习惯得多，从中也容易悟出人们的意图。更重要的是，狗也懂得，人们生气时是不吹口哨的。

菲尔奇警惕地倾听着，心中还是忐忑不安。周围发生了什么事？啊，主人已经用温和、响亮的口哨召唤它了。莫非需要它做点什么？于是，它拖着疼得发抖的腿拼命朝前走，但还不敢径直朝主人走去，离主人约莫还有十步远的地方便站住，带着不安的神情凝视着主人。

"喂，到这儿来吧！这头小狗倒挺顽强呢。"米斯柯轻声地说。"下次可千万别那么干。我对你说过多少遍啦；要听话，要经常注意我的动作。"他说着，缓缓地走近菲尔奇。

米斯柯变得善良了，在小牧狗身边蹲下，心疼地抚摩着它的脑袋。他心里想，农业社主席批评的对。赌博，这多误事呀！

菲尔奇也已经体会到主人的意思。它现在象虔诚的教徒在向牧师作了忏悔之后，诚心诚意地接受主人的温存。要是它的脊背不很疼的话，兴许它还会摇头摆尾呢。

这时候，米斯柯还在含含糊糊地说：

“只有魔鬼才见过这种无法令人理解的世界。就连人们吩咐自己的狗干什么都要干涉。哼，狗是我自己养的，难道就打它不得？……”

冯植生 译

纳吉·伊斯特万

捡花生

〔**作者简介**〕 纳吉·伊斯特万(1904--1977)，工人出身的小说家，本人当过细木匠助手。他从三十年代起开始发表作品，擅长运用现实主义手法，广泛而深入地反映和描写广大工农的生活，作品中人物性格清晰，故事情节步步深入。主要代表作有：《永不停止》、《以邻居的名义》、《奥勒泽诺克的子孙》、《外城》等。

“欸，米斯柯，快回来！”

约莉丝站在走廊呼唤孩子。她一只手搭凉棚往前看，另一只手插进系在腰上的围裙里。

“欸，欸，米斯柯，快来呀！”

“干吗？”

“有事。”

孩子倔强地站在猪圈后面。大概因为现在正是四月，天气已经转暖，所以他光着脚丫子，腿肚子上沾满了泥巴；他下身穿一条短裤，上身也只穿着一件小背心。他满头大汗，泥浆溅得他成了一个大花脸，两只手从胳膊肘往下也全沾满了泥巴。看上去他活象个小泥人。

这时候，母亲还在不停地吓唬他。

“你干什么去啦？”

“我……我……挖泥去了。”

“……你给我快回来，我还有别的事要干呢。”

说完，她一转身走进门里去了。孩子万般无奈，只好磨磨蹭蹭跟着走了进去。约莉丝盛了一脸盆水，匆匆忙忙给孩子洗掉身上的泥巴。

“……妈妈……”米斯柯嘟哝着。这时，母亲正在用脸巾替他抹去脸上的泥斑。

“说呀！……”

“我给你带花生回来了……”

“现在哪儿来的花生？花生只有秋天才有呀。”

“有。瞧，这不是吗？是我从地里捡来的。”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把花生递了过去。

约莉丝从孩子手心里接过弹丸大小的花生。

“可不，都是去年捡剩的。你赶快把饭送到地头去。告诉你爸和外公，那匹马快累死了，别狠命使唤它。地来得及耕完的，不用太着急，反正也没有人来催咱们。你听明白了吗？好啦，快走吧！”

其实，这一番话与其说是对孩子讲的，不如说是对自己讲的更恰当些。

米斯柯带上饭盒，踩着门前的干草，一溜烟跑到天井外面去了。这时，远处传来拖拉机开动时发出的轰隆轰隆的响声。孩子突然站住了，一转身又跑了回来。

“你听到了吗，妈妈？”

“听到啦。难道就你一个人听到？傻孩子。”

“哈，哈，拖拉机在耕地啰。”

“耕的是他们的地，又不是咱们的。快去吧，不然你爸又要追问你在什么地方呆那么久啦。”

她终于把孩子打发走了。在阳光下，只见一个小点子般的人影在向前飞跑。

约莉丝仍站在原地不动，愣神地凝视着前方。她整个的心都被拖拉机吸引住了。她索性走到屋外牲口棚旁，站在那里瞭望。这里比较阴凉，也看得清楚些。她看见那乌黑锃亮的拖拉机正在慢慢悠悠地、象人们喘息似的吃力地翻耕着土地。那一大片土地是属于农业社的。

“耕得多快呀！”她心里想。“昨天才开始的，今天晚上恐怕就能耕完村边这一大片地了。我们家真倒霉。魔鬼才知道，这个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猛然，她又想起该给那群小鸡喂食了。她转回去快手快脚地把只经过粗磨的麦粒撒在地上，一群小鸡立刻随着母鸡啾啾啾地围了过来。接着，她又往那长方形木槽里添水。

“咕咕，咕咕，吃吧，吃吧！”她边说，心里边想：要是拖

拉机也到自家地里干活，该有多好呀！同时，跟社里的妇女们一道下地干活，比呆在家里欢腾多了。可是为了申请入社的事，她和丈夫跟自己的父亲闹了好几回，总是不欢而散，几乎都快闹翻了。老头太固执，不管别人怎么说，他就是一个主意：不肯入社。她一想到这，心上似乎压着一块大石头。

米斯柯带着饭盒和一小口袋花生一口气跑到地头。他先把装花生的小口袋放在一丛野玫瑰下面，用他头上的那顶小帽子扣着，再把饭盒放好。然后他用两只手做成一个圆筒，对着正在地里忙活的外公和父亲叫喊：

"外公！——爸爸！——快来吃饭啰！快——来——吃——饭啰！"

这时，米斯柯的父亲正站在田埂上。他是一个健壮的中年人，脸膛晒得黑里透红，大滴大滴的汗珠正往下淌，衬衣袖子卷得高高的，露出一双刚劲有力的手臂。他听到儿子的喊声，略微抬头望了望，把帽子往后脑勺推去，但双手仍然稳稳地把着犁，装着什么也没有听见的样子。孩子听不到回答，又接着叫喊：

"爸爸——"

"马上就来——"

米斯柯有点撒娇地一再催促着他们，以便自己能早点在那些新翻耕过的地里捡花生。

同柯瓦茨·米哈依一起在地里干活的还有他的老岳父斯格雷什·佩斯特克。这时，铁犁正在一深一浅地翻耕着土地。柯瓦茨·米哈依迈着结实的步子，小心翼翼地跟在后面；在

前面拉犁的是一匹瘦弱的老马，它已经疲惫不堪，踉踉跄跄，看样子它是用了吃奶的力气来拖曳着铁犁的，但还是东歪西倒，活象一个步履蹒跚的老人。

斯格雷什·佩斯特克走在前头。他那双晒得光亮、满是皱纹的手用力握着缰绳，脚上穿着一双皮靴，步子非常稳健。有时，他从紧咬着的牙缝里挤出一两句话：

“嘿……嘿……上帝赐给你以痛苦，你就忍着点吧！”

土地异常干燥，有些地方已经龟裂。去年冬天只降了一场不算大的雪，可是从那以后直到现在，再也见不到雨雪了。犁被艰难地拖曳着前进。那匹老马显得愈来愈有气无力了。柯瓦茨·米哈依实在不忍心，便赶紧把犁卸下来。

“岳父，咱们让它歇一会儿吧！”

老头一把抓住缰绳，狠狠地把笼头松开。

“……我的上帝，……真他妈的见鬼！”

柯瓦茨·米哈依把犁放好，跑过去帮他。

这时，那匹老瘦马似乎感到一阵轻松，因为加在它身上的重负已经卸下来了。它踢蹬着前腿，挣扎着往前走了几步；它的皮和毛色仿佛也有点与往日不同了；它嘶叫着，不停地打着响鼻，带血的泡沫不断地从嘴巴和鼻孔里冒出来。

老头惊慌地跳到老马身旁，抚摩着它的脊背，神情显得十分沮丧，可是嘴里还是不干不净地谩骂着。

他的女婿尴尬地站在一旁，毫无希望地摇晃着脑袋。

“这马太劳累了吧？”

“嗯，真他妈的……”

“这马看样子快死啦！”

“嗯，只有魔鬼才知道。”

老头有点敌意地踢着摆在小土丘上的犁具。

“你还是先来吃饭吧，那些东西来得及收拾的。”

老头走到树荫下。这时候，柯瓦茨·米哈依已经把面包切好了。老头拿起一块面包，用小刀片了一小块腊肉，夹在面包中间往嘴里送。

“这孩子又溜到哪里去了？”老头四下望了望，寻找他的外孙。

“大不了就在附近的什么地方转悠呗……”

在地里，米斯柯正弓着腰，象头猎犬机警地奔跑着。外祖父一看见他，就冲他叫喊：

“你在那里找什么？”

“找花生。”

“找花生干吗？”

“吃呗……”

“找到了没有？”

“不多，……犁得不够深，还没有把地里的花生全都翻上来呢！”

老头听了这番话，心中不免一怔。

“嘿，你怎么知道的？”

“我找过了……”

“嘿，那你就仔细找吧，会找到的……”

这时，米斯柯反而不找花生了，却径直朝那匹瘦马走

去。马正躺在地上大口大口喘着粗气。孩子向它弯下身去，习惯地把它的头扳过来，抚摩着。瘦马冷不防把它那满是血水泡沫的污秽马嘴对着小孩伸去。米斯柯被吓得跳了起来，拼命朝父亲和外祖父跑去。这时，他们都默默无言地各吃各的饭，谁也不朝那匹马瞧一眼，仿佛早把它忘掉了似的。

米斯柯飞快地跑到他们身边。

“外公……爸爸……咱们的劳拉①快要死啦！”

但是，出乎他意料的是他们连眼皮都不抬一抬。

“听见了吗？那匹马快死啦！你们去看看吧……它正躺在那儿呢。”

老头摇摇头，慢慢地闭上眼睛。

“它是在休息，……因为……”

米斯柯上气不接下气地继续叫喊：

“可是为什么它的鼻子和嘴巴老在喷好多好多血红的泡沫呢？”

“喂，你给我安静点好吗？”

这时，孩子反倒楞住了，只好把滑到嘴边的话又咽了下去。父亲那双生气的眼睛正对着他看呢。在这种时候，最好不要挨近他。米斯柯有点懊丧地从树后悄悄溜走了。

老头大概吃饱饭了。他合上小刀，用一根小树枝剔去塞在牙缝里的渣滓。

他的女婿忙着装好一袋烟递过去给他，接着自己也点燃

① 马的名字。

一支烟。

“你老人家听见了没有……喏，我晚上去报名参加。”

“参加什么?”

柯瓦茨·米哈依正用舌头舐着纸烟。

“农业社呗!”

老头使劲在手心上敲打着烟斗。

“就因为那台拖拉机?”

柯瓦茨·米哈依只管耷拉着脑袋，连看也不看他一眼。

“唔!”

斯格雷什·佩斯特克又点燃了烟，狠命地把烟斗吸得吁吁作响。他把那只用袜筒改成的烟袋细心系好，用他那青筋暴露的大手把烟袋塞进内衣口袋里。随后，他仍然一声不吭地坐在那里。

柯瓦茨·米哈依也漫不经心地吐着烟圈。他尽量在抑制内心的激动。

“你也看见了，这匹马说话就要断气的。没有马，往后你打算用什么来耕地?”

老头大声地咳嗽着。

“没什么打算。”

“可不，事实上也正是这样。”

“欸，依你说该怎么办?”

老头把烟斗叼在嘴角上，又接着说：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好，哼……可是跟他们在一块，我可不干。”

“那是为什么呢？”

“为什么？这很简单嘛。就因为这块土地是我的，只有我才能在这里干活。就是到我干不动了，也不许别人到这里来。”

柯瓦茨·米哈依打了个立正，皮靴的后跟咔嚓响了一声。

“我们也不许吗？”

老头踌躇了片刻：

“你们？”

“嗯，我们。我、约莉丝，还有米斯柯。”

斯格雷什·佩斯特克霍地站起来，转过脸，背对着女婿。

“嘿，当初你回来的时候，要是马上提出要求，你也会分到一份土地的。”

“如果你早这么说，我自然会提出来的。”

“哼，现在我就这么说……”

“这么说……魔鬼才知道。我现在算是弄明白啦。你想捆住我的手脚。这块地里，别说一匹马，就是两匹马也嫌少呢！好啦，现在连这匹马也要完蛋了。”

老头害怕把事情弄僵，口气马上缓和了些：

“我们可以雇短工来帮忙嘛。”

“我的上帝，雇工！你用什么来付工钱？”

“用现金。”

“我明白啦，你又想在那窝小猪仔身上打主意了吧？”

老头用握着烟斗的手作了一个手势，表示女婿猜对了，他的确是这么想的。

"不错。"

听他这么一说，柯瓦茨·米哈依有点不耐烦地瞥了他一眼。

"我们不是已经说好，要用卖小猪仔的钱去买一头牛犊吗？"

"现在只好不这样做啰。"

柯瓦茨·米哈依急得蹦了起来。

"不这样做了？"

"我们暂时还不需要牛犊，……等到秋后再买一头奶牛算了，……用卖粮食的钱去买……"

"哼，你有钱就去雇工吧！反正小猪仔我是不卖的。我已经满足了，我不想当富农。你自个儿往前奔吧！我真不明白，你为什么不睁开眼睛看看世界？现在跟从前已经大大不同了，完全是两回事，两个世界了呀！现在不允许任何人不劳而获。道理很简单，要是你再这样做，别人就不答应。"

"噢，原来你们都是一个鼻孔出气的！"

"哼，我们！……正因为你象个木头人，要人把你插在地里的腿拔出来。你不但瞧不起新鲜事物，还要咒骂。你现在不能把那些小猪仔卖掉！等它们喂大了，用卖猪的钱来买牛犊……无论如何都得这么办！"

斯格雷什·佩斯特克还是直摇头。

"米哈依，俄国人在战俘营里把你改造得真好哇！"

"是的。在那里我亲眼看见人们怎样管理农庄。这一点，你连做梦也想象不到呢。我懂得，要这样做，就得跟大伙在

一起互助合作。”

“就跟从前那些穷鬼在一块？……象在集市那样，乱哄哄的？……”

柯瓦茨·米哈依的面孔刷地一下通红了。

“我听明白啦！你是知道我的底细的，在我还没有娶约莉丝以前，我也是扛长活的，如果我不是一个要强的孩子，我今天的遭遇就可想而知了……以前，我是别人的一只狗，后来就成了你的狗啦！……不过，现在我已经受够了。”

老头也有点急了，正了正头上那顶油腻腻的帽子。

“谁有痛苦，自己去消除好啦！”

说完，他调头朝那匹老马躺着的地方走去。

柯瓦茨·米哈依急忙转过身，看见老头走了，马上拔腿紧跟在他后面。他一边走，一边沉思着，又点燃一支烟，狠狠地吸了一口。这时候，阵阵凉风把拖拉机的隆隆声吹送过来。

孩子神不知鬼不觉地又转回来了，蹲在他们身旁。

“听见了吗，亲爱的爸爸？”他有些胆怯地问。

父亲瞟了他一眼。

“什么？”

“拖拉机……”

他们侧耳倾听着。

“听见啦！……”

刹那间，孩子又鼓起勇气，问道：

“他们为什么不到咱家地里来犁地呢？”

"谁呀?"

"就是那些拖拉机手呗。"

柯瓦茨·米哈依听着远处传来机器的喧闹声，低下头端详着自己的儿子，仿佛喉咙被什么东西堵住似的，一下子找不着适当的话来回答。

他感到耳根有点发烧。突然间，他很和气地对儿子说，其实也是对自己说的：

"甭担心……他们会到咱们地里来干活的。不用太久了!"

老头把那匹躺倒的老马艰难地拽起来，想把它牵回家去。老马勉强站立起来，趔趔趄趄地朝前走着。

到离家不远的玉米地旁，老马实在支持不住了，一头栽倒在玉米地里，连腿都来不及蹬一下就断气了。

斯格雷什·佩斯特克看到这情景，知道一切都完了。他一边破口大骂，一边快步走到家里，从牲口棚旁边抄起一把铁锹，想赶快把死马埋掉。他窝着一肚子的火，可是又不得不赶紧把这事给料理了，以免发生传染病，影响其他牲口。

柯瓦茨·米哈依这时却在猪圈旁走来走去，样子显得很激动。

老头小心翼翼地在玉米地里用脚步量着坑的宽度和长度，盘算着该挖多深。接着，他闷不作声地埋头挖土。挖得差不多深了，他才转身冲柯瓦茨叫喊：

"欸，欸，快来……"

柯瓦茨·米哈依仿佛已经歇够了，一听到他的喊声，便顺从地向他走去。他们俩把那匹死马半抬半拽地拖到挖好的

土坑里去。柯瓦茨·米哈依拭去脸上从额角淌下的汗珠，随后又用他那双有力的大手挥动着铁锹，迅速往坑里填土。

“嗳，你就在这里安息吧！……”老头站在一旁，难过地说。

柯瓦茨·米哈依把坑填满以后，低垂着脑袋独自一人先走了。

只有老头还接着细心地把土一锹一锹往上填，还不时用脚踩几下，想把它埋得结实些。

这时候，米斯柯又从地里飞快地跑回来，满头大汗，直喘着气，站在外祖父面前。在他的短裤上沾着许多带刺的球茎。

“外公，我把那堆东西都带回来了！……”他上气不接下气地说。

老头直起腰来，停下手里的活。

“你打算给谁？”

“我自己，也给你们。”

“你到底带了些什么回来呀？”

“还用问，花生呗！”

老头把铁锹靠在自己的大腿上，顺手把裤筒卷起来，然后才把手伸到孩子面前：

“拿出来我看看。”

“你瞧，在这儿呢，……你看见我是从哪里捡来的吗？”

“从什么地方捡的？”

“就在沙布·山陀尔爷爷的地里……拖拉机正在那里耕

地……你记得吗？你对我讲过，千万不要到别人地里去捡……可是现在实在没有办法。咱家的地要是也让拖拉机来耕一耕，准能捡到好多好多的花生。”

“我以前对你这么讲过吗？”

“嗯，是讲过的。”

“那不过是开个玩笑。”

“不，那时你是很认真地讲的……”米斯柯顽皮地蹦到马坟上，又搬来一块石头放在坟顶，象给马坟做了一个圆圆的坟头。他弓着一条腿，另一条腿干脆跪在新造的、还散发着浓郁泥土香气的坟上。

斯格雷什·佩斯特克沉思着弯下身去，帮孩子把沾在短裤上带刺的球茎一颗一颗扒拉下来。过了一会儿，米斯柯冷不防站起来。

“外公……”

“什么……”

“你为什么不买一台拖拉机？”

“我？”

“嗯！”

“因为我没有那么多钱。”

“沙布·山陀尔爷爷有钱吗？”

“不，他也没有那么多钱。”

“那在他地里的拖拉机是谁的呀？”

老头用教训的口吻对孩子说：

“噢，那不是他买的……”

“到底是谁买的呢？”

外祖父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谁都不是，拖拉机是政府的。”

刹时，米斯柯睁大了眼睛，因为他被弄得愈来愈糊涂了。

“谁是政府呀？”

老头无可奈何地摇摇头。的确，一下子很难找到合适的话语向他解释清楚。

“嗯……政府嘛……政府的就是大伙的……”

“也是咱们的吗？”

“嗯，当然是的。”

孩子歪着脑袋，思索了片刻，突然脱口而出：

“那为什么拖拉机总不到咱家地里来翻地呢？”

斯格雷什·佩斯特克被他盘问得有些心慌意乱，不免恼怒地嚷嚷：

“走，快去玩去……嘿，你这小淘气。”

米斯柯并不离开，他一言不发，缩着小身子蹲在地上，用双手把那些稍好一些的花生挑出来。老头看着他的动作，刚才他们俩的对话仍在他的心里萦绕着。跟着，他也蹲在地上，脑袋仿佛猛然膨胀起来。他心里想：沙布·山陀尔是他从前当兵时的好伙伴，现在沙布·山陀尔也有十五霍尔特①土地，早些时候就参加了农业社。难道自己真的落后了吗？单干，单干，最后还不是落到今天的下场！现在，不但村里

① 匈牙利土地面积单位，一霍尔特约合0.57公顷。

的老朋友、女婿和女儿不同意他的作法，甚至他的外孙也反对他！……他蓦地站起来，脸上露出的坚决神情，说明他已下了决心。他把铁锹往肩上一放，急匆匆朝家里走去。

他走进院子，在走廊把脚上那双皮靴脱了下来。

“喂，米哈依，”

女婿此时正在屋里擦皮靴，那是在节日时才穿的。

“我在这儿，有事吗？”

“几点了？”

斯格雷什·佩斯特克走进屋里，又接着问：

“你在换衣服？”

“是的。”

“上哪儿去？”

“农业社。”

老头这时也把外衣脱下，找出一套稍微干净的衣服准备换上，他边扣背心纽扣，边说：

“你等我一会儿……我也换衣服。”

柯瓦茨·米哈依刚把脑袋伸进套头衬衣的领口，听他这么一说，不由得惊讶地问：

“你要去哪儿？”

老头抬头瞟了他一眼。

“我同你一道去农业社，这样是不是更合适些？”

这时候，柯瓦茨·米哈依终于明白了他的意思，会意地含笑说：

“好呀，那你就快一点吧！不然会迟到的，天都快黑了。”

老头忙用干净的布先把脚裹起来，然后才把脚伸进皮靴里去。他听到女婿这番话，便向他挤挤眼睛。

“不要紧的，村子里已经装电灯了。嘿，魔鬼才知道该叫它什么？……”

说完，他们俩都同时放声哈哈大笑。

他们俩一前一后走出家门。斯格雷什·佩斯特克走时虽没有告诉女儿，他们在农业社办完手续后要马上回来，约莉丝还是站在门口，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他们的背影，压在心上的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一股甜蜜的暖流缓缓地流经她的心房，使她感到一阵轻松和愉快。

旭遇桢　译

多保耶·伊姆雷

骤 雨

〔**作者简介**〕 多保耶·伊姆雷(1917——)匈牙利著名小说家；当过新闻记者，现任匈作协主席。曾获得柯苏特奖。作品主要描写和反映农村生活的变迁，社会主义农业发展等问题。重要代表作有小说：《春风》、《云和太阳》、《村西的夜晚》、《平凡的故事》、《昨天与今天》、《公主的脚凳》以及剧本《风暴》、《明天继续》、《春天来了》和电影脚本《暴风骤雨》等。

米斯柯在波托夫妇走进办公室时，立即放下手里的工作，用胳膊肘把账本往桌子边推去。他多次听到人们提到波托·伊斯特万，也早就对这个人产生好奇。这个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

瞧，现在这个人就站在他面前。波托的个子说不上魁梧，

也不算矮小，体形不胖不瘦。说他是个中等个子，不如说他身材匀称更为恰当些。两个肩头之间长着一颗端端正正的脑袋，腰板笔直，卷起的袖子下边露出来的手臂是深褐色的，很结实，象是磨光的核桃壳。这不是一双农民的手——米斯柯心里想，不免产生一种羡慕感——他的手多小呀！比我的手还要小呢……米斯柯边想边打量着这个站在办公室中央的人。他的两鬓已经斑白，大概总有五十岁上下了吧。他脑门下的鼻子象从马鞍形的狭谷中冒出来的一个山包，鼻梁笔直，鼻尖发红，使他的脸看上去既冷漠又显出某种忧郁。其实，他的目光是热切的，厚嘴唇说明他为人憨厚，向左右两边分开的小胡子修剪得整整齐齐。

“日安！”波托跟米斯柯打招呼，听他口气，仿佛在说：我来了。

他那有点下垂的双肩微微抖动了一下。这个动作很微小，不过米斯柯还是觉察到了。用肩膀扛重物的人常常爱做这种动作，因为扛东西时间长了，肩上的肌肉被压得发紧、发疼，一旦卸下重物，肩膀顿时感到一阵轻松，往往会下意识地做出这种动作来。

农业合作社主席用两只手撑着写字台，上身微微向前倾斜，撅着嘴，脸上流露出很有兴味的神色，等着波托把话说下去。他从波托的声音和动作看出，这个一向沉着、自信的男人还要把他踏进农业社办公室的一切原因全讲出来。农业社主席象个刚听完新郎表态的证婚人，满脸堆笑，正准备参加庄严的婚宴呢。这时，米斯柯脑子里自然而然地想起农业

社主席平日对他说过的有关波托的一切情况：波托是一个精明的农民！如果他站到我们这边来，全村的人都会跟在他后面跑。他可是个神通广大的人物，甚至能把不需要偿还的十万福林贷款弄到手！……他的事迹三天三夜都说不完。现在，农业社主席大概是过于兴奋，舌头也变得不太好使唤了。

“欸……，我们该怎么办？”听他问话的口气，仿佛他不知道波托是为什么事到办公室来似的。这并不奇怪。很久以来，他就盼望着这一天，现在波托终于来了，他心中感到一阵胜利的喜悦。

“给我一张卡片。”波托说。

“噢，您先坐下。这可是一桩大事！娶媳妇也没有这事重要哩。结婚只不过意味着向单身汉生活告别。可是现在却是要向生活中的那一切——慌乱、乱七八糟的经营管理，以及许多令人头疼的事告别……”

波托的嘴角上掠过一丝笑意。可是，这一闪即逝的微笑却把农业社主席的话打断了。农业社主席用惊奇的目光注视着波托，好象是说：喏，等了这许多年，您终于鼓起勇气提出入社要求了；然而我对您的任何一个小小的表示也不会放过，对您我得小心点。农业社主席对于这种表示是有经验的。说得难听点，农业社主席每天夜里都得在床上要点手腕，哄着妻子，因为他妻子干了一天农活，累得精疲力竭，总想早点好好睡一觉，可是他不仅是农业社主席，也是个男人，所以他只要发现妻子有那么一点点表示，就得立刻用甜言蜜语讨取她的欢心。

“好吧，”现在他却装作不高兴的样子嘟哝着，顺手从写字桌抽屉里取出一张卡片，说得准确些，是一份入社申请书。“要是您不善于词令，就签个字好了！……这间屋子是裴多菲农业社办公室，可不是富农聚会的地方。”

他轻松地说着，拿起一支蘸水笔递给波托。

米斯柯也尽量装出一副笑脸。他喜欢这个庄稼汉，愈看愈觉得这个人有一股吸引人的力量，叫人赞叹不已。过去，米斯柯对他毫无了解，现在从农业社主席对他这种既随便又亲切的态度上可以看出，波托是受欢迎的。米斯柯喜欢他这种冷静的态度和经过深思熟虑的决定，尤其喜欢他刚才一闪而过的笑意，这不仅代表他的风度，也说明他的内心活动；看得出，这个精明能干的庄户人身上还具有优雅、智慧的幽默感。是的，这种人懂得自己该做什么……

波托接过笔，二话不说，在卡片上严肃而迅速地签了名。这时，农业社主席又取出另一份入社申请书，象打招呼似的转向波托太太：

“欸，玛丽斯，您也想好了吗？”

大概过了许久，也许是几天或者几个星期以后，米斯柯才真正感到奇怪，他当时为什么居然没有注意到那个女人。原因可能是波托作为坚定、沉着中具有炽热力量的形象充塞着整个办公室。再者，波托太太站在丈夫身后，因此不引人注目。米斯柯连看也不看她一眼，一个老农民的老婆有什么可看的。根据做孩子时和现在的经验，他对那些在丈夫的庇护下生活的农妇是有足够认识的，她们总是不愿意表示自己

的意愿，只有问到她们，她们才不得不开口。

波托太太不自然地望着农业社主席。

“我?”她神情迟钝地问，“我?”

她稍稍向前迈了一步，扯了扯身上的羊毛衫口袋，没精打彩地打量了一下办公室，仿佛刚从沉睡中醒过来似的。两个男人——米斯柯和农业社主席，还有办公用具，摆着墨水瓶的桌子，粗笨的椅子，吊挂在天花板中央因积满灰尘而显得昏暗的电灯，所有这些仿佛丝毫也引不起她的兴趣。

农业社主席笑了。

“当然是您，”他说着，眯缝着眼睛四下看了看，“这里只有一个玛丽斯嘛，难道还有我看不见的另一个玛丽斯吗?”

在米斯柯看来，波托是个非常有意思的农民，因此对他的妻子反而没有多加注意。可是现在使他吃惊的是，他发现波托太太根本不是一个老农妇，而是一个相当标致的小媳妇，比她丈夫起码年轻二十岁。一个如此健康、热情，总是怀着某种渴望的少妇，一个年过半百男人的妻子，过份显露自己的青春也许会被当作是一种无耻。尽管那个女人象一根毫无知觉的木桩笨拙地立在那里，米斯柯却把她从头到脚打量了一遍，心中顿时产生一种饥饿感，一种无耻的渴求和贪婪而又得不到满足的饥饿感。她身上散发出一股令人心醉的青春气息，刚才仿佛还是平淡、烟雾迷漫的办公室顿时洋溢着红光和异样的香气。他的眼睛象苍蝇叮着蜂蜜似的，紧紧盯着波托太太那健美、高挑的身躯。他的眼睛简直无法朝别处看。那个女人每当呼吸的时候，她那丰满的胸脯好象不耐烦

地起伏着。她那光滑、白皙、肉感的脖颈从绷紧的蓝格羊毛衫领子里伸出来。如果她那线条分明的嘴唇不闭得那么紧，以至看上去有点令人生畏；如果她那双仿佛刚从沉睡中睁开的甲虫般大小的棕色眼睛里射出的不是那么空虚、迟钝、迷惘的目光，她的脸蛋会漂亮得多。她丈夫身上长的全是脑髓，而她身上长的全是肉——米斯柯想——她丈夫为生活而奋斗，而她纯粹只会长肉……他愈是比较这对夫妇的体态、特点、声调和动作，就愈来愈有兴趣地望着那个男人，愈厌恶那个女人。他想，夜里他们躺在床上，波托脑子里考虑的必定全是经营管理上的事，一双精明的眼睛会在黑暗中象钻子似的把整个床铺都钻个遍，而他的妻子，也就是这个没有头脑而又放荡的妖妇却把自己热呼呼的身躯和大腿靠过去，贴着他，情情愿愿地委身于他。米斯柯心中顿时感到一阵愤怒，单身汉的孤独感冲击着他。我会满足你的——米斯柯无声地狞笑着——我要揍你一顿，把你全身挠个遍，你可以大声尖叫……然后我再对你这个饥不择食的女人强行非礼。想到这里，米斯柯心里突然产生一种兽性的渴望，身上火烧火燎，牙齿咬得格格响。

“喂，”农业社主席鼓励那个女人说，“您的嘴巴难道被封住啦？”

波托太太耸耸肩膀，说：

“我丈夫已经签了字。这就够啦。”

“您丈夫！不错，他的手续是办完了。可是您呢，难道您不愿意加入农业社？”

"我说过我丈夫……他已经签了字。"

"您要明白，现在是谈您的事。也就是您是不是愿意加入裴多菲农业社的问题。您打算怎么办呢？"

波托太太把手从羊毛衫衣兜里掏出来，双手笨拙、无力地往下垂着，神情茫然，脸也似乎变了形：她脸上笼罩着惊恐的神色，嘴角焦虑地往下撇，眼神突然变得呆滞，但从羞怯中又流露出激动的光芒。

"我……我要求什么？"她问道，突然瞪大眼睛看看这个，又瞧瞧那个，仿佛想从他们那里找出答案似的。

"喏，喏，玛丽斯，"农业社主席边说边作了一个手势，象牧师为信徒祝福似的，"我知道您是个顺从的女人，可是您也不要老是那么服服贴贴呀！"

这时，米斯柯在猜想，这个女人一般是不好表现自己的。看上去她真的就是这样一种女人，如果他刚才只注意到她那健壮而又显得笨拙的身躯，那么，现在从她孤立无援和困惑的神态看，她还是个缺心眼的女人呢。

波托温和地说：

"在家里我忘记说了……你也得签字……"

"我？"

农业社主席有些烦躁地说：

"当然是您。在我们的农业社里，妇女同男人一样，都是说话算数的……按人头，一个算一个。亲爱的，别那样盯着我，好象我会抢您的面包吃似的。您要知道，妇女连自己的名字都不敢说出来的时代早过去了。"

也许农业社主席就象户籍登记员在人们结婚时说话那样，对成百个农妇都说过这番话；他的声调既不高昂，从中也听不出有任何新的东西，可是波托太太却好象是听到一份正式声明似的。

波托微微冲她点点头，脸上露出一丝笑纹，以示赞同。

“是的，现在的世道不同啰，”他淡淡一笑，“你就签吧！”

波托的微笑正象刚才那样：一闪即逝，包含着某种智慧。现在，米斯柯对他的微笑并不在意，而是好奇地望着那个女人，看看她此时此刻是怎样从刚才的激动中产生令人惊异的变化：从头到脚笼罩着她的那条轻柔、半透明的纱巾仿佛被掀开了，露出了她那强壮、健康的躯体，从而增加了她肉体所产生的魅力，突然，她的头脑似乎又恢复了思考，脸上流露出怀疑、激动和希望混杂在一起的神情，象散兵线上的士兵一拥而上，直往前冲似的，这种复杂的思绪从她内心深处杂乱无章地掠过她那冷漠的脸庞，最终掀掉她那笨拙的假面具。

“那么，……我写什么呢？”波托太太问。

“您瞧，”农业社主席边说边把卡片递过去给她，“就在这里，您看，就在这上面。”

“要是说现在的世道跟过去不同……那么，我签什么样的名字呢？”

波托摇摇头，觉得有必要对妻子的无知辩解。

“你总知道你的名字吧！”他象教训孩子似地对她说。“别磨蹭了，咱们有咱们的事要办，他们也有他们的事要办呀。”

“是的……那我马上就写上波托·伊斯特万太太。可是……我能不能把我做姑娘时的名字也写在旁边呢？”

“当然啰，”农业社主席安慰她说，“两个都要写上。”

米斯柯对此不理解，然而却感觉到那个女人此时此刻正为某种事情，也许正为平息自己的激动情绪而尽力克制自己。她认为把做姑娘时的名字也写在卡片上是至关重要的。她也许把这视为命根子，象一棵被移植到新土壤去的树，担心能否活下来……

波托太太用胳膊肘在桌子上支撑着，慢悠悠地签字：先在卡片上写上波托·伊斯特万太太，又在旁边写上原名柯瓦茨·玛丽斯。然后她又深情地望着那张卡片；这时，她的脸部表情是温顺、和蔼的。她象个不常有机会欣赏美丽风景的人那样，恋恋不舍地望着那张卡片。农业社主席却把卡片一把抓过去，签上自己的名字，然后伸出他那只肥胖的大手，象抚摩牲口棚里的肥猪那样抚摩着卡片。

“今晚开社务会。”农业社主席高兴地说，又对波托眨眨眼睛。“我们会把这两份申请交给社务会，然后再考虑您的工作。您可以期待人民对您的高度信任……现在我们不是什么人都让入社的，这一点您知道得很清楚。”

波托什么也不回答，可是从他脸上的表情可以看出，他是懂得这一点的。他分别同农业社主席和米斯柯握手后，掉头就往外走。波托太太没有伸出手，这她连想都没有想过呢。她带着一双沉思的目光，跟随丈夫往外走——米斯柯注意到——还没有迈出门槛，她的脸又开始变得冷漠、呆板

了。

农业社主席满意地搓着双手。

“喂，亲爱的朋友，”他边说边咂咂嘴，“这可是一顿美餐呀。裴多菲农业社对他唾涎已经五年，现在我们终于把他吞下了。十八霍尔特土地、三匹马、两头牛、一辆大车、一辆轻便马车、一部刈草机、一部筛选机，还有其他农具，可了不得哟。得给他个副主席当当……上帝让他生来就是当司令官的；您用不着担心，他不会用大声吆喝，而是用智慧来指挥别人的。”

农业社主席高兴地从抽屉里拿出一支雪茄，点燃后神气十足地抽着，不到一分钟，办公室里就充满了烟雾和雪茄味。

“米斯柯，我亲爱的朋友，您听我说，”他兴奋地接着往下讲，嘴里喷出令人难以忍受的烟味：“这个波托，二十年来，这块土地的土地爷对他这个庄稼汉也不得不佩服得五体投地呢。‘我的朋友，’土地爷对他说，‘我的经营管理方法已经够现代化啦，可你播种的土地上长的庄稼怎么总比我的长得好呢?’这个波托……您想他怎么回答？当然，您也是想不到的吧！波托回答说，您尊贵老爷的财产是土地，而我的财产是面包……您不信？他的的确确是这么说的。别看这个波托平日话不多，可一开口就说到点子上，说得好极了。比如说，有一次……”

米斯柯的眼睛被烟雾刺得发痛。他不管农业社主席正说到兴头上，站起身去把窗户打开，注视着院子前面那些刚发

芽的栗子树，陷入沉思。春天来了——米斯柯思索着，突然一阵缺少伴侣的孤独感涌上心头：——可我仍然象一只流浪狗，独自生活，让一切全都见鬼去吧！

他从窗户前猛然回过头，脱口而出：

"主席同志，您说说，这个波托……不经常打老婆吗？"

农业社主席惊愕地注视着米斯柯。

"您从哪儿来的这种荒谬想法？波托可不是那种人，他从来没有欺侮过任何人，起码我没听说过……"他狠狠地吸了一口雪茄，再把烟吐出来，烟雾恰好象一朵蔚蓝的云彩，笼罩着他的整个脑袋。"当然，从来没有人专门去打探过他们的私生活。从前，这里有一个叫巴基茨的敲钟人，胆小怕事，连二都数不过来，见到牧师的狗也脱帽子；可是有一次突然听说，这个胆小如鼠的巴基茨也象一个堂堂男子汉那样，把老婆揍得半死。那个可怜的女人足足有一个星期没敢在街上露面。原来她身上、脸上被打得青一块、紫一块的。朋友，您瞧，人从来就是不可捉摸的。"

……第三天，米斯柯陪伴着波托去巡视农业社。新上任的农业社副主席证明自己是一个很有远见的经营者和杰出的伙伴。当然，只要他愿意，随时都可以看到农业社的土地，因为他原来的土地就是跟农业社的土地联在一起的。不过他可不是一个专爱挑毛病的人，也从不抱着好奇心去窥探裴多菲农业社的经营管理。在巡视过程中，他偶尔也对耕地、播种、牲畜饲养等问题讲出一两点中肯的意见，这使米斯柯心里暗暗大吃一惊；因为这个没有受过教育的农民多么懂得准

确地运用概念呀，形容词也使用得很恰当，他说出来的话既简短又意味深长。他看到一块长得很不好、正要翻耕的紫花苜蓿地，便说：造肥材料。米斯柯认为这就足够了，也许对这块苜蓿地可以说上十句，但波托经过思考和选择，只把实质突出地点出来。在更多的场合，他什么也不说。在牲口棚，饲养员正在给牲口饮水，波托来回走了一圈，有时流露出满意的神情，有时两眼又射出不耐烦的严厉目光。米斯柯自认为是熟悉裴多菲农业社全部牲畜的行家，见波托一头牲口也没有认错，心中不免暗暗称奇。

在远离牲口棚、堆放着低矮的草垛的打谷场上，波托点燃一支香烟。他沉思地凝视着前方，仿佛心里在盘算着什么，然后转向农业社的农艺师。

“您是怎么想的呢？”他问道。

他们彼此客气地以“您”相称。是的，他们之间既没有时间，也还没有机会相互了解呢。

现在，米斯柯脑子里正想着别的事情。他们在一起巡视农业社各项设施时，米斯柯就一直注视着这个庄稼汉，脑际里闪现出一个顽固的问题，象一只怎么也赶不走的黄蜂：这个能够觉察出农业社一草一木、牲口和土地存在的问题，并迅速作出反应的人，对自己妻子的本性能认识多少呢？这个问题已经有十次溜到米斯柯的嘴边，米斯柯十次都把它咽了回去。现在他又把它再次咽回去了。他想：要是我问这个波托提出这个问题，他会立刻觉察我对他妻子有非份之念。其实，根本谈不上……想到这里，米斯柯不禁感到脸颊火辣辣

的。

他的耳朵终于听到波托的问话了——他不知不觉地已经适应波托的缄默——也想三言两语地回答他。

"我在这里工作一年半了，"他说，"还有许多事情要做。裴多菲农业社不仅仅是由小生产者简单组合的大集体……还应该是现代化的农场。"

波托朝小土岗走去，过了一会儿，他说：

"是少了些。"

"少什么？"

"耕地至今还没有翻耕一遍。"

这一异议使米斯柯感到懊丧。在他看来，这是波托作出的第一个仓促判断。

"我们已经确定把四分之三的土地调整为种植大秋作物。"他急忙解释，并快步赶上往前走去的波托。"土地的翻耕是重要的，但不是唯一的任务。您要知道，投资规模，机械化程度，田间管理，生产费用……一句话，现代化农场的经营管理是由许多因素决定的。"

他只差没有把我对此比您懂行这句话说出来。可是波托却替他讲出来了，他朝旁边看了一眼，眼睛里仍然隐藏着恶意的微笑，象是接过米斯柯中止了的话茬，这样说道：

"当然，我只不过是个农民。"

"我也是呀！您想到哪里去了？难道您以为我父亲也拥有上千霍尔特土地？事实是一寸土地也没有……他是个雇农。我是他身边的另一个雇农。"

波托点点头。

“也就是说，您过去是雇农。”他轻声地说。

“雇农也是农民呀！”

“那当然是……”

“庄稼活我干过。我锄过地，挥过镰刀……”米斯柯突然为这种口角般的争论感到羞愧，轻轻地挥了挥手。“这都是过去的事了……我在大学念了五年书。这是我毕业后的第三个工作岗位。现在我倒喜欢在一个地方长久呆下去了。”

“有家口吗？”

“没有”。

“结婚了吗？”

米斯柯勉强回答：

“没有……那时我决定晚婚。事情就这么拖了下来。”

不是由他而是波托在提问题，这使他有点气恼。这时，各种结婚的尝试，姑娘们的脸蛋又从记忆的迷雾中涌现，幽会以及各式各样飘忽不定的往事都在他脑海里闪现……象往常一样，米斯柯不得不承认，对爱情的追求，在他来说至少还是埋藏在心底里的一桩事。他曾经爱上一个姑娘，不知不觉地、几乎是卑躬屈膝地追求过一个金发的、如常言所说、俏皮的农村姑娘，为了得到她，他甚至情愿跳井；那时候他刚满二十岁，给地主赶车；就在爱情即将向结婚方向转化时，他应征入了伍。等他复员回家时，那姑娘已经嫁人了……每当回忆起这一段难忘的往事，他心里很不是滋味。但是又无法摆脱它．因为米斯柯以后一系列的不幸都来源于这一段令

人烦恼的生活事实。每当他接近女人的时候，在他脑子里便自然而然地出现造成他痛苦的青年时代的记忆，把每一个女人都拿来跟那个长得象玫瑰般漂亮的俏姑娘作对比，最后事情也就告吹……时间年复一年地过去，他在所有的女人身上寻觅着一个不可捉摸的、或许不曾存在过的姑娘的身影。现在他已经四十了，最大的问题也许还不在于他是个单身汉，而是已经过去了的青年时代许多五彩缤纷的愿望在他心中被一种占有的欲望所代替。

他开始恨起波托来，恨这个可以把一个体态健美的女人说成属于自己的人。

“那不好。”波托撅撅嘴说。

“什么不好？”

“男人打光棍不好。”

“不好？那有什么不好？”

波托耸耸肩膀，步伐缓慢，沉思着朝土坡上矮小的灌木丛走去。

“我是个结了婚的男人。”他说着，不由得激动起来，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感：“可是却没有一个家庭……”

“没有家庭？为什么？”

波托默不作答。跟几天前出现在农业社办公室的那个波托相比较，在这一瞬间他看上去显得苍老多了。米斯柯对他并不表示怜悯。对这个老恶棍就该如此——米斯柯心里想——谁叫他把一个可以做他女儿的姑娘捆在自己身边呢……这时候，在米斯柯眼前出现了波托太太的身影，她的模样显

得如此真切、丰满，仿佛她真的就站在路旁似的。她的手插在羊毛衫的口袋里，胸部隆起两座坚实的小山丘，正在有节奏地起伏着……米斯柯只觉得血管里的血液全涌到头上来了。他无法控制自己不去想那个女人。只要他想起那个出现在农业社办公室、轮廓分明、呆滞的脸上必将绽开希望之花的女人，一种无限渴望之情便在心中油然而生。

“不！”他心里想，担心自己会大声说出内心的想法。“他们没有孩子，这不是那个女人的过错……倘若上帝赐与她以爱情和母性，她甚至可以生十个……”

回到村子里时，波托向他伸过手去。

“祝您一切顺利！”波托说。“午饭后我要到办公室去。”

“需要我也去吗？”

“也许需要……得赶快着手工作。事情多着哩。”

米斯柯放开他的手。

“我们彼此会更好了解的，”米斯柯说，“您是个很有意思的人……您的妻子也是个很有意思的女人。”

后一句话他不是有意说的，而是说漏了嘴。这时，米斯柯为自己的失言恨不得钻到地底里去。波托原来和蔼可亲的脸庞立刻变得冷淡起来，流露出怀疑的神色。

“她年轻，是吗？”他的口气相当尖锐，不乏敌意。

米斯柯的脸顿时变得通红。

“我并没有说她年轻！”米斯柯高声回答，几乎是嚷嚷起来：“她多大年纪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只是说她是个很有意思的女人。”

波托沉默了。他眯缝着眼睛凝视着前方，脸部表情冷漠，连额头上的那块绛红色伤疤也变得苍白了。

“她身上没有任何有意思的东西。”他嘟哝着，再没有看农艺师一眼，便径直往回家的路走去。

米斯柯长时间地注视着他的背影。“我要从您身边把她夺走！”——米斯柯怀着愤怒和恶意，暗自下定决心，“哪怕只是一个晚上，我也要把她夺走。”

……一个星期过去了，米斯柯一直没找到机会同波托太太单独在一起，哪怕是一分钟时间。他经常跟在她后面，从这一块地走到另一块地，细心地对她进行观察；波托太太同妇女们一起在地里干活，午饭后，她们彼此紧挨着在土坡灌木丛旁边休息；这时候，米斯柯不得不克制自己的感情冲动，一本正经地向她们讲解胡萝卜间苗和锄玉米地的意义；令米斯柯生气的是，她们听他讲话时一点反应也没有；然而他还是注意到波托太太的眼睛在闪动。她从家庭狭窄的天地里解放出来了，已经愿意同别人开个玩笑什么的；米斯柯经过一段时间的暗中观察，发现她那张原来总是沉思和呆板的脸在短时间里变得多么活泼。同是这一张脸，过去流露出来的是受压抑、不喜欢说话的神情，现在不仅她的嘴，仿佛连眼睛也会说话了，友好、自然的本性流露代替了她过去的那种愁眉苦脸。在同伴中间，她感到舒畅、自然——米斯柯想。瞧，那些比她年轻的妇女都称呼她玛丽斯，看来她很满意……另外，波托太太干起农活来既熟练又从不知疲劳，同她一起干活的妇女只有拼命赶才跟得上她。当妇女们一个个落

在她后面喘着气叫喊“比不过你啦！比不过你啦！”时，她脸上就闪烁出孩子般骄傲的胜利微笑，好象她从来没有尝到和享受过人们赞扬的滋味似的。

在一次有关刨土豆的技术性报告会结束时，农业社主席突然来到现场，点点头表示同意米斯柯的讲述，还以若干实例对报告内容予以补充。报告会结束后，农业社主席挎着农艺师的胳膊，朝村外走去，高兴地解释说：

“喂，朋友，您还记得我说过的话吧？即使我们捡到一袋金子，比起波托夫妇入社这桩事来就算不上什么了，是不是这样呢？波托就是这种庄稼汉，用不着别人的吩咐和鼓动，就主动去干，他是个有血性的汉子……我本人是站在雇农一边的，您知道我也给地主扛过活，让那种生活永远见鬼去吧！朋友，您听着，象您我这种出身的人们中间，有些人至今还需要在经济上给他们一点甜头，然后粗暴无礼地对他们说：滚吧！去你妈的！干活时别睡大觉！——可是您瞧波托这两口子，他们连偷赖都不会……您注意到玛丽斯了吗？她简直就象一部机器。她把妇女们都带动起来啦！喂，朋友，对此您有何看法？”

米斯柯耸耸肩膀，装出一副漠不关心的模样：

“在她身上能看出什么呢？她也跟其他妇女一样嘛。”

“什么？您这样讲就不对啰，朋友。如果其他妇女都象她那样卖力气，地里的土豆早刨完了……您说说，您不喜欢吗？”

“喜欢谁？”

“那个女的呗。还有那个男的。总之，就是波托夫妇。”

“您这是怎么啦？”

“朋友，我是说……”

“他们加入农业社，我很高兴。”

“那就好。要是我们中间最优秀的人们彼此意见不一致，我们的事业就会产生困难；是的，一定会发生巨大的困难。朋友，您是我们中间最优秀的一个，这一点，在任何人面前我从不否认，在会上我也是这么说的，您本人也亲耳听到过嘛。可是您瞧，这个波托也是我们中间最优秀的一个，这一点，您也是无法否认的，因为他跟我们一样，把全部精力都放在工作上啦。有一次，我同我的连襟去看望我们的老岳父，他老人家对我们每一个人都说：你是我女婿中间最好的一个……”

……每天晚上波托太太把牛奶送到收购站时，米斯柯总是下意识去窥伺她。他象头猎犬，即使在黑暗中也能凭嗅觉跟踪她，小心翼翼地避开来往的熟人。可是，每天晚上总有一个邻妇同波托太太结伴而行，米斯柯也就无法同她接近了。

后来，他们终于得到一次见面的机会；这次相遇是面对面的，而且很偶然。

一个星期五的过午不久，突然哗啦啦下起了暴雨。瓢泼大雨把正在地里干活的妇女们驱散了。有些人吱哇乱叫，踏着泥泞拼命往家里跑，有些人则躲到长在地边的桑树下。波托太太也拼命往回村的路上奔跑，可是低矮的云层象是被

戳穿肚子似的，哗哗哗地直往下漏雨，她只好跑进一间废弃的葡萄榨房避避雨，里面榨葡萄的机器早就坏了。米斯柯紧跟在她后头。他来到机器房前面时，身上已经被淋湿了。他站在那里，嘴里咒骂着，还旁若无人似的脱下上衣，拧掉衣上的雨水。

波托太太从葡萄榨房的角落里说话了：

“同志，请您不要生气，……下一场小雨并没有害处呀。”

米斯柯朝发出声音的方向看去。

“里头有人吗？”他故意这样问道。

“是我在这里……玛丽斯，就是波托太太。”

“噢，看来我们只好挤一挤啦！”

“进来吧！进来吧！……”

米斯柯跨进大门时，看到原来的砖砌炉灶塌了，被熏黑了的砖头散落在地上，摇摇欲坠的屋顶到处在滴水，只有北边的屋角是干的，波托太太就站在那里。米斯柯暗自高兴，心想，要是他也走到她站的角落去，挨近她，在目前的情形下，她大概不至于会见怪的。他对自己刚才的装模作样不免感到有些后悔；他从老远就尾随着她跑过来，万一现在雨停了，他的希望可能又要落空。他觉得应该当机立断，不再浪费时间。

“日安！”他边打招呼边把手向她伸了过去。

波托太太笑着说：

“哎哟，我一身全是水呢。”

“我也是……”

果然，她全身都被雨水淋透了。她的裙子象教堂里的那口大钟，水从裙角滴滴答答往下淌。她身上的紧身衣被雨水紧紧沾在身上，显出了她身体的曲线美，连她乳房上的奶头也仿佛清晰可见，就象光着身子似的。米斯柯咬牙咽下欲火，把手指蜷曲成爪子形。

“我，”他声音嘶哑，眼睛却一刻也没有离开那个女人的胸脯，“早想跟您谈谈了。”

“跟我？”

“是跟您……我再也无法把我要说的话藏在心里了。即使把我钉在十字架上，我也得把话说出来。”

“您想跟我谈话已经很久了吗？我们第一次见面到现在还不久嘛。”

“要是一个人被火烧了一天，不，哪怕是一个小时也是很难熬的。玛丽斯……我这么称呼您，您不会生气吧？您不属于，也不可能甘心忍受一个冷酷的、没有感情的老头……”

“我觉得身上发冷。”那个女人说着，全身在微微战栗。“如果您的上衣暂时不穿，能让我披一披吗？”

米斯柯生气了，与其说是把上衣递过去，不如说是扔过去给她更恰当些。现在，这件倒霉的上衣将要剥夺他观赏眼前的景致；话又说回来，为了观看这样的景致，把他所有的上衣都给她，他也是心甘情愿的。

波托太太接过上衣，用它把身子紧紧裹住。她觉察到这个男人贪婪、搜索、犯罪的目光在盯视着她，但她脸上却没有任何惊吓、反感或拒绝的表情，只是流露出沉思和可以理

解的忧愁。

“您为什么要跟我谈话呢?”她沉着地问，把落在额头上的一绺湿头发拨回到耳根后面。

她边等候着回答，边用冰冷的、客观的、冷静的目光打量着站在她面前的这个男人的脸膛。米斯柯咽了一口唾沫。他不知道该对她说什么好。几天来经过反复思考，打算向她坦率倾吐的话语，已经被这场骤雨和摇摇欲坠的机器房所造成的带有浪漫主义的气氛所湮没了；现在，他要向她坦白的心事在嗓子眼里被什么东西卡住了，冷却了，烟消云散了。他本以为，经过一阵急速、猛烈、连珠炮似的表白之后，他可以把一个被吓呆了的天真女人从自己脚下拉起来。可是波托太太，现在站在他面前的这个波托太太既没有惊呆，也不幼稚……他想，得找另外的借口，新的、不那么重要的、也不那么不堪忍受的借口。

“您连我是谁，是个什么样的人都还不清楚，”她说，“您想从我身上得到什么呢?”

顷刻间，米斯柯感到一阵兽性的冲动，渴望着把这个被雨水淋湿了身体的女人不声不响、热烈而粗鲁地搂在自己怀里。别人爱怎么说，就让他们说好啦！然而，米斯柯又一转念，立即意识到这种欲望是可笑的。好吧，就算拥抱住她，用青年人那种鲁莽的方式紧紧搂住她……接着又将会发生什么事情呢？难道说，一直把他弄得神魂颠倒、坐立不安的，就是等候着把她象一只不会颤抖的口袋那样，紧紧地搂在怀里贪欢片刻吗？

那个女人轻轻地摇晃着脑袋，脸上罩上了一层痛苦和迫不得已的忧郁的云翳，象是对眼下出现的情形不满意，但又不认为这种情况的出现是自己的过错。

“您是需要这个吗?”她轻声地问，把那件从他那里要去裹在身上的大衣敞开，露出被淋湿的胸脯。“或者是要占有我整个身体?”

是的，某种欲望在冲击着米斯柯，可是他却高声回答说：不，不。

外面一声巨响，声音是从机器房发霉的芦苇屋顶传进屋里的。大概是离这儿不远的地方打雷了。

“别的您是不愿意要的。”她说着，又用上衣紧紧裹住自己的身子。“我知道……过去，有许多男人需要我，现在他们仍然需要我。这我懂得。您在我身上看到了些什么呢?我丰满的身躯，我的臀部，还有……可是，我脑子里想些什么，我需要什么，不需要什么——这些都是您所不知道的。当然，没有任何人了解我的想法。”

“您听我说!”

“人们从来不习惯倾听我的话。他们只习惯对我说他们需要什么。”

“我想过，也许您个人的身世是不幸的，生活里没有欢乐……您不要否认，您跟您的丈夫关系不好，您是从家里躲出来的，也许您丈夫揍了您……我可怜您，是的，当您象个不能支配自己行动的仆人，同您的丈夫一起走进办公室时，我就对您表示怜悯，这只是人之常情，没有别的意思……其实

我完全可以采取行动，而您也不会怜惜您自己的一切的。可是我对您提出任何企求了吗？我难道会这样做吗？”

他既激动又愤怒，一口气把这一切全讲了出来。他深信，在这之前，他对这个女人不仅产生怜悯之情，同时也是有所企图的。

波托太太什么话也不说。米斯柯盯着看了她好一会儿，然后转过身去。雨还在下着，有时稠密些，有时稀疏些，门外是灰濛濛的一片，象在门上悬挂着一块门帘。

“我象一只狗似的在这该诅咒的村子里生活，”米斯柯的话似乎是从肺里迸发出来的，“我没有任何亲人。我没有孩子，连一只狗也没有。我已经满四十岁了，我有大学文凭，有一份相当不错的收入，我有一切，只是没有一个家庭。从前，我虽然生活贫困，至少还有我母亲对我说一句亲切的话……”

他自己也没有意识到怎样被卷进已经消失了的生活里去；他只顾讲着，把积压在心底里，从来没有对任何人说过的话全掏了出来；他把他怎样从一个不懂事的孩子成长为孤独的单身汉的全部经过说了出来。二十年时间把原来一个生龙活虎的小青年改变成另一个模样；这期间他经历了战争，在分得的土地上为生活而奔忙。他是否有过幸福？他曾经遇到一个好心的姑娘，他就要娶她时，被征入伍了，复员回家，姑娘已经飞走；接着是学习，起初，他觉得脑子生锈了，为此感到痛苦，心烦意乱，在新的笔记本上乱写一气，他在那些比他会动脑筋的同学面前一直感到羞涩……雨开始停了，云彩在种植葡萄的土岗上空被撕裂成碎片。米斯柯还在叙说、

回忆、倾诉，仿佛骤雨一下子把他多年来积存在内心的所有拉拉杂杂的东西全都冲刷出来。

他没有转过身子，沉默了一会儿。

“雨立刻就要停了，”他说着，冲屋外点点头，“您马上就要走了……您尽可以到外面去大声呼喊，这里有一个饥饿的小丑……这对我毫无伤害，对我来说一切都是无所谓的。”

在这瞬间，他觉得自己的言行是一致的，心里顿时感到轻松多了。这场骤雨，终于冲掉他的思想负担，使他能够毫无顾忌地吐露自己多年的情感，即使有些粗野和冲动，他还是这样做了。

站在角落里的波托太太显然被感动了。她终于开口了：

“大家都说您是一个好人呢。”

“我？好人？为什么呢？”

“我不知道……大家都这么说。他们都是些普普通通的人，心地善良。”

“哦，那是另外一码事了。我喜欢土地，喜欢这里的村庄，关心这里的一切……我常常告诉人们说，别那么干，要这么干……我认为这是我该做的。这不是出于慈悲。这是……鬼知道该叫什么……”

“我可从来不会对别人说要这样做，不要那样做。”

米斯柯从门口转过身来，望着那个女人，看见她的脸同刚才一样，没有一丝一毫的变化。

“我父亲也是雇农，”波托太太接着说，“他就在这个村子

里给地主当的雇工。我……我曾经是一个漂亮的姑娘，起码在我丈夫眼里是这样。您不要认为他是个坏人。不，他不是坏人。对于他，我不知道您是怎么想的，也许您认为他粗暴、古怪，会打老婆……不，这不是真的。他从来没有碰过我一手指头。”

米斯柯顿时觉得全身无力，感到一阵空虚。他把自己心里的话全都对她说了，而现在，他早年的激情和近日来让他无法安宁的那种折磨人的冲动刹时间全消失了，留下的只是一种卑鄙的自我感觉。

“您在袒护您的丈夫！”他痛苦地说。“您终于也明白他是个好人啦。”

他望着那个女人，觉得现在离她那么遥远，仿佛这间巴掌大的葡萄榨房突然变成一所又大又空荡的房屋。

波托太太摇摇头。

“说不上是好人。”她说。“他既不好，也不坏。他从来没有碰过我一手指头……可是，十五年来，他也从来没有问过我一声：你想些什么，你喜欢什么，你需要什么。连我是不是想同他来这样的事也没有问过我。只要他想来，他就照他的想法行事……他早起，我也得跟着早起，他熬夜，我也得陪着他。他要带什么东西出门，事先从不告诉我一声，到时候想拿走什么就拿走什么。这就是我们的生活。我有漂亮的衣服，舒适的住宅，不愁吃不愁穿，什么都有，就是没有我自己的生活。因为我不是一个活人。他是附在我身上的灵魂，总是他在代替我思考……如果我喜欢什么东西，我即使说出

来也不顶事，因为连我的围裙也是他按照他的想法替我挑选好了的。原因是他无所不晓，而我什么也不懂；不管到哪里去，总是他领着我，而不是我领着他……这是您不知道，也不理解的。人们从来不会这样对待您，总是对您露出一副和蔼可亲的笑脸……我总是得到所需要的物品，但这些东西从来都不是我自己挑选的。我得到的物品只是出于别人的恩赐，而不是我自己购买的。我身边没有一样物品可以说是我自己买的，出于自己的意愿挑选的……其实，我丈夫对我是很好的。而我呢，一个人干三个人的活，也没有白吃他的饭。”

“那又怎么样呢？您愿意继续这样生活下去吗？”

波托太太否定地摇摇头：

“不，我要离开我的丈夫。”

米斯柯惊讶地睁大眼睛：

“您打算抛弃他？为什么？是为了谁吗？”

“不是为了谁。我没有任何亲人。如果说我曾经是波托太太，那么，现在我还是波托太太。要是我不是波托太太，那我什么人也不是啦。”

“就象俗话所说……”

“不。也许您不理解，但事情就是这样。人们所以向我打招呼，我所以有衣服，家里什么都不缺，那是因为我是波托太太。我就象是附在我丈夫身上微不足道的一个部分，要是我从他身上脱落下来，就不能继续生存，就没有……如果他揍我，也许会好些，至少我会出于反抗、悲痛、生气而采取某种行动……我们入社时，我所以要问，我能不能在卡片上

写上我做姑娘时候的名字，原因就在这里。因为波托太太并不说明问题的实质。那是另一码事。一个人总要有自己的姓名……因为我现在再不需要他的恩赐。我不再需要他代替我思考。大家称呼我玛丽斯。玛丽斯，这才是我；因为我要把我生活中的这十五年奴隶岁月抹掉。”

雨后，葡萄榨房显得特别闷热。波托太太从身上取下上衣，还给米斯柯。米斯柯是否还象刚才那样盯着她看，她全然不在乎。然而米斯柯不再象刚才那样盯视着她了，他不再看她的胸脯、脖颈，现在他注意的是她的脸庞。

“您别生气，”那个女人继续说，“我也不生您的气，您说了您的生活，我也讲了自己的生活……因为我丈夫需要的也是我的肉体。他第一眼就看中了我的身材。别的他什么也不想看，结婚以后也是这样。现在，我看到在我的生活里已经开始出现希望，因为妇女也象其他人一样是人：如果她灵巧，她就是个能干的人，如果她不偷懒，她就是个真正的劳动者，如果她有发明，她就是个发明家……如果她不动脑筋，不喜欢劳动，那只好长一身肉，当一个躯壳……”

米斯柯想点燃一支香烟，可是藏在上衣口袋里的香烟也被雨淋湿了。他想从中挑出一支不湿的香烟，但连一支干的香烟也找不出来，于是，他把整包香烟朝墙角扔去。

他又朝那个女人瞟了一眼，看见她穿着湿衣服，又开始战栗了。

“要是您需要，我可以把我的上衣给您。”他微微一笑。“如果您用它把自己裹起来，我也没有什么好后悔的。”

波托太太也跟着微笑了。

“谢谢您。”她边回答，边接过他递过来的上衣，把它披上。“我已经说了，我不生气……”

现在，她目光里流露出来的不是后悔，而是和解的愿望。米斯柯在令人窒息的闷热里满头大汗。他心头起伏，思绪万千：关于他自己的；关于波托夫妇的；关于这个不寻常女人的，她能够一直麻醉自己的神经长达十五年，但又不懂得也不愿意把渴望这一人类的本性在光天化日下埋葬掉。可是当他开口的时候，并没有说出这种想法。

“如果，”他开始说了，目不转睛地望着那个女人，满怀着新的希望，“如果我喜欢您，是不是应该这样做：在任何人面前都不让您，玛丽斯卑躬屈膝？”

波托太太踏出门槛。风在追逐着一团团浓密的云烟，泥泞的土地在艰难地喘息着。米斯柯也从葡萄榨房里走出来，站在那个女人的身旁，等候着她的回答。

这时，把裤腿卷得高高的农业社主席，绕过田野小径上的水洼，正往这边走来。

“真见鬼，”米斯柯说，“他会在这儿瞧见咱们的。魔鬼才知道他会怎么想呢。”

波托太太耸耸肩膀。

“他喜欢怎么想，就让他怎么想好啦。我想要知道的都知道了。再说，他也没有朝这儿来，而是拐到草场那边去了。”

她把上衣还给了他，现在事情终于全部结束了。

“我得等到衣服干了才回家，”她解释说，“就象没有被淋湿那样。”

“您什么也还没有回答我呢。”米斯柯固执地说。

那个女人低垂着脑袋，从侧面由下而上细心观察着农艺师的脸部表情。

“生活的道路是很长的。”说完，她便朝前走去，走到路旁，又回过头望了望，脸上露出温柔的笑意。

米斯柯在葡萄榨房前踱了好一阵子步。那个女人的身影已经远去了，在绿油油的玉米地中间变得愈来愈模糊；但他仍在那里踱步，步子显得愈来愈沉重。他从地上抓起一把叶子，捏碎，代替香烟抽起来。

“我要等待。”他高声对着葡萄榨房前面的那株可怜巴巴、衰老的醋栗树说。“我要等待时机，我再也不会把她放跑了。”

他吹着口哨，远远地跟在农业社主席的后面，朝草场走去。

夏悦文 译

柯达·格保尔

伟大的上帝

〔**作者简介**〕 柯达·格保尔(1911——)匈牙利著名作家。曾获柯苏特奖和尤若夫·阿蒂拉文学奖。他的现实主义作品具有强烈的讽刺倾向。早期作品《风暴之前》和《在豺狼中间》辛辣地讽刺法西斯反动统治。解放后，在描写现实生活的作品里也以尖锐的笔触揭示社会的落后面，同时又以极大热情歌颂真正的革命者。主要讽刺小说有：《蜡像馆》、《外星人和其他》、《来自地狱的信》、《波尔蒂尼先生》、《孤独的旅行》、《一个懒汉的日记》等。

我宣布人们称呼我上帝并非出于自我吹嘘、哗众取宠或者别的什么卑鄙的意图。这是出于一种迫不得已的责任感，否则这篇东西便没有了意义。谁也无法禁止我这样做，因为一个作家写作的目的就在于使其作品含有意义……

同样，我也不是出于夸耀，而是出于需要才提到我曾经

当过首都，甚至是“帝国首都”的文化参事（当然，这是解放后的事），倘若读者考虑到官方强制性的官僚主义和我天生的反官僚主义本性，有些事情仍然是值得回顾的。

想当年，我掌管着一个庞大的帝国。在这个帝国里拥有图书馆、蒸气澡堂、大约八个博物馆，还有挖掘队和制造苏打水的工厂；总之，不怕亵渎神明，在文化参事管辖下还有一个动物园；无须赘言，在我掌管的帝国公园里当然有过真正的动物。确切地说，我在这里叙述的那个时期，动物园里的动物寥寥无几，要是我没有记错，总共有三只猴子，一匹骆驼（据我所知，它是由德国的非洲军团用装牲口的敞篷车厢运来的），此外还有几匹河马，一头大象，当然还有几只鸟，它们（所以指明是“它们”，原因是要根据它们的类别来编制详细的预算）总算是顺利地通过了审查这道防线。

当然，我不喜欢老坐在机关办公室里，尽管办公室的摆设相当豪华，有壁毯，舒适的大圈手椅，可我却喜欢——如我常说的——到下边去“视察”。我在“帝国首都”当文化参事的那个时代（我们离开以后，人们便把狮子送进动物园，把天使永远租赁给教堂），“视察”是不受鼓励的，也不可能引起任何人的注意；也正因为如此，我才喜欢视察，就象马加什国王①或者哈隆·阿尔·拉什特②那样，我会使人吃惊地突然出

① 马加什（1443——1490），匈牙利国王，1458年在中、小贵族拥戴下即王位。

② 哈隆·阿尔·拉什特（763——809），巴格达王国的最高统治者，以英明著称。

现在我管辖的帝国首都这一个或者那一个地方。譬如说，有一个早晨，我突然出现在蒸汽澡堂，了解澡堂管理人员和洗蒸汽浴顾客的情况，检查浴池是否清洁，为了获得切身体验，我还洗了一次蒸气浴。在一个天气不太好的日子里，我曾经以马加什国王那样的热忱来到画廊，了解我们首都画家的情况……

当然，这是我们党同社会民主党合并①前几个星期的美好的一天。一部分社会民主党人，也就是右翼分子或者比右翼分子还右的那些人，听到共产党真诚地接纳他们党的左翼分子，并且这些人有可能转为共产党人时，感到异常震惊。随之出现了一些专爱阿谀奉承的小人。于是人们不得不把手搁在背后，免得那些过份殷勤的人吻了这只手后又要去吻那只手。

总之，我决定在那天坐进官方时髦的双轮轻便马车，象马加什国王或者哈隆·阿尔·拉什特当年乘坐官方马车那样，驱车直奔动物园。动物园管理处处长是一位社会民主党人，我听到过一些有关他的闲话。考虑到我需要了解我管辖的帝国的真实情况，便趁两党合并前的日子抽空去看望一下这位管理处长。我的行动是保密的。谁也不曾料到，一位官员会乘坐古老的双轮马车，穿过市中心区到动物园去视察仅剩下的河马和漫无目的闲逛的猴子，以及那位社会民主党人管理处长。

---

① 指1948年3月匈牙利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左翼）合并，组成统一的工人阶级政党——匈牙利劳动党。

管理处长为人异常机灵，我一到动物园，他们已经站在大象般高大的门口恭候。对于我此行的意图，也许他正在琢磨。不过对此我没有加以研究。我刚迈出车门，管理处长便主动过来扶我下车，仿佛我不是哈隆·阿尔·拉什特，而是一位老态龙钟的老奶奶。“参事同志，请往这儿走！”——他用手指着大门的入口处；其实，我从做孩子时候起，对这座大门已经很熟悉。

迎接我的除管理处长外，还有上任不久的动物园园长；他穿着崭新的上装，连他那两撇胡子也在冲我摆动呢。他们就象欢迎弗兰西斯·约瑟夫皇帝①最后一次访问动物园那样热烈欢迎我。管理处长首先致辞：

“我们的参事同志亲临视察我们处于困境的动物园，以示对我们的关怀，这对我们是莫大的荣幸。”他作了一个同社会民主党人颇为相似的动人的长篇演说。其中谈到：战前，动物园里有许多动物，这里的一切都十分美好。但现在据他了解，国家在别的方面更急需进行投资——就其合理性而言，这是不可避免的——所以现在动物园里不可能有诸如老虎、美洲狮和浣熊之类的大动物。经过多次交涉，社会民主党人副市长同志答应跟共产党人副市长同志商量，请他不再否决关于制定明年“购买动物”预算的动议。

他讲得很轻松，连眉毛也没有动一下。

“我是同意这一意见的。”留着两撇胡子的园长边说，边把

① 弗兰西斯·约瑟夫一世(1830—1916)，奥地利皇帝(1848—1916)，奥匈帝国皇帝兼匈牙利国王(1867—1916)。

上装的纽扣解开后又扣上。

“好极了，”我说，“我们不允许老虎和美洲狮子在合并问题上钻空子。”

“这我也是同意的。”园长又说。他是在霍尔蒂时代被推荐到动物园来当园长的。我们边谈边走，来到收拾得整整齐齐的花圃旁，在一株枝叶茂盛的橡树下面，我说：“尽管动物园里没有浣熊，不过毕竟还有毛驴和猴子呀。”

“嗯，嗯，”管理处长回答着，还不住地点头。“对不起，我谈的不是猴子和浣熊，因为没有浣熊并不影响咱们首都的存在。我是说，在合并的时候要提高动物园饲养员的危险津贴。”

“欧，欧，”我说，“这是谁告诉您们的？”

“大家都这么说……社会民主党党员已经投降了，今后只有共产党党员管事。对不起，其实提高危险津贴这件事是无需讨论的，因为人们不是在这里喂养兔子，而是跟狮子、老虎，也就是说跟猛兽打交道的呀。”

“目前，这里有这类猛兽吗？”

“很抱歉，目前还没有这类猛兽；不过，归根结底并不是因为没有这类猛兽就不需要动物饲养员了，对吗？”

“那么为什么还需要危险津贴呢？”我以哈隆·阿尔·拉什特明察秋毫的目光盯着他，进一步追问。

“对不起，这又是另一码事了；如果参事同志愿意提出陈述，社会民主党副市长终归是会同意的……”

我们一直往动物园里走，来到会发出回声的狮子洞和空

荡荡的铁笼前面；在这之前，我已经视察了瞎眼的河马，还看到了斑马，在视察几只懒散、厌倦的猴子时，我不得不为如何处理这些本来是活泼好动的动物考虑下一步的预算问题……那位留着唇须的非党员园长使用专门术语，对我有礼貌地进行解释，企图在我面前证明他是个再合适不过的园长人选。然而，管理处长在礼貌方面更比园长略胜一筹。他不停地向我解释，看见仙人掌，就谈仙人掌，看见猴子，就谈猴子，看见斑马，就谈斑马——任何机会都不错过。

“请往这儿走。”他有礼貌地指着一排带走廊的飞禽舍对我说。我们走进动物园的飞禽舍。这时，管理处长解释说：

“我们饲养的飞禽只剩下几只了。我感到很痛心。对不起，大鹰全被杀掉了。德国兵争着射杀它们，吃它们的肉。不过我们还是有一些可爱的飞禽保存下来了……请……请往这儿走。”

我们从两排整齐的禽舍中间走过。的确，这里的景象简直象一片废墟。墙壁上弹洞累累，只有吱吱喳喳乱叫的麻雀忘却了一九四四年底围城时留下的痕迹。

在此地，管理处长是最大的权威。他充当主要解说员的角色。动物园里原来就有的某些著名的非洲和亚洲飞禽不见了，眼下只有几只匈牙利飞禽，这是在战后能够比较迅速收罗到的，喂养起来也简便些。笼子里有一只麻雀可怜巴巴地站在一根假树枝上，用悲哀的目光呆滞地望着自己的拉丁学名。管理处长对每一种飞禽都能说上几句。他向我这个已经

当上文化参事的人介绍喜鹊，以便让我知道喜鹊原来是一种贼鸟；关于夜莺他也说上几句，好让我这个文化参事了解阿兰尼·亚诺什[①]曾经写过关于夜莺的诗篇。那里还有一只鹦鹉，管理处长讲出它的学名，但看来他说错了，因为园长立刻纠正了他。管理处长脸色阴沉地望着留唇须的园长，园长则同往常一样，仍在不住地点头，肯定自己的看法，赞扬管理处长对给某些飞禽起名字方面做出了贡献。

我从他们的介绍获悉，这只鹦鹉是一位老太太送回来的。围城[②]时，它飞到她家的窗台上。那是一只古怪的鹦鹉，我们走过它面前时，它竟然对着我们叫"嗨"，以示敬意。

"您得宽恕它，"管理处长说，"它这是从德国人那里学来的。"

那位留着两撇唇须的园长后退一步，把手紧紧贴在胸前，微微低着头，说道："请您务必宽恕它，参事先生。我们将在最短的时间里把它纠正过来。"

我以参事的目光很有兴味地观察着那里的动物世界。我特别喜欢这些小动物，它们个头虽小，却很活泼，唧唧喳喳，啾啾啾地叫个不停。饲养它们的开支，根据行政上编制预算的精神，显然只能列入"禽类动物饲养"的栏目内。在养鸡场，尤其使我产生象哈隆·阿尔·拉什特那样的好奇心。

---

① 阿兰尼·亚诺什(1817—1882)，匈牙利著名诗人。

② 指一九四四年底苏联红军围攻布达佩斯德国法西斯军队的战役。

怎么会有这么多的母鸡、公鸡和别的什么鸡统统都到这里来了呢？的确，母鸡和公鸡是禽类，鸭子和鹅也是禽类，用行政上最大的想象力可以把它们理解为飞禽，这样做是没有过错的。

这些可爱的、从动物园角度看具有拉丁学名的禽类，正在欢快地啄食着撒在它们面前的营养丰富的谷物，而这些谷物都是列入布达佩斯公共预算支出部分第十一章、第三栏、第十七附项、第一百二十七款，以“禽类饲养”的名义取得的现金购买的。

那里的饲养场大约有二十只母鸡、几只公鸡，还有数量相当可观的鹅，足够管理处长一家食用的，甚至邀请园长及其家人去作客也绰绰有余。管理处长尴尬地微笑着，看样子他想借此来打消我的疑心。然而我是一个警觉的参事，在公务上明察秋毫，便询问他们：

“同志，这也是飞禽吗？”

“至少也是沾上禽类的边儿的。”管理处长回答。

“您不认为它们多了些吗？”

“参事同志，我们应当考虑到，动物园发展到一定程度，是可以把它们送去制作成标本的。”

“园长先生，事情果真是这样吗？”

“就我这方面而言，我是同意这种安排的。”园长说；与此同时，还响起鞋后跟相碰时发出的咔嚓声。

“做标本一只就够了……”我态度傲慢；由于揭露出一个小小的花招，使我变得不可一世起来。

“做标本一只是够了，但问题不在这里，而在……”园长说，想在令人费解的“而在”两个字上面，给管理处长的话布上一层薄薄的疑云。

总之一句话，他们是食用过那些家禽的。他们把动物园禽类饲养场变成“管理处及其领导人的饲养场”，而饲养场的费用是由城市公共预算总额中支付的。这一系列怀疑至少使得作为“帝国首都”文化参事的我增添了自己的想象力。显然，事情得往他们的权力方面考虑。但是，我不可能再在鸡、鸭、鹅这些大量“禽类世界”上头花费更多的工夫，因为管理处长尽管偏促不安，还是很有礼貌地说：

“这就是我们的飞禽！”

我们只能看到有着长长走廊的飞禽舍的这一头。即便不是参事，对眼前的情形也会产生疑心的，更何况我是参事呢。在走廊的另一端会是些什么呢？那边的饲养笼里养的都是些什么样的飞禽？我什么都想看，象一位国王，对隶属于自己帝国的一切犄角旮旯都要走一走。

“那边，我尊敬的参事同志，我可以说，实在没有什么可看的了。”

“怎么？走廊尽头的饲养笼里都是空的？”

管理处长轻轻地摆摆手，看样子他只是不好意思谈论从这里看不到的、不值一提的飞禽。园长也表示了同样的见解，说那些饲养笼里喂养着“不属于值得一提的飞禽品种”。这两位陪同宁愿邀请我到园长办公室去用早餐，因为我已经视察了相当长时间，想必很疲乏了，作为一位文化参事，我

是不习惯这种令人感到疲惫的走动的；尤其是观看那些空荡荡的鸟舍，必定比看里面有许多可看的禽类的笼子令人容易疲倦。

难道他们果真想用作为饲养动物的预算来招待我？

“谢谢，”我说，“我不饿。我不想花掉我的预算。我要看飞禽。”

他们还是一个劲地催促我。

“没关系……这是和平时期，自家酿制的上等好酒……会使参事先生感到舒适……”留着唇须的园长冲我微笑，我这才发现，他那铲子般的大黄门牙在他未加修剪的唇须下面闪闪发光呢。

“您们把所有的飞禽都指给我看吧。我要看所有的飞禽。”

“是，”管理处长说，“不过，同志，请您相信，真的没有什么可看的……”

“那里头是什么？”我指着走廊尽头的一只鸟，它正在一个相当大的笼子里孤独地漫步。

我声色俱厉，摆出负责人不讲情面的严肃态度，而且符合一位嗅觉灵敏的参事的身份。我边说边加快脚步，来到走廊的尽头。从远处我就看清楚了：在鸟舍大门的正对面，有一个相当大的鸟笼，里面只有一只鸟在踱步。看到它，我是骄傲，还是痛苦，此时此刻，我无法准确说出自己的心境。这只不惜功本制作的鸟，正用它的小爪象哲学家那样在也是人造的、长有小树的草坪上漫步，鲜红的长喙不时伸进小小

的人工湖里去喝水。它的嘴定时啄食撒在面前的谷物，还想尽量多吃一些。在笼子正上方，有一块小小的白色珐琅质牌子，上面用黑字写着鸟的名字：伟大的上帝。在括弧里写着它的拉丁学名：縢鹬。

“瞧，瞧，我的同名者！……”我说着，感到有一股热流通过我的心房；每当远方亲朋突然出现在眼前时，这种感觉常常陪伴着我。

园长显得很尴尬，脚上的军用皮靴来回地搓着地面，还正了正脖颈上的围巾。管理处长搓着手，干咳了好几次。

“这是什么玩艺儿？”我追问。

“请原谅……这是一只鸟。”管理处长回答。

“是吗？！”我惊奇地说。

“是的，这也是一只鸟，给它起了一个拉丁学名，叫縢鹬。”管理处长窘迫而又有礼貌地说，避免把我这个文化参事的名字同这只只会转动的飞禽的名字发音联系起来。我是不是受到侮辱？我是不是过于敏感？我对自然科学的命名毫无兴趣。这件事竟然发生在两党合并的前夕，我不得不考虑，这个社会民主党人管理处长是否有意跟我作对？可是，两党合并的事是非常敏感的，因此，一切微小的、可能导至混乱的言行都必须避免，更何况这种感情上的意气用事也许会比给一只长喙小鸟起名带来更严重的后果呢，所以，我无论如何得尽量克制自己。

我们默默无言而又很受感动地站在那只鸟的面前。我不由自主地对它表示崇敬。说来也怪，我现在觉得它长得多么

漂亮呵！它有一只长长的嘴，不停地在它的帝国领地里来回踱步。留唇须的园长有礼貌地站到一旁，清了清嗓子，用科学术语向我解释：

"这个嘛，正象您尊敬的先生所看到的，它是一只鸽子般大小的飞禽，可是从它的长腿长脖子看得出，它比牌子上写的那种禽类实际上要大得多。这种飞禽的喙的确又长又直。如果您允许，我可以简单地介绍一下它的分布状况：这是一种在中欧筑巢生活的鸟类，它的生活区域扩展到瑞士，整个瑞典的南部，即欧洲沿海地区和大陆内地。往南，从中亚开始，直到叶尼塞河流域．在沼泽河湾地区筑巢而居。它们主要是在地中海沿岸过冬，早春季节，约莫在三月底飞到咱们这里。"

留唇须的园长作完介绍，双腿并拢，严肃地鞠了一躬。

"不错，是这样的。"管理处长说，他觉得有必要在我面前证实非党人士园长的话。

我注意到在笼子里的那棵假树的两根树杈之间还有一个小小的鸟巢。

"上面那个东西又是什么玩艺儿？"我问。

"那个东西，"现在是管理处长先说，"……那个嘛，我可以这么说……那是上帝的安乐窝；在那上面，上帝的儿女们，也就是几只雏鸟在幸福地生活着。"

我听到管理处长和园长发出轻微的笑声。

这时，我们都站在笼子前面。我久久地注视着我这个同名之物．仿佛在禽类齐鸣的喧闹声中，我觉察到园长和管理

处长在我背后交换眼色，正在酝酿着一场小小的政治阴谋。

最后，还是管理处长率先打破沉寂；显然他们通过交换眼色，已经取得一致意见。他说话有点结巴，还用食指指一指伟大的上帝，又摸摸钉在笼子上方的珐琅质牌子。

“如果参事同志对这……我怎么说好呢，感到不舒服的话……这个……嘿，嘿……我说的是这个同名的……嘻、嘻、嘻……或许我们可以把这块牌子和鸟一起弄走……因为……归根结蒂这是参事同志的威望所不允许的……”

他没有说下去，只是耷拉着脑袋站在那里。他的嘴角不再流露出微笑了。留着唇须的园长一会儿看看我这个伟大的上帝，一会儿又看看那个伟大的上帝，自作多情地说：

“当然……我们可以把它弄走……”

那只鸟儿把大红嘴巴从笼子栏栅的缝隙伸出来，用愉快的目光注视着我们。它的模样显得十分轻松。

我转过身子，正视着他们。

“让它留下来吧。”我表现出了马加什国王那样的智慧，还对着那只鸟微笑。“它不会损害我的威望的。让它作为鸟留在这个动物园里，就象我这个参事……”

那只鸟同样对我报以亲切、和蔼的微笑。

夏悦文 译

波罗巴什·蒂保尔

传　　票

〔**作者简介**〕波罗巴什·蒂保尔(1911——-)，匈牙利著名作家，曾任匈作协书记，柯苏特奖获得者。早在三十年代反法西斯时期就参加工人运动，作品多描写先进人物为争取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而斗争的主题。解放后，他创作的作品多为描写普通劳动者的日常生活。重要的小说有：《佛罗伦萨的篝火》、《边塞的传说》等。他还从事电影剧本的创作，著名的电影剧本有：《拉科治上尉》、《皇帝的司令官》，以及电影喜剧《国营商店》等。

一九五三年六月初，邮递员给我送来一张法院的传票。出于旧社会的习惯性条件反射，任何官方文件都不免给人带来一种紧张感，尤其是……这张传票的措辞既严厉又含糊不清。上面写着，被传人须于本年六月十一日上午十一时就汉

图什·伊斯特万一案出庭。地点：马尔柯街区法院大楼一层32号。这件事使我大伤脑筋。我同这个案件有何牵连？他们凭什么传我出庭？这些在传票里都没有写明。汉图斯·伊斯特万不是我，这点我是可以肯定的。但我是否被列入他的同案犯？这是我必须搞清楚的。这事好办，我给区法院问讯处打电话问一下，也许他们会知道点内情。当时，我还是作家协会书记。我给区委会挂了一个电话，接电话的是个妇女。她回答说：对不起，问讯处负责人把材料带走了，她也不清楚究竟是根据什么理由传我出庭。

我被这一份使人烦恼的官方文书整整折磨了六天，等待的日子终于来临。在马尔柯街区法院大楼的前厅和走廊上人声嘈杂，人们正在商议事情；人们在到处蠕动着，他们当中有原告、被告、律师、证人、新闻记者、法院职员、法官、女打字员和传送文件的人员。正巧电梯出了毛病，大家都在抱怨。幸好我要办的事情是在一层。从大厅可以看到整个庭院，那里人声喧哗，熙熙攘攘。人们正挤在一家卖烟草的小亭子前面购买邮票。一位漂亮的金发女郎，身穿白色套装，扭着腰肢，迈着轻盈的步子，来回几次穿过大厅，逢人便打探点什么。她挎着一位上年纪的律师的胳膊。他是她的什么人，是父亲、上司还是朋友？谁知道……我终于找到32号房间，房门上挂着一块牌子：区法院。门口右边的一张长凳上坐着一人，是一位上了年纪的妇女，孤单单地独自一人坐在那里。也许我有些反常，竟主动向她打了个招呼；总之，我象对一个年老的同案犯似的向她打招呼。那个老妇人头发斑

白，即使她坐着，我也看得出她是个瘦高个子。她的穿着跟一般妇女不一样，是个老处女的装扮。蓝色的长统袜子套在烟管般的细腿上，脚上紧箍着一双黑皮鞋，黑色上衣上别着一枚象牙纪念章。她的手掌又大又黄。她板着脸坐在那里。她那双针一般尖利的眼睛迅速地转动着。听到我向她打招呼，她抬头瞥了我一眼。她那满是皱纹的脸庞开始活跃起来，一双松鼠般的眼睛朝我投来新奇的目光，还把我从头到脚打量了一遍。随后，她又象从来没有见过我似的说话了。听她说话的声调，颇象一个已经离开舞台生涯的演员。

“您也是为汉图什的案子来的？”

“是的。”我回答说。

“您也想卷进去？”

“我？谁卷进去啦？”

“喂，他是个坏蛋、恶人吗？我指的是汉图什先生！”

“我不知道。”

“那您到这里来找谁？”她叫喊着，那双乌黑的松鼠眼睛里闪烁着怀疑的目光。

“我自己也不清楚……”

“您也是烟草商？”

“不，不，我不是烟草商。我是作家。”

“作家！噢，我可是非常喜欢作家。我的一个叔叔也曾经是位作家。年轻人，如果您想跟我那位已故的叔叔一样也写出成功的作品，就得勒紧裤腰带。”

“您那位故去的叔叔是谁？”我有礼貌地问道。

“克拉里尔·维勒莫什。他写关于比赛规则方面的书。”

“这方面的书籍已经不如当年吃香了。”我冒冒失失地给她泼了一盆冷水。

“今天?! 今天?! ”一听到这方面的书籍受到轻视，她几乎是叫喊起来。但是，这时候我对这位上了年纪的妇女怎么也会牵涉到汉图什案件上来不免产生好奇。

“请您告诉我，他到底是因为什么事被控告的?”

“他被控告? 就是这个喜欢幻想的人? 那个愚蠢的贝亚托从裴多菲·山陀尔街的烟草店叫人捎话给我，说他是个非常规矩、殷勤的年轻人。他们是老相识。贝亚托经常托他把当天的货款上交银行。他有腿疼的毛病，这样至少可以省掉排队的时间。看上去他倒是个非常机灵、规矩的人。他代贝亚托交了两个星期的款子。后来贝亚托告诉我……那个年轻人从他那里骗走了九千福林，又从我这里骗走了七千福林。我就到他的住处找他，那已经是晚上十点钟了。他住在维雷什·巴勒尼大街一个教员家里。可是奇怪的是，那个教员竟矢口否认他曾住在那里……我怎么对您说呢，我怎么会被卷进去?我也搞不清楚。”

法院工作人员传我进去时，她才把怀疑的目光从我身上移开。门打开了，她让我在头里走。整个大厅装有三扇大窗子，从窗户可以看到设在大楼对过的监狱。大厅里案桌后面坐着一位法官，五十来岁，看上去已是一副疲惫不堪的模样。我一走进大厅，他便从角质宽边眼镜后面抬起他那双善良的灰色眼睛望着我。一位中年妇女和一位秃顶男人分坐在他的

两旁，案桌的右下方摆着一张小桌子，一位胖呼呼的女打字员坐在那里准备打字，她嘴里不停地吃着香肠，还不断地用眼睛去瞟法官，看他是否注意到自己在吃东西。官方指派的被告辩护人是位胖律师，他满头大汗，一只手掏手绢拭去脑门上的汗珠，另一只手臂使劲挟着装得鼓鼓囊囊、锃亮的公文包。我的右手边，站在两名武装法警中间的就是那个被告。看样子他有四十五岁左右，身上穿着皱皱巴巴的蓝色衣服，这说明他在拘留所已经呆了几个星期。被告身材瘦小，背有点驼，衬衫很脏，同围在脖颈上的那条绿色毛线围巾显得很不协调。他生就一副怯懦、谦卑、迂腐的知识分子相，在饭馆里，在酒吧间或小巷里我们经常能见到这种人，他们就在那些堕落者中间厮混。难道说，贝亚托和那位穿蓝色长统袜子的妇女控告的就是这个不幸的家伙？正当我在思索的时候，法官开口了：

"您是波罗巴什·蒂保尔吗？"

"是的。"

"您是作家协会书记？"

"是的。"

"我们希望听取您作为专家的意见。"接着，他对女打字员说："请记下他个人方面的情况。"

我望着女打字员，开始轻松地回答法官关于我个人身份方面的提问。随后，法官摘下眼镜，用一块鹿皮擦拭着镜片，同时向我提供被告的情况。

"汉图什·伊斯特万已经四次站在法庭面前受审，他这

是第四次策划诈骗和盗窃。可以预见法庭可能会判他几年徒刑。在这里，我们不得不提请各位注意，被告是一个声名狼藉的懒汉，正是他的流浪汉生活使他犯了他本人供认不讳的罪行。因此，我们必将对他从严处理。他所犯罪行的性质是恶劣的。他屡教不改，过着流浪汉的生活……他可能被判处四年……严厉监禁……”

“对不起，这件案子跟我有什么牵连？在这里，我作为一个作家能做些什么呢？”我客观地问。法官戴上眼镜，脸上露出一丝笑意。现在，我才第一次从他脸上看到某种愚蠢的优越感。

“这您马上就会知道的。汉图什·伊斯特万认为他不是流浪汉，也不是懒鬼，而是一位作家。请您听清楚：作家。现在，我向您提出第一个问题。您认识汉图什·伊斯特万这个作家吗？”

“不，不认识。”

“对不起。如果连作家协会书记都不认识的人，我们能够把他视为作家么？有这样的知名作家么？”

“知名倒不一定，不过很可能是一位伟大的作家。”

“汉图什·伊斯特万从来没有出版过作品。从您的方面考虑，这样的人会是作家吗？”

“是的。在世界文库里，曾经有过身后才被承认的伟大作家。我只举一个例子：卡托纳·尤若夫[①]生前就没有看到

① 卡托纳·尤若夫(1791——1830)，匈牙利著名戏剧家。《邦克总督》是他的主要代表作。

过自己的《邦克总督》的上演。”

法官摇摇头，又抛出一个新问题：

“汉图什·伊斯特万说他总共写了三个短篇小说和一个独幕剧，这就够当一名作家了吗？”

“我认识那样的作家，他只写了三个短篇小说就获得柯苏特奖①，甚至还获得斯大林文学奖。”

法官焦急地望着我，脑子里又在酝酿新的问题。我看得出来，他企图用逻辑推理的方法，把问题限制在法律的范围内。

“请您费心回答下列问题：作家跟业余文艺爱好者之间的区别是什么？业余文艺爱好者不清楚他不是作家吗？”

“不，事情往往不是这样的。真正的作家有时甚至认为自己仅仅是一个文艺爱好者，尤其是他对自己的作品感到不满意的时候。”

“业余文艺爱好者不为自己写的作品没能发表着急吗？对自己的作品不觉得没有把握，不觉得不满意吗？”

“往往不是这样。真正的作家反而是如此。”

法官依然摇摇头，气恼地把铅笔敲成两截。

“如果从心理因素、写作动机方面难以把业余文艺爱好者同作家区别开来，那么，您认为通过什么样的方法可以辨别出那些对文艺的浅薄涉猎者呢？”

我低下脑袋，我觉得这位法官提出了一个棘手的问题。

---

① 匈牙利最高的国家奖，每年颁发一次。

“唯有在写作的基础上。”

“那是绝对没有疑问的。”他松了一口气，犹如哥仑布终于发现了陆地。

“不，这样说也不一定是绝对可靠的。因为在这个问题上，忌妒、嗜好、世界观方面的偏见已经造成巨大的误解。”

“因此，您认为汉图什·伊斯特万在写这三个短篇小说和一个独幕剧时，他是在劳动，在工作……”

“如果撇开道德方面的问题不谈，我认为，我认为那是……”

“在这件案子里，我们必须维持诈骗和盗窃的控告，而放弃游手好闲和好吃懒做的控告。我对专家提供的证据表示感谢。我们可以宣判了。”

我向法官鞠了一躬，然后朝门口走去。

汉图什·伊斯特万苍白而削瘦的脸上掠过一点什么东西，友好地冲我点点头。他仿佛想说：

“谢谢您，亲爱的同行！”

坐在门口长凳子上的那个卖烟草的妇女冲我喊道：

“现在，您知道为什么把您叫来了吧？”

“我明白了，是关于文学上的事情。”

庭院里聚集着好几百人等着要听我讲话，他们絮絮叨叨地跟随着我，直到大门口的台阶。法庭外面，生活在喧闹着。

旭遇桢　译

德里·蒂保尔

爱　　情

【作者简介】 德里·蒂保尔(1894——1977)，作家，当代匈牙利现实主义文学杰出代表。曾获柯苏特奖。他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早年即参加工人运动。三十年代，以运用心理分析描写一位进步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长篇小说《没有说完的话》驰名文坛。重要的小说还有：《虚假世界的游戏》、《前通讯员》、《回答》、《尼奇——一只狗的故事》等。《爱情》是他写于五十年代中的重要短篇小说之一，遂成为写这类题材最早的匈牙利作家。他于1964年写成的小说《在X的A·G先生》很快被译成英、德等多种文字出版。

牢房门打开了，看守把一包东西扔了进去。

“接住!”他说。

那是一个上面标明号码的口袋。它正好落在房内一个囚犯的脚下。B站起身子，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望着看守。

“里头装的是您原来的衣服！”看守说。“赶快换上！他们马上给您理发，刮脸。”

七年前，从他身上扒下来的衣服和皮鞋就装在这只口袋里。衣服皱成一团，上面连巴掌大小的平整处都找不到，皮鞋也发霉了。那件被撕破了的衬衫当然也发了霉。他刚换好衣服，那位专门给囚犯理发的监狱理发师便来了，立即动手给他理了发，并刮了脸。

一个小时以后，他被领到那间小小的监狱办公室门口。走廊里已经有八九个脱掉囚服、换上普通衣服的犯人在等候。他刚来到办公室门前，他们便叫他第一个进去。办公桌后面坐着一位警官，另一位警官站在他的旁边，在他们面前，在这狭窄的办公室里，一位中尉军官缓慢地来回踱步。

“走近些！”坐在办公桌后面的警官开了口。“您的姓名？……您母亲的姓名？……打算到哪儿去？……”

“我不知道。”B说。

“这怎么可能？”警官问道：“您连要到哪儿去都不知道？”

“是的，”B说，“我不知道要把我带到哪里去。”

警官满脸怒气，瞪了他一眼。

“不会再把您带到哪儿去了，”他粗暴地说，“您可以回到您妻子那儿去吃午饭，夜里您就可以有所作为了，明白了吗？”

犯人不回答。

“说呀，您打算上哪儿?”

“榆树街十七号。”

“在布达佩斯，第几区?”

“第二区。”B说。“为什么放我出去?”

“问这干吗?”警官又发怒了。“放您出去，您就出去。从我们这里获释，您该高兴呀。”

他们从隔壁房间拿来属于他的贵重物品：一只镀镍的怀表、一枝钢笔和一个他从他父亲那里继承下来的皮面已磨光的深绿色钱包。钱包是空的。

“来签个字吧!”警官说。

又看到镀镍的怀表、钢笔和钱包，他感到莫大的欣慰。

“还有这!”

是的，还有那一百四十六福林的工资也使他感到欣慰：他们当着他的面点完钱，把钱放在桌子上。

“这您也拿走!”警官说。

B从衣袋里掏出钱包，把钱塞进钱包里面的一个隔层。钱包也散发着霉味。最后，他们把释放证递给他。释放证上面的逮捕原因那一栏是空着的。

在走廊里，他约莫等候了一个小时，随后连同他自己总共四个人在看守监护下向监狱大门口走去。可是就在他们快走到大门时，从他们背后跑来一位警官，把他们叫住。警官从他们四个人中间叫出一个来，由两名手持冲锋枪的看守挟持着押送回牢房。那个被叫回去的人刚刚刮过的脸立刻变得

蜡黄，活象得了胆囊炎的病人，而且眼珠子也发直了。

其余三个人继续朝前走，终于来到监狱的大门口。

“那里有电车，您上车去吧！”看守又对B进行了最后一次检查，重新把释放证交到他的手里后说。

B站着不动，低头看着地面。

“您还等什么？”看守问。

B还是站着，垂着脑袋。

“快走吧！”看守又说。“您还等什么？”

“我这就走。”B说。“这么说，我可以走啦？”

看守不回答他。B把释放证装进口袋，走出大门。刚走几步，他本想回头看看，可是没有这份勇气，便又继续往前走。他竖着耳朵倾听自己身后是否有脚步声。他心里想，如果他走到电车站，仍没有一只手从身后沉重地搭在他的肩膀上，或者他们仍没有从后面叫唤他的名字，那么，他们可能是最终释放他了。是最终吗？

他来到电车站时，冷不防转过身；身后并没有任何人跟踪他。他把手伸进裤兜里，想掏手绢擦掉额角上渗出的汗珠，可是裤兜里没有手绢。他上了一辆刚进站的电车。这时正巧从后一节车厢下来一个监狱看守，这看守从头一节车厢旁边走过时，用他那双挑衅式的小眼珠子长时间地审视着正站在车门上的B，那张麻脸显得老大不高兴。他没有向这个看守打招呼。电车开走了。

就在这一分钟——从这一刹那，也就是他没有向监狱看守打招呼，电车开走后的这一刹那开始，他周围的世界竟变

了样。这时候他的感觉就象坐在电影院里，由于机器出了故障，银幕上只有人影，却没有声音；好不容易才听到屏幕上张大着嘴巴的人影只讲了一句话或者一个词，突然又没有声音了；观众终于失去了耐心，便都不耐烦地大声说话或唱起歌来，使得本来是鸦雀无声的大厅，突然变得闹哄哄的。他只觉得周围的一切把他搞得眼花缭乱，晕头转向。迎面开来一辆电车，它的颜色黄极了，黄得仿佛他从来没有看见过似的。那辆电车从一幢刺眼的灰白色两层楼房前隆隆地急驰而过，B似乎觉得这辆电车永远不会停下来了。在街道的尽头处，有两匹枣红马驾着一辆双轮马车在奔驰，象伴随着乐曲的旋律在天空中飘舞的彩云。马路两旁的便道上，行人熙熙攘攘，他们穿的都不是囚服，个个打扮得都很漂亮，而且各有特色。他发现在那些行人中间有不少矮得出奇的人，他们只有一般人的膝盖那么高，更奇怪的是人行道上竟然还有许多女人。

B仿佛觉得自己的眼睛湿润了，便朝车厢里头走去。女售票员的声音是那样的温柔、悦耳。B买了一张票后，坐到车厢后排一个单人的座位上。他闭上眼睛。他担心睁着眼睛会失去自控力。当他再次睁开眼睛朝窗外望去时，他看见在对过的人行道上，有一个男人站在啤酒厂前面，正在抚摩着一个年轻女子的脸蛋呢。他又把手伸进兜里，仍然没有找到想用来揩拭额角上汗珠的手绢。一个工人走到他对面的空位上坐下。这工人拎着一个装有十瓶啤酒的手提包，手提包的口是敞开着的。

女售票员笑了。

“这不多了点吗？”

“同志，我是有家口的人啰，”工人说，“我妻子是喜欢看丈夫喝酒的。”

女售票员笑了。

“是吗？”

“是呀！”

“黑啤酒？”

“是的。”

“淡啤酒比黑啤酒好喝。”

“我妻子喜欢看我喝黑啤酒。”工人说。

女售票员笑了。

“要是您能匀给我一瓶就好啦。”

“黑啤酒？”

“当然是黑啤酒！”

“给谁？”

女售票员笑了。

“我想捎回去给我丈夫。”

“既然他喜欢金发女人，为什么要给他捎黑啤酒呢？”工人打趣说。

女售票员笑了。电车也到站了。B从电车上下来，坐进一辆出租汽车。

“您上哪儿？”过了一会儿，司机见乘客不吭声，便主动问道。

"去布达。"B说。

司机转过头来端详着乘客。

"走哪一座桥？"

B直愣愣地望着前方，问：

"这是什么意思？"

"您大概对佩斯不熟悉吧？"司机反问道。

"走玛尔奇特桥。"B说。

出租汽车开动了。B直挺挺地坐着。被太阳晒得灼热的街道在冒着沥青味和尘土味，这些气味和电车的响声一起从敞开着的玻璃窗钻进车子里。太阳以同样的光和热照射着道路的两旁，把来去匆匆的行人的身影投射在柏油路面上，仿佛使街道的交通变得加倍的繁忙。在一家冷饮店橘黄色条纹的帆布棚下面，一个年轻女子在吸烟，烟头亮着血一般的红光。再过去一点，在人行道的拐角处，有一棵树龄不算太长的栗子树，枝叶茂盛，一根拳头粗细的枝干在来回晃动，树下面的影子也跟着晃动。

"您要是看到一家纸烟店……"B对司机说。

汽车再往前开不远，约莫过了三幢房子的距离处停了下来。B从玻璃窗朝外看；他发现他们的车子正停在一家敞着门的铺子前；铺子前面是一片草坪。

"您坐着吧，"司机转过脸对他说，"我帮您买。您喜欢什么牌子的？"

B望着铺子的橱窗，手却在哆嗦。

"柯苏特？"

“是。”B说。“请顺便捎一盒火柴来。”

司机下车去了。

“您不用着急，过一会儿我们会找到搬运工的。您不就只这一个包裹吗？”

“是，那就谢谢您啦。”B说。

“抽一根吗？”司机返回来时问道。“我的小舅子也在里面蹲了两年，他一出来也是先上烟草店。他一根接着一根足足抽了两包柯苏特牌香烟，然后才回的家。”

“您也看出我是从监狱里出来的？”过了一会儿，B问道。

“可不，多少看出点来。”司机说。“当时我的小舅子也象您现在一样，一脸病态。当然，您也可能是从医院出来的，不过从医院出来，衣服不会皱成这个样子。您在里面蹲了多长时间？”

“七年。”B说。

司机吹了一声口哨。

“政治原因？”

“是的。”B说。”他们判我在死囚牢房呆了一年半。”

“现在他们把您释放啦？”

“看来是这样。”B说。“是不是一眼就能看出我是从监狱里出来的？”

司机先是耸起两个肩头，随后又放了下来。

“七年！”他说，“这不奇怪。”

B在齿轮厂附近下了车，剩下的路他想步行，在同妻子见面之前，他想让自己的动作从容些、自然些。司机不肯收

他的小费。

"同志，您现在需要钱用。"司机说。"别的不要去多想，保重身体要紧哪！每天吃点肉，喝它半升好酒，过一个星期，您就恢复元气啦。"

"谢谢，再见！"B说。

他朝对过的马路走去，在一家时装店的橱窗里看到一面窄窄的镜子。他在镜子面前踌躇了一会，然后又继续往前走。巴沙里蒂街上行人较多，他便从网球场旁边的一条小道往一座小土丘走去，从那里拐进哈勒曼·奥图街。这里的广场周围是一些破旧的建筑。B觉得脑袋晕呼呼的，便坐在草坪上。他想，妻子反正也不会在家等他。他在那里坐了半个小时。在他的对面，也就是栅栏的后面，有一棵苹果树正在开花。他目不转睛地望了好一会儿，然后站起身，朝栅栏走过去。那棵苹果树的枝头上开着密密层层的小白花，光洁照人。从树下朝上观赏那些洁白的花朵，仿佛它们是镶嵌在蓝天上的白云。只要细细观察那些花朵，你会发现它们象一只只小酒杯，圆圆的花瓣，玫瑰色的花心，犹如年轻新娘的脸蛋，抹着一层淡淡的脂粉。数不清的蜜蜂在花间嘤嘤低语，仿佛是把朵朵白花用金丝线联结起来的金梭子来回穿织。苹果树在微风中摇曳，在阳光照耀下象一把明晃晃的火炬。B站在树下沉思默想。他发现从苹果树的两根枝杈中间可以仰望蓝天，一朵毛绒绒的白云立定在那里，一动不动。他被这远在天边的另一棵正在盛开的苹果树深深吸引住了。他一直在观望眼前这棵触摸得到和那棵触摸不到的苹果树，直到不再觉得头

晕为止。

大概他忘记掏出怀表，所以不知道从出租汽车下来以后，已经过了多长时间。他终于转过身，朝家的方向走去。刚迈出几步，他又在一丛灌木后面站住了，他感到一阵恶心，呕吐了以后才觉得轻松一些。他慢慢步行了半个小时，穿过几条阳光几乎照射不进来的小巷，因为街道两旁的果树挡住了太阳的光线。他站在一幢房子前面。被捕前，他家就住在这幢房子的一层。在院子里，房门的两侧各种着一丛白丁香。他走上台阶。

他按了好一阵子门铃，始终不见有人出来应门。门上没有名牌。他只好又走下台阶，去敲看门人住的那排平房的门。

“日安！”一位出来开门的妇人跟他打招呼。这妇人面容清癯，比当年老多了。

“您找谁？”

“我是B，”他说，“我妻子还住在这里吗？”

“我的上帝！”妇人叫了起来。

B低头望着地面。

“我妻子还住在这里吗？”

“我的上帝，”妇人又说了一遍，“您这是回家来啦？”

“是回来了。”B说。“我妻子还住在这里吗？”

妇人的手松开门把，让门半开着。

“您这是回家来啦？”她一再重复着。“我的上帝！噢，他们当然是住在这里。她不知道您回来吗？仁慈的上帝！他们

当然是住在这里。”

“我儿子也住在这里?”B问。

妇人终于明白了他的意思。

“他好好的,”她说,“什么病疼都没有,他已经是一个结实、漂亮的大小伙子啦。我的上帝!”

B 沉默了。

“请进屋吧!”妇人用颤抖的声音说:“请进屋呀!我知道您是清白无辜的。我知道您会再回来的。”

“那里没有人出来开门。”B说,“我足足按了三次铃呢。”

“请进来吧!”妇人一再催促。“谁都不在家,住在里面的房客也出去了。”

B不再出声,眼睛望着地面。

“您妻子上班去了,卓利柯去上学,”妇人说,“您不愿意进来?他们要到下午才回来呢。”

“已经有房客跟他们同住?”B问。

“房客都是规规矩矩的好人,”妇人说,“您妻子同他们相处得不错。我的上帝,您这是回家来啦?”

B沉默不语。

“房门的钥匙在我这儿。”过了一会,妇人说。“您上去吧,在您妻子回来之前,好好休息休息。”

墙壁上有两排钉子,钉子上各挂着一串钥匙,妇人取下其中的一串,从屋里走出来,随手把门掩上。

“您上楼休息去吧!”她说。

B还是低头望着地面。

"您也上去吗？"他问。

"是的，"妇人说，"我给您带路，指给您看您妻子住在哪一间房子。"

"他们住在哪一间？"B问。

"有四个房客，"妇人说，"他们分住两个大间。您妻子和卓利柯搬到那间小的里头住。可是厨房和浴室是共用的。"

B不回答。

"咱们现在就上去呢，"妇人问，"还是您就在我们这里等他们回来？您就躺在这里的躺椅上，先休息一下，等候他们回来吧。"

"厨房和浴室是共用的？"B问。

"当然是共用的。"妇人说。

B抬起头，望着妇人的面孔：

"那么，我也有权利在浴室洗澡？"

"那还用问，"妇人微笑着，轻轻地用手掌象托着似的扶着B的胳膊肘，"您当然有权利在浴室里洗澡。我说过了，那套住宅里的浴室是共用的，您就大胆地烧水洗个澡吧，我们的贮藏室里还存着过冬用的木柴。不过我知道，房客在白天是把浴室锁起来的。"

B又沉默了，重新望着地面，

"咱们是上去呢，或者干脆您到我们家里来？"妇人问道。"那就请到我们家来吧！我呆在厨房里，不会打扰您的，您躺在躺椅上，也许还能睡会儿觉呢。"

"谢谢您，"B说，"我们还是上去吧。"

象所有的仆人的房间那样，那间小房子的窗户也是朝北的；窗前是一棵高大的白槐树，从左边可以眺望古格尔山黑魆魆的山峰。在白槐树的荫庇下，房间里显得有点阴暗。等房间里只剩下他一个人时，他闻到一股气味，立即辨别出这是妻子身上散发出来的。他索性坐在窗户旁边，尽情地吸气。他凝视着窗外那棵白槐树的婆娑树影。他仿佛被妻子身上散发出来的气味迷住了，不停地吸着。在这间狭小的房间里摆着一个上了漆的木头柜子，一张铁床，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显得特别拥挤。他小心翼翼地朝那张铁床走去，以免碰倒那把椅子。他不是躺在床上，而是坐在床沿上，在深深地吸着气。那张桌子上堆满了各种杂物：书籍、衣服、儿童玩具，还有一面小镜子；他照照镜子，镜中人跟他在齿轮厂附近的商店橱窗里照镜子时映出来的一模一样。他把镜子平放回桌子上。他没有在妻子堆放在桌面上的杂物里乱翻。烟灰缸里搁着一个有红色斑点的球。他觉得在桌子上面也散发着妻子的气味。

他刚坐回到窗户旁边，那看门的妇人就端来一大杯加奶的咖啡和两张厚厚的摊饼。他独自一人留在房间里时，便吃了起来。过不多时，那妇人又来了，这次是给他端来一杯咖啡、抹黄油的面包、香肠，还有一个他在街上商店橱窗里看见的那种大苹果。她把托盘放在桌子上，眼眶里噙着泪花，过了几分钟后才离去。当剩下他一个人时，他又把这些全吃了。他没有掏出怀表，所以不知道坐在窗户旁已经多久了。窗户是对着后院的，那里没有人行走，透过那棵白槐树光洁白净叶子的缝隙，时不时吹来一阵阵微风，午后的阳光在这间

小小房间的灰白墙上摇曳着。

他觉得已经把妻子留在房间里的气味全吸进肺里以后，便走出房门，踩着台阶朝院子的大门走去。他想走到街上去。过了一小会儿，他的妻子从街角走了过来。她身边有四五个孩子。快走近大门时，她的脚步突然放慢了，犹豫片刻后，便又加快步子走过来。B也下意识地奔跑过去。当他们彼此快接近时，她忽然又停住脚步，仿佛变得毫无把握起来，接着她又起步向他奔跑过来。B认出她身上那件灰底黑条纹的长袖毛衣，那还是他被捕前的晚上在城里的一家商店买的呢。他又从妻子身上闻到那股独特的气味，这是他任何时候都不会弄错的。这种气味是那样浓郁，远远超过他蹲在监狱七年所想象的。

当他们彼此从拥抱中松开手臂时，B靠在院子的栅栏上。在她背后几步远的地方，有四五个孩子呆呆地站着，脸上流露出惊奇而又有点敌意的神色。他们小的七岁，大的也不过九岁左右。说精确些，他们不是五个，而是四个。B靠在栅栏旁边逐个地审视着他们。

“哪一个是我的？”他问道。

这时，妻子哭了起来。

“咱们上去吧！”她哭着说。

B用手臂搂抱着她的肩膀。

“别哭了！”

“咱们上去吧！”她说着，又放声大哭起来。

“别哭了！”B说。“哪一个是我的？”

她推开院门，飞快地朝房子跑去，从那两丛丁香花中间，消失在大门里了。她的身段还象他们分离时那样苗条，腿脚还象做姑娘时那样富有弹性；那时候，她是那么无拘无束。可是，当B跟着她走上台阶，来到房门口时，她已经镇静下来了，只有她那藏在灰底黑条纹毛衣下面的姑娘般的胸脯还在一上一下地起伏着。她已经止住哭泣，但眼眶里还噙满泪水。

“我亲爱的，”她贴着他的耳朵说，“我亲爱的！”

她的耳语是那么轻，仿佛她嘴里说出来的每个字都是非常特别似的。

“咱们进去吧！”B说。

“现在房子已经有别的人住了。”

“我知道了。”B说。“咱们进去吧！”

“你进去过啦？”

“是的，进去过了。”B说。“哪一个是我的儿子？”

在房间里，她跪了下来，把脑袋靠在他的怀里，又哭了起来。在她淡黄的鬓发中间已经夹杂着少许的银丝。

“我亲爱的，”她说，“我一直在等着你，我亲爱的。”

B抚摩着她的头发。

“日子过得很艰难，是吗？”

“我亲爱的。”她又轻声地对他说。

B还在爱怜地抚摩着她的头。

“我已经很老了，对吗？”

她又抱住他的双膝，用身体紧紧贴着他的腿。

“在我看来，你还是我们分别时那个模样。”

“我是很老了吧？”B又问道。

“只要我活在世上一天，我就爱你一天。”她又轻声地说。

“你爱我吗？”B问。

她禁不住打了一个寒战，又大声哭了起来。B抚摩着她的头的双手也随着垂落下来。

“你还能象从前那样对待我吗？”他问道。“还会象从前那样对待我吗？”

“我从来没有爱过别人，”她说，“我一直爱着你。”

“你一直在等着我？”B又问道。

“我一直在等着你。”她说。“我没有一天不在想念你。我知道你一定会回来的。万一你回不来，我也永不改嫁，何况还有你的儿子呢。”

“你还爱我吗？”B又追问。

“我从来没有爱过别人，”她说，“我对你的爱是至死不渝的。”

“你瞧，我变多了，”B说，“我变老了。”

她又哭了起来，紧紧抱住丈夫的双膝；B又抚摩着她的头。

“我们还会有孩子吗？”她问。

“可能还会有的，”他说，“如果你爱我的话！站起来吧！”

她站起身。

“要不要我去把孩子叫上来？”

“先别去叫，”B说，“我想跟你再呆一会儿。他已经不认得我了。他就在院子里吗？”

"我找他去，"她说，"告诉他先等一等。"

她返回来时，B正站在窗户旁边背对着房门。他的脊背仿佛变得窄小，而且有点驼了。听到脚步声时，他没有转过身来。她在房门口站了一会儿。

"我叫他去采一些花来给爸爸。"她说着，声音有些嘶哑。"隔壁邻居园子里的丁香开得正旺，我叫他去采一大束丁香来给你。"

"你还爱我吗？"B问。

她朝他扑过去，抱住他的肩膀，把整个身体紧紧贴住他。"我亲爱的。"她把嘴贴在他的耳旁轻轻地说。

"你还会象从前那样对待我吗？"B问道。

"我从来没有爱过别人，"她说，"我一直日日夜夜在思念着你。我每天都对你儿子说起你。"

B转过身，搂抱住妻子，目不转睛地望着她的脸。在从窗户照射进来的落日余晖里，他用泪眼望着她，透过泪水他看见的她也变老了，尽管仍比他七年来日夜思念的她要漂亮得多。她闭上眼睛，半张着嘴，从洁白的牙齿缝隙中呼出来的温暖的气流拂拭着B的嘴唇。她的脸庞还是那样白皙，浓密睫毛下面的眼睛却湿润了。她把脸向他贴过来。B吻拭着她的眼睛，然后轻轻地放开她。

"你也要爱我们的孩子！"她还是闭着眼睛对他细声细气地说。

"好的，"B说，"我会的，我一定会爱他！"

"爱你的儿子！"

“还有你。”B说。

她搂住他的脖子。

“我给你洗个澡。”她说。

“好极了。”

他脱掉衣服。她去替丈夫铺床，再把一条毛巾披在光着身子的丈夫身上。随后她去端来一盆热水，拿来肥皂和两条毛巾。她先把毛巾在热水里沾湿，打上肥皂，从头到脚替丈夫把全身擦洗一遍。总共换了两次水。这时，B的手还时不时地在颤抖，可是神色已经自若多了。

“你还会象从前那样对待我吗?”B又问道。

“我亲爱的。”她说。

“夜里你跟我一块睡吗?”

“当然。”她说。

“孩子睡在哪儿?”

“晚上我会在地板上给他铺一张褥子，”她说，“他会睡得很香的。”

“整个晚上你都会躺在我身边吗?”

“当然，”她说，“只要咱们还活着，每天晚上都要在一起。”

冯植生　译

维希·安德烈

安奇·维罗的生活篇章

〔**作者介简**〕 维希·安德烈(1916——)，匈牙利著名小说家、诗人，曾三次获得尤若夫·阿蒂拉文学奖。他的作品以描写工人生活、社会主义建设和知识分子问题为主要题材，善于揭示日常生活中的戏剧性冲突，写作风格丰富多采。重要作品有：《你自由了》、《她抱着孩子》、《女秘书》、《黑色的羊羔》、《春天到来的时候》、《多瑙河上的桥》、《使命》、《布达佩斯的隐匿者》等等。《安奇·维罗的生活篇章》是他的代表作之一，最初发表于1962年，1978年被改编成电影，他亦于同年获得柯苏特奖。

医院的讨论会快结束了，安奇·维罗并不想站起来发言。她一直很不耐烦地坐在椅子上，甚至会议主持人向与会者提出问题的时候，她也没有举手。烟雾萦绕着她金黄、厚实的头

发；她清瘦的、典型的尖脸上毫无表情。那是一个初秋的星期天上午，天空罩着一层云翳；礼堂的灯早打开了，新近才从墙上把医院前赞助人、权贵和豪商的画像摘下来，因此礼堂显得光秃秃的，给人一种荒凉感。百无聊赖的气氛向四周扩散着，最后停留在正面墙上。一位医生正在谈论两个工人阶级政党合并这一不言而喻的事，他的通篇讲话书生气十足，使用的是大家都陌生的语汇，还夹杂着“我们革命者”这类的词，而且一再郑重其事地重复着。

他最后一句话的话音刚落，安奇·维罗便霍地站起来。她修长的身段很苗条，小纤腰细得难以叫人置信；她那清秀的尖尖的脸镶嵌在厚实、黄澄澄的金发里，宛如长在挺拔的花梗上。激昂的话语从她的唇间奔流而出，这些用语都是她以前从未有意识地使用过的——连她也对自己突如其来的愤怒感到吃惊。在烟云氤氲的礼堂里，苍白的面孔、明晃晃的眼镜、灰白的脑袋都转向她，而在礼堂另一端的某个地方，坐在主席台上的区代表则用笔迅速地作记录——他是一位红脸膛的男人，她一开始就注意观察他的一举一动。她现在正冲着他说话，冲着这位把头伏在纸上的男人说话。她批评医院的管理工作，指摘绅士派头的院长象上帝一样骑在职工头上作威作福，还提到医生们不得不经常提防来自背后的攻击，以及私人病房制仍然存在的情况。

区代表一字不漏地记录下她那骤然脱口而出、充满控诉的发言。同大多数经常跟下级职工接触的干部一样，他也受到发现人材的希望所鼓舞。两党合并还不到六个月：急需新

生力量和新鲜血液。他在打量着安奇·维罗，发现她白皙的脸蛋仿佛在燃烧，愤怒使得她的血液都快烧干了。他把写好在纸上的一个问题递到党支部书记面前："她是谁？"对他提问的答复写在从报纸上撕下的条子上："助理护士。刚从勤杂工中提拔上来的。"

安奇·维罗周围的世界顿时起了变化。烟雾、阴郁的灯泡的黄光和索然寡味的装饰混合成单调的整体。她发现她的邻座在望着她，冲她眨眨眼，警告她不要再说下去——他是对的，她何苦要发言呢？——然而她没有住口；这些话在她舌面上已经燃烧了几个月，甚至几年了；她过去不得不经常咽下的愤怒和闭上嘴的痛苦，而且这一切直至她放下拖把，在腰间系上护士围裙之后仍没有改变。

安奇·维罗的这一席话把在场的人搅得蠢蠢而动。在外面走廊上推着手推车的职工开始把锅碗瓢盆弄得丁丁当当响，嘴里咿哩哇喇地又说又笑，把星期天比较象样的午餐送到病房；肉丸子烧甘蓝的香味一个劲地钻进礼堂，但是讨论仍在继续。区代表沉着地在做记录，然后把安奇·维罗的名字写在另外一页纸上，旁边还打了一个惊叹号。

第二天上午，安奇·维罗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走进院长办公室。房间里充塞着旧皮革的霉味，那是从鼓鼓的扶手椅散发出来的。院长是一位年近六十的高个子男人，衣着讲究，背有点驼，是一个医学世家的后代。他的脸很长，脸上的肌肉松松垮垮，额头很高，致使脑壳呈鸡蛋形。疲惫和哀愁使他那双鼓鼓的、失去光泽的眼睛显得温和些。

他让姑娘坐下。当她深深陷进凉森森的扶手椅里时，觉得仿佛是坐在冰水里似的。院长站在著名外科医生，也就是他自己父亲的油画下面，沉默好一阵子后才开口。

“听说昨天的党支部会上你提到了我，真难为你啦。”

他这不是有意冷嘲热讽；他平时说话就是这个样子。

“我宁愿他把我扔出去！我宁愿他叫我滚蛋，而不这么折磨我！”维罗心里想，随着焦虑而来的是后悔，于是紧紧捏着自己的手。他们最后一次象这样单独谈话的时候，院长也是站着把她母亲的事告诉她，身上还穿着白大褂，口罩从脸上耷拉下来。当时维罗母亲的肚子被弹片打得稀烂，做完手术半小时以后就死去了，他们却还在外面争吵。

“我的行为举止确实与众不同，要是你高兴就把它叫做绅士派头吧，”院长接着说，从画像下走出来，“不过你可不能说我反民主呀。我认识所有为这所医院工作的人。我不仅认识他们，而且真正关心他们每一个人的问题。不下于两百人的衣食住行问题。你会记得的，孩子，在围城战中，你和你母亲到医院来避难的时候，就是我批准你们留在这里，给你们找到住处、工作和吃的。”

“可我母亲却死了。”姑娘说，脸上毫无表情，另一种仇恨又涌上她的心头。

“我认为，在那种条件下我们已经为她采取了一切能够采取的步骤……”

维罗慢慢抬起眼皮，望着院长的面孔。那个男人瞪大眼睛盯视着她，显得有点吃惊。

“是的，在那种条件下……”院长若有所思地重复着。“你在我们这里干了三年了，虽然我们从来没有谈过这事，但我一直认为你对自己在这里的位置是满意的。”姑娘的手在自己怀里扭绞着，随后跌坐在扶手椅里。“我想你甚至已经被提名参加护士训练班了。”他急忙补上一句。他的语调和表情全变了。

姑娘又瞥了院长一眼，刚才转瞬即逝的想法虽不是她有意识的反应，然而她的神经却更坚强了：这个人怕她。怕她，怕她这部庞大机器中最微不足道的一个零件。

“因此你的提升，在我看来……”

“谁稀罕那个，”姑娘打断他的话，“这里还在发生的卑鄙下流的事情叫我恶心死了！”

院长的脸变得灰白。

“你，不要太放肆！你是在含沙射影吗？你怎么胆敢用那种腔调对我说话？”

“你们都是一路货，你们瞧不起我们，不是吗？对你们来说一切照旧，不是那样吗？”安奇·维罗喊叫起来，她白皙的脸蛋涨得通红。

她的激动感染了院长。他眼圈四周的皮肤也因愤怒变成了绛色。

“我无法容忍这种语言！可是一转念，还是让你说下去吧，你这爱造谣中伤的小妖精。但是不允许你在这里诽谤我！出去，我的好姑娘。你给我从这里滚蛋！”他冲向房门，砰地一声把门敞得大开。门上皮垫充里的马鬃随着纷纷落下来。“滚

出去！”他还上气不接下气地重复着，然而姑娘早已离开了房间。

他探头朝走廊里望去。他感到嘴里冒出一股令人作呕的气味，好不容易才忍着没有吐出来：他在责备自己刚才如此粗鲁，发那么大的脾气，任凭自己的怒火突破神经的保护线，这是有失体面的 。一个外科医生的镇静应始于手术室墙壁之外，正由于此他感到倍受威胁。他的畏惧超过瞬间爆发的怜悯。他感到自己的脊背裸露在外面，毫无设防。

就在当天晚上，安奇·维罗到区总部去找那位她发言的时候做记录的红脸膛的人。

区代表塞特林格同志见到她时感到又惊又喜。他把她让进他那间冰冷、却没有烟雾的房间里。他扬起他那张紫色的胖脸对着姑娘。

“我们刚刚谈到你。就在刚才！”他说，话语中带着意外和巧合的欣喜。

维罗怀着期望的思绪在驰骋。她那双机灵、倔强而庄重的眼睛注视着她面前的男人。可是他却没有接着往下说，倒是轮到她谈自己的身世了。她父亲二十六岁上在前线失踪了。说到这里她停住了，抬起她那双美妙的灰眼睛，用略带咄咄逼人的坦率目光盯视着这个男人。

“我们最后一次听到的消息说他在德布雷森前线，以后……从此我们就不知道他的下落了。我们到处找他，他却消失得无影无踪。”

她在背诵自己的传记，一字不漏，连逗号也没有落下。她

们过着叫人心碎的穷苦日子，故去的父亲原是个看仓库的，没有一丝一毫的阶级觉悟，终于成了一个酒鬼；母亲是一个典型的受苦受难的劳动妇女。维罗在一个军官家里当女仆直至这家人为逃避前线迁往西方。随后母女二人在医院的地下室找到栖身之处，并受雇在病房打扫卫生，把尸体抬到太平间，擦洗手术室血糊糊的地板。不久母亲受了致命伤，医院便成了维罗永久的家。

“我老觉得自己没有很多可说的，可是你知道，同志，”她解释道，“我怎么也不能闭上我的嘴。”于是她把自己来找他的原因告诉他。

“院长叫我去，为的是昨天发生的事。”她在重温那幕情景时，白皙的皮肤变得更加毫无血色。“开头他自我表功一番，说他一向待我多么好，最大的功劳当然是他养活了我死去的可怜的母亲。可是当他发现这些都不起作用的时候，他就威胁我。这个恶棍！他是一个衣冠楚楚的强盗，是的！他们想除掉我，因为我把实话告诉了他们。”

“他们除不掉你，我们会防他们这一手的。院长嘛，暂时还让他当——反革命势力在支持他。他们说他是一名出色的专家，参加过民主活动，现在应该受到信任。”他把嘴一撇，露出嘲讽的笑意。“总有一天这些诡辩会失去魔力的。也许不会太久了。”

维罗心中一阵狂喜，怔怔地望着书记。仅仅那么几句话，因为出自信任的交谈，便把他们俩联系在一起了。当他补上一句“我刚才说的当然只能咱们俩知道”时，她觉得自己同区

党代表更加亲近了。

他们告别的时候，他们之间已经建立了真正的友谊。

“有空再来，同志。”塞特林格用这句话来代替说再见。

几天以后，他对医院党支部书记说出象维罗这样一位聪明、泼辣的妇女不该被埋没在区里的想法，并为她的提升采取了步骤。1948年秋，她被派到州的一个城镇去参加为期三个月的党课训练班。

他们在地下室的饭厅等候，坐在铺着油布的餐桌旁。另一轮审问在等待着他们：他们将挨个走到校委会面前。因为不够格，从这里被遣送回原单位是多么丢脸呀！

本来井然有序坐在一起的人们，由于旅途的劳累，加上焦虑地等候了几个小时，已经坐不住了，开始三三两两聚在一起交谈。烟雾在他们头上飘动。有些人被校委会盘问的时间比大部分人都长，他们一开门出来，连珠炮似的问题便向他们射来：他们问些什么？什么使人印象最好，书本知识——还是坚定的风度？什么五花八门的问题都有，全是因眼下这种狼狈的窘境造成的。回答是各式各样的，没有一句老实话，而且全都是驴唇不对马嘴。时不时爆发出阵阵的笑声，不过声音倒是清脆而兴奋的。

安奇·维罗独自一人坐在一条板凳上。在这里大家都互叫名字，她虽然逐渐习惯了这种称呼，可是总觉得难以回报他们那毫不掩饰的友谊。畏惧在她内心燃烧。她能期待什么呢？她周围尽是些有文化教养又有手腕的人们，可是连他

们都把握不住自己的命运呢。她虽然上过几个基础课程——诸如“什么是法西斯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她还是责备自己水平太差。她认为那些派她来学习的人也同她一样欠缺考虑到荒唐的程度。叫她来受这分罪干什么?他们很快就会发现——她来这里是个错误,因为她并不真正想学习,使自己成为一名优秀分子。接着她不禁又想起院长来,想起她发现那个冷酷、自恃的人害怕她时的奇异时刻——害怕她!一想到这她就稍稍平静下来,得到一点安慰。

那是一个快近黄昏的下午,灰褐色的夕阳照射在宽敞的玻璃窗上,她终于从烟雾和嘈杂声中听到喊她的名字。她抓起大鞣皮公文包——医院党委赠送的礼品——步入房间。起先她看不见任何委员;他们都坐在灯光后面的某个地方,人数可能很多哩。

问题一个接着一个向她急速投来,问的既枯燥无味,又无针对性,而且声音很单调,仿佛是用消过毒的镊子逐个捡出来似的。

现在她完全明白自己该怎么办:干脆一个问题也不回答。她全然不知道过去了多长时间,站在那里,倔强地沉默着,摆脱了一切思虑,甚至畏惧。不知什么时候有个人走到她身边,温和地扶着她的手臂,领她到一张椅子前。

“坐吧,同志。”一个男人的声音说,是那个举止文雅的人的声音。

她坐下,双腿开始发颤。她的眼睛突然睁开了。原来长桌后面坐着五个人,那位叫她坐的年轻人还站在她身旁等

候。他身体单薄，样子很谦虚；他那双灰褐色的眼睛从苍白的脸膛上向姑娘射出灼热的红光。

“还有许多时间可以考虑，不要紧张。”年轻人用鼓励的口吻说。一绺浅棕色的卷发在他额前甩动；他脖子上一个很大的喉结使劲地在上下跳动，以赶上他说话的节奏。“这里的同志们都祝愿你顺利。”

安奇·维罗只觉得嗓子发干，最后还是回答了：

“你们问的我一题也答不出来。我从出世到现在从来没有念过书，也从来没有人教过我。我一直在为面包，为面包而……”

“党，同志，党会教你的。”一位戴着眼镜、又矮又瘦的男人说，他坐在长桌后面的正中央，维罗从他坐的位置猜测他必定是这里的领导。他看上去很严肃，显然没有幽默的感官，然而现在连他也变得和善起来，声调客气而温和。维罗真诚地感动了；她把头低垂到胸前，呜咽起来。

她步出房门的时候，脸已经哭得泪痕斑斑，一位长得很丰满的姑娘扶着她的胳膊，领她到一群妇女堆里去。

“你只管同我们呆在一起吧。”她用悦耳的女中音一再保证着。“我们会相处得很好的，日久见人心嘛，等着瞧。我们会相互帮助的。我叫莫什卡特·玛丽亚。”

吃过晚饭以后，她们的房间也分配好了——她们八个人住一间简陋的大屋子——她觉得一切都安顿得井井有条。她自孩提时起就没有哭过，可是现在她眼眶里积满了一湾泪水，它们包含着她的现在和过去，也是她的幸福和保护者。

她为自己能机灵地设法应付外界，悟到略施小计的优越，这种感受又反过来用自尊的甜蜜温暖着她的心。

她们又接着聊了起来，一直聊到深夜，陌生的环境和交友的强烈愿望驱走了她们的睡意。维罗更喜欢听她们聊天，听她们中间更有文化教养的人说话，而且觉得她们都各不相同。她逐个把她们都记在心里。东方破晓了，天色朦胧，很冷，其他人约莫睡了几个钟头，她却醒着，为如何进行防范辗转反侧。她不再害怕了，而是对下次将发生什么感到更为好奇。夜里一个妇女说过的一些话象钓鱼钩儿似地牢牢钩住她的脑子。“你们瞧着吧，学习班结束以后咱们就不必回老地方啦。”

她们将来都要到新单位去。她们都会得到提升。当体态丰盈的莫什卡特·玛丽亚——她们中最可爱、最快乐的一个——把她们叫醒时，维罗从微睡中很快完全清醒过来。寒冷、灰暗的早晨又使她感到对自己没有把握。她渴望着得到安慰和怜爱，因此紧跟在莫什卡特·玛丽亚的后面，象一只小猫期待着人们抚摩它的小脑袋。

淋浴室就在她们房间的对过，她们径直穿过走廊，把罩衫扔在衣服架上，站在莲蓬头下面。滚热、密集的水珠子硬邦邦地打在她们身上，滋润着她们的肌肤，她们舒适地沐浴在宜人的热水里，脚下的木板条子周围漂浮着肥皂泡沫。这水汽萦绕的温柔乡是她们真正相互了解的地方，愉快的感觉占据着她们全身，消除了陌生床铺造成的腰酸背疼，也打消了她们心头的疑虑，紧张的情绪终于松弛下来，使她们忘却

了警惕和谨慎。在这里她们仅仅是女人，就肉体和象征意义而言，她们是一群光溜溜、一丝不挂的女人，她们的躯体享受着热水浴，在半明半暗的浴室，狂喜般尖叫着、欢笑着。从隔壁浴室里也不时传来男人们雷鸣般愉快的喧嚷声。

"你的乳房多漂亮，多结实呀，"莫什卡特·玛丽亚羡慕地对维罗说，虽然怀着最大的善意，不免也带有几分嫉意，"象十几岁少女的乳房，是柠檬形的！"说着，她低头看看自己鼓鼓囊囊、沉甸甸的乳房，落在上面的水还不断溅起水花。

从门那里传来指责声，是特罗扬·安娜的声音，她站在最末一个莲蓬下：

"同志们，同志们！你们这成何体统？你们就象一群在洗土耳其浴的中产阶级妇女！"

莫什卡特·玛丽亚用温和却带挖苦的口吻回敬她：

"怎么啦？难道美丽的乳房必定是资产阶级培育而尚未被镇压的残余吗？那是历史范畴，"她叫喊起来，声音愉快、圆润，"最好把它忘掉不好吗？"

从一些分隔间里冒出格格的笑声，这使特罗扬·安娜更加反感。她的身躯笨重，已经开始发福，厚实的头发里灰发斑驳。她用罩衫挡着自己的身子，一脸官司走到玛丽亚面前。

"莫什卡特同志，"她显出悲哀的样子说，淡淡的缕缕水汽模糊了她滚圆的肩头的轮廓，"从我听到有关你的情况看，我本以为你会有所改变。你严肃点。你过去的苦头还没吃够

呀！”

“闹着玩儿也至于这么严重吗？”玛丽亚说，表情却有点窘。

刚才听到夸奖的时候，维罗的乳房还挺得老高，可是特罗扬·安娜的正经劲儿使她对自己的女性气质感到害臊，一看到眼前热腾腾水汽中那些半透明的粉红色身躯，不禁使她陷入极度的痛苦。人们在这里是不应该有这些想法的。人们必须同过去决裂，诚心诚意、毫不留情地决裂，处理问题要果敢、严肃，因为学习这东西在她们头上把冷酷无情、令人生畏的鞭子抽得劈劈啪啪响啊。此外，在这里人们能够看到你的灵魂深处；因此，这颗轻率、火焰般的心，该熄灭了。

“你，莫什卡特·玛丽亚，我告诉你，我对你太失望了。”特罗扬·安娜提高嗓门往下说，扭过身去把背对着她们。她为要擦干身体，向挂毛巾的地方走去的时候，背上和屁股上一道道肥厚、红扑扑的肉棱在不住地波动。

莫什卡特·玛丽亚忍不住噗哧笑出声来。

“假正经的老妖婆！她才是资产阶级，不是我。”她在嘟哝，用厚绒布毛巾把自己的肌肤搓得红亮红亮的。

在去教室的路上，维罗觉得有人轻轻碰一碰她的胳膊，她一转身便听到特罗扬·安娜在说：

“你应该纠正她的错误。”

特罗扬·安娜说话很慢，一个音节一个音节地往外迸，正因为如此，她才被认为聪慧，有见识。维罗发觉这个宽脸庞的女人很可憎，她说的话她虽一个字也不信，但是她还是

决定在公开场合站在她一边。

她们分成几个学习小组，维罗所在的小组分在安德烈·伊斯特万负责的那个班，正是这位谦虚的年轻人在委员会面前把她郁积的泪水疏导出来，把能将她从单调的日常生活提高到现在非凡处境的唯一力量释放出来。

每当她一想到安德烈·伊斯特万，她紧张的神经便松弛下来，马上充满着信心和安宁。他怀有非常朴实的好意。他是个通情达理的人。

下午上他的课使维罗如释重负。他们一共十五人围着他坐，到第三次开会的时候她还发了言。这是她表达谢意的方式。她分在他的班上不会是巧合。在清静的时刻，尤其是在晚上，她感到他灼热的褐色眼睛停留在她身上。有时候，一阵渴望用手抚摩他削瘦的脸膛和摩挲他那淡黄色卷发的冲动向她袭来。她对他充满着激情，致使她不敢在人前谈到他。她知道他同他的妻子和子女住在这里，同其他教员的家庭一起，住在邻近的楼房里。这并不使她觉得沮丧，反而使她倍加提防。她执拗地暗自重复着："他要是站在我的身旁，他要是属于我，那么一切，是的，一切都会改变，会好办得多……"有时她确信他也在盯着她看。虽然她流动的血液似乎通过身上的毛细孔把他的凝视全吸进去了，她却能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偶然有一次，他们俩走在幽暗的走廊上时——太阳早已落山，可又还没有开灯——他们的胳膊相碰了，她希望他是有意的。他的触摸好象烧灼了她身上的肉，还留着痛处呢。

把这桩秘密藏在心里是很艰难的。她真想向人谈出来，可是她又不敢向任何人交心。她最害怕的是特罗扬·安娜。她那两只责备的眼睛似乎到处在跟踪她。尽管如此，她还得设法和她亲近，陷入自己畏惧的抗磁网中，这个名字听起来如此浪漫的女人，却同所有想要最大限度保卫自己个性的果敢、坚定的女人一样，更喜欢使用好斗的假名——以现在的表现来捍卫她们的过去。她那张宽宽的癞蛤蟆脸老是堆满文雅的微笑：这是经验的光芒。除了在淋浴室出现的那一个镜头之外，她处处都小心谨慎，很有自制力。她在外交部工作，据说学习班结束后她就要调去当大使——担任这种职务的第一个女性。

每天下午课间休息的时候，维罗总坐在一个教室里，用心地把笔记本中的空白补上。她那歪歪扭扭的字母在她眼前跳舞，虽然他们都上过如何又快又准记笔记的专门训练班，使用一串串巧妙的缩写，可是她的笔记本里仍是通篇的半截句子，到底漏写了些什么她现在全想不起来；她对那些没有记全的段落一点摸不着头脑，直担心哪天她得把笔记本交上去给教员看。有困难的不只是她一个。有一名矿工因一点也记不下非记不可的笔记，开学的第三天便逃了——他终于由矿党委书记领着返回学校，而且当着全班学员的面宣誓说，如果再遇到困难他是不会屈服的；学习是他的责任，他现在决不能回去，何况过去比这更艰苦的环境他都坚持下来了。说完，这个长着娃娃脸的大男子汉竟失声痛哭起来，用他粗糙的手指背不住地抹眼泪。维罗觉得自己必须说点什么。她

象被某种看不见的绳索提了起来似的，冷不防站起来，战胜怯场和羞涩，向全班宣布从现在开始她要同那位同志一道学习，检查他的笔记，用一切可能的办法帮助他。

“你怎么知道该讲些什么呢?”特罗扬·安娜惊愕地问，露出一副瞧不起人的样子。

那是他们开学后的第四个星期。在学习期间规定不准任何人离开校园，不过星期天下午允许他们结伴到镇上的茶点铺喝杯咖啡。在这种场合矿工们都集体失踪，八成是大吃大喝去了，可又抓不到他们的把柄。

在熄灯后的黑暗中可以无拘无束地扯家常。她们把全体男学员都挨个评论了一番；有些嘴巴粗鲁的女人的评语搏得阵阵笑声。特罗扬·安娜从来不参与这种胡闹，可是有时候经大家久久恳求后，她会讲述她经历过的运动，还涉及到运动中的一些浪漫事件。她自己从来不是这些故事中的女主人公；她说话很严谨，用非特指人称来回避主语部分。在十一月七号节日前夕，学习班领导特准晚餐供应啤酒。熄灯以后令人意外的事发生了。特罗扬·安娜在她头天晚上停下来的地方接着讲述她的故事，确切地说，她讲的是运动中一个著名人物的事。她的声音变得热情起来；她平日缓慢的音节加快了。“相信我吧，他可不是一尊雕像。你们简直想象不到他是一个多么快活而又容易动感情的男子，”她入迷地说着，“一个漂亮的年轻人，高高的个儿，棕色的皮肤，谈笑风生，充满幽默感……他的婚姻是不幸福的，而且……”她停住了。一阵长长的沉默之后她才接着讲，声音逐渐减弱，最后变成平

庸的叹息："他爱着另一个人。"整个房间顿时鸦雀无声。"他被捕的那天上午我们是在一起度过的。我们去看电影，在皇宫影院看了《男孩子们的城镇》……"

那么，他爱的就是她啰，她们都这样暗自寻思。

就是这句话打开了她们的话匣子。她们都有一些要说的。维罗激动得全身在颤抖。同全室的女伴共享一个秘密的时刻，使她们变成姊妹、使她得到疼爱和安慰的时刻，粗暴造成的悲剧让位给永恒善意的时刻到了。她想说点骇人听闻、伤感动人而又富有刺激性的事情。为给她们编一个这样的故事把她急得血管在突突地收缩，兴奋的话语从她的心房蹦到嗓子眼……她终于想出一个故事。她在一家专做女晨服和睡衣的裁缝店当女工……她还是一个冒冒失失的小丫头，因营养不良长得很瘦弱，老板却爱上她，一天晚上只有他们俩在铺子的时候，他突然狂暴起来……待送的茶会缎袍从天花板垂挂下来，她象森林里的一只小动物，躲在缎袍光亮、瑟瑟作响的皱褶里。

当她想象着这个情景的时候，她不由得出了一身冷汗，但是她仍然接着暗自编织这个故事。

茶会袍子飘动起来，反射着亮光，那个高大、肥胖的男人追上她，把她摁倒在地板上。

极度的兴奋使她的双唇在燃烧，她就要张口说话了。可是在一阵骤然的沉静中想起这几乎会给自己带来的烦恼——她们不会可怜她，她们会认为她可恶、令人作呕时，不禁战栗起来。

“维罗，你想讲点什么吧。”一个声音在鼓舞她。

她躺在那里，四肢松弛着，肌肉却绷得紧紧的，不让它们发抖。

“维罗！”其他人在喊她。

她吓得象死人一般静静地躺着，不敢出大气，一动也不动。

“她睡着了。”有人说。

这意外的打扰丝毫没有减弱她们的兴头。莫什卡特·玛丽亚悦耳的女中音打破了寂静，大家都竖着耳朵听她讲。

“我要讲的同过去无关。这事发生在前天，就在上个星期天。”

“你是说你偷偷溜出去的那天。”有人咯咯地笑着说。

“完全正确！”

维罗心脏的跳动又恢复了正常。她虽然还一动不动地躺着，心里却感到满意。她正要陷入真正困境的时候，及时地抑制住了自己的冲动。她在倾听玛丽亚讲述时，好奇得身子从头顶到脚尖都在颤抖。

“欸，我溜出去是去会弗朗奇的。他是搭中午那趟火车来的，他天麻麻亮就出来了。”

大家都知道，弗朗奇或费仑茨吧，是她的未婚夫。他和玛丽亚一样当领班，而且还在同一个工厂。

“弗朗奇为我们开了一个房间，就在火车站旁又脏又乱的地方。我们就象夫妇那样在那里住下。我们在里头一直呆到天黑，一步也舍不得踏出房门。他是个棒小伙子，个头很

高，力气可大啦。我们实在想得慌。”

“还有呢？”有人从角落里问。“讲点细节给我们听听！”

“闭上你们的臭嘴！”特罗扬·安娜尖叫起来。她的声音被泪水噎住了。“我竟把他的事告诉这些……这些……”

她的哭声被枕头捂得变了调。

过了好一会以后，安奇·维罗从床上爬起来。她细声细气地问：

“你要点什么吗？我给你倒一杯水好吗？”

她的手轻轻掠过特罗扬·安娜的额头。她能感到自己手心下那个女人酸臭、粗糙的头发。她不明白自己怎么会走到她床前来。其实，她的同情完全在莫什卡特·玛丽亚一边，感到她的冒险把一股强烈的爱的芳香带进这间房子，带进这已经变冷了的黑夜。

“回到你自己床上去。”那女人说，声色俱厉地拒绝了维罗的怜悯。“我叫你回去，你还在等什么？我不是好好的嘛！”

第二天上午，特罗扬·安娜把自己的行李拿走，住进一位女教员的宿舍。

莫什卡特·玛丽亚奉命去见学习班主任，一位叫萨斯·维尔莫什的矮个子男人，他长着一双猫头鹰眼睛。两个小时后当她从他办公室出来的时候，她并不显得心慌意乱，在她那张和蔼、快活的脸上反而出现了新的特征：无情的蔑视。没有任何人问她出了什么事，大家都有点害怕沾上道德败坏的边儿。

"我向那老家伙解释说，世界上存在着这么一种作为肉体的东西，而且我们没有发过纯洁的誓言。我们同修女之间的区别在于我们不假装正经。他想禁止我星期天下午出去。哼，我骑着自行车出去为党工作的次数比他坐下来吃早餐的次数还多呢！"

1945年她骑着自行车随土改队和宣传队走了几百公里；她不得不象男人一样生活，和衣而睡，虽然筋疲力尽也从不出怨言，还要默默忍受很差的伙食和人们的敌意。但是她还一直认为那是她一生当中最美好的时期。

"你怎么能这样评论萨斯同志呢？"维罗觉得自己的声音似乎来自远方。好象有一股异己的力量在唆使她，从她喉咙里挤出这句话来。

"又是你？又在舔腚了，是吗？"不是恼怒，而是出自惊讶使莫什卡特·玛丽亚说出这种话。"你不知道，我的姑娘，你已经成了叫人讨厌的下流人了吗？你想证明什么呢？我告诉你吧，我的心肝……"

"尊敬，这就是我所需要的。"维罗回答，神情很严肃，还从床上坐起来。她的眼睛里含着泪水。噢，要是现在主任能听到她说的话就好了！要是安德烈·伊斯特万在这里该有多好哇！一切事情该会多么顺利！

玛丽亚哈哈大笑起来。

"这就是你想要受到尊敬的做法吗？你就这么干下去吧，你这小猴子！"

不少姑娘都为维罗说话。其实她们好象对着扩音器说话，

仿佛有人站在门后偷听似的。她们的话是要说给更多的听众听的。

第二天下午他们得进城进行一次宣传活动。他们要宣传两党合并后的形势，以及即将来临的人民阵线选举。他们分成两人一组，按城镇党组织的指示，挨家挨户去访问新人和收集新观点。维罗要求同特罗扬·安娜在一起。萨斯·维尔莫什赞同她的选择。姑娘不再用傲慢的得意暗自发笑了，她不再认为自己聪明、伶俐。她既害怕特罗扬·安娜，又被她所吸引，而且吸引的成分更多些。

她们开始走在镇上工业区灰暗、烟雾弥漫的街道上。已经是深秋季节，暮色很快就降临了。房屋从烟灰色慢慢变成灰褐色。在大鹅卵石空隙里形成的一个个泥水坑，使她们行走更加艰难。路灯微弱的光线似乎在她们周围投下没有希望的影子。她们不得不经常去询问名单上写的地址，穿过泥泞的院子，登上散发着尿臊味的楼道。她们要找的钢铁工人不在家；她们毫无希望地敲了好半天门，他的邻居终于出来了，是一个干瘦的驼背老人，他那两条瘦骨嶙峋的细腿末端套着一双拖鞋。外面是下着蒙蒙细雨的清冷的傍晚，他请她们进到他的厨房等候她们要找的人。四十年来，这里的一切依然如故，到处是破破烂烂的。

“我本人也是钢铁工人，做型芯的，”他边说边削土豆，“正巧我很快就要退休了。”

这个巧合使特罗扬·安娜活跃起来。她一直在她的坐位上蠕动，直到为自己庞大的身躯找到舒适的位置才安静下

来。

“或者更确切地说……”那人皱起眉头，“如果他们高兴，可以美其名为病休。可事实是他们想撵我走。”

特罗扬·安娜的身子从坐位上直往前出溜，因为裙子紧紧箍着她那臃肿的臀部。

“当然这一切都是在他们开除我出党后开始的。就在他们合并的时候。”他顿了顿，眯缝着眼睛。“你们刚才说你们是从哪儿来的？”

特罗扬·安娜的面部表情不那么紧张了。她使劲挤出一点笑容。

“你的邻居同我丈夫——他们都是好朋友。我们从这里经过，顺路来看看他。”她指着维罗说，“这是我的小妹妹。”

“不管怎么说，我一直是社会民主党人，”做型芯的工人接着说，“三八年，当那些佩着箭十字章①的法西斯分子在国会占有五十个席位的时候我就入党了，而且他们在这一带捞不到几张选票。”

特罗扬·安娜问他点什么，好让他把话题转到她想知道的事情上来。

“指责我的理由是什么？指责我扇动1946年的罢工和反对合并呗。我只不过因为开口说出了一个纳粹密探——他现在还在当我们的领班呢——就那么些。可是那家伙以后入了共产党，还利用这开除工人。我的同伴们要求把他赶出工厂的

① 指当时的匈牙利法西斯组织——箭十字党的标志。

时候，我做了不利于他的证明，大伙停止干活的时候我也随大溜不干活了。可我没有说过半句反对合并的话呀。”

“那位同志刚才说他叫什么来着？”特罗扬·安娜问，瞬间的疏忽摘掉了她那副兴味索然的面具，可是很快就发现自己失策了。

这位大骨骼的人霍地站起来，声音充满着愤怒。

“你们到底是些什么人？是谁派你们来的？你们是探子，对吧？你们是专门来捞……我只有一件事要对你们说，只有一句话……给我滚出去，快。”

这两个女人吓得魂飞魄散，慌忙往外跑。她们跑到楼道的时候，特罗扬·安娜又变得沉着起来。

“右翼社会民主党人，”她说，“一个真正的敌人。”

来到门口，她在积满污垢的房客牌上寻找那个工人的名字，然后把它记在自己的小本本里。

“你今天学到不少东西。相当于整整一期学习班学到的东西。”

她挽起姑娘的胳膊，温和地说。感激之情在姑娘心中油然而生。她感到无家可归之后的幸福，顿时觉得她们成了整个家庭中的一员。

“他真是一只下流的瘦猪猡！”她叫喊起来。

“一只下流的猪猡，完全正确。可是别在这里呆太久。”她领着维罗朝点着灯的门口走去。“快走，我全身都湿透了。”

她们走进一家茶点铺。香草饼和姜饼的香甜味向她们扑

来。她们一推开门，小门铃便叮叮当当响起来，随后，一位长着乌油油头发的女人从老式、平淡、但却很舒适的一间朴素的内屋走出来。她们在红长毛绒沙发椅上坐下，老板娘脸上露出愉快、安详的微笑，俯身把自己的食品摆在她们面前。特罗扬·安娜的宽脸盘上皱起一丝笑纹；她那双深深埋藏在层层叠叠肥肉中的小黄豆眼，此时也闪烁着淡淡的黄光。她伸出迫不及待的粗壮的手去拿装着糕点的瓷碗。

她贪婪地吃着，用叉子狠狠地砍劈着碗里的点心。她全神贯注于面前的糕点，全然不顾周围的一切。她在劈向第五块糕点的时候，终于抬了一下头笑起来。

“这一点待遇是咱们应得的，对吗？怎么你只吃两块就不吃啦？等等，咱们再来杯酒。”

她要了胡布杜什酒①。看到维罗面有惧色，她便先举杯祝酒。

“我不会喝酒，不过这酒味道很好。咱们不为那事干杯！喝了它，同志！”

那天晚上她们很晚才返校。第二天上午特罗扬·安娜把写好的报告递给维罗看。报告几乎完全集中写了被开除出党的那位做型芯工人的事。她在末尾做了如下的结论：“根据我们的看法，他是一个自觉的敌人。”

维罗用使旧了的破钢笔在上头签上自己的名字。

---

① 一种滋补身体的饮料。

头几天的极度紧张和劳累使维罗消瘦了些，脸色也更苍白了，跟着而来的是一个平静时期，她可以专心致志于熟悉情况。她独有的巧妙心计使她暗自发笑，而那些小小的胜利，那些小小的成绩，以及恶意的欢乐和遮掩的做作使她恢复了自信。特罗扬·安娜母亲般的，或者更确切地说，修道院似的友谊给她输入新的希望。她怯生生地期待着可能的、意外的前程！那个受过教育的大块头女人没有向她许过任 何 愿；她只大谈目标和义务，但是从她谈话的字里行间却闪烁着玫瑰色的未来。

“首先你必须完成你的学业，参加专科入 学考 试。这并不难，我们会帮助你。这花不了两年时间。当然你得忘掉其他一切，那些轻浮的事和其他等等。为了学习需要付出全部精力，不过这是值得的。而且你必须留神永不辜负那些关心过你的人们。他们对你支持的程度全决定于此。”

有了这样的支持，维罗大可以高枕无忧了。她不仅逐渐习惯了周围的新环境，甚至开始喜欢起这个新环境。晚上她睡得很踏实，早上醒来精神格外爽快。过去的两星期里她的体重居然增加了两公斤。她的皮肤不那么苍白了，闪着健康的光泽，她那双浅灰色的眼睛充满着女性的宁静，她的臀部丰满起来了，两个乳房变得圆鼓鼓的。她发现周围的男人都用前所未有的兴味重新评价她；不论走到哪里都有不安份的目光在追踪她。她一从他们身旁走过，许多脑袋便刷地甩向她。她生活在无间断的兴奋状态中。可是从一开始她心里只惦着一个人，安德烈·伊斯特万。她说不清楚他身上到底有

些什么东西吸引着她：他那双忧伤的眼睛，他沙哑的声音，他的喉结，或是他的温存？她毫不掩饰，好奇地久久盯视着他的眼睛；她在院子里，在走廊上，只要有机会，她就把他拦住。“我有些问题请教你。”她会这样搭讪地说，而且总能找到点新东西来同他探讨。她害怕暴露自己，害怕受到羞辱，何况她还不能真正信赖自己的心上人呢，然而她下决心无论如何要把他弄到手。她现在正发愁不知道该如何下手。这桩事完全是个秘密，一个非常特殊的秘密，被深深地埋藏着，小心翼翼地置于防御壕沟之中。特罗扬·安娜自认为能看出人们头脑里的任何想法，让她这么认为好了！她不再害怕她了，她已经懂得如何自卫。

“是呀，是呀，”特罗扬·安娜每天都用她那缓慢、含糊的声音重复着，“专科入学考试是非常重要的。”

“入学考试。”维罗恭敬地附和着，把那双天真无邪的眼睛睁得大大的，跟着便想到安德烈·伊斯特万。她非常肯定，自己不再听到特罗扬·安娜在讲些什么了。她脸部肌肉的机械运动成了她在注意听讲的代替物。于是她用不着表露一丝一毫的优越性，便在女人当中占据着优势。

星期天下午，她答应在学习上得到她帮助的那位矿工陪她到镇上去。他大约在三十五岁上下，沉默寡言；凡是非要在大伙面前说话不可的时候，他的舌头就失灵了，脸上直冒冷汗。

同往常一样，他们到茶点铺去。特罗扬·安娜没有同他们在一起；经校方特许，她已经上布达佩斯两天了。他们竟

从来没有想到这是不正常、不公平的。

“抛弃了你的朋友们，是不是，诺鲍尔同志?”安奇·维罗在逗这个傻乎乎、说话不利索的矿工。她甚至重新发现了自己的幽默感。“那么谁去喝你那一分酒呢?”

矿工愁眉苦脸地回答了一句，便把嘴唇闭得紧紧的；他不高兴被人取笑，不过也许他只是感到难为情而已。

他在茶点铺里要了一杯甜酒。酒是盛在咖啡杯里端到他跟前的。

“我也为你叫了一杯，同志。”他道歉地说，紧锁着的眉头舒展开了。

“你不应该叫的，我从来不喝白兰地，何况你也知道上头的同志是根本不喜欢我们喝酒的。”

“这不是白兰地，这是甜酒。”他本想尽量逗逗乐，结果却同往常一样笨拙。“请你尝尝，我给你添了许多麻烦，为了我们的交情你也该喝下这一杯。”

维罗不好坚持，把一杯甜酒一饮而尽。她舔舔嘴唇；她爱喝这种酒呢。

“我们矿工都习惯喝酒。那是因为下矿井很危险，这你是知道的。而且还因为酒好，好喝。”

他们的同伴都到镇上逛去了；他们还呆在铺子里，喝第二轮酒。

“我逃跑是真的，不过我还是回来了。”诺鲍尔羞怯地解释道，还不停地扭绞着手。“这是我的职责。德国佬撤退的时候想把矿给淹啰，我们二十二名矿工在井下阻止他们。我

们在井下呆了两个星期，大部分时间都没有吃的，也没有喝的，矿井里的水越涨越高，因为水泵坏了，而且又没有电。我们不得不节约着使用矿灯，因此我们大部分时间都摸黑呆在矿井里。”

他用浑浊的蓝眼睛注视着维罗，用自己粗红粗红的手按着她的手。

“我要是有一个象你这样的妻子！”他冷不防叹了一口气。“她不论到哪里都会带着我，我也会老出现在她的身旁。”他呻吟着，脸上一亮。“你怎么不能成为我的妻子呢，同志？难道我生活里就不该得到这种待遇吗？”

维罗没有回答他。她感到心情很沉重，茫然不知所措。这个孩子气的大个子想从她那里得到什么呢？而她，她自己又为什么要同他一起坐在这里呢？他们相互之间有什么关系呢？他们之间没有任何共同点，连一句共同语言都没有。这整个局面是一场什么样的骗局呀？

“别再喝了，同志。”她痛苦地说。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漂亮的姑娘……我一生中只喜欢金发姑娘，可惜我老婆的头发既不是金发，也不是黑发，偏偏是灰不溜丢的头发。”

维罗努力镇定自己。酒劲使她的思绪不能畅通，可是偏偏现在她得赶快作出坚定的回答。她盘算着用那一种方式回答矿工，以防万一发生什么事时，她还可以收回前言。就在这个时候门开了，门铃也跟着响了起来，随后安德烈·伊斯特万迈步走了进来。他的脸冻得紫红紫红的，只有贫血患者

的脸才会有这种红润，而他容光焕发的颧骨和鼻尖则突出了眼眶四周肤色的苍白。当他看见他们坐在那里的时候，他的脸顿时亮堂起来，眼睛闪闪发光，然后在他们桌子旁坐下，高兴地搓着两只手。

“我刚送我妻子和孩子们到车站。他们上布达佩斯住一星期。”

他瞟了维罗一眼。她柔软的金发放射出夺目的光彩。他目不转睛地盯着她，忘乎所以，于是她冲矿工那里挤挤眼，示意矿工喝多了。

“呃—呃—，糟糕的是，”诺鲍尔嘟哝着，低头望着自己发黄、劈开的指甲，“糟糕的是，同志，你结了婚以后才见到真正的美人……”

“这种事是经常发生的……任何人都可能发生。”教员说，他发红的褐色眼睛充满了怜悯之情，几乎是超出了常情的怜惜。

“难道我这后半生就该这么过下去吗？”诺鲍尔大声问，引得一些顾客都抬起头来看他，听他讲下去。“如果你是一个共产党员，这事就永远无法改变了吗？”

安德烈眯缝着眼睛。

“那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同志。”

维罗把头向他靠过去。

“得把他送回去。他连自己在说什么都不知道呢。”

教员吃惊地望着姑娘。他发现她的反应很冷酷，而且太就事论事了。

然而处在高度敏感的矿工意识到自己在这里是碍手碍脚的。一阵悲哀的郁闷掠过他的全身，他嗫嚅着，拍拍自己的笨脑袋，付完钱，很有礼貌地向他们点头告别后走了。

教员若有所思地看着他走出去。门铃响了一阵后才静下来。

“咱们应该跟着他。我以前见到过他喝醉酒。他会到所有的酒店去转一圈，醉得象一摊烂泥。”他看了一下表。“如果咱们还想吃晚饭，最好也走。”

维罗没有马上回答他；她沉默片刻，好象面临难以决定的问题似的。然后她慢慢抬起眼睛注视着他的脸。

“咱们再呆一会儿吧。”她满不在乎地说。

小小茶点铺低低的嗡嗡声和柔和的灯光织成一个柔软的茧子，把他们包在里面。姑娘的头发在闪烁。外面暮霭沉沉，万物都处在朦胧之中。

“我常常想同你说话，安德烈同志，我多么想告诉你一些事情……”

他的脸又恢复原来的苍白，这使他又变得俊美起来。

“我经常拦住你，安德烈同志，问你一大堆傻问题，我肯定你一定烦得很，腻味得很，你可能会认为我有点歇斯底里……你是那样想的吗？”

“我当然没有那么想，当然没有。”

“人们看到我拦住你，站在你的面前，望着你，而且当你看着我的时候我却忘了要说的话，他们会怎么想呢……我在讨论会上发言为的是想同你说话……这样你就会同我说话。

这样你就会回答我。你瞧，我把这全告诉你了，尽管我知道这会使我陷入困境。”

安德烈·伊斯特万在拨弄着碟子下面的花边小垫布，没有看维罗。

“当我站在委员会面前，你突然出现在我身旁……从那以后我就知道……从那以后最重要的事……他们对我说话的时候我压根没有听，我也压根没有看他们，我谁也想不起来……”她的嘴唇在燃烧。“我爱你，先生。”这就是她所能表达的唯一方式。

他那两个全是骨头的膝盖顶住她的膝盖；他用两只手抓住桌子的边沿。

“你没有注意到吗？你没有发现我经常望着你吗——先生？”姑娘放肆地问。他没有回答。“只要我们俩单独在一起的时候，我要老称呼你先生。你知道为什么吗？对我们来说这就象我们互叫名字一样。”可是他仍然没有作声，她突然惊恐起来；她把自己交给了他，把自己出卖了，现在可能就要失去一切，她所期待的一切。她本不该如此软弱，如此孩子气，这个男人正在筹划着什么，或者他太胆小，不敢说话，那么这一切又是怎么发生的呢？全是因为两杯甜酒，仅仅两小杯甜酒！她的心已经蹦到嗓子眼来了，由于她体内发热，她的双唇似乎就要爆裂了。

安德烈·伊斯特万扬起脸，两只手从桌边滑了下去。

“我觉察到了。”他说，用虽然沙哑却是很温存的声音回答她的一个问题。“我一切都觉察到了。你也会觉察到的。你

应该觉察到的。”他的眼睛在微笑。

“就是说你爱我，这就是我应该觉察到的吗？就是说你爱我？”维罗忘了称呼他先生，“就是说你也爱我？你有勇气说这话吗？说呀！”她使劲握住他的手，连手指甲也掐进他的肉里了。

“是的，小家伙，我也爱你，你弄得我经常说一些蠢话，因为我无法留意其他人。我同我妻子和孩子们在一起的时候也想到你。弄得我连看主任眼睛的勇气都没了。”他的颧骨泛起鲜艳的红晕。“对我来说这是很难忍受的。而且……再过六个星期学习班就结束了，你也要回去了……而我……我永远再见不到你了。”

他们付完账，从铺子里出来，走进灰蒙蒙的黑夜。牛毛细雨在街灯四周撒下一张绢丝薄网。

“我可怜你，安德烈同志。”维罗说，不禁对自己温柔的声音吃了一惊。

“叫我彼斯托①吧。”

姑娘顽皮地改了口。

“我不再可怜你了；彼斯托，我只是爱你。”她把手搭在他瘦削的肩膀上，他们出了城，朝学校走去，学校座落在旧高射炮兵兵营，到飞机场草坪后还要往前走。

这条道很偏僻，两旁是开阔的田野，稀疏的路灯在悄悄的雨雾中忽隐忽现。维罗从来没有感到自己象现在这样平静、

① 伊斯特万的爱称。

泰然自若过。在她的一生中不是随时准备着进攻，就是随时准备着自卫。令人痉挛的紧张现在离开她的身躯，犹如一个人已经完全沉湎于极度的宁静；她现在紧紧偎依在他粗糙、潮湿的外套上，没有丝毫保留或不信任的感觉。她能闻到他全身弥漫着强烈、苦涩的烟草味。他们默默地走着，同黑夜溶为一体，分享着同样的心思。黑乎乎的建筑群隐隐呈现在他们面前。维罗拉住他的胳膊。她突然觉得受到了威胁。她挡住他，用双臂搂住他的脖子，踮起脚尖把自己湿漉漉、凉丝丝的唇贴在他的唇上。

“今晚我上你家去，”她气喘吁吁地说，“我要去你那儿。”

他们难舍难分地从阴雨黢黑的保护色下走出来，坐在铺着油布的餐桌旁，撕扯着冰凉难嚼的香肠，嘴里塞满了食物，还在谈些愚蠢的琐事，这是多么不可思议呀！

教员坐在桌子的另一端，离她稍远些；一个很大的面包屑在他髭须尖上滑稽地蹦跳着。

熄灯了，等开完最后一个谨慎的玩笑，毯子在入睡的女人们身体周围被弄得乱糟糟的时候，维罗的眼睛变得比平常更敏感了，她躺在床上倾听周围的动静。外面走廊上最后一拨脚步发出的回声消失了，远处的喧嚷声也逐渐逝去，替代的是一种奇妙的空气里的分子密集到胶和状态般的静谧。维罗和衣躺在被子下面，她的身躯象着了火似的在燃烧，同时又在阵阵寒战的兴奋中哆嗦。她想弄清楚其他人是否已经入睡。她们想必睡得很熟。莫什卡特·玛丽亚睡着了，舒展着她滚

圆、光滑的棕色双臂；从一点差十分她就同她的未婚夫在旅馆的房间里度过整整一个下午。她的肩头从睡衣下面裸露出来，她的额头闪着满足的亮光。

维罗根本没有把同房间的其他女人放在眼里；她蔑视她们，认为她们的神经系统八成是在更低的水平上起作用。她们睡得很死，对外界毫无反应，腹中装满晚饭，沉陷在迟钝与饱胀之中，甚至对自己也隐瞒自己的想法。

她从暖烘烘的被窝钻出来的时候，放在她邻铺床头桌子上闹钟的夜光表面正显示着两点一刻，意想不到的寒冷使她倒吸了一口凉气，浑身上下都在哆嗦；她披上那条讨厌的法兰绒披肩，悄悄穿过房间，听到最后几声太不女性的呼噜。她转动门上的球形拉手，迈出房门站在走廊里。走廊上唯一的一只灯泡发出暗淡的微光，她身后是一片漆黑、无形、阴郁的黑夜。当她把房间这个窒息、封闭的保护地抛在身后的时候，恐惧又一次向她袭来；她无依无靠，麻木地站在走廊中央，等于把自己暴露在毫无遮掩的开阔地带。门会不会开着？安德烈·伊斯特万看起来象一个胆小鬼，他的爱就象惊弓之鸟在发抖——他是不是有足够的胆量把门开着？他能不能面对必定会发生的后果？她是不是应该返回去，悄悄钻进自己冰凉的被窝，夜复一夜地忍受无聊的折磨？她已经实现了自己所想要的，安德烈·伊斯特万已经表明他爱她爱到极度痛苦和战栗的地步。鼾声又传入她的耳际，呼噜声倒使她高兴起来，这显得多么滑稽。她开始往前走，穿堂风吹透她的双腿，吹得她扁平、少女般的小腹在打战，她却感到

很舒服。她想象着安德烈就站在门后等候着她。她非常有把握地推开门。他果然站在门背后，天晓得他穿着这身双排纽扣的褐色上衣，系着芥末色领带等候多长时间了——他站在那里，用怀疑的目光凝视着被推开的门和披着松散的金发、把一股暖人的香气带进房子来的姑娘。

"把灯关上。"维罗对他耳语。

"不，我要看着你。"然后他重复着同那天下午矿工对她说的几乎完全一样的话。"我从来没有见到过……我一生中从来没有见到过这么美丽的姑娘。"

他面容清瘦，象个流浪儿，颧骨上泛着红光。

"把灯关上，"维罗催促着，"有灯我要害臊的。"她赶紧加了一句，很坦率，丝毫不觉得难为情。

"不，不，我要看着你！"

天快亮了，她从他的房间溜出来的时候，好象觉得在走廊看到特罗扬·安娜。那不可能是她，她在寻思，她两天前就上布达佩斯了。可是上午她们在教室门口相遇了。她是昨天夜里到达的，是搭人家的车子回来的。在那一刹那，维罗开始疑心那个女人看见她从安德烈房间里出来。后果是很难预测的哟。

在以后的几天里，安德烈·伊斯特万冒着被发现后受人嘲笑的风险，寻找一切机会同姑娘单独呆在一起。现在倒是他在院子里、在走廊上追逐维罗，对着她的耳朵悄悄说着语无伦次的、急促的话语。他显得既尴尬又荒唐。"我今天夜里

等着你，别忘啰。"他对她窃窃私语。第二天他又说："我昨天等了你一夜，你却没有来……"姑娘默不作声。特罗扬·安娜使她心神不定。她不明白自己怎么会同她站在一起，因此她提醒自己要特别留神。她决不能再冒任何风险。再过几天他们学习班就到期中阶段了；到时要讨论他们的收获及将来奋斗的目标。批评和自我批评会将象一个地狱的边缘，他们所能猜到的也就那么些，然而他们对任何事都没有把握。这几天他们要复习学过的材料。学员和教员都一样，心里只是想着即将到来的那一天。在课堂讨论会上，安德烈·伊斯特万向维罗提问仅仅是为了同她说话，听她的声音、再望着她的眼睛。

"你怎么啦？是我伤了你的心吗？你是不是对我失望了？"他们站在排球场观看比赛时，他烦躁、疲惫地问。"他们明天就回来了。你今天夜里一定得来。"

站在观众当中的主任用他那双猫头鹰眼睛盯着他们。继续谈下去是不可能的了。可是姑娘已下定决心无论如何要结束他们之间的这种关系。她不应该再上他家去，她既不能去，也不敢去了。永远不再去了！她这样暗暗自语。当她看到这张痛苦得扭歪了的瘦脸时，她翘着的小嘴唇紧紧闭上了。她不禁想起特罗扬·安娜来。

可是那天夜里她也失眠了。

她后悔自己太自私。"他就象一个小男孩，"她伤心地思念着，"一个被夺走了难得的乐趣的小男孩……"她坐起来，四下望了望。一道宽宽的月光从窗户照射进来。她正要从床上溜下来的时候，听到她旁边传来一个声音。"你还是老老

实实给我躺着吧，小家伙。”莫什卡特·玛丽亚悄声地说。维罗赶快缩回到被窝里。“她们终于知道了点什么。”这个想法象无情的判决从她脑子里一闪而过。

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会的日子到来了。冬日的雾霭使窗户和走廊变得模糊起来，所有教室的灯都打开了。取暖用的煤油炉还要一些时候才能散发热气。他们严肃、呆板地坐在教室里，面前摆着铅笔和笔记本。他们甚至不敢相互说话，以免破坏期待的肃穆。他们直视着前方，不安地坐在椅子上，等候着教员的到来。维罗被一种说不清楚的焦虑弄得不知所措。她觉得自己就要受到责难了。眼前这些面孔全是假面具，谁知里面会藏着些什么真面目？他们的话语仅仅是音符，其价值是无法用日常的逻辑来估量的。人们是会变换着角色的。你必须提防着所有的人，他们全是一个庞大监视机体的细胞。她觉得自己被包围了，围在四堵墙里。赎回她的罪过，所有的罪过，甚至儿时的罪过的时刻到了。她得把这些罪过说出来，她撒谎的次数，偷窃的次数和违反社会准则的次数，一个也不能漏掉。这些罪过深深烧灼着她的肌肤，否认是不行的，它们任何时候都可能在进行显微镜解剖时暴露出来。是时候了。

她感到有人用阴沉、咄咄逼人的目光盯视着她。她没有回视这个目光，不过她知道那是特罗扬·安娜的目光。特罗扬·安娜——一直是她的一块心病。她一想到这便抬起眼睛，使出心中的全部热情冲那女人微笑，可是特罗扬·安娜的面孔依然是那么呆板、严肃。她的眼神很严厉，却也不是不友

好的。

教员们鱼贯走进教室。同他们在一起的还有来自布达佩斯的代表。除了安德烈·伊斯特万照旧穿着他平时那身双排扣的褐色上衣外，其他人都穿黑制服。他的眼圈和苍白面孔的颧骨四周布满浅蓝色的阴影。他的眼睛无神，失去光泽。“他害怕了，他也吓坏了！”维罗寻思，一种不可名状的狂喜支配着她。

教员们坐下后，他们中间还有人在交头接耳说了一阵。然后主任萨斯·维尔莫什站起来讲话。他清了几次嗓子，脸上露出坚定的自负，活象一个就要着手干一番事业，而且要不受干扰地一直干下去的人。

批评与自我批评，他解释道，必须自然地进行下去，因此不能限定时间。于是，在若明若暗、不可捉摸的面孔和意图中，今天上午将进行无期限和无范围的批评与自我批评。

头四五个人倒很轻松地过关了。在不寻常的寂静中仅有几个人敢为增添辩论的激烈性做出贡献。

外面硫磺般的黄烟滚滚而来，猛烈地冲击着窗子。取暖的炉子开始散热气了。

维罗把头搁在笔记本上。她的手在哆嗦，好在只有她自己一个人知道。她能从自己的笔记本上，如同从一面镜子里，看到特罗扬·安娜不动声色的面孔。她现在肯定了那天拂晓时，这个女人在走廊上是看到她的。那个看到了她的女人之所以还保持沉默，是因为这件事跟她没有利害关系。

一个留着两撇很神气的小胡子、身材修长的漂亮小伙子

站起来发言。他是某边防哨所的上尉。他举着左手，小拇指上戴着一只宝石图章戒指。那是一只指甲修剪得整整齐齐、芳香、高贵的手。一只进攻的手。一只异己的手。在这一刹那，许多人都会有同感。"如果他们也这样折磨我！"维罗战战栗栗地寻思着，却不愿意继续往下想。

布达佩斯来的代表是一位年轻人，长着淡黄色的头发，态度很随便，使用的却是经过润色、推敲的句子。

"是的，同志，"他对上尉说，声调冷淡而无情，"我们觉得你并不是完全表里一致的。"

戴着图章戒指的手扬得高高的，灯光在八面体的宝石上闪烁着。

"我只能说……我在努力使自己表里一致。"

"不，不，同志，你不诚实。你没有谈到你的过错，即使提到了，你也在避重就轻。还有一些东西你故意不提。"

"如果他们也这样折磨我！"维罗用钢笔在一张空白纸上胡乱写着。她永远不想再瞧特罗扬·安娜一眼了。

"只有一件事我没有谈到……"军官的男高音压低成耳语，"我在靠近边境的一个小村子里服役，对那里的村民有一定的影响。当上头要地方党组织执行中央作出的反对铁托集团的决议时，我没有全心全意支持中央代表，因此……决议没有得到执行。"

"即使你不把这事说出来，我们还是知道的，同志。不过这还不够。我必须告诉你，同志，我们仍然不信任你。"

指挥官坐下了，用双手捂住自己的脸。

"如果他们也这样折磨我，我要把他们的眼珠子抠出来！"维罗合上笔记本。她怒不可遏，心中充满着仇恨。

提问，回答。断断续续的句子以呜咽告终。一个妇女在啜泣。而凌驾于他们所有人之上的是那个淡黄头发的机智的年轻人，他能确凿无误地区别好与坏。

"我可没有自高自大，"有人嚷嚷起来，"我没有瞧不起工人！"

窗外的昏暗更加浓重了。人们的话语漂浮不定，象变形虫那样，没有固定形态。

"你的根本问题在于你对党的态度……极端的玩世不恭。"

"他对工人的态度是成问题的。"

"对批评抱不满的典型……他的自我批评是表面的，不系统化……仍然受反革命时期工团主义对立情绪的影响……"

他们终于坐在铺着油布的餐桌旁，默默无言地吃着午餐。维罗坚定地把汤一勺一勺送进嘴里。她不愿意属于他们中的任何一个。

批评会下午接着开。维罗感到特罗扬·安娜阴沉的目光又落在她身上。她也回看了她一眼，不过没有笑容，而是勇敢地面对命运。坐在讲台上的安德烈·伊斯特万好象被自己的苍白同化了似的，忧心忡忡，一声不吭。她想引起他的注意，传给他一些自己的气愤和反抗，他却凝视着远方。"如果我们俩，在一起……在一起……"

话语、声音、哭叫在她周围嘤嘤嗡嗡地响着。

结果揭发出某K每天早晨在一个摇摇欲坠的仓库后面练瑜伽[1]。在那背后会是什么呢？从新佩斯区来的女工B太太的主要问题是看不见自己在商店里的前途。为什么会看不见呢？某种恐惧破坏了S同党的关系，他总是谨小慎微，不在讨论会上暴露自己的真实想法。他担心会丢掉他的工作。M认为自己同工人的关系不够深。F之所以靠不住是因为他过去是犹太复国主义分子。

我们必须转变、改造、变化、最后达到舒畅。过去是原料，巨大熔炉的原料。

中央代表明确、无情的话语是：

"今天要是一个农民或劳动者还有自卑感，那是他过去的残余在作怪。"

"今天要是一个党员感到害怕，那他过去一定是严重失职了。"

一束雾一般的白光穿透他们的身躯，照出他们骨骼黑色的轮廓。

维罗还在设法引起安德烈·伊斯特万的注意。他却依然凝视着远方。

一个敦实、胖圆脸的男人正站在他们面前。他的头圆得象一个皮球，两撇胡子又粗又密，1919年无产阶级专政时期他指挥过一个营。他经常提到这段历史。

---

① 古代印度哲学的一派。此派着重说明调息、静坐等修行方法，有神秘主义成分，并且承认有一个"自在"(大神)。

他摘下厚厚的凹透眼镜，用视力模糊的眼睛四下使劲看了看；光线散射在他粗糙、厚实的头发上。

"我要尽最大努力去做，"他说，象一个挨了打的孩子。

"你必须克服你的居功自傲，同志，你必须正确对待自己的过去。"

"是呀，"老人扬着脸，"你们可以看到我已经尽自己最大努力去改变自己，我甚至同大伙一起打排球呢。"

"形式主义！"

"同我一个宿舍的人可以告诉你们，集体的活我也参加干的……熄灯以后我经常给他们讲地下工作和监狱里的生活。"

"难道你不觉得你这么做是在吸引人家对你的注意吗？你不就把自己置于其他优秀同志之上了么？置于我们党的领导人之上了么？"

萨斯·维尔莫什是用温柔、单调的声音说这番话的。淡黄头发的年轻人接过话茬：

"这不是什么秘密了，同志，你被送到这里来是因为……在这里你是岁数最大的老同志了……你应该在大家的帮助下认识自己的错误。你已经停止不前了，同志，这是事实。不进则退，从普遍发展的趋势中倒退下来。"

圆脑袋老头的两只手耷拉下来，轻轻敲打着长板凳；他在抽噎，两个宽宽的圆肩头一耸一耸的。

"这大概不是对待一位有阅历的老同志的正确方式吧！"莫什卡特·玛丽亚说，由于突然的寂静使她的声音更响亮

了。

维罗被她的插话吓了一跳。她真想对玛丽亚大喝一声，叫她务必不要同他们作对，惹怒他们。她方才的反抗、她的固执已经被踩碎了。

第二天下午轮到维罗头一个发言。她已经考虑好了，完全知道该说些什么。她用自己顽强、痛苦的眼睛搜寻安德烈失神的眼睛。“他变得象这个那么渺小。”她暗自言语，举着自己的小拇指。

她那个组为她准备的鉴定是充满感情而宽容的。她很用功，热情饱满，牢牢地掌握学习材料，是她自己和其他人的严厉的评判员；尽管她对党是真诚的，但受的教育不完善，在某些方面仍受到限制……有些人提了一两点意见，一位教员自告奋勇提出自己的看法，但安德烈·伊斯特万仍然沉默不语，缩在他的同伴中间。有些学员用渴求、忌妒的目光搜索着维罗的眼睛。她该有多得意！她轻而易举地过了关。赞许的话语在她耳边象流水一样潺潺作响，然而她的不安却在增长。她周围坐着年长的男人，他们的脸通红，脸上堆着受羞辱的皱纹。这些男人都愁眉不展，神情恍惚。而她……！中间休息喝完咖啡以后她随随便便走到特罗扬·安娜身边，结果一点用处也没有；她的女保护人连一句话也懒得跟她说。原因是她知道底细，正在等着看热闹呢。她的沉默是沉闷的，意味深长而有所期待的。

她必须站起来回答他们，承认自己有一些小过错和疏忽。他们脸上的肌肉开始松弛下来，她已经不成问题，三言两语

就足够了。可是他们不知道出众的见证人正在倾听、在窥伺。他们不晓得在这里进行的是一场阴间的审判。她站起来的时候，特罗扬·安娜用鼓励的目光望着她，这几乎使她哭出声来，想在她的仁慈下取得温暖。只有大人物才具有宽宏大量的品德！她隐隐约约觉得有点恶心；她觉得头重脚轻，涌向头部的血液使她眩晕。起来造反和勇敢地面对他们的愿望早离开了她的心。不，她不能辜负他们的信任和慷慨，她不能推开向她伸过来的手，她不能撒谎。这是她跨进这所房屋的门槛以来第一次感到了自由。她听到一列火车拉着一声长长的汽笛后迅速远去；火车、那辆火车仿佛也把她突然带走了！

她抬起眼睛，越过前排那些人的脑袋，朝讲台望去。她用一个信徒式的倔强说话了，口气很镇定，声音很清晰。

"谢谢，同志们，感谢你们对我的关心，"她说，"如果我没有估计错，以前在我一生中从来没有那么多人关怀过我。我从来没有过学习的机会，没有吃过一顿饱饭，也没有领过工资。"

她深深地感动了，她的情感冲昏了她的头脑。人们开始坐端正，因为她的声调使人听出这仅仅是开场白，后面还有正文呢。

"我不应该向你们隐瞒这里发生的一些事情。上星期天夜里我到安德烈·伊斯特万同志房间去了。趁他妻子上布达佩斯的时候。"

她环顾四周，大厅里所有的脸都朝向她。

"我到他房间去了，"她重复着，"我现在害臊死了。"

"这臭婊子！"矿工诺鲍尔在嘟哝。"做一个好妻子？当一个好婊子倒更合适！"他心中充满着愤怒，同时也充满着贪婪的恋慕。

"他并没有威胁我，也没有强迫我，不知为什么我自己干出这种事来。"姑娘接着说。"我可不是一个坏女人。"

特罗扬·安娜霍地站了起来，砰地一声把拳头砸在桌子上。她的气出不来，呼哧呼哧直喘。

"住嘴！"她叫嚷起来，声音嘻着了。"闭嘴！典型的歇斯底里！一派胡言乱语！神经分析学家最了解她们！"她不自觉地求助于自己弗洛伊德①学派不可告人的经历。"坐下，同志！"

人们坐不住了，吵嚷声越来越大。萨斯·维尔莫什和布达佩斯来的代表的头在一位教员背后碰在一起，耳语些什么后，频频点了几次头。

安德烈·伊斯特万在一张纸上画了几个圆圈，看见姑娘站在他面前的身体，她肌肤的颜色就象融化了的奶油，香甜而温暖。他的头开始晕眩；维罗赤条条站在衣著笨重的人群面前，正在讲呀、讲呀。她正在对他，只对他一个人讲述着那天夜里发生的事；讲述着那天夜里没有关灯，讲述着那个

① 弗洛伊德(1856—1937)，奥地利心理学家，精神病医师，精神分析学派的创始人。他把人的心理分为意识和潜意识两个对立部分，认为存在于潜意识中的所谓性本能，人的心理的基本动力，是摆布个人命运，决定社会发展的永恒力量。

男子用孩子般的惊奇目光盯视着她，因为他从来不曾见过如此销魂的肉体。“你真美。”他对她耳语，他迷茫了，看不见自己周围的任何人。

“住嘴！”特罗扬·安娜使出全身的力气叫喊起来后，又恢复了自信。

“不，”姑娘说，“这是应该说出来的。”这时，安德烈从愉快的迷茫中慢慢清醒过来；他站起身，为自己两条腿找到立足之地的时候，椅子嘎吱嘎吱地发出不悦耳的响声。

“安奇·维罗讲的是实话。她讲的全是实话。”他狂热地重复着。

“离题万里。”特罗扬·安娜叫喊起来。

“不离题，”安德烈象一个执拗的孩子重复着，“这当然一点也不离题！”

党代表用迅速、有棱有角的姿势在一张纸条上草草写了什么后，把它悄悄推到萨斯·维尔莫什的面前。主任点点头，清清嗓子，就在他站起身的时候，笨拙地把一瓶樱草花弄翻了。

“我看……，”他开始说，“我看……”

听众席上窃窃私语声四起。他们以前从未经历过这种场面。

“我看，”他又开始说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里吧。”

有人大声喊：“让我们听听安德烈同志的发言！”

其他人也跟着叫起来：“我们想知道！”

萨斯·维尔莫什拽了拽安德烈外套的袖子。“够了，”他

低声说，脸上露出严峻的表情，“闭上你的嘴。”

“罗米欧与朱莉叶！”一张长凳上有人发出笑声。

萨斯·维尔莫什又拽了一下那件老式的褐色外套：“你会毁了自己的。”

“你们瞧，我们，”安德烈·伊斯特万无法控制自己，继续沉着地讲下去，“维罗和我，我们相爱着。现在应该把真话说出来了。因为这里已经进行了两天……同志们！”他没有提高嗓门来追求讲话的效果，然而可以从他的声音觉察到他坚定的决心。“我今年二十七岁，进大学的第一年就入了党。第二年受到起诉；在牢里我同其他囚犯一起被链子拴住，我也是从那里设法去投奔苏联红军的。我的生活——没有什么了不起。可是运动，同志们……”他兴奋得发不出声来。他说不下去了，他又感到有人使劲拽他的外套，连肩膀都被拽疼了。

“这里发生的，同志们，也许我选择了最坏的时刻发言，可惜我现在没有权利对此发表意见了，但是这里发生的一切是不人道的……是绝对……绝对非人道的。”

特罗扬·安娜乒乒乓乓地走出教室。

安德烈·伊斯特万感到萨斯·维尔莫什的胳膊肘正往他肋骨里杵。

“我是一个共产党员，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我们，安奇同志和我，我们相爱着。而且我知道我的责任。我们不想把人们变成色情受虐狂，我们也不想当叫人厌恶、习惯成自然的撒谎者。这是办不到的！我知道，是的，

我当然知道自己的责任。”

从他嘴里冒出断断续续、杂乱无章的句子，象孩子在瞎说。他的眼睛里噙满泪花，他觉得自己在单枪匹马赎回过去两天的罪过。

“是的，”他悲喜交加地说，“我爱维罗。”

安奇·维罗望着代表。她觉察到萨斯·维尔莫什的苦恼。她钦佩安德烈·伊斯特万，他瘦削的肩头在混沌的灯光下微微往前倾，他的颧骨上泛起肺病患者才有的深红的红晕。她冷静、精确地估量着这一切。她晓得，她再一次晓得自己该做什么了。

“不，”她用令人着迷的沙哑嗓音说，“不！安德烈同志弄错了。我一点也不爱他。那是因为他的威望……因为他是我的班主任。”她严肃地垂下眼皮。“我昏了头。”

党代表又把一张纸条悄悄拨到萨斯·维尔莫什面前。

批评与自我批评会终于结束了。

张春风　译

屠勒约·格保尔

亚门，亚门

〔**作者简介**〕 屠勒约·格保尔(1912—1979)，匈牙利作家，曾三次获得尤若夫·阿蒂拉文学奖。早期作品从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出发，描绘首都资产阶级的没落、虚伪和资产阶级生活的危机。解放后的作品逐步接近社会主义，并反映普通人的生活与问题。重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圣人》、《序曲》、《白昼与黑夜》、《假钱》、《耻辱》、《一个人的归宿》，以及短篇小说集：《亚门、亚门》、《羊圈里的羊羔》、《受骗者》、《最后的小组》等。

“先生，您也到电台去了吗？”

“我只是在电台附近呆了一会儿。”

“要是允许我打扰您的话，请问，现在的形势如何？”

“对此我很难作出判断。”

“果然如此。您的意见非常正确。对目前形势确实是难于作出判断。”

站在门口的是一位留着白唇须、态度温和的小个子老头，身上穿一件老式翻毛旧大衣。这里是一条狭窄的老式街道，街上行人寥寥无几。火光映红了半边天，人们猜测那是在民族博物馆的上空。火光中闪着射击时发出的蓝光。这里也能听到乒乒乓乓的响声。站在门口的那位老先生抬头望着天空。

“要是允许我询问的话，该把这场火灾归咎于什么呢？”

“那是载重汽车在燃烧。”

“真奇怪。”他沉默片刻，又问道：“就在我们街的附近吗？”

“一处在加尔文广场，另一处在民族博物馆附近。”

“要是我们民族的艺术珍宝被付之一炬，我只能表示遗憾。”他跺了跺脚，接着又是沉默不语，用一种探询的目光望着我。他有一双漂亮的蓝眼睛，在他那张高贵、衰老、饱经沧桑的脸上，唯有这双蓝眼睛显得无限年轻。——我们能等待什么呢？——我觉察到他在琢磨：该说些什么？说到何等程度？能否得到所期待的回答？——“我几乎不相信，”他接着说，“事情会朝这样的方向转变。要是允许我打听的话，您认为这一切是不可避免的吗？”——他又在等待，脸上露出犹豫不决的神情。“我读了贴在树上和商店橱窗上那些用打字机打印的传单后，不免使我感到惊骇。这些都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干的呵！不久前，谁要是有这类念头，只能把它深深埋

在内心深处。前些日子，报上进行了论战，我们的行政机构没能作出正确的处理……”——我意识到，他的每一句话都是针对不同的情况而选择的措辞，目的在于使这些话不受时间的限制，既抽象又不超出法律范围——“总之，这是那些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的人经过长期准备的一次激烈斗争。只要时机成熟，随时随地都可能爆发。”

时间大概已经过了午夜，街上却显得愈来愈活跃。从民族博物馆，从国会大厦那个方向走过来一拨拨的人群，人数有多有少，他们象习惯于晚睡的人，正在寻欢作乐时叫人搅和了似的，被这突如其来的事件弄得目瞪口呆。他们在议论死人、示威者和军队。男人们都穿着风衣，妇女们身穿翻毛小大衣，慌慌张张地往前跑，很快被站在街道两旁观望的人群所包围。无论是谁带来什么消息，从中都可以引伸出许多猜想。目击者的讲述从来都不是那么准确无误的，原因是他看到的事实过不了两分钟就完全变了样。因此，他们在开口之前，都得留点神，先看看周围的动向，甚至宁愿表示沉默。一辆带斗的摩托车象个缺了一条腿的人在道上颠簸着；原来它的一个轮胎被从什么地方射来的流弹打穿了。一个失去知觉的女人躺在车斗里，身上被胡乱包扎着。驾驶摩托车的是一个身穿短皮大衣的男人，他神色慌张，嘴唇直打哆嗦。摩托车终于一瘸一拐地从房子前面开过去了。这时候，这里已经聚集了许多人。有人说，那个女人是被从卡车上射击的子弹打中的。一位上了年纪、头发蓬乱、身穿睡衣的妇女在讲述两个孩子在民族博物馆附近被打死的情景。孩子们想从熊熊

燃烧的卡车旁边横穿山陀尔街，那里正在进行枪战；先是那个男孩，接着是那个女孩中弹倒地。

“很遗憾，”老先生叹了口气，“永远是年轻的生命……您还再呆一会儿吗?”他伸手向我告辞。可是他伸手之前先把手套脱掉。“我想天一定很晚了。”

“两点半了。”

“明天早上，我们会知道更多消息的。晚安!”

“晚安!”

*　　　　*　　　　*

我们是在公寓楼一层分手的。在大门后面的楼梯口，密集的机枪声已经不象站在街上时听得那么清晰了。老先生往二层走去。我听到他轻轻地把房门关上。

从前，国会曾就宗教和其他法案进行激烈辩论，斯哈伊·格若博士是以年轻法学家领袖的身份参与讨论的。在秋玫瑰革命①时期，他曾经当过几天的司法部高级职员，代表政府坐镇银行。随后他又在西莫尼—塞马丹②政府里担任几天司法部长。他精通拉丁语，在国际上也是数得着的最后一批拉丁语新诗人之一。他在中年时曾获得世界圣公会奖章，后来又获得圣马利亚学院颁发的勋章。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期，他以银行董事会负责人之一的身份退了休。

---

① 指1918年10月在匈牙利首都爆发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② 西莫尼-塞马丹·山陀尔(1864—1946)，人民党领袖、律师，1920年3月15日至7月19日曾出任匈牙利反动政府总理，推行白色恐怖政策。

这幢公寓里的住户对他的情况知道得不多。几年前，他同他妻子不声不响地搬进二层的一间连同家具一并租赁的房间。他们象两只蛀虫夹在杂物里被带进来似的在这幢公寓里呆下来了。我不知道他们在我楼上住了多久。一天晚上，有人敲我的门。我开门一看，门口站着一位衣冠楚楚、两颊红润的上年纪的男人和一位身穿弹力呢大衣的浓妆艳抹的女人。他们手里都抱着包裹。"对不起，请问斯哈伊·格若博士是住在这里吗？"我告诉他们再往上走一层。他们向我道了谢，便匆匆登上楼梯。公寓门前停着一辆梅茨牌大型黑色轿车。我看见司机手里也拿着包裹匆匆走进公寓。第二天下午，住在楼上的老先生同他妻子一起来串门。他们作了自我介绍，并感谢我告诉客人——老先生的兄弟，两次柯苏特奖获得者，建筑工程师斯哈伊·卡茨梅尔——他们的住处。即便从那以后，我们见面的次数也不算多。有一次，斯哈伊博士太太向我们借电烫斗，还回来时给我母亲——用她的话说——带来一部非常有趣的小说。那是一部德文小说，叫《神圣的崇拜》，是阿克奈斯·孔德尔①的名作。后来他们还借用过几次我们家的电话。斯哈伊·格若博士现在是郊区某木材场的看守。他那位个子比他高大的妻子替某个小手工业合作社做些小玩具，诸如兔子、狐狸、米老鼠之类的小动物。

那天晚上，他们显然很不平静。其实，对其他人，对我们来说也是如此。第二天上午同样是不平静的。战斗没有扩

---

① 阿克奈斯·孔德尔(1863—1911)，德国女作家。

展到我们住的这条街。一般来说，被狭窄、曲里拐弯的小街环抱着的这个地区是可以回避一切不幸的。不过，战斗仍在它的上空进行，偶尔也从屋顶上落下几块碎弹片，好在只擦掉墙上的一层灰泥。我们在这里就象生活在盛满水的器皿里。在我们的上空和周围传出喧嚣声，可是这一切又是离我们非常遥远。

* * *

门铃响的时候，我还没有完全醒过来。我穿着睡衣，头发蓬乱，在犬吠声中赶忙去应门。

“噢，”斯哈伊博士太太不好意思地说，“要是知道这样，我们怎么也不会来打搅您的。”

“没关系，请吧！”

“我的外孙小格若，”老先生解释说，现在他仍然穿着那件掉了毛的皮大衣，戴一顶皮面被磨光了的皮帽。“他是个学生。我们担心他卷进那些事情里去。孩子不懂事，我们不免为他担心。要是我们能跟我们女儿通个电话……”

电话机放在外间，他们很快就拿起话筒。我在另外一个房间换衣服，却一直竖着耳朵听他们通话。

“我是爸爸，”老先生说话的声音是那样细，象个即将入睡的病人。“我们的小格若怎么样啦？感谢上帝……你不要让他出去！对他要格外小心！你妈要跟你说话。”现在我听到他妻子的声音：“哎哟，我的小心肝，你们那里的情况怎么样？太可怕了，你是对的……我们可紧张啦。我的小心肝，哎哟，你们可要小心哪！小格若，是你在说话吗？小淘气，你没说

实话吧。你这个闲不住的小家伙，你一定下楼去过了。你说你没有上过街？这我就放心啦。谢谢，谢谢。你们那里还有吃的吗？”

我从房间出来时，斯哈伊博士太太还在打电话。她脸色阴沉，显得很冷漠。她的皮肤黄得象一个病人。她那染黑了的又厚又密的头发象两个高高的波浪往两边耳后根涌去。

那位昔日的部长正站在煤气灶旁边。

“您是党员吗？”他冷不防问道。

“不是。”

“我的兄弟也不是。他是两次柯苏特奖获得者。”

“这我知道。”

“噢，当然。”斯哈伊博士太太还在对着话筒亲切地说着，她的声音很轻，深怕扰乱我们的谈话。“我本想听点消息，”老先生看了我一眼，“可是佩斯电台只播送歌曲。您说，电台到底出什么事啦？为什么不发表声明？”这我不清楚。正象他不清楚一样，我也不清楚。“有些人认为，”现在他又以探询的口吻说，“我们这儿发生了革命。您认为在我们的环境里，这能够想象吗？一般说来这是不是一次好机会？”放在另一个房间里的收音机被打开了。声音立即传遍整个房子。电台播送的是《酒店皇后》①。老先生的思想逐渐活跃起来了。——“我的小女儿住在汤巴大街，那里的情况很不妙。尤其困难的是，我们不知道城里出了什么事。街道之间本来是相隔很远的，

① 又译《恰尔达什皇后》，是匈牙利著名舞曲。

可是我一觉醒来，突然觉得近多了。”他沉默片刻，又说，“我想向您提个问题，我们如何去理解这桩事情？它会在什么时间，什么情况下得以结束？”奇怪的是，末了他又添上一句：“我不是一个社会主义者。”

斯哈伊博士太太终于放下了话筒。可是她依然坐在扶手椅上。

“您们知道我女儿讲些什么吗？”她转向我们说，“他们那里战斗仍在进行。她听说兵营已经被夷为平地。可是在她们那里，还有在加尔文电影院，人们仍在坚持战斗。”

“哪里来的这许多弹药呢？”老先生问我。“您没有预感到这个……这个……”他在寻觅恰当的字眼来表达自己的思想，“这个事件是不是预谋的？上个星期天，我家来了一位熟人，更确切地说是我的一位老朋友，他说可以指望会出现大事。”

斯哈伊博士太太这时急忙走到我们身边。

“我告诉小梅达，”她插话说，“要他们到地下室去。”老先生还想把星期天听到的消息往下讲，可是他的妻子没让他说下去。“她问，会永远这样下去吗？现在，我们要永远担惊受怕，每隔一段时间就得到地下室去，包袱倒是经常备着的。您们储存食品了吗？”

“我母亲只习惯买够两天吃的东西。”

“太可怕了！”她同情地叹口气说，“您们没有储备吗？我有经验，这种时候总会出现不速之客的。就在这最坏的时刻。”

*　　*　　*

我们住的公寓有两扇钉着铁片的橡木大门，子弹很难穿透，一九四四年底布达佩斯围城战役时，飞来一颗流弹，却没能把门打穿。现在不仅我们几个人依着大门站着，公寓楼上也不断有人下来。已经是黄昏时分了。街上空无一人。从远处传来机枪的哒哒声。枪声有时密集些，显得很合拍，有时又间隔一段时间，象乌鸦拍打了一阵翅膀后又安静下来。这条街上唯一的一幢现代化公寓大楼，就在我们公寓的对过，那是一幢格式新奇的建筑，结构比较坚固。那里的门口经常聚集着一大群人，只有在附近响起枪声时，人们才跑进屋里去。一辆车子开过来停在大楼前面，从车上抬下一个血糊糊的年轻人，身上到处缠着绷带。公寓楼一层的一扇窗子砰的一声被推开了。一位细高挑的女人象一颗子弹似的高声尖叫着从窗口跳下来。这位年轻女子径直向汽车冲去。她帮着把自己的丈夫从车上抬下来。那幢坚固大楼的居民们赶快往两边闪开，给他们让出一条道以示同情。

"这个年轻人，"斯哈伊博士说，"据说在国家保安机关工作，是昨天晚上被带走的。"他沉思片刻，脸上露出悲伤的神色。"匈牙利人反对匈牙利人。这样下去何时是了？"

汽车开走了。整座城市，当然也包括我们居住的这一条街在内，从昨天晚上起，街头上的弧光灯就一直亮着。现在天黑以后，灯光显得更亮堂了。天上淅淅沥沥下起雨来，夜色蒙蒙。从伊丽莎白桥方向开来一辆军用卡车，从我们门前驶过。车子是空的，支着帆布车篷，车上竖着一面红十字会

的旗帜。

“亲爱的，”斯哈伊博士太太把头伸到窗外，又很快缩了回来，说，“咱们该上楼了。我觉得有点冷呢。”

夜愈来愈沉寂，人也愈来愈感到郁闷。电台广播停止了；一拨佩斯台，只能听到叽叽啾啾的响声；拨短波吧，外国电台对佩斯情况的报导也是混乱的……

老先生和他的妻子又来串门了。

“您说过，您们只有两天的食品。要是您们不见外，这一点点土豆、罐头……”

“亲爱的，这可是……”我母亲大为感动。

“不客气。互相帮助嘛！这不奇怪，我们家也有缺这短那的时候呀。”

她把土豆、罐头放在桌子上，便匆匆进去打电话。

我把房间的窗户打开，好让空气流通。老先生站在我身旁。外面是一片寂静，几乎是死一般的寂静。偶尔从远处传来一两响爆炸声。在我们身后，斯哈伊博士太太正对着话筒同她的小女儿通话。他们谈的大概是腌黄瓜之类的事，老妇人还不时地瞥她丈夫一眼。

收音机冷不防响了起来。“十点以前，所有的人必须一律放下武器。”这是从收音机里传出来的声音。“放下武器者将得到宽恕！”

斯哈伊博士神经质地捻捻唇须。

“依您看，他们会不会顺从？”他停顿了一会儿。“处在狂热状态的人们，思想是非常解放的。我从来不认为把武器交

到所有人手中是正确的。可是今天连那些一脸鼻涕的小家伙也能拿到武器。谁知道他们中间什么时候会出英雄，什么时候又会出叛徒呢。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英雄就是英雄，叛徒就是叛徒，如同真理和谬误这两个概念不容混淆一样；在此之前，它们曾经是重要的、永恒的范畴。我早就担忧，只要划一根火柴，火药桶就要爆炸。”说完，他又赶快自我辩解道：“请您不要误解。这只不过是理论上的判断。每次在木材场值夜班，我都用这种哲理上的推论来打发掉漫长的黑夜。”

我们住的公寓座落在一条古老的街道上。街旁连一棵树木也没有。这里的地形象半圆形的灶口。从多瑙河方面灌进来的脏水，又黄又臭。仿佛我们周围堆放的是被遗弃的停尸台，上面枯萎的花朵表明死者早被遗忘。这里散发着病态的、略带馊味的臭气。电台一次又一次地重复着刚才的通令，间隔也愈来愈短了。

“您们听到了吗？”不知道是谁这样问。斯哈伊博士太太是对的，在我们这里也出现了不速之客。“还有二十分钟。”

寂寥的天空呈现出一片玫瑰红和淡蓝色。这时候既看不到火光，也看不到蓝色的曳光弹。人们无所事事地站在大门口，仰面观天。天空万籁俱寂，而且寂静得可怕。这种现象是少有的。这是一种期待般的静穆。我们仿佛站在山脚下，等待山上的岩石倾倒下来把我们埋葬。我们又象在等待着山崩地裂。天空仿佛已经凝聚着一簇簇云块，一动不动，可是只要吹来一阵风，云块就会被撕碎、飘落下来。整座城市仿

佛被烦闷、令人难于忍受的窒息气氛所笼罩。但是，射击显然仍在某些地方进行着，来回奔驰的汽车仿佛给死气沉沉的街道、房子，甚至废墟带来唯一的一点生活气息。

电台在计算着时间。

还有十分钟，你们放下武器吧！

接着有人用恳求的语调在电台说话。

还有五分钟。

我们木然地站着。猛然间，窗格子发生一阵奇异的震动，难以置信的喧嚷和骚动开始了。天空中的颜色也发生了变化，黑暗变成意想不到的五彩缤纷的条纹。瞧，就在市中心那儿。等待，恐惧。眼前，我们这里已经变成一座无秩序可言的乱糟糟的城市。街道、广场、雕像、公共设施、学校的桌椅、剧院冷清的包厢，这一切现在是为谁准备的呢？这又是谁的过错？整座城市和所有房屋都是多余的，急需的只是能藏身的洞穴。怎么办？衣服藏在衣柜里，电车月票塞在兜里，工作台、写字桌和记录本全是空的。今天这种状况，也许还要延续到明天或者后天。小狗躺在上年纪的女士们怀里。绣着浅黄色香橙花的新娘礼服和薄面纱巾都堆放在女裁缝师的工作间里。在城市四个公墓的停尸台上躺着紧闭双唇等候埋葬的尸体。死者身着节日盛装，黑呢上衣和白绸衬衫。商店橱窗的百叶窗后面摆着火腿、香肠和奶酪；橱窗顶部的弧光灯因使用不当已经烧坏了。电车、公共汽车不是停在停车场便是停在街心死一般僵硬的铁轨上。人们都在等待着。

正十点。

周围又是一阵骚动，随后便是死一般的沉寂。有一个死人瞪大着眼睛，好象在看什么，其实什么也没看。死者大概是一位过路的旅客，没有人替他合上眼皮，也没有人把钱币放进他的嘴里。

“十点。”我们又一次听到了，可是这一次却不是电台广播的。

“十点，”这是我们心中响起的声音：“十点。”

怎么，这是幻觉？或者真的有人这么说？这是不是象征死亡的乌鸦用它的尖嘴叩啄玻璃窗时发出的声音？或者只是我们从沉寂中听出死亡的恐怖含义？

斯哈伊博士从上衣口袋掏出他的金怀表。那是一块有双层盖子的瑞士产老式怀表。

“真的，”他的声音略带嘶哑，“正好是十点。”

“亲爱的，”他妻子颤巍巍地说，我便把窗子关上，“真的该上床休息了。”

“明天，”老先生说，“明天早上我们会知道得多一些。晚安！”

“晚安！”

他象头天晚上那样，同我告辞后，挽着妻子的胳膊，一同往二层走去。

* * *

第二天上午是平静的。平平淡淡的寂静。大门打开了，到处有人在走动。这同一个预示着生活在进行的任何一个早晨一样。一切都得小心谨慎，因为生活并不需要这么早就开

始。有些人匆匆赶往主要街道，电车和公共汽车将在那里等候他们。那个令人惊悸的夜晚终于逝去，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我的狗挣脱了脖围，朝前奔去。它东嗅嗅，西闻闻，在原地转了几圈后，站住了，随即又往前冲去。路面上到处是碎砖瓦、玻璃碴和散落在地上的电线。狗大概觉得很好玩。对它来说，这是多么新鲜而又没有经历过的体验呵。它在嗅巴耶马尼·彼得雕像下的新坟。它对着那忽强忽弱的弧光灯汪汪叫唤了几声后，便去窥探咖啡馆里摞起来的椅子。它在附近兜了一圈，又朝墙那边冲去，哀叫着等待着我。一辆坦克从柯苏特大街那儿开过来。广场显得空荡荡的。坦克在广场转了一圈，停了一会儿，又开足马力，吼叫着，在隆隆声中掉头开走了。

在奥斯图里阿广场附近有四辆坦克横在街面上。坦克后面聚集的人愈来愈多。远处什么地方偶尔传来一两响枪声。拉科治路已经处在死亡的废墟帷幕后面。我跟在我的狗后面小跑着。在一个被炸成碎片的售报亭前面，狗找到了一个可怕的掩蔽所。一个孩子躺在人行道的边沿上，手里还握着武器。他长着一头金黄色的头发，膝上盖着一领褪了色的草绿色大衣。在潘诺尼亚雕像原先矗立的地方，一个士兵仰面躺在那里，肚子上盖着一件白色斗蓬式外衣，手臂上还套着一个红袖章，武器已经不知去向。看样子他是个年轻人，起先我还以为是个姑娘呢。他们周围围拢着不知道从哪儿飞来的一群乌鸦。橱窗被击碎了，玻璃碴散落了一地。

我和我的狗掉头往回走。沙梅勒威斯林荫道树上的叶子

被悄悄来临的夜雨和爆炸的气浪扫落了一大片，人行道上撒满了黄色和暗红色的树叶，呈现着一片秋天的景色。

在人行道上，斯哈伊博士挎着妻子的胳膊，向我打招呼：

"请问，您知不知道司法部在哪个方向？"

"我一点也不知道。"

"显然是在国会大厦附近。是的，我相信就在那里。"

"您有什么事要找司法部呢？"

"我写了一份申请书。"我接过他递给我的那份用打字机打的文件，仔细读起来。原来他们早晨借走我的打字机就是为了打这份申请书。"我想我现在提出来，会有希望得到更多一些退休金。"

"这种时候部里会有人吗？"

"按照国家规定的条例，任何时候都应该有值班官员的。"

我注意到他们往小环城道走去。现在，人们开始在街上行走了。忽然，迎面开来四辆坦克，一辆挨着一辆，上面坐满妇女和儿童，至使新涂上的代表匈牙利民族的红、蓝、白三色标志也几乎看不清了。斯哈伊博士夫妇绕过满是瓦砾和玻璃碴的路面，小心翼翼地在人行道上走着。坦克开过去后，街道又显得空荡荡的。只有死者躺在那里。人们把那个死去的士兵抬上一辆卡车。那个盖着褪了色的大衣的小孩仍然躺在那里。

当天下午，我又跟这位前部长先生见面了。

"真糟糕，"他听到电台广播已经成立新的党和政府机构后说，"我什么事也没有办成。"

“大概那里没有留下值班人员。”

“哎，我们只走到波特马尼斯基大街就站住了。我们听到战斗的喧嚣，看到奔跑的人群。我们实在无法往前去了。那里有一间盥洗室，是用一辆老式的绿色电车改装的。”说到这里，他忍不住笑了。“我们只好躲进里面去。我们实在无法走到部里了。”

“也许早了点……”

“您是说为时过早吗？”他的神情稍稍有点紧张。“也许我的申请已经失去意义。不过无论如何我得通过邮局把它送上去。我老啰，腿脚不灵活了，没有交通工具简直是寸步难行。”

“依我看，要是邮政总局还在工作的话，那么……”

他用很有意思的手势指着收音机，一再引用从收音机里听到的消息：

“从此以后，我们可以期待凭借法律来发展形势。”他顿了一下，仿佛他现在是在昔日的法律节，或者在上议院发表演说似的。“那就是说，我们终于解决了威胁着民族生死存亡的大问题。如果说人们的牺牲有什么价值的话，其价值就在于此。说得准确些，一切都必须服从法律。”他神秘地哑然一笑，接着又补充了一句：“我现在什么都不害怕了。”

过了一会儿，斯哈伊博士太太拿出几件手工艺样品同我母亲探讨起来。多年来，我母亲一直从事编织窗帘、桌布等手艺。她是个急性子，总喜欢把突然想起来的一些编织方法记在一张张小卡片上，有时也喜欢把织剩的线织个圆圈或五

角星之类的玩艺儿。一天上午，斯哈伊博士太太给我母亲送来一摞象小山丘那么高的手工编织小册子，全都是很久以前出版的。她们终于在那些小册子里找到喜欢的花样，便动手编织起来。

“倘若我求您作点事，”老先生站在一旁看了一会儿，这样问道，“您不会介意吧？”

“请说吧！”

“最近可能有人来电话找我，到时能叫我一声吗？”

“当然可以。”

“感谢之至。我不是等我孩子的电话。他们有事都找我妻子。”

* * *

今天，我已经很难把那些混乱日子里出现的情况理出个头绪来，比如说，那些日子里发生了什么事，是什么时间发生的等等。那时候人们过日子，就象得了疟疾，时冷时热。有时出现令人眼花缭乱的景象，有时气氛又冷清得叫人感到压抑。喜庆的旗帜和哀悼的黑纱同时悬挂在屋顶上。街上是一片乱哄哄的喧嚣和混乱。

我唯一能够说清楚的是斯哈伊博士这些天的活动。他多次下楼来打听：有没有他的电话？其实，没有任何人来电话找他。

“这是不可理解的。”他自言自语。

“也许您可以找有关人士。”

“不必。”他变得有点紧张，扯了扯衣服的下摆。“这我是

不干的。”

最后到了十月三十日——用斯哈伊博士的话说，这是值得纪念的重新改组的节日。实际上，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整个世界形势出现的变化，欧洲出现了大分裂，目前仍然分裂成两个阵营，并且相互对立。根据他的看法，现在一切又都起变化了，不过还不能说是胜利的节日——就在这一天，有人来电话找他。

“格若大叔，有人来电话找您。”

他们住在公寓二层一间窗户朝天井的房间，颇象医院里的储藏室。房间里几乎摆满了贵重的旧式家具，彼此挨得很近，要在它们中间行走是很艰难的。放换洗衣物的口袋里装着鸭子、米老鼠等小玩具。墙上挂着一幅斯哈伊博士太太的巨幅油画像。前部长太太正在电炉上烧牛肉焖土豆，老先生在一旁削土豆。

“是谁打来的？”他边解下围裙，边紧张地问。

“他没有告诉名字。”

这一对夫妇——在我看来——胜利地相对而笑。在电话机旁，斯哈伊博士先把话筒在手里握了一会儿后，才对着话筒说话：

“我是斯哈伊·格若博士，退休的司法部长，曾任上议院议员，信贷公司董事会董事。请说吧！”他妻子带着赞赏的目光注视着丈夫非常优雅的风度和微露得意的神态。可是，当斯哈伊博士告诉妻子，谁在同他通话时，她脸色骤然变苍老了。“怎么？”他停了好一会儿，模样显得又老又疲惫。“派车子

来接我？亲爱的库尔茨曼同事，这有必要吗？我已经是个老人了……那我不反对。好，您们派车子来吧！"

斯哈伊博士太太几乎晕倒了。

"是木材场打来的？"她问道，还稍稍抱有一线但愿不是木材场打来的希望。

"在我缺席的情况下，他们把我选进了工人委员会。"他又转过身对我说，"谢谢您，要是再有人来电话，您一定会叫我，对不？"

午后不久，来了一辆车子接他。我们在大门口碰面了。那是一辆大型载重汽车，车上插着一面巨大的三色旗，特别引人注目。车上已经坐着好几个人。一位留短发，身穿短皮大衣的妇女从车上伸手给斯哈伊博士，把他往车上拽。

"勇敢些，尊贵的先生，"那位妇女鼓励他说，"既然熬过了这么些可怕的岁月，现在就剩下那么一点路程了，必定会成功的。"

我从下面也帮着托他一把，老先生终于上了车。他用过去高级政府官员的那种风度，向我介绍那位妇女，不过口气显得有些不自然：

"这位是茨内尔同志。"

"哟，别客气，"茨内尔太太笑着说，"用不着这种礼节呀。"她从车上把手伸给我。"我叫伊露丝。"

卡车把他们载走了。斯哈伊博士靠着车帮坐着，用手抓住车子的栏杆。风吹动着旗帜，呢料旗帜的一角时不时拂拭着他的面孔。他也时不时用手把旗帜拨开。站在他身旁的是

那位茨内尔太太，脸上露出一副轻浮相。

晚上，斯哈伊博士夫妇邀请我去打桥牌。我不是行家，只能凑个数玩两局。斯哈伊博士夫妇却打得好极了。第四个是他们的外孙小格若，他是个忧郁的小伙子，长着一脸的粉刺，倒是个很会弄手脚的行家。

“要是您能为我出个主意，我是非常感激的。”在他妻子计算输赢时，斯哈伊博士对我说。“今天开的工人委员会乱极了。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做得对。因为就我过去的背景而言，我现在的行为举止不免有点无法理解。您也许会说，前途可畏，负责外交事务的政府官员是否是机会主义者，或者说得轻一些，我们能不能称他为人道主义者呢？现在，在许多问题上，我们都需要进行独特的思考。”

斯哈伊博士把会议的情况简略地说了说：首先，他们把干部档案卡统统拿出来。接着一张张地念，边念边议论，给人的印象是，他们这样做与其说是评论干部的好坏，不如说是一种娱乐更恰当些。人事科长茨内尔太太——用斯哈伊博士的话说——是个快到更年期的妇女。出于自私的心理，对所有的人都要说几句闲话。自然，斯哈伊博士最欣赏的还是他自己的那份档案，上面这样写着：“没有前途的没落阶级的成员；每次讨论会上尽讲些空洞无物的话，对一些鸡毛蒜皮的琐事喋喋不休，却回避原则问题；在家里，喜欢家人称他为尊贵的先生；不适宜担任任何工作；曾多次建议解雇他，可是总有一只秘密的手，显然是两次柯苏特奖获得者斯哈伊·卡茨梅尔的手，在进行阻挠。”会议就是如此这般地进行的。

说到这里，斯哈伊博士象孩子般真诚地笑起来。

“我的工资应该是六百三十福林。”他强调档案在这一点上对他才是具有实际意义的。他沉思片刻，又继续往下讲：“当然这还不是主要的。在讨论第二项议程时，大家要求排一次队，看该解除哪些抱妥协态度的人的职务。我没有必要向您提及他们的名字，反正您也不认识他们。在那种气氛里，我们有些人是很难同其他人对抗的。可是过了一会儿，我觉得自己成了一个护民官。要我解释在法国革命时期那些女士们都是些什么人也许是多余的。正如今天人们所说，那些女士们都是流氓无产者，她们在断头台下从容不迫，还鼓励刽子手和他们的助手手不要发抖。现在我觉得，这个流氓无产者的概念变成了具有特殊意义的显要人物的概念。这个问题一直使我感到困惑。我觉得我自己是不配的。在我们那里，”他继续讲下去，“更准确地说有一位党委书记，叫曹尔柯，原先是个木匠，一个很好的人。过去，他跟我没有什么过不去的，也就是说，他对我不好也不坏。依我看，在过去的年月里，这就是一种人性的表现。现在轮到他了。我鼓起勇气为他说了几句好话。人们叫他斯大林分子。依我看，大家都为以前的制度服过务，我这么说无疑是一种冒险。把我同斯大林分子联在一块，”说到这里，他淡淡一笑，捻了捻小胡子，“至少是很可笑的。接着便发生了一场激烈的辩论；当然，这种争论是不对我口味的。最后进行表决，他们把曹尔柯解职了。这时已近黄昏，曹尔柯还在会议室外面的一间小厢房里，等待着关系到他前途的决定呢。我把消息通知他，并向他伸出我

的手。我这个举动可能使他得到一点安慰。我觉得我必须告诉他，我这样做是应该的。现在，我等候您的回答：我的行为是否正确？因为当我回顾我的一生，这种有点莫名其妙的举动表现了我作为老年人的一种屈辱，也许我该采取相反的行动。握一次手，这就是全部事情的经过。而这将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呢？”——他的声音表明他精神上有点紧张。

他的外孙格若抢在我前头回答：

“脑力衰竭症。”

把这个医学上的拉丁文术语转译成匈牙利语就是：老年人大脑软化症。

这个评语使老先生感到沮丧。我们又接着玩了一局，他却不再多说一句话。打完牌，我向他友好地告辞。

“还有一个问题，”他紧紧地握住我的手，“您能想象，这样一个小国，进行这种无休止的争论，能否导至单方面取消同一个大国缔结的条约？我是指在法律方面。”

“对法律这门学科，我是一窍不通。”

“当然，您不是法学家，”他审视着我好一会儿，叹口气说，“要是他们来电话找我，我想您一定会叫我下去接的，对不？”

* * *

在哀悼死难者的那天，我是黄昏以后才回到家的。重型卡车把我带到鲁古斯医院，我纵身从车上跳下来。在我背后，也就是共和国广场方向，我听到被驱散的人群的喧哗和排枪的射击声。当时的情景是令人惊骇和恐惧的。屋顶上到处悬挂

着弹洞累累的代表民族标志的三色旗和哀悼死者的黑缎带。一个报贩高声吆喝晚报上的热门新闻。由于黑暗的突然降临，整条拉科治大街和房屋的窗子都被烛光照亮着。那是成百万枝蜡烛的烛光。仿佛整座坟场迁到城里来了。每一个窗户就是一个被照亮的坟头。在那些几天前死者躺卧过的地方也点着蜡烛。在每一个死者躺过的地方都点燃着两三枝蜡烛。烛光摇曳，仿佛是垂死者的奄奄气息。在昏暗中，我，还有其他人，都怀着不祥的预感，垂头丧气、畏畏缩缩地匆匆从人行道上走过。

在那个盖着褪色大衣的孩子躺过的地方，也闪烁着烛光。我在那里碰见斯哈伊博士和他的妻子。他们挽着胳膊站着休息，看样子他们已经走了很长一段路。斯哈伊博士好象快累趴下了，他的妻子却站得笔直，神情严峻。

"您很早就从家里出来了?"老先生问我。

"午前就出来了。"

"他们到现在还没有找我，"他直截了当地说，"那是因为他们认为我说的话不合时宜。"

"可不是嘛。"

"您对我们刚才去什么地方感兴趣吗？这么晚还在这里遇见我们，肯定使您觉得奇怪。"

"如果您肯透露的话，格若大叔……"

蜡烛在他那沾满尘土的皮鞋旁闪了几闪，终于熄灭了。

"再不会有人了解我了。"他突然说道，流露出痛苦的表情。"再没有人了解我了。"

“您怎么会这样想呢？”

“事实如此，”他沉默了一会，“为了确认这一点，我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　　*　　*

……原来他们整天在外面奔波。他们先去找司法部。人们让他们在前厅等候。不一会，出来一个年轻人，通知他们说，现在还不须要他们的服务。接着一个勤杂人员用土豆、甘蓝塞满老先生的皮包，领他们出去，老先生仍然很固执，不愿离去。在走廊，他听到几个男人在咋呼，他认出其中的一个。那个人叫多里纳伊，当过低级雇员。他站在多里纳伊面前，多里纳伊当然也认出他来了。不过，向他问候的握手同时也是告辞的握手。多里纳伊匆匆走了。斯哈伊博士只听到他对他那些斯哈伊博士不认识的同伴说：“我怎么会知道这只老松鼠是谁？”斯哈伊博士夫妇拎着装满土豆和甘蓝的皮包蹒跚着离开了司法部。

随后，他们又去找一个新近成立的、具有保守色彩的基督教民主党办事处。斯哈伊博士从前作为这个党的思想先驱者，对这个党的活动起过重要的或者说指导性的作用。他觉得现在该是为这个党提供自己的服务和经验的时候了。他有点抱怨自己在部里工作十二年，使自己养成一种过份谦逊的习惯。在党的办事处，他努力振作精神，摆出一副傲慢的姿态，为自己加上头衔。

“斯哈伊博士。”他把自己的名字告诉秘书。

“……博士？”

"斯哈伊·格若博士，前司法部长。请您去报告主席先生。"

"亲爱的大叔，"那个年轻人露出怀疑的目光，急忙说，"主席先生忙得不可开交。他正在准备一份纲领性声明。明天他要在电台广播。"

"我要跟他面谈。"

年轻秘书急匆匆走进主席办公室。老先生由于自己能从容地摆出一副高贵的仪态显得真正年轻了。他仿佛觉得，正当他庄严地站着等候时，大门打开了，党主席匆匆走出来，挽住他的胳膊说："尊贵的先生，您的莅临使我们感到荣幸。我们已经派车子去接您，您却赶在我们前头了。我们非常需要您的经验。有谁比您能更好地概括我们的思想呢？……请进来吧，请您参加我们的委员会，我诚心建议您这位过去时代的见证人担任党的名誉主席，这是对您过去受到诽谤所应得到的报答……"

然而事实是无情的，走出来的还是那位秘书，遗憾地对他说：

"主席先生非常忙。他再三交待我们，不要让他不认识的人进去打扰他。"

"您指的是谁？"

"我只是引用主席先生的原话。"

他们又去找了四五个党。当然，正如斯哈伊博士所强调的那样，他们找的那几个党都有保守背景，了解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并深刻理解匈牙利的地理位置所具有的特点。"保守

观点。”几天前他这样表示：“我可以这么说，也是有弹性的，不是一成不变的。”但是，他们去找的那些党都不接纳他，甚至连门槛也没有让他们迈过去。他手里拎的那只装满土豆和甘蓝的手提包变得愈来愈沉重了。

现在，他正好从一位老同事家里出来。他不愿意提起此人的姓名。这个人跟斯哈伊博士的年纪相仿，快七十了，也是旧时代的一位部长，住在拉科治大街附近的一条小巷里。在过去那些艰辛的岁月里，他们偶尔见见面，喝喝咖啡，打打桥牌，同时也借机交换点彼此的看法。这位贵族式人物常常怀念昔日那种地主或者牧场主的舒适生活。后来他转而采取消极反抗的手法。他的孩子们都到美国去了，从那里经常给他寄来邮包。

斯哈伊博士在这位老朋友的客厅里遇到一群上岁数的老先生。他们都在兴头上，因而很亲切地接待他。哦，这下子可放心啦。“这是多么美妙的活博物馆呵！”他在心里暗暗自我解嘲。这些老先生全都是昔日的部长、国务秘书和大主教。他们坐在扶手椅里，个个神气十足，摆出贵族的派头。他们的面孔都象是用大理石雕刻的，唯有下巴颏时时在颤抖。在座的老先生里，起码有十位已经秃顶，然而他们的内心活动却是别人难以理解的。斯哈伊博士很快就弄明白，由于目前出现的情况，他们一致同意：为了民族团结和公众利益，必须成立政府。他们已经准备好一份政府成员名单，围着桌子坐的当然全是部长。

斯哈伊博士愉快地提出一项倡议。

“请允许我说一句。”他手里端着茶杯，郑重其事地宣布：“要是您们同意，我愿意效劳。”

“当然啰，真是妙极了。”有人这样说。

从这个话音里，以及在座的先生们的神态中，显然可以觉察到，这时他们的热情远远不及他刚进来他们拥抱他时所表现出来的那么高昂。这种突然出现的沉默并没有使斯哈伊博士泄气。他想，他们可能在考虑分派给他哪一个职位更合适，在什么地方最能发挥他为公众利益服务的才干。

“也许，”他以一种亲切、平静的声调代替他们提出建议，“如果您们委托我负责农业信贷机构方面的工作……依我看，目前……”

“是的，要是可能的话。”文化部长嘴里在嗫嚅。

接着又是一阵沉默。最后，财政部长开口了：

“我亲爱的格若，我认为您误会了。我们衷心地欢迎您，但是我们不能向您提供职位。要当面对一位老伙伴说这种话是难于启齿的。可是我不得不说，在过去的年月里，您并没有表现出您应有的骨气。您是有污点的，我亲爱的格若。”

“我？”斯哈伊博士惊呆了。

“是的。您容忍了，您担负了公职。不论是多么微不足道的职位，都表明是参与了过去那个该诅咒的制度。我说这就是妥协。”

“那是迫不得已呀！”他双腿哆嗦着站了起来。

“不错，是为了生活。可是，我认为您是很难理直气壮地向那些作出牺牲的人们进行解释的；要知道，他们付出的

不是小小的牺牲，而是坐牢……”

斯哈伊博士真正生气地叫喊：

“十一年来，我只不过是一个木材场的夜间值班员哪！”

斯哈伊博士急速地把他们扫视了一遍，发现他们都象他一样老朽，也象他一样成了多余的人。

“我们将尽一切努力，”在前厅，那位身穿家庭便服的总理紧紧握着他的手，“妥善安排您的事情。尽管您的行为是完全不可原谅的，不过作为一位专家，我可以说，事情不是不可挽回的。”他快活地挤挤眼睛：“对这样的事情，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啰。当然，您可以指望我们的帮助，譬如说，在退休金的问题上。我马上把这一点记下来。”

* * *

……现在，我们又回到我们居住的那条古老的街道。那里没有一个人影，连唯一的一盏路灯也没有亮。所有住户的窗户都透射出烛光。那些有弹洞的旗帜沮丧地、无精打彩地飘拂着。

“他们所以那样对待你，”斯哈伊博士太太难过地说，“大概是因为他们听说你在工人委员会上所持的态度。可是那也算是罪过吗？”

“他们怎么会知道呢？”

“到处都有告密者呀。”

老先生沉思着。

“问题的症结可能就在这里。从那以后，我想得很多：我作为常常受到那个党歧视的对象，我的发言是否过分出于人

道的考虑呢，或者我之所以那样说，是由于我已经把将来对我不利的一切因素置之度外，才变得勇敢起来。是的，对那件事得从两方面去考虑。请您不要生气，"他继续对我说，"今天晚上我不邀请您上楼打桥牌啦。我累了，明天早上还得早起。我要上城堡①去找主 教大人，请他为我过去的一个计划祝福。根据这一计划在民族与宗教信仰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家信贷银行，过去在农民中间，现在在集体合作社中发放贷款，它是非常有前途的。我会真心实意地承担起指导这家银行的工作。"

* * *

在家里，母亲对我说，她在斯哈伊博士太太上次拿来的一期旧的《社会》杂志上发现有老先生的一幅照片。我拿来一看，果然是他。斯哈伊·格若博士那时四十五岁左右，留着两撇英国式的胡子，看上去是一位容易叫人产生好感的男人，眼睛象孩子般清澈、明亮。照片下方这样写着：斯哈伊·格若博士，法学士舞会的赞助人。紧挨着他的照片，还有舞会的照片，再就是赞扬这个舞会的报导。这次舞会最轰动的消息之一——正如我们所知道的——是尊贵的大公爵夫人第一次把她的女儿、迷人的玛克托莲娜公爵小姐带来参加法学士舞会。斯哈伊·格若博士殷勤地接待尊贵的来宾。他向公爵夫人一一介绍了在座的女士们，其中就有斯哈伊·格若博士太太（那天她穿着绛红色的丝绒礼服，一头金黄头发，配上

① 指布达山上的居住区，这里建有许多古城堡，还有著名的国王王宫遗迹。

金黄色的皮鞋，风度优雅，漂亮极了）。大公爵夫人很随和地同贵妇们边走边谈，在她们簇拥下迈步走上台阶，朝金碧辉煌的大舞厅走去。玛克托莲娜公爵小姐同年轻法学家的领袖斯特尼茨·伊万共同为舞会剪彩。

“没有人来电话找格若大叔吗？”

“连一只狗也没有。”母亲边说边继续做她的编织活。“你知道他们老在盼的是什么电话吗？”

“我现在猜到了，”我把他们痛苦的冒险经历告诉母亲，“我几乎不相信他们会再找他。”

是的，第二天也没有人来电话找他。就这样过了十天。一天晚上，听完新闻广播以后，他们夫妇俩从楼上下来。他们带来一小壶煮好的咖啡，说是要同我们共享。老先生沉默不语，一个劲儿地用匙子来回搅拌着杯里的咖啡。他的妻子有时谈政治形势，有时谈编织活。后来，我把话题一转，问斯哈伊博士：

“事情办妥了吗？”

“什么事情？”

“上次您提的信贷银行呀。”

“我们去过主教那里，”他说，“上城堡去非常困难。那里有许多坦克……我不喜欢它们。已经有许多人在那里求见主教，因为主教大人正在同某个代表团谈话。”

“他知道格若大叔您找他吗？”

“我给他递进去一张名片。”

“后来怎么样？”

"他让人出来传话说，"老先生脸上的肌肉抽搐了一下，"不要用这种琐事去打扰他。何况……"他手里端着的杯子抖动了一下，有几滴咖啡洒在他的西服背心上，他的妻子急忙小心而迅速地替他擦掉。"他从来没听说过我的名字。"

从此以后，他再也不等任何人的电话了。

*　　*　　*

有轨电车通行以后，斯哈伊博士动身到郊区木材场去。他对无所事事、犹豫不决已经感到厌烦，更何况家里的食物也吃光了。他听说，在工厂和木材场正分发猪肉和鸭子。雨一直下个没完。那些有弹洞的旗帜和表哀思的缎带全被淋湿了。在木材场里，这儿站着一队人，那儿站着一队人。开头，老先生很纳闷，以为场里在罢工呢。可是，无论他走到那里，人们都亲切地跟他打招呼，同他攀谈，告诉他站到队列里来。办公楼变成了肉铺。有两个人在切肉，经理负责过秤。

斯哈伊博士静静地排着队。轮到他时，生产科长正好用一张报纸包一大块后腿肉。

"我可以要那块肉吗？"他指着那一大块圆鼓鼓的后腿肉问。

科长有些生气了：

"您不认为太多了吗？"

"那就要一半吧。"斯哈伊博士说。

可是，科长还是把整块肉给了他。随后，他又在木材场四处转悠，得知茨内尔太太逃到加拿大去了。雨还是淅淅沥沥地下着。大家都说，恐怕要等到圣诞节前后生活才会恢复

正常，不过现在已经出现这种迹象了。

回家的路上，他同曹尔柯一起坐的电车。

“您得做些工作，博士先生。”当他们面对面站在拥挤的站台时，曹尔柯开门见山地对他说。

“什么，您说什么？”

“您到哪个办公室去工作都行。”

“噢，”老先生轻轻地摆摆手，“我觉得现在这样挺好，我就留在我原来的工作岗位吧。我已经变成一只守夜的猫头鹰啦。猫头鹰，”老先生喃喃地说，“猫头鹰，这可是一个挺好的名字啊。”

*　　　　*　　　　*

过了许多个星期后的一天早晨，我们又在公寓门口碰面了。

“您是新教徒，对吗？”

“不，我是天主教徒。”我带着惊讶、好奇的心情回答他的问题。

“那就无须我多加解释啦。在我们家乡，当人们把死者装进棺材时，亲友们为他作祷告，唱赞美诗，焚香。等到钉上棺材盖，牧师就说：‘亚门’。——请您注意，现在我真的用猫头鹰淡淡哀愁的目光看到了这一切——然后人们就起灵到墓地去，把棺材放在两块木板上，用绳子把棺材坠到墓穴里。这时，亲友们又焚一次香，牧师再作一次祷告。往棺材上填土之前，牧师再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说：‘亚门’。这样一切就算结束了。”他顿了一下，问：“我想您现在大概明白

我为什么说这些话了吧？”

“不十分明白。”

“有那么一些死者，牧师对他们说的第二次‘亚门’毕竟迟了些。这种情况是罕见的，但必竟是存在的。”他哑然一笑。“比如我吧，情形就是如此。我得等到第十二个年头。现在总算听到了。”

他向我告辞，带着一副无精打彩的倦容，缓慢地走进屋里去了。

夏悦文　译

伊雷什·贝拉

温泉疗养院

〔**作者简介**〕 伊雷什·贝拉(1895——1974)，匈牙利著名小说家。青年时期即从事工人运动，积极参加匈牙利1919年苏维埃革命，失败后侨居苏联，曾任“无产阶级国际联盟”书记。1945年随同苏联红军返回匈牙利，参加匈作协的领导工作。他的三部长篇小说《喀尔巴阡山狂想曲》、《蒂萨河在燃烧》、《祖国的光复》反映和描写了匈牙利人民长达半个世纪的革命斗争。另外，他还著有《歌唱勇士与武器》、《轶事和故事新编》、《新酒》、《金鹅》等。由于他对促进匈牙利无产阶级文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曾两次荣获柯苏特奖。

一

罗兰·巴勒原定去斯洛伐克休养一个月，可是他在那所

谓上帝背后的幽静的疗养胜地只住了七天，便再也呆不下去了。现在，当他六十年来第一次去疗养时，并不想用自己终身从事的工作来搅扰自己的心境。他在这样设想的同时，希望在著名的疗养院会找到医治他一切思想烦恼的药方，或者至少尽量使自己深信会达到自己所预期的目的。他要去的这个上帝背后的疗养院，从前曾经名噪一时，现在也还有不少人知道它的大名。罗兰之所以选中这个地方，是因为他想起他那早已故去的祖父(著名内科医生)打发过许多患者到那里去接受矿泉浴疗法。

火车是在晚间到站的。罗兰从火车站换乘公共汽车，他到达旅馆时，天空已经一片漆黑。他住进旅馆的房间，打开手提箱，取出睡衣往床上掷去；这时，他突然想起，正是三个月前的今天，他接到给他办妥退休手续的通知书。

“魔鬼才会相信，可是现实毕竟是现实：人须要生活六十年才能理解三个月时间是多么的漫长。”

近几个星期以来，这句话已变成他的口头禅：人须要生活六十年才能理解……他这样说并不是想炫耀自己的学识或智慧，而是想斥责其他人的愚蠢、无知和不负责任。他自己也说不准，这些其他人具体是指谁，但他感觉到这种人是很多的，而且认为在他眼前出现的这种人象幻影似的正在迅速增长。

其他人……

二

罗兰很晚才入睡，醒来时感到全身无力。尽管他住的房间里两扇窗户中有一扇是整夜敞开着的，他仍然觉得室内早晨的空气跟一家三等咖啡馆牌室在深夜时的空气差不多。他从来没有到过这种牌室，从那里得出这种显然是过份夸张的对比，连他也莫明其妙。但是，不容他对此作过多的考虑，他很快又得为别的事情烦恼了。他住的房间不仅没有必不可少的洗澡间，连一个带水笼头的象样洗脸池也没有。他只好用一只古老的瓷盆盛水洗脸。这不由得使他想起他那位住在沙普隆的已故教母，还有她把在圣约翰节那天领到的圣餐当作最精美的甜食珍藏起来的情景。

罗兰从楼上下来，走到旅馆门口。还不到吃早餐的时间，他便仔细地端详起这座黄不黄、绿不绿的建筑物来。昨天晚上，他只来得及匆匆看它一眼：在灯光下，这幢房子显得比实际的要大些。一眼就可以看出，这座建筑物的墙已许久没有粉刷过了，由此可以得出旅馆是弗兰西斯·约瑟夫时代建造的结论；而事实也正是如此。现在，罗兰凭着他那具有四十年工作经验的工程师的眼睛，很快判断出旅馆建造的年代相当久远——墙上还留下许多后来每次修缮时添加的装饰的痕迹。这家旅馆的正式名称叫温泉疗养院。旅馆的门房是个上年纪的斯洛伐克人，脸刮得精光，会说匈牙利话，他证实了罗兰的这一判断。他看到新来的客人对这幢建筑物感

兴趣，便主动告诉罗兰，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柯苏特·拉约什①曾经在这家被称做治疗旅馆的温泉疗养院住过几个星期，接受治疗。五十年代初，一位叫鲍日娜·聂姆曹娃②的捷克女作家在这里住过六个星期。六十年代，蒂亚克·费仑茨③曾在这里作过暂短的停留。七十年代，米克沙特·卡尔曼④来这里疗养过两次。那时候，旅馆地下室设有澡盆，客人就在那里洗矿泉浴。现在已经另外建造一幢比旅馆本身还要大的现代化建筑，供洗矿泉浴的人们使用。

罗兰对于旅馆门房略嫌过长的解释并不太感兴趣；等介绍告一段落，他说了声谢谢，便离开这位乐于助人的门房。可是过了几分钟，他又转回来，把一张数字相当可观的银行支票塞到这位目瞪口呆的人手里。这次，罗兰先开口了：

“这家不幸的旅馆为什么建在两座可怜的小山中间呢?”

“正是这两座小山捍卫着温泉疗养院，或者说这家旅馆才得以不让高贵的客人受风着凉。不瞒您说，这一带经常刮风。这个地点是当时最著名的建筑师法朗士·赫威尔·里德尔先生亲自选定的，他考虑到避风的问题，才决定把旅馆建造在两座小山中间。”

---

① 柯苏特·拉约什（1802——1894），匈牙利1848年革命的领导人，民族英雄，政治活动家。

② 鲍日娜·聂姆曹娃（1820——1862），十九世纪捷克著名小说家。

③ 蒂亚克·费仑茨（1803——1876），匈牙利著名政治活动家。

④ 米克沙特·卡尔曼（1847——1910），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匈牙利著名现实主义小说家。

罗兰默默听着门房的解释。

他是第一次来到这一带地区的。在这之前，他只熟悉斯洛伐克的哥萨和塔特拉地区。尽管这里的山路纵横交错，他仍然觉得有把握不至于迷路，仿佛这里是他出生的故乡。十几分钟之后，他已经站在澡堂对过的那座小山的山坡上；至于那座澡堂，他已从为心脏病和神经官能症患者提供的说明书里看到过。说明书上的彩色图片并没有夸大这里的景色。山坡两侧，并排种着树龄还不长但已长得相当高大的菩提树，树的间距不大。树荫还没有把整个山坡遮住，这里或者那里露出一块块草地，在八月充足的阳光下，草地显得格外浓绿。半山腰上是一排排挺拔、墨绿的松树。从山顶往下看，只见枝杈交错，仿佛相互拥抱在一起。松树散发的清香犹如在光溜的斜坡上滑动，向还略有睡意的罗兰迎面扑来。以前，工程师对大自然的美景并不太敏感，无论是什么地区，对他来说首先考虑的是该地区的实用价值，尤其是作为桥梁建筑师，他感兴趣的是山丘和大山的自然条件。然而，眼前突然出现的景致不能不叫他摈弃职业的偏见，暂时忘却内心的委屈和痛苦。他张大着嘴，大口大口地吞食着松树的清香。就在这一瞬间，他猛然想起不知道是谁曾提出过这样的严厉批评：

“大自然不仅是慷慨的，而且简直是过份挥霍自己的色香。迟早它要为自己的轻浮付出代价的。”

罗兰觉得，在某种意义上，这个批评对他也是适用的。

三

他在餐厅吃了一顿丰盛的早餐。饭后——这是疗养院严格的规章制度——必须到医生那里去检查身体。在乏味的候诊室等待了半个钟头，他又陷入在家时预感到的那种状况：又变得忧郁甚至生起气来；使他更为气恼的是，那位德国血统的医生出于礼貌，费劲地用匈牙利语同他交谈，尽管他的匈牙利话讲得非常蹩脚。当罗兰冷冷地告诉医生，他本人精通德语时，医生便闭上嘴，不声不响地为这位粗暴的病人足足检查了一刻钟，只是偶尔才对病人说一两句简短的话，当然，讲的还是匈牙利语：

“不要呼吸！……请不要动！……把手伸直！……他们说您今年六十岁，是吗？”检查结束时，医生终于讲起德语来了。“从您的体格、心脏和肺部的情况看，您连四十岁都不到。噢，我忘了问。您是已婚吗？”

“我是单身汉。”

罗兰是个性情孤僻的人。在匈牙利或者在这里（斯洛伐克），要是有人把医生的看法用匈牙利话告诉他，他最多点点头，或者干脆不吭声以示回答。可是现在他面对的是一位说外国话的陌生人，罗兰不认为自己有义务保持沉默，强制自己不吱声了。

“您说我还不到四十？可是他们却把我当作一头丧失劳动力、不中用的老驴给撵出来啦。是的，就象撵一头老驴那

样。”

医生对罗兰这种感情的突然迸发感到十分吃惊。

“把您撵出来？”医生诧异地问。

罗兰不回答医生的问题，只是把手伸过去给他，表示不希望医生再追问下去。医生也不想知道更多的情况。他毕竟是内科而不是神经科大夫呀。

“如果您感到不舒服，”告别时医生对罗兰说，“需要什么药品，镇静剂或者维生素……”

可是，罗兰什么药物都不需要。

四

罗兰走出诊室，信步漫游。他知道旅馆位于山谷中间，便选择一条羊肠小道往山脊走去，站在草地彩色斑烂的斜坡上，眺望不远处一条闪闪发光的河流。

“是的，是的，我在书上读过的。我读过的，可是想不起来了。让我再想想，噢，想起来了，这就是柯罗姆河！”他在喃喃自语。

无论他往那里看，都产生一种浪费的感觉：一切都过于富丽了。即使闭上眼睛，仅凭嗅觉也能闻到大自然是多么挥霍无度。看来罗兰被整个温泉，包括周围的景致迷住了，唯独忘记一个地方，那就是分配给他住的旅馆。

他回到他住的房间。房间还没有打扫。里面迷漫着从墙上散发出来的浓重的潮气。他正为想不起一首诗感到气恼，

竟然没有留意呆在房间会妨碍清洁女工清扫。

“我需要工作！”

在布达佩斯，他就这样决定了。关于他的问题绝不仅仅是个人之间的冲突（尽管在某种意义上说，他成了某些人的牺牲品），象莫勒纳尔·伊斯特万代表在国会上谈到类似的问题时指出的那样，是个原则性问题，它涉及到维护集体利益，性质是严重的，也是最清楚不过的。因此，他认为对部里的决定不能表示沉默，必须起来与之抗争。他没有别的抉择。他要再次穿上明盔亮甲，堂堂正正地去战斗。他把全部问题重新想了一遍，终于同意先前的决定：把事情发生的经过及其矛盾写下来，这样做当然不是出于说明自己的正确或者要求恢复自己工作的权利为目标的。“就这么办！……我认为这是关系到集体利益的原则问题。”

在最近一些日子里，集体利益这个词象提到他是六十岁一样，常常挂在他的嘴边。其实，他并不是一个社会活动家。他既不是共产党员，也不是反共产主义分子。罗兰只不过是一个专家。但是，在我们的时代，集体利益已成为人们为之奋斗的明确概念。在霍尔蒂时代，通过父亲和姐夫的关系，他找到工作，可是从来看不到工作的成果。他老在设计，却没有一项设计能变成现实。一九四五年以后，他接受了真正严肃的工作，不仅能享受到进行设计，而且也能享受到设计变成现实所带来的欢乐。因此，他成了这个制度的信徒，尽管他从来没有对任何人谈到过这一点，连对自己也没有说过。只是关于世界观方面的讨论会使他感到厌烦。尽管

如此，解放后不仅有设计，而且也在建设——这使他为之振奋；一项工程尚未竣工，又要进行另一项新工程设计了——这是他亲眼看到的。正因为如此，他才满怀喜悦地工作。他孜孜不倦地工作，而且任务完成得很出色。工作中当然也遇到过一些令人烦恼的事情，可是这些跟整个事业相比简直是微不足道的。罗兰可不是爱在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上纠缠不清的人。

他一向沉默寡言，即使他的意见是对的，也不愿意张扬，总是孜孜不息地为新社会工作。他生平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被推到前台，是在一九五六年十月间。他被选为公司的所谓革命委员会主席。其实，他并没有担负这一光荣职责。他几乎有两个星期没有去上班。然而在十一月中，当工农革命政府开始新的建设工作时，他却作为第一个非党主任工程师出现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他这一行动不但对工程技术人员和公司职员，而且对工人也产生很大的影响。

罗兰体魄健壮，属于那种四十岁左右两鬓便开始斑白，干瘦，脸刮得精光，看上去象个老人，而从四十到六十岁却没有多大变化的人的类型。到了六十岁，由于他善于使用自己的精力，干起工作来同二十年前差不多；加之工作安排合理，看来他比四十岁时还能承担更多的工作。他的工作能力是得到充分证明的：他能够利用较少的工作量做出较大的成绩，而且能正确地调动别人的积极因素。这些在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二月间是得到证实了的。一九五七年春天，人们推荐他担任某公司的经理，他却恳求不要让他离开他熟悉和

喜爱的工作岗位。当埃及政府购买他设计的一项工程图纸时，上级本想派他去领导完成那项建桥工程的。对于这一荣幸的使命，他婉言谢绝了。

罗兰留下来了，他要用自己的劳动在布达佩斯积极参加恢复工作，挽回由于反革命事件造成的损失。当这方面的工作基本完成后，他接受了一项相对来说微不足道的任务：在蒂萨河上架设一座新桥的设计。这项任务不是上级指派，而是他主动要求承担的。正如一位古代诗人在诗中引用石匠克莱门的妻子为建造布达城堡付出血的代价这一传说那样，罗兰也把自己的心血全部倾注到这一设计中去了。罗兰并不喜欢这种对比（毕竟不是学生时代了），在交出设计图纸时，只是这样说：

“我承担一切责任。我承认我为这项工作感到骄傲。这是我一生中完成得最好的工作之一。”

设计的确是出色的。要是按照这项设计加紧架设新的蒂萨桥，会给罗兰带来终身的荣耀。年轻的工程师们也可以从中学到许多东西。可惜这座桥始终没有建起来。评议设计的部务委员会赞赏并高度评价罗兰的工作，还建议发给这一设计的工程师以最高金额的奖金，可是却决定采用从各方面来看都较为逊色的另一设计方案。罗兰一听到这个决定，头一分钟的反应与其说是吃惊，毋宁说是震惊更恰当些。可是再过一分钟后，他就不怀疑如果他向部长或者任何一位副部长提出申诉，必然会得到满意的答复。

部里的一位副部长本人也是工程师，比罗兰晚一年获得

文凭，同罗兰相识也有四十年了；他了解全部的建桥设计，尤其熟悉罗兰的设计。他简直被罗兰的工作热忱深深吸引住了。可正是这位副部长肯定了部务委员会的决定。他坦率而坚定地说出了自己的意见。这使罗兰感到非常突然，差一点失去了自持力。罗兰几乎脱口说出这样带控告的话语：当然，您们宁愿要一个共产党员的坏设计，也不要一个非党工程师的好设计。可是，话刚到嘴边，他才想起莫勒纳尔·伊斯特万，被采纳设计方案的设计者本人也是一位党外专家。想到这里，他的气消了一些；可是嘴里不说，心里还是深信：这一决定是建立在不正确的干部政策基础上的，他们宁可不要有经验的老工程师的设计，而要一个年轻工程师的设计，尽管他们明知前者的设计方案是优秀的。

"我相信，无须强调，部里清楚地知道罗兰同志的知识对我们具有多么重大的价值。今天，我们部里几乎没有比您更出色的专家。虽然大大超出了原定的预算，设计方案本身证明……"

"但您们却采纳了别的方案！"罗兰发火了。"虽然您们知道莫勒纳尔设计的桥顶多能使用半个世纪，四十、五十年后，桥本身因超过使用年限而不得不拆除。而我的桥，如果建成的话……"

副部长给罗兰以正确回答：

"罗兰同志，您刚才是说那座桥能使用半个世纪？我不敢担保它能使用那么长时间。那座桥不可能使用五十年，而且也没有必要让它在那里呆上五十年嘛。那座桥应该又快又省

地架起来。我要强调的是，我们决定采用的方案不仅可以省钱省工又省料，而且蒂萨河流域地区工农业的发展也要求我们把新架设的桥尽早交付交通部门使用。按我的理解，桥的迅速建成将大大减轻运输上的压力，从而给这一地区带来明显的繁荣。这就是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五十年后又会是什么样子呢？我认为在这一点上我们的意见是一致的，就是说，五十年后货流量势必要比今天大大增加，交通工具也会是另外一个样子。可以设想，一座现在看来可以减轻交通压力的桥，用不了五十年，只要二十年或二十五年以后，它不但没有帮助，反而会成为障碍。既然如此，我们今天又何必建造一座工程更艰巨、造价又高，看上去虽然美观，二十年、顶多二十五年后就要成为障碍的桥，而不采用莫勒纳尔既便宜又可以迅速架起来的桥呢？再说，二十年后在蒂萨河上架设一座桥意味着什么？可以这么说，到那时，架设一座桥所花费的工作量不会大于今天缝一个纽扣。那时建造一座桥的费用也不会超过今天看一场电影所花费的钱。”

“总之，在我们今天社会主义建设时代搞的建筑只考虑短期使用就行了，不用提倡什么百年大计啦。”

“这是什么话，罗兰同志！您知道得很清楚，我们在建设城市，新的城市，引进新的工艺，创造一切永恒的……您也知道得非常清楚，我们首要的不朽的工作是使新社会的发展更为顺利。或者我们可以这样说：我们要建立新的工作关系，在人与人之间建立一种崭新的、比迄今为止更加融洽的新型的关系。”

“要是部里的领导愿意用世界观、辩证法或者别的类似想法弥补数学和几何图形的话，那么……”

“那么怎么样？”

“如果我说我对这个决定表示高兴，那我是在撒谎。不过您可以相信，副部长同志，我感谢您对我毫无保留的谈话。我现在至少知道我该做些什么了。”

“您应该承担别的工作，新的工作。”

罗兰对副部长语气坚定而友好的话不予理睬。他甚至连那位态度和蔼、面带微笑的女秘书端来放在他面前的咖啡也不去碰一碰。

第二天，年轻工程师莫勒纳尔登门向他请教工程方面几个重要的细节问题。罗兰却建议他找某个热心的专家去讨教。

一个星期后，部里通知罗兰，准备在重建布达佩斯伊丽莎白桥工程处为他安排重要的职务。那里的工作非常需要他。他给部里打了一个书面报告，说明他不适宜担负这一重任。接着，他又回绝了为他安排的两个重要职务。于是，那位曾经就拒绝采用他的蒂萨河桥设计方案同他进行过辩论的副部长便打电话约他到部里去面谈，罗兰又以有病在身推辞掉了。

十天以后，他退休了。部长会议——考虑到他的功绩——决定给予罗兰高额的退休金。

五

罗兰从手提箱里找出两个从布达佩斯带来的笔记本。一

个本子上记满了关于他自己和莫勒纳尔设计方案的资料，另一个本子却是新的：他准备把这桩事情的教训写在上面。他担心最清楚不过的论证也说服不了那些被混乱的理论引入歧途的人们。可是一个人即使确信斗争几乎是毫无希望的——在某个时刻里甚至是徒然的——也应该为集体利益，为真理而去完成自己应尽的义务。

他坐在那里对着打开的笔记本沉思片刻。他回顾自己漫长的一生，自己的奋斗、期待和失望。值得继续奋斗下去吗？人们已经给他提供过宁静生活的可能性。值得放弃这种宁静的生活吗？

他倏地站起来。

"这是我的责任！"他叫喊着回答那无声的提问。"我要履行我的义务。"

房间还没有收拾好，他便坐到那张铺着丝绒桌布的旧式桌子旁，伏在那个空白笔记本上挥笔疾书。

抱有乐观主义态度的人，在生活里不论遇到什么不如意的事，总能找到慰藉。可以举几个例子：不愿意流血的死囚，人们把他送上绞刑架；赞赏英雄骑士时代的死囚，人们用剑或者刽子手的大刀结果他的性命；了解现代科技全部威力的死囚，被推上电椅坐着死。在我漫长的生活过程中，我认识不少真正抱有乐观主义态度的人，可惜他们全都有这样或那样的小缺点，我在他们身上同样能找出毛病。如果悲剧不是发生在他们身上，而是找上他们的邻居，我所认识的这些抱乐观主义态度的人总是抱无所谓的态度。

他把写下的重读一遍，觉得不满意，便把写下的这一页从本子上撕下来，揉成一团，又把纸团摊开撕碎，因为在房间里找不到字纸篓，就顺手把碎纸片塞进自己的衣服兜里去了。

"瞧，我竟成了文学工作者啦。别人已经吃饱，我还在细嚼慢咽呢。"

罗兰对作家的印象非常不好。有一次，他在某个堤坝建筑工地工作，有两名作家在他那里呆了几天，他亲自领他们去工地，向他们讲解工程的进度，还让他们深入到工人中间去了解几个重要的工程项目。可是他们回去以后，一位作家什么也没有写，另一位作家写了点关于堤坝建设和建设者的报道性文章。作者把这篇东西寄来给他，他把文章从头到尾读了一遍，发现里面提到的事没有一桩同工地的工程师有关。从此以后，他很瞧不起作家，觉得他们不讲求实际。所以，当他现在把自己比作文学家时，他是想借此作严厉的自我批评。他懂得，如果一个人想完成一项严肃的工作，首先必须学会在公共事务中表现出个人的热忱，甚至必须成为一个狂热分子，可是如果公共事务同个人私事搀和在一起时，就得强迫自己保持冷静。这一点当然是容易理解的，不过……

"我关心的是，不让任何人指责我怀有偏见，或者说我在任何事情上更多地考虑自己的利益。"

罗兰把笔记本合上，往手提箱里一塞，走出房门散步去了。

离开旅馆，走了几分钟，他便来到一个小小的人工湖旁，

湖中央一座不大的孤岛上站立着一对白鹤。不仅那些站在湖边观看的孩子们扔食物给这双体态娴雅的飞禽——大凡鹤对糖果类食品是不感兴趣的——，公园的一位工作人员也从篮子里掏食物喂它们；他把许多青蛙和一寸多长的小鱼扔到水里。白鹤有了可供挑选的食物，竟然也变得挑剔起来。它们挑选了最合口味的青蛙和小鱼，衔在嘴里飞走，八成是带回去喂小鹤了。它们的窝一定筑在离这里不远的地方，因为过一两分钟后，它们又飞回小岛，单脚独立，神态孤傲而高贵，看来它们对还能得到所需的食物并不怀疑。

罗兰注视着这一对白鹤足有半个小时；他自己也莫明其妙，为什么这对飞禽会引起他的兴趣。几个星期以来，他一直企图把他的所见所闻和切身体验全收罗来证明自己的正确。当他意识到眼前的小湖、孤岛、两只大鹤以及许多青蛙和小鱼既不可能或者至少很困难同他自己的事情联系上时，不免生起自己的气来；因为这分散了他思考问题的注意力，而他自信是能够找到问题的答案的，于是，他转而迁怒于那对鹤了。

“你们确信是你们给人们捎来孩子吗[①]?!你们错了!”

罗兰不免有点气恼地转回旅馆。餐厅里摆着每张可供四人进餐的小巧玲珑的餐桌，他的邻座是个年轻人，介绍自己是建筑工程师。罗兰故意只告诉他自己的姓名。不料这位邻座是个非常好奇的人，经他再三打探，得知罗兰也是工程师时，变得非常高兴，从他那双玳瑁眼镜后面的淡灰色眼睛里

① 在匈牙利民间流传白鹤送子的传说。

放射出兴奋的光芒，打开话匣子滔滔不绝地对罗兰说开了；他说他是四年前才获得建筑工程师的文凭，已被委派去完成过重大的工程建设项目，而且就要作为领导人之一，负责在这个疗养地兴建一座新型的大旅馆。

“旅馆将拥有两百六十四套房间，每套房间都有浴室和小阳台。楼下是餐厅，有现在这个餐厅的四倍大，当然还有会客室……亲爱的同行，您认为怎么样？我个人认为那将是一家非常漂亮、舒适的旅馆。”

年轻工程师的热忱感染了罗兰，使他的情绪显然好多了。这在他是罕见的。可是由于年轻工程师没完没了地夸耀自己从事的工作，使罗兰又变得烦躁起来。

“我的同行，您还年青，”他带着教训的口吻说，“为自己的创造感到幸福，这是可以理解的美好思想。然而等到您懂得，人干了一辈子工作，到头来被当作一头老驴，或者说正因为干了许多工作才正式被当作老驴……噢，我并不想给您的工作热情泼冷水。说真的，这不是我的本意。不过，要是一个年轻人不知道自己美好、出色的工作的最终结果是什么，也许会更好些。”

年轻建筑师的好情绪并没有受到影响。他望着罗兰，与其说是对他感到失望，莫若说是惊愕。

六

人的智慧是值得赞美的。它能使一切问题得到回答和解

决。人们总是认为，通过劳动取得成绩是很自然的，可以理解的，不仅嘴上是这样说，而且也相信好成绩应该、也会得到承认和奖赏。人在事业上没有成就——在历史上，在技术、自然科学和文学史领域都可以举出成百、上千个例子——是因为同时代人不承认他的出色的工作。同时代人总是喜欢低廉、肤浅、昙花一现的东西，可是后代人呢！……是的，真正优秀的工程从来不为同时代人，而是为后代人准备的，真正伟大的作品只有从后代人那里得到承认和赞扬，并获得声誉。凡是有时在这里获得成功，有时又在那里遭受挫折的人，他的观点也会随之发生相应的变化。是的，人的智慧大概只存在于那些完成了创造性工作的人们头脑之中，智慧是他们真正的智力正常发展的产物，因为他们从不怀疑他们有能力去完成创造性的工作。但是，对他们来说——应该具有一种自我欺骗的哲学观点，那就是容忍——不可能期望人们对他们的创造性工作表示出同自己一样的重要意见。罗兰也懂得这种自我欺骗，可是自我欺骗无法使他得到自我满足。每当他向自己撒谎时，总觉得自己的设计方案好象在计算上存在某种错误似的。至少他可以这样欺骗自己：他为做出成就奋斗时，是把个人利益同集体利益融合在一起的，或者象他常说的那样，是同真理融合成一体的。为真理而奋斗会得到什么结果，对此他并没有准确的概念，但有一点是清楚的，那就是他相信他现在也是在为真理而奋斗。

这两三天来他一直在考虑如何办的问题。如果纯粹为了建桥这件事批评部里的决定，他可能会被人讥笑，因此，千

万不能纠缠在具体问题上，必须提出一个关系到未来的、一般可行的长远方案来。在这几天里，他食欲旺盛，经常出去散步，美中不足的是晚上难于入眠。罗兰去找那位会讲几句匈牙利话的德国血统的医生，问他要些镇静剂。医生给了他安眠药。药物很管用。借助安眠药他晚上能入睡了，可是第二天早晨醒来时感到疲惫无力。他又去找医生要兴奋剂。这次他拿到的是咖啡因。现在他就是靠这两种药物过日子。晚上服安眠药，早上服咖啡因。要不细心观察，还会以为他没有什么心事呢。其实，现在他脑子里正在收集、积累和整理为实现真理的许多论据。有时，他会一连几个钟头注视着那对白鹤。而对那幢已破土动工的旅馆，他却远远地绕着它走。不过即使是离得老远，他的眼睛也仍然老盯着工地。

罗兰同年轻建筑师一天要碰上几次面，建筑师对他总是那么友好，主动跟他搭讪，而且永远是那么热忱。当局给予建筑工程以一切帮助和支持，还大大赞扬了建筑师一番。

"说真的，我们没有什么可抱怨啦。所有的人都赞扬我们建筑师在完成一项杰出的工作。"

"赞扬，"罗兰回答说，"赞扬并不说明工作一定是好的。"

年轻建筑师默默无言地注视着他的同桌人好一会儿。现在，他脸上第一次失去笑容。

"成功，"罗兰再次说，"成功并不能说明工作就一定是出色的。"

那位戴眼镜的年轻建筑师好一会才回答，但他的回答是那样尖锐，不仅罗兰，连他自己也吃了一惊：

“可是失败也不能说明工作是优秀的呀。”

七

罗兰在温泉疗养院呆到第六天，早早吃过晚餐，立刻回到房间。房间里仍然是那么潮乎乎的。他在房间里来回踱了一会儿步。

“我准备好了。一切我全仔细考虑过了。我得动手写啦。”

他从手提箱里把那个特意从布达佩斯带来的笔记本找出来，拧亮台灯，顺手拿起钢笔。

他先是在头脑里简要地重复和明确一下那些他现在准备加以驳斥的论点，然后才开始动笔。

“不考虑费用和物质条件，空谈十年或者一百年的工程是没有意义的……唔，总之，建造永久的工程是没有意义的……同志们只愿意承担一些使用十年左右的工程项目。那些建筑到时候不仅没有保留的价值，反而会阻碍生活的发展。”

写到这里，他觉得从窗户照射进来的月光妨碍他的视线，便把窗帘放下。

“这种论点还认为，搞永久性的工程需要更多的物资、钱财和劳力。在二十或者三十年后，那个我们现在以我们工作成果使之变得更为富裕的社会，将会以比我们现在更新的科技去搞建设；同样的工程项目，那时候的进度将比现在迅速得多，人们的劳动也会轻松得多……要是我没有记错，副部长说的大致是这样：到那时候，在蒂萨河上架设一座桥梁比

今天缝一个扣子要简单得多，费用也不会比今天看一场电影花的钱多多少。妙极了，我首先必须清算这种观点。”

罗兰放下钢笔，站起来在房间里足足来回走了半个小时，又把这些天来收集的论点在脑子里再加以整理和系统化。这是一桩困难的工作。在辩论时，论点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可是现在当他把自己的论点放在天平上称一称的时候，不免对这些论点能否说服那些否定他的设计方案的人产生怀疑。

“管他呢。反正我要履行我的义务。”

他一口气写了两个小时。他写得那样流畅、轻松，对自己的看法似乎没有半点怀疑和踌躇，反而象是有谁在催促他快点写似的。

他写了满满半个本子。然后他把身子靠在椅背上稍事休息。

“我要把这些全都告诉他们，明白无误地告诉他们。”

他大声地把自己的这个想法说了出来。但意外的是——他自己也觉察到这一点——，他说话的声调表明他并没有充满必胜的信心，相反却包含着某种勉强、陌生的东西……。

“我必须推倒的第二个观点大致是这样的：我们最重要的任务是促进新社会、新技术的进一步改革；到那时候，人们要搞一项比现在更大、更漂亮、更吸引人的工程，是很轻松的，简直就象孩子玩耍似的，这也必然使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在建设规模上大大地超过资本主义国家。他们要使我相信，我们今天的建设主要目的在于促使那样一个新的社会的产生和巩固……如果一位工程师考虑的不仅是数学方面，

而且……要是想把桥梁建筑师和工厂建造师的注意力转移到去谈论辩证法，那么……这跟我有何关系呢……我从何知道，而且又有谁会知道我们的子孙如何建设和建设些什么呢？”

他又在房间里来回踱步。往前走四步，又往回走四步，步伐愈来愈快。直到他感到疲乏了，才坐回到桌子旁。他拿起笔想继续往下写时，先把刚才写的念一遍。他连着念了两遍。然后他合上笔记本，把一直握在手里的钢笔放回桌子上。几天或者说几个星期以来，他已经习惯于独自一人自言自语，进行自我争辩，责备或者肯定自己的想法和应做的事情，用准确的构思和语言阐明自己的观点。然而现在他却沉默了。他站起来，又在房间里踱步。这一次，他的步子非常缓慢。走动的时候，他似乎显得有点驼背。总之，对自己和对别人的意见，他都没有讲出来，仿佛他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似的——看来，他是尽量不去考虑。不错，一个人要是不愿意思考了，他的脑子也就不会想出什么东西来……

罗兰迅速脱掉衣服，吞下比平日多一倍的安眠药，然后把灯关上。

第二天他醒来时，已经很迟了，早晨已被中午所代替。他看了看表，第一个念头是：“我错过了早餐。”

他起床后，第一件事是精心地把脸刮得又光又亮，盥洗完毕，便把昨天晚上他睡下前放进箱子里的笔记本取出来。在这个笔记本上，昨天晚上他足足笔耕了两个小时。现在，他连看也不看一眼上面究竟写了些什么，便把本子撕了。

“这里连个字纸篓也没有，那就让魔鬼把它带走吧！”

他顺手把碎纸片往兜里塞。然后又把装在两个玻璃瓶里的安眠药和咖啡因(近日来它们已成了他的好朋友)全找出来，倒进用过的洗脸水里。

“如此而已!”

罗兰去找那个门房，向他打听开往布达佩斯的下一趟火车什么时间开。

“那么我还可以散一小会儿步。以后一段很长时间我不会有这种机会了。请您代我订一张二等车厢的车票。”

“怎么，您要走啦?”门房颇为惊讶。

“有件要紧的工作在等着我。噢，是的，我到这里的第二天，您曾经向我提起并列举了上个世纪都有些什么著名人物在这里住过，请您再把他们的名字告诉我，好让我回到布达佩斯后也能向别人谈起。”

旭遇桢　译

沙可尼·卡罗伊

一所陌生的房子

〔**作者简介**〕 沙可尼·卡罗伊(1931——),匈牙利著名小说家兼剧作家,获匈总工会文学奖和尤若夫·阿蒂拉文学奖。曾任匈牙利民族剧院专职剧作家。在他的小说和剧本里广泛地反映了人们的社会道德、个人与集体、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等问题。他著有小说:《天空彩云朵朵》、《在城市上空》、《男人们》、《陶瓷宝宝》、《我宣布我过得不错》、《人的祝贺》;另外,他还著有剧本:《约卡,我的生命》、《魔山》、《播音中断》、《香港的假发》等,其中《播音中断》已在许多国家舞台上演并获得成功。

这样的房子只有在英国电影里才能见到。那是一座厚实而坚固的建筑,前门的两旁有古希腊科林斯式的圆柱,房子的门牌号码在门楣的角上——用油漆写在水晶玻璃上的8

字，每到夜晚路灯照在上面的时候，就象猫眼一样发光。轻便运货车灵巧地停下，车的尾部正好与前门平行。司机马上从驾驶座跳下来，问是不是需要他帮忙，在我还没有来得及开口之前，我的伙伴们已经谢绝了他的自告奋勇。“不需要了吧。他敢厚着脸皮要一百福林小费的。”南迪把话从牙缝里挤出来。我们跳到人行道上，这时雷吉娜也从驾驶室下来，上楼去把我们的到来通知女房东。那是星期一上午，天还比较早，秋日的太阳只照到坐落在这条狭窄街道的房子的最顶层。天气已经转凉。我们放下货车的后挡板，我站在地上接应。马雷尔和南迪把很沉的雕花衣柜和当中有个窟窿的长沙发使劲往车后拽。然后马雷尔从车上跳下来，我们先搬下衣柜，吃力地把它抬进通风的、黑洞洞的门里，接着再去抬长沙发。这就是说我们已经把大件的搬下来了。车上只剩下几只篮子、几个硬纸盒、一张细长腿的牌桌、一只箱子和裹在灰方格布包袱里的床上用品。

马雷尔和南迪一直在忙活，好象他们是在扛自己的东西，或在干计件活，好节省时间少付点车费。“付钱去。”车子一搬空，南迪就说。司机坐在方向盘后填表格，因为少挣了几个钱而阴沉着脸。他把铝板垫在方向盘上，在夹着复写纸的纸上写了老半天。我给了他三十福林小费，他还嫌少。我倒不太介意，不过这总叫人有点憋气。他收下钱后只是爱理不理地嗫嚅了一声再见，便开车走了。我是诚心诚意给他三十福林的，当然不愿意让自己因他没有说声谢谢而烦恼，不过心里多少还是有点不好受。

“对他们你得留点神。”南迪说。“他们可会敲竹杠哩。”他冲着房子把大拇指一挑，“这地方不错吧，啊？正好在市中心——找不到比这更好的地方啦。”

“你们是不是跑了许多地方才弄到的？”我说着，扫了这座又高又大的灰色建筑一眼。

“是跑了不少地方。”南迪说。他是个很壮实的小伙子，和我同年，力气很大，一头又短又粗的金发一根根立着。他是我们厂足球队的中锋，不论是在车间干活或在街上走道，他都象在球场那样风快，灵巧。雷吉娜见过女房东后刚从楼上下来，她身上的松绿色风雨衣在门口闪烁。风雨衣的腰带安在腰下，这是眼下最时髦的款式，而她在婚礼那天做的发型还没有走样，只有一两绺头发散落下来。这正是我喜欢的模样。一条很轻的毛绒绒的围巾在她脖颈上来回飘动，她整个的膝盖裸露在短裙和风雨衣下面。她漂亮得叫人见了就发狂。

“咱们可以把东西搬上去。”她说。

我用一只胳膊搂住她的肩膀，就在那里，当着我两位朋友的面亲吻她。他们都笑起来。马雷尔也笑了，用他固有的粗犷的方式笑，而他脸上唯一的几道皱纹是他眼角上友善的鱼尾纹。我很高兴连他也笑了，这说明他也喜欢雷吉娜。开头他是不喜欢她的。有一天下班以后，我在“小骰子咖啡馆”第一次把她介绍给他们认识的时候，他只是久久地打量着她，一句话也不说。南迪则不然，他同雷吉娜聊起来，同她开玩笑，近乎在追求她，当然我并不吃醋，因为我们之间的友谊是非常牢固的。我很高兴南迪也喜欢我爱的姑娘，可是马雷

尔的沉默使我很懊丧。第二天，我在车间问他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问了他三遍，末了我只好对着他的耳朵吼叫——这在我们车间并不是什么异常现象，因为电锯、磨床和刨床都发出刺耳的噪声。过了好半天他才开口。“山约，我说不准这姑娘是不是你合适的对象。”他说。我大吃一惊，可是我总不能对他说出类似“这同你什么相干”的话呀，因为在我来说，马雷尔几乎象是我的父亲。是他教会我上机床干活，他和南迪把我视为朋友，而且这三年来我们就象一家子，不论是在车间，在外头布置橱窗，在城市公园搭展览棚或到市郊原先的赛马场跑道上锻炼，我们都分在同一个班组。我虽然什么也不能说，但他这话却很伤我的心。我很纳闷，就凭她的美貌和迷人劲儿，加上我们又已如此相爱，他也不该不赞同我和雷吉娜好呀。南迪准把我的想法告诉他了，因为过后他向我走来——当然不是当天——很滑稽地把我的贝雷帽①拉到我的额头上。“你知道，山约，”他说，“爱情是两个人的事。你不用为我发愁。”这仍然使我在一段时间里心中很犯嘀咕。尤其是一想到他说这番话的意图是什么，我不用为他发愁指的又是什么，以及为什么雷吉娜不是我合适的对象等一系例问题，我更是心事重重。他一直试图使我忘记那次谈话，而且每次见到雷吉娜，除了不太同她说话之外，对她倒很友好。至于我和雷吉娜，不论我怎么翻过来复过去考虑，总得出我们是很般配的一对的结论。我们对任何事物的看法都很一致，我们

① 一种扁圆的无沿帽。

能连续接吻几个小时，或者在僻静的地方偎依着坐在长凳上，对生活有着完全相同的向往。后来，当事情发展到非办不可的时候，我们订了婚，他们俩，马雷尔和南迪，给雷吉娜买了一把很时髦的长柄伞。马雷尔在“小骰子咖啡馆”亲手把伞交给她，而且请我们吃奶油冰淇淋的也是他。

因此现在我便细心观察起他的表情来，看看他是不是喜欢雷吉娜，我发现他对我们俩都喜欢。我说：“你们真够朋友。”我的眼眶里噙满泪花。“他们真够朋友，对吗，雷吉娜，瞧他们给咱们弄的房子，还帮咱们搬家……”

南迪用脚踢着一张纸片以掩饰自己的慌乱。马雷尔哼哼两声说，我们最好把东西搬到楼上去，因为很快就要到正午了。马雷尔比我们年长，有妻室，还有两个孩子，不过年龄的差距并不影响我们之间的友谊。他身体很单薄，头发已经开始灰白，老戴着一顶方格鸭舌帽，把半截香烟插在樱桃木烟嘴里抽。

“这就行了，老伙计，”我说，“你们两点还得去上班呢。这些东西就放在这里算啦，我和雷吉娜呆会儿再慢慢往上搬。你们已经累死了。”

“你和雷吉娜？”南迪说着，笑起来。“你可真逗。是先抬衣柜还是别的？你说吧，现在你是头。”

于是雷吉娜留在门口看着其他物件，我们动手搬衣柜。

“嘿，等一等！你们从没听说过肩带吧？”马雷尔说着从宽大的外套兜里掏出一个打着结的织物来。他们不让我扛，因此我只能帮他们扶着衣柜来到三层。那是一个雕花的老式

衣柜，上面镶嵌着镜子。南迪在楼道的第一个拐角处吸了一口气，冲着楼底下的雷吉娜喊："亏得你爹没有用大理石雕刻这该死的大家伙！"这只不过是一个玩笑，既简短又纯洁，不过你得习惯南迪爱开那种玩笑，可是我却发现雷吉娜脸有愠色。南迪当然没有觉察到，他又吸了一口气。朋友们都知道这些家具是我岳父给我的。"我一有办法就另买一个。"我对南迪说。

"废话。"我们走到二层楼梯平台的时候，他嘴里还在嘟哝。"到那时候我们早把这大家伙扛到三层了。"

我们都汗流夹背。上岁数的女房东站在门厅里，肩上披着披巾，因为我们把两扇门都打开了。

"小心墙！"她焦急地说。"千万小心，这是夏天才新上的漆呢……"

她象城里的鸽子，闲得没事，满屋子转来转去，而且她也同那些身穿蓝灰色衣裙的女人一样，胸脯丰满，不停地眨巴着黄豆大小的眼睛。穿过厨房才能进女仆的房间。这实际上是我第一次亲眼所见，因为朋友们在我婚宴上宣布把租赁房子作为礼品送我时，只把房间的模样略略告诉了我。房间虽小，看起来倒是一个很舒适的地方。地板油漆成深褐色，窗户朝院子开着。我们把衣柜放好以后，南迪站在房间中央，边喘气，边擦去脸上的汗珠，带着赠品人的快乐微笑，问："这房间还行，对吗？"

这时候我才发现心里有点事，其实这事我早些时候就知道了，在婚礼那一天，甚至在婚礼之前就知道了，我只是尽

量不去想它罢了。我对考虑那件具体的事没有一丝一毫的愿望，每当那事出现在我脑际，我便一再对自己说："什么都还没有发生，我得设法处理这事。"其实我深知自己无能为力，这就是为什么我不去想它的原因。见到南迪站在我的面前，满头大汗，而且很愉快，我便觉得那件使我痛心的事似乎未必会是真的。

"你们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好的朋友，"我说，"我永远也无法报答你们……"

南迪变得严肃起来，说：

"你再拍马屁，看我踢你屁股一脚……你知道，这又不是两居室、独门独户的单元。"说着，他摊开两臂。

"两居室，又是独门独户？"我说。"有这种好事？"

听我这一问，大家都笑起来。南迪搂住我的肩膀，我们又下楼去搬剩下的东西。我再次想到我们之间的深厚友情，我该多么感谢南迪和马雷尔——想当年是他们给我谋到一个职业。而这过去的三年……！是马雷尔第一个领我到讲究的裁缝铺做身象样的衣服，我在他们家过的第一个圣诞节……星期天，我们去为南迪的球赛加油，看完球赛的晚上一同去喝啤酒……现在又费那么大劲为我们找到一间房子。我正打算对我朋友谈这些事，便同他并肩走下楼梯，可是我又不禁想到这几天来我知道的事，而且在最近两天里这事木已成舟。我不得不站住，好象有什么东西卡住我的喉咙，我感到很害怕。

"出什么事啦，老弟？"南迪问，猛地站住了，从楼梯下

朝上望着我。

“这，”我想，“是我该告诉他们的时候了，至少得告诉他。不过也得告诉马雷尔。要是我不告诉他们，这事会越拖越糟，越拖越叫人讨厌。”可是就在那时我看到他那张微笑的脸——每次比赛完毕，他从更衣室出来时的那种微笑，马雷尔和我在入口处招贴画旁等候着他，一见到他我们就说：“你真是个奇才，南迪！”不管他是不是奇才，我们总是这么对他说，这不是欺骗也不是虚伪，因为我们总认为他会成为一个非常优秀的运动员。他会摆摆手说：“甭说蠢话啦！”然而几分钟以后，在工厂俱乐部里他会问：“那场球踢得挺带劲，对不对？”

“没事，”现在当我看到他微笑的脸时，我只好这么回答他。“没出什么事，我以为楼上有人喊我们呢。”说到这里我突然停住了。我变得非常胆怯起来，又不作声了。“到这种时候了，我为什么还要撒谎呢？我不应该对他说谎。我不仅没有把实话告诉他，还对他撒谎。”我心里这样想。我不敢看他，突然小跑起来，在楼下飞快地超过他。我还记得，我变得非常健谈，说我们不应该再搬长沙发，抱怨没用的东西太多，还说如果我们缺烧的，就把牌桌的腿拿来当柴烧，以及诸如此类的事，说得非常大声，而且不必要地快，还添加了许多手势。然而他们竟没有发现我的反常举止，我一直在观察南迪和马雷尔的脸，如果他们中的一个问我，并要我把叫我烦恼的事告诉他们，我会说出来的，尽管我很害怕他们会问我。我变得对自己非常陌生起来。不一会儿工夫，我们把所有的东西全搬到楼上，雷吉娜也跟着上来了。南迪走到老妇人面

前，说：

“喏，太太，我们把这对没有巢的麻雀领到您这儿来啦。”说到这，他点燃一支香烟，因为他是业余抽烟者，抽起烟来显得很笨拙，立刻咳嗽起来。“您看，他们就象我们向您介绍的那样，对吗？他们不会太麻烦您的。一切都办妥了吧？”

妇人微微一笑，先看看我，再看看雷吉娜。当她的目光触到雷吉娜的外套和她红扑扑的膝盖时，便在上面停留了片刻，然后正正自己的披肩，点点头。“当然全办妥了。已付清三个月房租。”

“什么？”我惊愕地问。“我可什么也还没有付呀。”

“这两位先生已经付了房租。”妇人说。

南迪把烟灰轻轻弹进火柴盒里。“不是我，是咱们的班组。这是结婚礼物的一部分。”

“咱们是走呢，还是留在这里不去上班？”马雷尔问南迪。

“先喝杯酒。”我赶忙说。“咱们找个地方去喝杯酒。快点，雷吉娜。”

“你们自己去吧。”雷吉娜说。“你们去喝酒，我在家里收拾收拾。”她的脸色变得很冷淡。这已经不是我第一次感到扫兴，我一直纳闷，为什么在我朋友们面前她偶尔会变得冷若冰霜。

“你回头再收拾吧！”我说，拉着她的手。我发现马雷尔已经转身从前厅的门走出去，正依在楼道平台的栏杆上呢。

“不去。”雷吉娜说。在这种场合她很会使性子，可我又怕惹她生气。她一生气，眼睛变得更大，脸蛋变得更窄小，还把下嘴唇往下耷拉着一点。她故意同我闹别扭的时候，模

样显得更漂亮。“朋友们不会生气的，不是吗？”

“天哪，不会的。”南迪说，不过我看得出，即使雷吉娜跟我们一道去，他也是不会介意的。他会很乐意同她搭讪，可是雷吉娜待他却有点傲慢。有一次，我把这话告诉她，她却嘲笑我。“那是南迪该得的礼遇。”她说。我没有同她争辩，尽管我知道南迪是看在我的份上才忍受雷吉娜的傲气的——他是个心很细，又很敏感的小伙子。于是他冲我妻子微微一鞠躬。“允许我在您的小手上吻一下，夫人。”他说完，大笑起来。他喜欢开玩笑。已经走到楼梯平台上的马雷尔离开栏杆，冲门里喊了声再见，便戴上帽子。我亲吻过雷吉娜后很焦急地对她说：“我尽快回来，亲爱的。”她点点头。我们跑下楼梯，到二层的时候，马雷尔站住了。

“你留在家里会更好些。”他说。

“你这是什么意思？”我反问。“我也渴着呢。”

这局面的确很尴尬。到了楼下，我们终于又走到街上，我知道我必须把事情和盘托出。最迟到酒店就该说了。如果不是先由我告诉他们，这会比我诱拐马雷尔的妻子，或从南迪兜里偷钱包更糟糕。

我们在附近找到一个酒店。我在柜台付了三杯酒的钱。店主在价格表上写着莫尔的“上等好酒”，可是那酒却次得同甘蓝菜汁一样。酒店简陋不堪，令人憋闷。一个柞着拐棍的独腿乞丐正靠着砖墙喝酒，角落里有几个身上溅满白涂料的油漆工在喝啤酒。我们来到自助餐圆桌旁。我们把杯子碰得叮叮当当响。

“干杯，”马雷尔说，“再一次祝你走运。”

我们正要喝的时候，马雷尔却把酒杯从嘴边移开。

“你知道，山约，我是不喜欢说教的人。”他说。“不过我毕竟是过来人。你同雷吉娜生活以后，情形会同你单身的时候大不一样。”

我屏住气息，因为我觉得马雷尔似乎已经把我看透，其实这并不奇怪，在过去的三年里我们彼此太了解了。我猛然举起杯子，好把自己的脸挡住，说：

“我知道你们在想什么。不过朋友终究还是朋友。”

“为我们的友谊干杯！”南迪说着，举起杯子。他喝了一大口酒，但这口酒好象使他不寒而栗。“我已经习惯喝维他可乐。”

马雷尔喝了一口以后，用手心把杯子上的水雾擦掉。“朋友们，”他说，“是的，当然。”他又呷了一口，掏出一包压瘪了的柯苏特牌香烟，转着让了一圈烟。他把自己的那根烟撅成两半，把一截插进他的樱桃木烟嘴里。我划一根火柴替他点烟的时候，他并没有马上吸，而是把烟嘴夹在两个手指中间。“听着，山约，现在最要紧的是你们俩，你和雷吉娜要和睦相处。”一听这话，我把划着的火柴给忘了，结果把指尖灼了一下。我痛得咝咝吹了两下指尖，把火柴棍扔到洒在桌面上的一摊酒里。火在酒里劈劈啪啪响了一阵后化成一缕青烟。马雷尔等着我给他划第二根火柴，吞下第一口烟后，四下看了看。“咱们吃点咸月牙面包不好吗？这劣酒绞得我肚子好痛。”

我到柜台要了五个咸月牙面包。我背对着他们站在那里的时候，觉得他们好象在嘀咕什么。我猛一回头，马上感到一阵羞愧，原来马雷尔正往窗外看，而南迪正在端详着那个叫化子。“我要不主动告诉他们，这事会把我的一生给毁了。”我想。我把装有咸月牙面包的小笸箩放在酒杯中间，看着马雷尔取出一个，咬下一口，吧唧吧唧地嚼着。“现在，”我寻思，“现在该是告诉他们的时候了。”我的心正在怦怦地狂跳着，厚厚的热浪在我全身起伏。“马雷尔！”我开口了，可是他并没有怎么理睬我。我这才发觉原来我的嘴只动了动，却没有说出声来。“马雷尔！”我正要再说的时候，南迪把他的月牙面包浸在酒杯里，回头冲着我笑。

“宾客走了以后，你丈母娘骂我们了吧？”

“我的岳母？我岳母干吗要骂你们呢？”

“嗯，我们是婚宴上最吵闹的几个。”

“噢，”我说，“没有。我岳母什么也没说。”

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要问及我的岳母，不过此时此刻，我也没有心思去琢磨他的话。我一直在考虑的是：“如果我现在不抓紧时机告诉他们，呆一会儿大家就要天南海北地聊起来，然后回家，那时我就再也没有勇气告诉他们了。总有一天他们会发现的。其实他们在一个星期之内就会发现，因为我瞒着他们，他们会讨厌我的。真的非常讨厌我。”

“你象唱诗班的领唱人那样扯着嗓门唱，”马雷尔对南迪说，还抿着嘴轻声一笑，“你一直在唱《波波罗·阿万蒂》。”

南迪咯咯地傻笑着，用拳头搓自己的脑门。

“我是存心的。我们走了以后，你的那些大姨子小舅子们说我什么啦？”

“没，”我说，“什么也没说。”我不太明白他问这些干什么。“我干吗还不赶快告诉他们？”我心中暗想。

“说马雷尔什么了吗？”南迪问。

“谁？”

“马雷尔。他那天表现得很有气派，对吗？”

“当然。”

“《波波罗·阿万蒂》！”南迪说着，又咯咯笑起来。他因为做了自己现在想不大起来的事而非常得意。“我是不是整个晚上都在唱？”

“你把这首歌同所有的进行曲混在一起唱了。”马雷尔笑着说。

“什么进行曲？”

“各种进行曲。你还唱了《炮兵进行曲》呢。”

“《炮兵进行曲》！”说完他放声大笑，笑得前仰后合，还用手按着两胁。马雷尔也被逗乐了，但是我好象透过厚厚的玻璃墙才看到他们似的。我仅仅望着他们的动作，他们讲话和大笑时的嘴形，声音却几乎没有进入我的耳际。似乎我已经不再是他们中的一个。我在想，他们是两个好朋友，他们之间互不隐瞒各自的想法。自从我认识他们以后，他们一直是这样相处的，我只是后来才成为他们中的一员，而且是他们把我拉进他们中间去的。我本该怎么办呢？当我岳父在我们婚礼以后把为我安排的计划告诉我的时候，我本该说什么呢？

“山约，”南迪用手指头杵着我的胸口说，“你在大白天做梦了吧？我真的唱了炮……哈哈哈……嘻嘻……嘻嘻……《炮兵进行曲》？”

“真的。”我回答。这时我回想起婚宴和雷吉娜的一大家子。他们原先自己有一个作坊。他们的餐室，里面摆着又大又笨的家具，上着一色的暗樱桃红漆——与其说餐室，更象一个博物馆；雷吉娜的父亲，一个过份讲究礼节的花白头发老人，是一家之主；她的母亲，在忙活着摆刀叉餐具；而南迪却一个劲儿地唱着劳工运动歌曲。

“你的丈母娘并不太喜欢你，你知道吧？”南迪说。

“是不太喜欢。但是雷吉娜不在乎那个。”

“那你老丈人呢？”南迪问。

“现在，”我想，“现在我得告诉他们。”我的喉咙干极了。我耸耸肩膀。

“他的老丈人比较鬼。”马雷尔说。他拿起玻璃杯，用两个手心捂住，好象是在温酒似的。“他要把你弄到他们的合作社去，是真的吗？”

我看看马雷尔。然后又看看南迪。南迪什么也不明白，因为他刚才没有注意听。而马雷尔的目光却使我害怕。

“我岳父有一个计划……”我说。马雷尔打断我的话：

“那么说是真的罗。”

我没有回答。

“我还以为那老家伙是酒后胡言哩，”马雷尔说。“我以为你事先会告诉我们呢。”

“你们瞧……”我开口了，却说不下去。我觉得再说也没有用了。所有的辩词倾刻间化为乌有。开始，我把自己的杯子放在洒在桌面上的酒里转动，拿起来，再放在远一点的地方，又放在更远一点的地方，就这样在桌子上印了一条小酒圈圈的链子。这时我才发现他们在等待着我的回答呢。“你们瞧，”我接着说，可是我很难集中自己的思想，“当我和雷吉娜的事定下来以后，一天晚上老头把我留在厨房，把他为我做的安排告诉我。他要我离开工厂，到他们的合作社去干。他们也有一台电锯，他们一个钟头给我九福林五十弗勒，还要给我分红。这对双方都有利。好吧，我想，现在甭跟他争辩，反正这事无论如何是办不成的，他以后会把这事忘了。我丝毫没有去他们那里干的意思。后来雷吉娜提过几次，星期六，我们去市政厅登记结婚之前，她说一切都办妥了，他们等着我去……雷吉娜也非常愿意我去。”

“你到哪里去？”南迪问，他好象还没有完全明白过来。

“你们瞧，”我说，“实际上……”

“他要走了，”马雷尔说，“要离开咱们了。”

“什么？”南迪问。他不愿意相信这是真的。

“要离开咱们。”马雷尔说。我注视着他。他非常镇定，表情毫无异常。

“你从来没有提过这事呀！”南迪惊讶地说。

“我并不真想去。”我回答。

“这没什么区别。”马雷尔说。他把抽剩的一小点烟渣从樱桃木烟嘴里吹出来，用脚把它踩碎。“你想不想并不算数。

你的行动才算数。”

“我并不想糊弄你们。”我说。我觉得现在自己象个可怜虫。我知道自己干的事很不地道，而且就要去做这不地道的事情了。“别想象……”

“这种事我是从来不去想象的。”马雷尔说。“我理解你，真的。这样会更好些。九福林五十弗勒是比七福林二十弗勒多。”

“我无法相信！”南迪一再重复着。“山约！你是不是说你干脆永远不回工厂来干活了？”

“我们的友谊是永存的，不管怎么样。”我说。于是我们开始谈起这事来，这事实际上并不象我把它藏在心里时那样可怕。什么事也没有发生。我们仍能站在餐桌旁继续谈下去。我也镇定了些。“正因为我就要去合作社了，没有任何理由认为我们不能保持我们的友谊。”

“那是事实，”马雷尔说，“友谊不是那种你朝夕就能忘掉的东西。”

“这魔鬼，”南迪在嘟哝，“我不得不说，那是我没料到的。”

“咱们还可以同过去一样见面，”我说，“星期天我们去看南迪的球赛。你们也会来看我们的。”

“这魔鬼。”南迪哼哼两声，盯视着我。我把视线移开。

“除了咱们不在一起干活以外，一切都照旧。”我一再说着。这时我觉得轻松了些，以前我是太害怕了，现在我才看到不会出什么危险。

"就这样吧，"马雷尔说，"我们该走了。"

"当然一切照旧。为了家庭的宁静我才接受这份工作的。也许我们很快就有小孩了……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吧。不过相信我，不会出什么事的。"

我们走到街上。到街角的时候我们都转身相对而立。

"我想告诉你们。"我平静地说。

"说吧。"马雷尔说。

"这魔鬼。"南迪哼哼着，还气呼呼的呢。

"我想，你们是生我的气了吧。"

"嗐！"南迪把手一挥。

"准生我的气啦。"我说。到了街上，这场面又变成另一个样子，它变得难以置信和令人不舒服。

"没生气。"马雷尔说。"我们不可能生你的气。你这不是为你自己。再说这桩事的形成，说明似乎你是对的。"

"你是说我做的对？"我问，心里很感激。

"我是说似乎你是对的。唔，我们该走了……"

"咱们什么时候再见面？"我问。

"我星期天有球赛，"南迪说，他伸出手来，苦笑了一声，"三点，在小投球场上。"

"三点见。"马雷尔说。我们互相握手。

他们走出几步以后，我在后面大声喊：

"等等！"他们都站下，回过头来。我问他们，"告诉我，你们是不是把我想得很坏？"

"你这傻瓜。"南迪说。

马雷尔说："我们没这么想，要是这么想，我们会告诉你的。"

我冲他们招手告别，转身回家。我在房子外面站了片刻。"终于熬过来了，"我想，"什么事也没发生。"那是一座很大的灰色建筑，你在英国电影里才能见到的那种，前门的两旁有圆柱，房子的门牌号码在门楣的角上——用油漆写在水晶玻璃上的 8 字，每到夜晚便闪闪放光。天气很凉，阵阵微风把附近面包铺新鲜糕点的香味吹送过来。"这就是我们——雷吉娜和我往后要居住的地方。在 8 号房子里。"我在等待一种愉快的感觉涌上我的心头。"确实没有发生什么不得了的事。"我想。我在等待这个感觉来消除我的疑虑。然后我走进前门。这楼梯是很陌生的。整个房子也是很陌生的。"我会慢慢习惯的。"我想。"总有一天，我会觉得我好象是一直住在这里的。"尽管如此，我仍然不敢真正相信这是事实。

张春风　译

沃尔克尼·伊斯特万

不可饶恕

〔**作者简介**〕 沃尔克尼·伊斯特万(1912——1979),匈牙利著名作家。从事专业创作之前是化学工程师。曾获柯苏特奖和尤若夫·阿蒂拉文学奖。早期作品主要描写资产阶级人物的生活方式和思想面貌。1950年以后的作品,其中心主题转为对知识分子寻找出路的描写。他的作品具有独特的幽默和怪诞的艺术特征。他也以"一分钟小说"(微型小说)著称文坛。主要作品有:《耶路撒冷的公主》、《粘蝇纸上度蜜月》、《托特一家子》、《一分钟小说》、《在时间的顺序里》、《小说选集》,以及剧本《猫的游戏》(1974年改编后搬上银幕)等。

我给了两个男护士各二十个福林,他们用担架把他从楼上抬下来,放进救护车。到了医院我又给病房日班和夜班护士

各二十个福林，请求她们看护他。她们说我可以一百个放心，她们会每隔半个小时进去看看病人，尽管很幸运，他还没有到不醒人事的程度。第二天是星期日，我可以去看他。他还很清醒，却不太爱开口了。我从他隔壁床的病人那里得知，那两个护士压根就没有踏进病房来瞧他一眼——考虑到她们有一百七十个病人要照看，也就不足为怪了；而且大夫们也不屑去给他检查，只是说星期一要给他会诊。隔壁床的人说，他们总是用这种办法处置星期六上午送来的病人的。

我到廊厅去找护士，头天值班的护士一个也找不到。经过长时间搜寻之后，我设法跟踪星期日的值班护士；我也塞给她二十个福林，求她时不时进去看看我父亲，我还要求见大夫，因为我在家里已经把一张一百福林的钞票装进一只信封。她说大夫被叫到女病房去给一位患者输血了；她要我别发愁，她会转告大夫的。我回到病房，父亲隔壁床的病人一再要我不用着急，既然值班大夫无论如何抽不出时间检查我父亲的病，我也就没有机会塞钱给他了。明天病房大夫来了，他们才会有时间给我父亲检查。

“您需要什么吗？”我问父亲。

“不需要，谢谢。什么也不需要。”

“我给您拿来几个苹果。”

“谢谢你。我不饿。”

我在他病床旁又坐了一个小时。我本想同他说说话，可惜找不到话题。过了好一会，我问他是不是觉得身上什么地方痛，他却回答说哪儿也不痛，于是我再也想不出该问他什

么了。我们只得面面相觑。我们之间的关系一向很羞怯、内涵；除了谈事实之外，从来不谈别的事情，而任何发生在头一天的事实，第二天它的意义便缩小到零。我们也从不谈感受。

“嗯，那我走了。”呆了一会后我说。

“好的。”

“我明天再来，再找找大夫。”

“谢谢你。”

“病房大夫明天上午才能来。”

“不着急。”他说着，用目光伴送我到房门口。

他们第二天早晨七点钟给我打电话，通知我，他昨天夜里去世了。我一踏进217号病房，便发现另外一个人占领了他的床位。隔壁床的病人一再向我保证，我父亲没有遭受什么痛苦；他只是长长出了一口气就过去了。我怀疑那人没有说实话，因为我觉得要是自己处在他的地位，也会用和他同样的语言说同样的话的；不过我还是说服自己相信父亲没有受到任何痛苦就过去了，他隔壁床的病人根本没有骗我。

还有一大堆手续需要办理。在医院接待办公室，一名护士接待了我(不是星期六值班的那个，也不是头天的那一个，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护士)，她把他的金表、眼镜、钱夹子、打火机和一纸袋苹果交给我。我给了她二十个福林，接着向她口授问及他的情况。办完之后，一个头戴皮帽的男人走进来，提出要给躯体梳洗、穿衣服、化妆。他在使用“躯体”一词时，指的是提到的那个人虽然不再活着，可也还不是一具十足的尸体，因为他还没有梳洗、化妆呢。

我身上还带着那只内装一张一百福林票子的封口信封，于是把它递过去给那个人。他撕开封口，往里瞥了一眼后，猛然摘下帽子；从此在我面前再没有把它戴上。他答应把一切都办得非常妥贴，我只需送来一些干净的亚麻布衬衫和被单就行了；他还肯定我会十分满意。我告诉他说我当天下午就把这些东西送来，外加一套深色的西服，不过我想现在就去看看他。

"您要去看躯体?"他吓了一跳，问。

"是的。"我说。

"您一定更愿意等它梳洗完毕后再去看它。"他建议说。

"我现在就要去看，"我说，"我没能给他送终呀。"

他很勉强地领我到太平间，医院花园中央一处孤零零的建筑。地窖里亮着一盏电灯，没有灯罩，光线非常强。我们走下几级混凝土台阶，正好在台阶脚下，我看见父亲仰面朝天躺在混凝土地板上。他摊开着四肢，战争场面的油画里，大凡在军事行动中被打死的士兵都是这个姿势。唯一的区别在于他身上没有衣服，从他的一个鼻孔里露出半截小棉花球，另一个棉花球则沾在他的左臂上——显然是他们最后一次给他注射的地方。

"您现在什么也还看不到。"手里捏着皮帽的人抱歉地说。即使在冰凉的地窖里他也不戴帽子，站在我身旁。"等我给他梳洗化妆以后，您会发现他有多精神。"

我默不作声。

"他病很久了吗?"过了片刻，那人问。

“是的，病很久了。”我回答。

“我知道我该怎么做了，”他说，“我要把他的头发稍稍剪掉一点。这样效果就大不相同啦。”

“您认为怎么好就怎么办吧。”我说。

“他是梳分头的吧？”

“是的。”

他不再说话了，我也不再说什么。我不能为父亲再说什么，或做什么了；我再没有可以给钱的人了。即使叫人把我埋在他身旁，也无法弥补我的过失了。

旭遥桢　译

柯罗耶瓦里-格罗特彼尔·艾米尔

条件反射

〔**作者简介**〕 柯罗耶瓦里-格罗特彼尔·艾米尔（1907——　　），匈牙利著名小说家、翻译家和文艺评论家，曾获柯苏特奖。早期作品主要以怪诞手法嘲讽中产阶级和白领工人的生活。解放后出版的作品广泛描绘社会生活画面，对新社会里存在的歪风邪气和矛盾冲突也予以无情揭露和辛辣讽刺。他的艺术风格细致、优雅。重要作品有：《奇柏拉基博士的爱情》、《大人物》、《幸运的继子》、《防波堤》、《地下道里的幽灵》、《阳光里的面孔》、《袖珍画里的女人》、《十字路口》等；此外，他还翻译了巴尔扎克、阿拉贡、法朗士等人的作品。

钻牙机；钳子和夹具；磨光机；预热炉；听惯了的嘈杂声，见惯了的面孔。说得更精确些，要不是卓里又出现在她

面前，她还想不起已经有些日子没见到他了呢。

“这些日子我可一点也没有想念你呀。”莫妮柯说。

年轻人耸耸肩膀，似乎想抖掉这不文明的话语。他不是喜欢一意孤行的人；他好象在想什么想得出了神。

“我想跟你谈谈，莫妮[1]。我以前一直在闲逛荡，不过现在我想谈谈。”他补了一句：“认真地谈谈。”

姑娘从睫毛下朝他投去一道搜索的目光。

“你已经把你的追求告诉过我一次啦。你就来个简短的吧。”

他们的谈话被一位进来抱怨的老妇人打断了。老妇人把自己的满口下假牙包在一张白报纸里，用漏风的嘴咝咝地说着：

“我一咬东西这牙就脱出来。”

诊所的主人走出来，洗完手，接过假牙，边放在水龙头下面冲洗，边招呼老妇人坐下，往她张着的嘴巴里瞧瞧，把假牙安上去后又取出来，嘟哝了两句，动手磨起假牙来；末了，双方客套一番。

“咱们一块儿去吃午饭吧。”卓里建议。

莫妮柯摇摇头；她不愿意去吃午饭，她在节食减肥呢。年轻人匆匆上下打量了姑娘一眼，不觉微微一笑：在白大褂下，她身体容易发胖的部位全鼓出来了。一位丰产的女神或类似那样的东西吧。姑娘是个美人儿，的确是个美人儿。望

---

[1] 莫妮柯的昵称。

着她心里怪好受的。

“去喂你那两只小眼珠子？”

“咱们还是去吃午饭吧。”

莫妮柯耸耸肩膀，瞟了小伙子一眼，让他明白她能看穿他的每一个花招。

“跟你出去吃饭你可别想入非非。我得把话说在头里，我可不供享用。”

他们在离餐馆不远处会面。莫妮柯比约定时间早到一刻多钟。她踯倦地荡来荡去，望着广告柱上的招贴画，懒洋洋地扭搭着腰身走开，又走回来把看过的广告再看一遍。那是一张独幕轻松小歌剧的演员表，无奈她的两只眼睛无法集中在字母上。她想，真滑稽，我不觉得发腼哪。

“很抱歉，我来晚了。”

卓里站在她面前，身材修长，肌肉发达——她对他的这些特征都很熟悉——，不过他今天显得特别潇洒，这倒使她非常惊讶。

她机械地整整自己的衣裙。

“要知道这样，我会早点来的。”

“噢，”她说，“你没有来晚；是我来早了。我家里简直同疯人院一样。母亲……”她把手一挥。“我 兄 弟……”她又把手一挥。“那些患者……”她再把手一挥。“你 要 带我上哪儿呀？”

“你要上哪儿，就带你上哪儿。”

“只要不太远，上哪儿都行。不过别让我喝太多。是我把

那个老太婆的满口下假牙给做坏的。”

吃饭的时候小伙子表现得很不自然，象一个正在打消自己要做某些事的念头的人那样，等待着似乎永远不会到来的时机。他在讲述自己的身世和成为一个受过训练、每月挣两千福林的牙医师之前所经历的艰难困苦。他谈到刚故去的舅舅；他得感谢舅舅为他谋到一个能挣钱糊口的职业；他过去穿的都是舅舅穿过不要的衣服，现在也还穿着这些衣服去上班……

“你今天穿的这身衣服真高级，”姑娘打断他的话，“是定做的，对吗？”

小伙子点点头。

“要是我能说了算数，”她接着说，“我就派象你这样的小伙子去当驻外使馆工作人员，同外国人做生意——专挑象你这样的棒小伙子。巴黎和伦敦的人们见到咱们的一个小大人物的时候，你猜他们是怎么想象咱们的：是不是所有的匈牙利人都象这些木制假头？我听说情况在好转嘛。不过要是你问我，我要说诊所的干部还是太多了。最好的办法是装聋作哑。这是我从我兄弟那里听来的，他呢，是从部队听来的。”

“那办法好。”

“我喜欢你这身打扮，真的。我喜欢你，不骗你。”

“我很高兴你喜欢我。”小伙子说，这一次是充满着自信说的。“这使我能比较轻松地把我的想法告诉你。要我再叫一瓶这种酒吗？”

姑娘摇摇头，嘴角上挂着一丝会意的微笑。她那一头染

红了的头发在颤动。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学会这样彬彬有礼的?”

“我不是已经告诉你了嘛,开头我老瞎逛荡。你白大褂上有一个扣子开着,或者你在往上提你的长统丝袜的时候,我老直勾勾地看你的胸脯、大腿和胳膊，想大饱一下眼福。而且每次都使我产生快感。尤其是你的皮肤。”

“咱们又回到你最得意的话题上了。”

“好啦，该是象上几次我要对你说些事，或约 你 出去的时候了。上次我抚摩你的胳膊……你还记得吧。从那以后咱们再也没有幽会过。你可以想象那是最疯狂的事；我对这事一直想得很多。我知道我是一个傻瓜，因为我从来的举动都不是那个样子，可不是预谋的。嗯，只有女方岁数大许多，而且会盯着你看，还会马上扑到你身上才行……”

他在沉思，眼睛凝视着远方。莫妮柯望着他的时候想起巴拉兹来，她尝到更多的不是他本人的滋味，而 是 生 活 方式，甚至更多的是闪烁着短暂微光的希望，可惜很快便消失了。

“再来一瓶吧!”

“你应该知道,”卓里要来酒后接着说，“你应该知道，我很小就失去父母。我从来不知道世界上最自然的东西……母亲和父亲意味着什么。”

“别以为你失去的就那么多。我母亲和父亲是非常讨人喜欢的。要是谈到父母亲，你想象不到会有比他们更好的父母了。我不是爱冷嘲热讽的人，不过那还是很可怕的。我们一

大家子没有足够的住房，却有许多时间来吵架。”

“瞧，你还是有建立家庭的愿望的。你走进一个单元，你会感到有什么东西……”

“你现在明白了吧，的确是那样。一个单元的住宅就是人生的指纹印。”

她把手一拍，格格地笑起来。

“欸，我今天不是表现得很聪明吗？”

“你心情那么好，我特别喜欢。”

“你喜欢我身上那么多的东西吗？我的胸脯，我的大腿，我的胳膊，我的皮肤，当然最喜欢的是我的好情绪啰。那么你还在等什么呢？”

小伙子傻呵呵地望着她。

“你没瞧见我已经很兴奋了吗？我的眼睛盯住你的嘴唇，只等你开口了。你以为你带出来吃饭的是一个修女吗？”

“你愿不愿意上我家去？”

回答是明确而坚定的点头，以及纯属精神性质的几个富于表情的姿势。

“行！”

又是一个挥手。别看服务员来回上菜的时候象一个溺水后被激流冲走的人，绝望地用胳膊拍打着水，却把一切全看在眼里了。然后又是一阵叫出租汽车的挥手。莫妮柯使劲劝说小伙子不要破费，他却不听。

那是一个简陋、狭窄、带家具的房间，家具都散发着霉味，地上、床下和柜子上全是尘土，代表着无穷尽的房客所

虚度的年华。

卓里把房间里唯一的一把扶手椅让给姑娘，自己坐在被子还没叠的床沿上。他挠挠头，嗫嚅着没能招待她吃点或喝点的抱歉话。他开口说话之前，咬着嘴唇想了片刻：

“别以为我喝醉了，我要你明白，因为事情没有那么简单。你已经知道了，我要在乡下开业。你记得吧，你甚至暗示我老逛荡，而且老问你晚上是不是有空，那是因为我想占有你。不过那是我到乡下去以前的事。我对那次出门并不太热心；即使一个在布达佩斯没有单元住宅、没有小汽车、甚至一无所有的人，也不乐意搬到乡下去。情况是这样的，虽然我舅舅同我没有血缘关系，不过为这一切我还得感谢他的妻子。比丽舅妈没有孩子，她老想要个孩子，不知怎么的，她就过继我当她的儿子了。”

“一眨眼工夫我就能哭起来。只是别忘了给个信号。”

“莫妮，别犯傻了，”卓里恳求她说，“我在讲正经事哩。让我把话讲完吧，瞧我刚才讲到哪里了？”

“讲到你比丽舅妈过继你了。”

“长话短说吧，她有恩于我。要不是她，那老头，她丈夫是不会那么好心的。你要是处在我的地位，你也会去走一趟的，莫妮，尽管你说话很冒失，可你的心还是好的。”

卓里做了一个手势，他们又交换了眼神，他接着说：

“比丽舅妈在信里没有特别明确表示，也没有写什么看上去叫你抱很大希望的东西。我那次去，只要她提出来，我是准备住下的，这是道义上必须做的；周围多一个更体面的

人，是不会有坏处的。当我知道一切以后，我羞愧得直想钻到地底下去。比丽舅妈提出的建议简直比中彩票还值钱哩。她住在森特洛伦兹，自己有一栋房子。她想搬到那里去住，不愿意当继母婆婆妨碍我的婚事。就是说，如果我结婚的时候。不过她有一个亲戚，一个做牙的技师，住在佩奇[1]附近的迈切克山坡上，自己也有一栋房子。他们同意老头搬到比丽舅妈家里住，这样他们俩能相互照应，我呢，得接过老头的诊所。我连开业执照都不用操心，他们全给我办，我付给他们一点钱就行了。”

莫妮柯对这飞来的横财羡慕得直咂嘴。她说，卓里在萨波先生的诊所是一把好手，应得到这份幸运的。她还说，她敢肯定，不用一年工夫，半个佩奇城的人将会戴上他做的全口假牙；不久，连狗都会把他的手艺安在自己嘴里哩。

“我怎么不能认真同你谈谈呢？”

这丧气的话语使她成了一个瘪了气的皮球，脸上没有了表情，然后她耸耸她那两个滚圆的肩头：

“听我说，卓里，如果我认真对待所有应该认真对待的事情，认真谈论所有我觉得应该认真处理的事情，我早八辈子就从窗口跳下去啰。”

“正因为，莫妮……”卓里费劲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正因为你太迷恋……”

“我找不到自己的住所，就这样呗。”

---

① 匈牙利西南部城市，在迈切克山南麓。

“咱们别为字眼争吵啦。”

姑娘执拗地晃着脑袋。

“真该死，你要是老打岔，我就没法把我要讲的全讲完啦。”

“这你已经讲过上百遍啦。你以为我看不穿你。你想用这胡说八道来哄我？休想。你狗嘴里长出象牙来也骗不了我。”

他们都哈哈大笑，笑得前仰后合，笑得流出眼泪。

“你真行，居然会想出那么多花招来。”

“你让不让我接着说？”过了片刻后他问。“我的话不会太长。你答应不再打断我的话。”

“尽我最大的努力吧。”

“我一听到这消息就坐不住啦。随后我就去看老头的房子。你听呀。那是有三大间的房子——一个洗澡间，一个佣人住的小房间和一个有遮挡的门廊，晚上可以在那里悠闲自得地喝酒。屋前是一个花园，屋后是一个果园。山坡上有一个小巧的葡萄园。山上有一个小印刷所，从那里可以鸟瞰城镇，当然不是全貌；那里大部分是产铀区，不过风景很美。老人让我自己作主，说：瞧，这全给你，我的小儿子。我在小印刷所门前的石阶上坐下，抱着自己的双膝，对眼前的景致老觉得看不够，就在那里我才明白，我象奴隶一样干活，靠面包和水生活不是没有用的，只要到头来有机会住在那里，自己当家作主，实际上能买下或继承那个小天堂是值得的。”

他叹了一口气，整整自己的头发，眼睛一动不动地凝视

着天边，似乎他仍能看见佩奇周围的风光。他用更温柔的口吻接着说：

“我很快就明白，这是我今生的一个好机会。我无论如何不能让它溜掉，就象俗话说的那样，我得趁热打铁，要是我不抓紧，我就没有权利抱怨运气不好或老天爷不公正或别的什么了。我当机立断，完全接受比丽舅妈为我安排的一切：我要在佩奇定居。”

“我于是想到你。”他握着姑娘的手继续说，把头稍稍歪向一边，用朦胧的眼睛注视着她。

“趴在地上苦苦哀求。”她用叫人扫兴的方式说。

小伙子直摇头，仿佛耳朵里灌了水似的。他依然握住姑娘的手，不想失去同她身体的接触；他没有抚摩她的手，虽然他身上的每一根神经都在怂恿他这样做。

“就在那时我想起了你。我突然觉得，要是我离开这里住到佩奇去，我可能永远再见不到你了，我会觉得很难受的。当然我知道这一切听起来是多么愚蠢。咱们共事了一年多，为什么偏偏到那时我才明白过来？我不寻求解释。我一向需要你，我知道即使你今天不在那里，明天你一定也会在那里。只是当我坐在那老古董似的印刷所门前石阶上时，我才觉得我需要你在那所房子里，在那座花园里，在那间工作室里。没有你，生活就没有了意义。我一定要你到那里，做我的妻子。”

他一说到这，忙放开姑娘的手，姑娘往后坐了坐，因为距离远一点反而能看得清楚些，但手却仍然放在扶手上，柔

软而没有生气。她的两道眉毛弯成两个弓形，张着嘴。她无精打彩，一动不动，这似乎使她比原先老了些，也丰满了些。有个看不见的重负把她压得喘不过气来，压弯了她的腰，使她的肩膀和脖颈都低垂下来。她的音声听起来很不悦耳：

“那么，你以为我要把它脱掉？”

“脱什么？”小伙子激怒地厉声问。

“我的裤衩呗。”

她几乎还没有把话说完，耳朵便发出嗡嗡的巨响，以致她以为自己耳朵要聋了，同时她的脸象挨了两下雷劈似的疼痛。

“滚出去，你这又贱又臭的婊子！滚出去，不然我把你脏嘴里的臭牙全给敲掉！滚出去，不然我把你踢到楼底下去！”

她站起身，把手提包挟在腋下，用惊愕的眼睛直勾勾地望着小伙子。她慢慢转过身，步履蹒跚，象一个梦游者。走到门口，她才扭过头来。

“我本来是要脱裤衩的，你这傻蛋。我不就是为这才上楼来的嘛。”

她在楼道里摸索了好一阵子才找到开关。房屋入睡了，楼梯、灰泥脱落的墙、入口处的名牌，全都入睡了。

她心不在焉，在门道里踉踉跄跄地走着，门房用爱打探的目光窥伺着她的脸。

她没走几步，便被一阵恶心压服了。

旭遇桢　译

沙布·玛克托

微笑的酒神巴克科斯

〔**作者简介**〕 沙布·玛克托(1917——),匈牙利著名女作家，翻译家。曾两次荣获尤若夫·阿蒂拉文学奖。她的创作活动以诗歌开始，诗集《羔羊》、《回到人性》、《沙沙声》等描写战争残酷及其产生的后果。她擅长运用现代小说的技巧、心理描写等方法在小说中反映知识分子问题和新、旧社会力量之间的矛盾冲突。她的小说在国内外颇有影响。主要代表作有：《壁画》、《幼鹿》、《宰猪宴》、《生日》、《睡眠人的奔跑》、《老式的故事》(以上是小说)及剧本《蛇咬》和电影脚本《红墨水》、《追浪》等。

他居住的那条街很狭窄；所有房子的屋檐几乎叠在一起，只留下一条缝隙让阳光透进来。这里是这座城市最古老的部分，自从佩斯第一次建城以来，人们就一直在这里居住。

“这不是一个非常健康的环境。”他从小汽车出来环顾四周的时候，有几次是这么想的。可是他始终下不了决心另换住处；他在这里出生，在这里度过他的青年时代，在这里成了化学家，死亡从这里夺去他双亲的性命，他也是在这里娶玛丽亚为妻的。

现在他对玛丽亚的记忆是那么淡薄，好象她从来不是他的妻子似的；其实她去世才四年哪。玛丽亚不复存在的事实既不使他痛苦，也没有特别烦扰他的生活。他已经完全习惯于这个事实。

这位化学家对他的女同事们从不抱偏见；在他的研究所里有许多出色的妇女，他在评价她们的时候，从来没有产生过怀疑她们的工作质量和能力的想法。他年轻的时候经常陪伴父母出国旅游，他访问过许多妇女解放运动产生得更早的国家，而且他家的例子也使他消除了这些偏见。他的父亲和母亲都是化学家。

他同玛丽亚结婚是一个错误，当他开始认识到自己大错特错的时候，他对自己的恼怒超过对她的恼怒。

她在他的研究所工作，非常年轻，显得对化学很有兴趣。说真的，她对任何事物从来没有过独创性，却能很巧妙地应付一切事情。她很文静，会察颜观色，而且非常迷人。他开始认识到自己真正被她吸引住的时候，他断定自己不可能挑到一个比她更好的姑娘了。他认为一个四十好几的男人，只有结婚才最适合，当然要在慎重考虑和选择之后啰。显然结婚后他可以更自由、更精力充沛地去工作。他就这样娶了那

个姑娘。

结婚以后，他替她找了一个新的工作。他们俩都认为一个单位头头的妻子在自己丈夫手下工作是不适宜的。玛丽亚在另一个研究所一直工作到她怀孕。她一知道自己怀孕便马上放弃工作，领了退职金后回家当她的家庭妇女。有时他一再看透自己的妻子是多么不喜欢科学工作，而她在做姑娘的时候所做的一切又是多么赤裸裸的不真实的时候，不禁觉得好笑。结婚以后，一提到化学，她便干脆不掩饰自己的索然寡味，不久化学家也就懒得讲他研究所的情况去打扰她。"我原来娶的是一个出类拔萃的管家婆。"他下了评语，尽管心里不是非常高兴。

在一次不大的手术，而且显然是一次不成功的阑尾切除手术后，这女人竟意外地死去了，他这才惊愕地发现自己从来没有真正爱恋过她，只不过表面上回报她的感情而已。而玛丽亚却的确很爱他，对此是从来没有一丝一毫可以怀疑的；况且，嗯，她是用如此笨拙的方式爱着他。她甚至试图支配他袜子的颜色，她用一再问他星期天午餐想吃什么来烦扰他，她会哄他放下工作同她去散一会儿步，而且有时她还会把他的香烟藏起来。她用一种老式的方法爱着他，那是非常荒谬的，因此他哀悼过她以后就把她忘了。不过他也从来没有想到要续弦的事。他有许多朋友，有男的也有女的；化学家并不反对社交活动，远非如此。只要有机会，他就去看望他的朋友，或邀请他们到他那栋两层楼的房子来听他酷爱的音乐。他以后的几次恋爱虽没有深入发展下去，却是令人愉快

的，因此给他留下充分的自由。他很满足，也很高兴。

只有一件事是他没有料到的，那就是他会用他妻子爱过他的同样幼稚、任性的方式疼爱自己的女儿。

自从他女儿出生的那一刻起，他就热烈地疼爱着自己的女儿。他狂喜地望着她好看的小脑袋和秀嫩的小胳膊小腿。他从来不会忘记给她买礼物，她一哭，他就心慌意乱，她一病，他就象丢了魂似的无法安心工作。在埋葬玛丽亚那天他还能看一份科技报，可是小姑娘膝盖磕破出了点血，他便什么也干不成了。化学家发现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成了强于自己情感的俘虏，甚至为此感到欢乐。而这种感情似乎多少使他同自己的同类更接近了。

后来玛丽卡由格尔特鲁来教养。

玛丽亚去世以后，他仔细考虑了他那数不清的亲戚，他猛然记起他母亲最小的妹妹，并下了决心。他一向非常敬重格尔特鲁，因为她从来没有麻烦过他；她从来没有要求利用他的影响为她办任何事情，她也从来没有邀请他参加命名日①的聚餐，而且实际上从来不企图同他攀亲戚。格尔特鲁是位寡妇，在幼儿园任教后退休在家。就他所能记忆的，她从来不是一个顽固不化的人，也不是反革命分子；她平日系统地阅读报纸，知道世界各地发生的大事。化学家儿时一次印象最深的经历是同母亲一起去参观格尔特鲁所在的幼儿园。孩子们在跳一个很简单的舞蹈，当时他只有四岁，老大

① 欧美人常以圣徒名取名，该圣徒的节日为此人的命名日。

不高兴地站在一群陌生孩子中间，渴望着格尔特鲁会冲他点个头，让他也参加跳舞；可是她却始终没有点头，没有。

格尔特鲁的丈夫是一位教员，是在化学家获柯苏特奖的同一个时间去世的。格尔特鲁没有向他 伸手 要钱埋葬丈夫；要是他没有主动邀请，她也从不来串门。有一次她病得很重，化学家偶然得知她住院了。遇到类似情况，他的所有亲戚都会向医务人员打出他的招牌；格尔特鲁却没有把自己外甥是谁的事告诉任何人。他去探病时，她很过意不去，并说，“你没时间，不必跑来医院看我。我很快就会好的。即使没有响哨哨的保护人，他们也不会把领养老金的人杀死在这里的。”

他要她替他管家并负责教养玛丽卡的建议被毫无表情地默默接受了。几天之后她又告诉他，她不反对这个建议，不过她要保留她原来的住宅一个时期，以防事情不顺利的时候她可以回去住。她不动感情，很客观地接受了外甥对工作提出的唯一一个条件。

“有一件事，”在谈话的末了化学家说，“当然，考虑到您的擅长，这对您是不会有困难的。”

那张皱皱巴巴的脸聚精会神地倾听着。

“我不想让孩子害怕。我不想在她的语汇里 有 任何复仇之神、诅咒或火和硫磺之类的词。您会明白我的意思的。”

格尔特鲁明白了。

“最后，咱们也得考虑考虑她将来上 学 的事。我不想让她在家里听到同她以后在学校听到的不一样的东西。”

“要我象唯物主义者那样教养她？”格尔特鲁问。

这话从她那老朽的嘴里说出来是很滑稽的，特别是关系到刚满周岁的婴儿的时候。

“是的。”他有点烦躁地回答。

“这得由你定啰。”格尔特鲁说着站起身来，把她那只大得出奇的手提包挎在手臂上。她环视了一下他们在其间谈话的房子；她很少到外甥家来。她从敞着的窗户往外凝视。就在街对过，离这房子不到十米处，屹立着一座极好看的四层楼的建筑，房屋的正面是黄色的，屋顶上有一尊酒神巴克科斯①的雕像。酒神是裸体的，有点残缺。遮蔽阴部的无花果树叶被战争卷走了，他的一只前臂也丢了。同酷爱音乐一样，化学家也酷爱艺术，对他来说在起床后和睡觉前看一看酒神像是他每天必不可少的乐趣。美与欢乐日日夜夜从窗户笑着进来，愉快面容的和谐弥补了酒神躯体的残缺。

“孩子一定要经常带出去散步。”格尔特鲁说。“家里的空气不新鲜。”

化学家对自己的选择没有后悔。格尔特鲁整洁、老练、聪明，而且严格执行他的指示。孩子看到狂风暴雨的时候一点也不在乎，她独自一人睡在漆黑的房间里，她似乎从来没有想到会有什么可怕的东西在黑暗中作怪。晚上她上床的时

---

① 罗马神话中的酒神，希腊神话中叫狄奥尼索斯。他到处建立对自己的崇拜，追随他的疯女们头戴长春藤编的花环，身披 皮，手持节杖，抛弃自己的家宅，跟着他在山间漫游。对他的崇拜与古代的化装仪式有密切的联系，纪念他的庆典往往变成狂欢暴饮。古希腊的悲剧和喜剧即起源于纪念他的仪式。

候，她的一天不是以祈求守护神而告终；她洗完澡，跌跌撞撞走到父亲身边，同他握握手，祝他睡一个香甜、安稳的觉。化学家很喜欢她这小模样。

关于格尔特鲁滑稽可笑的事是，随着岁月的消失，甥姨之间的关系反而一点也没有亲热起来。显然亲昵同她的本性和她外甥的本性都是格格不入的。另一方面，小姑娘又太过于依恋格尔特鲁，等她稍长大一点，在她会故意同大人作对和对抗的阶段，格尔特鲁成了她唯一听从的人。

格尔特鲁不在家的时候，清洁女工经常抱怨她摆弄不了这孩子。他自己也发现(大都发生在游戏场，他每个星期天固定带她去玩的地方)，不管怎么求她或说她，除非她看到格尔特鲁守候的目光，玛丽卡总不愿意从秋千上下来，或同别的孩子一起玩她的沙袋玩具。这使他很苦恼。已经成为他生命中心的这小姑娘，当她感到非要干一件事不可的时候，她甚至敢违抗他的意愿，如果他想得到和平与安宁，他不得不——这叫他太难堪了——求助于格尔特鲁。他的姨妈从来不用提高嗓门，她只需悄悄说几句话，玛丽卡的气马上消了，她那柔嫩的小嘴唇便跟着哆嗦起来。

每年外甥休假，格尔特鲁也休假。

化学家期待着这几个星期的到来。那时他便自己照料女儿，定期忙他女儿的事比其他任何种类的休假更使他精神爽快。

玛丽卡第五个生日的时候，父女俩又单独在一起了；格尔特鲁离去半个月，把家务交给一个叫卡托的清洁女工。

小姑娘是六月里生的，在这个季节每出去散一次步是一件难得的乐事。化学家喜欢四处逛逛，还喜 欢 乘有轨电车。孩子需要活动，同人们接触，格尔特鲁经常这么说，因此他们常常步行或乘公共交通工具；他不愿意坐小汽车。他们就这样在城里闲逛。

他一向爱在托罗鲁沙·马迪尔教堂前散步，因为他喜欢这块小小的意大利式的广场和圣母哀痛耶稣之死的大理石雕像。他按照自己的习惯站在这不寻常的艺术珍品前，再次赞美那张悲伤、但还年轻的面孔，而在死亡的忧郁神秘中的基督却躺在她温柔的膝上。这时，小姑娘的手指在他手中扭动。他无法向她解释他想说的——要她注意她所看到的美。玛丽卡掉过头去，用一种奇怪的、几乎是令人吃惊的激怒，把她父亲从雕像前拉走。

“这还为时过早，”他心想，“也许她要再大一点才会懂得美的享受。我倒真希望她对艺术也有鉴赏力，不懂得欣赏艺术，无疑将是她生活中的一个损失。”

他们也去狼草地公墓。化学 家 不 喜 欢一年一度的万灵节——十一月里摇曳的烛光。因此他家总在玛丽亚生玛丽卡那天——她一生中最重要的日子，去给她扫墓。路上，孩子一直无精打采，闷闷不乐，可是她一透过栅栏看见一个个坟头的时候，便开始在59路有轨电车的窗沿追逐一只小虫，而且她的热情不自然到几乎近似做作。去年带她来这里的时候，她很喜欢那些墓碑；实际上她在坟墓中间奔跑、尖叫，指着那些保护神和死神雕像时那种极度欢快的样子使她父亲不免

有点窘：石头做的阿姨真多呀！可她现在怎么会这样反常呢？她是不是被同死亡的接近吓坏啦？她是不是知道她在什么地方？然而她怎么可能懂得死亡呢？

他们来到玛丽亚墓前时，化学家的眼睛里噙满了泪水。此刻他心中充满了对妻子的爱；多么骇人的不公正呀，他心里想，她一个还不满二十五岁的人竟躺在这地底下了，看不见自己的丈夫和自己的女儿。“你好！”他用比她活着的时候还亲热的声音同她打招呼。玛丽卡庄重地站在光秃秃、极大的墓碑前，注视着她不会读的碑文。“对你妈妈说，‘你好！’”他脱口而出，可是又马上为自己被此时此刻的情感所制服感到难为情。

一双小蓝眼睛朝上望着他。

“我才不说你好呢，因为她不是活人。她听不见我说你好！”

“好在她没说是死人。”他想着，松了一口气。“格尔特鲁很聪明，按他的意图教育孩子。这么说来不是死亡在近处烦扰着玛丽卡。那到底是什么东西呢？”

他们乘无轨电车回家。现在他不用提醒她坐安静点了；她紧挨着他坐着，紧紧抓住他夹克衫的衣边。去年他们一上无轨电车，她就立刻跪在座位上，凝视着墓碑林立的墓地，还为她自己，还有她父亲和格尔特鲁各挑选了一个坟墓。以前他从来没有感到她同他那么亲近过，在身体和心灵上那么完全统一过。他很尴尬地干咳了几声。

在家里，卡托煮好了甘蓝，可是玛丽卡不愿意吃。

他不知所措，只觉得很可怜这小姑娘。嗯，要是她不爱吃萝卜之类的菜，以后就别再煮了。不吃这些破菜照样可以用其他方法使她得到同等的维生素！何况：今天是她的 生 日，每一个孩子在自己生日那天都有权利得到自己最喜 欢 的菜。这真滑稽！

卡托走进来，把孩子的椅子挪正，发现盘子里的东西没有动。

“吃了它！”卡托说。

孩子从椅子上跳下来，跑到父亲身边。化学家感觉到她的小心脏在怦怦地跳。

“回去，坐下，玛丽卡！”

弱小的身躯绷得僵硬。

“坐回去吃饭！”

她眼窝里含着多大一颗泪珠呀！该死的萝卜！世界上的青菜值得让孩子哭成这个样子吗?!

“你知道，要是你哭，会发生什么事的！”

玛丽卡悄悄地走回去，爬到椅子上。化学家愣愣地注视着这一情景。“要是你哭，你知道会发生什么事的！”到 底 是什么事呢？会发生什么事呢？已经没有怪物，没有魔鬼，没有炼狱，这孩子从来没有被痛打过，一向是用常识、说理和解释的方法耐心地教育她的呀。

小姑娘望着盘子出神。

“拿起你的叉子！要是你不吃……”

玛丽卡很厌恶地把甘蓝吞下去，脸上和手上全是眼泪。

卡托正在擦洗餐具柜；她等盘子空了以后给孩子一点草莓。化学家羞愧得满脸通红：卡托三言两语做成功的事，他苦苦哀求好半天都办不到。吃完午餐，玛丽卡说声谢谢后才让出去玩。他看着她闷闷不乐地走出去。卡托边收拾桌子边往窗外看；即使是在他们这条狭窄的街道里，夏日的下午也是很可爱的，从屋顶的缝隙可以看到湛蓝的天空在闪闪发光。街对过那座新修的房屋的正面反射着阳光。酒神雕像也修复了，他充满着青春之美，完整无缺地站在那里，还冲着他们微笑呢。

"她怕他怕得要命。"卡托说着把玻璃杯放在托盘上。"我对格尔特鲁姨妈说，要是她不把使孩子那么听话的秘诀告诉我，我就不呆在这里了；这孩子谁的话都不听。她人小，可任性了。格尔特鲁姨妈终于把秘诀告诉我。"

他直直地望着她。卡托冲酒神点点头。

"喏，对过那尊雕像，她最害怕的就是那个。"

他的喉咙快干裂了。

"真可笑，那光着身子的玩艺儿把她吓坏了！自从格尔特鲁姨妈告诉她，要是她淘气，那个整天从窗户望着她的东西会进来咬她以后，她对每一个石头偶像都害怕。我们每次用它吓唬她，她就马上象绵羊那么听话。"

它，那尊希腊神站在房檐上，在它风吹日晒的脸上露出永恒的欢乐。化学家象得了重病似的艰难地站起身，缓慢地离开房间。"一个骗局，"他在寻思，"一个不可救药的叛徒。我该怎么办呢？我现在能做什么呢？玛丽卡，我可怜的孩

子！”

他走进玛丽卡的房间，跪在她身旁，她正在玩积木，背却对着窗户。

“饶恕我！”她的父亲又说。“你这可怜的苦命孩子！”他亲吻她，把她抱在怀里，好象他今天才第一次见到她似地望着她。从孩子那双毫无猜疑的眼睛里，人类又回到他的目光中。

张春风　译

拉科什·格尔格依

蜘蛛网

〔**作者简介**〕 拉科什·格尔格依(1924—)匈牙利作家。他的职业是农艺师。出版过短篇小说集和一些儿童作品。他著有小说《虎跃》。《蜘蛛网》是他的代表作之一。

他从房间走出来；身上穿着蓝色游泳裤，手里拿着白色游泳帽，脚下趿拉着胶拖鞋。他肌肉发达，动作轻巧灵活，皮肤晒成古铜色，要不是那一头灰白头发，看上去不超过四十岁。

"我正要走。你去吗？"

裹在桔黄色浴袍里的女人坐在凉台桌子旁一张非常时髦的柳条扶手椅里，正在玩一种纵横填字字谜游戏。

"啊？噢！不，我不去。太晚了。"

他啪嗒啪嗒地走下凉台的阶梯，花园门在他身后吱吱嘎

嘎响起来以后，她才说话。“你就这样走啦?”

他又啪嗒啪嗒地走上阶梯，在她两个脸颊上轻轻吻去她的愠怒。

“再见，可爱的小东西。”

“再一见一”她用唱歌般的声音平静地说，眼睛又回到纵横填字字谜上。

他边朝下往湖滩走去，边心里想，他们还有两个半星期呢。这个星期里还有三天真正的和平。要是假期过了一半，他就不能用“我们还有这么这么多天”来计算日子了；他只能这么考虑，“我们只剩下这么这么些天了。”他们有一个月的假期。对此，确实用不着发愁——至少对他来说——只过了假期的头两个星期而已。他老在琢磨，一个人的“前半生”到底有几年。三十年？四十年？绝对不会多于四十年。而他已经四十六。柯蒂四十三。

他们的乡间别墅地点很适中：离湖岸近，却又不在湖岸上。建在岸上的别墅并不理想。确有这么一些人，这些不知叫什么的人——他从来记不起他们的名字……他们为自己的别墅伤透了脑筋！靠湖那面的山墙的灰泥又脱落啦；冬天呼啸的大风又把屋顶掀了几个洞啦。可是这些人竟有如此大的精力和毅力，年复一年地修补冬天造成的损失。整个湖岸都是他们的喧闹声。真叫人烦死了。他们成天喊喊喳喳——祖父母、父母和三个孙子。他们老在抹灰泥或粉刷墙和修补屋顶，喧嚷着、笑闹着、争吵着。他们聚在一起干活的日子里，休息时会坐在花园的桌子旁，桌子上摆着一只不象样的

大柳条坛子，里面装满葡萄酒……在上班的日子，那里相对安静些。——不过也仅仅是相对而已，因为老头老太太和他们的孙儿们要在这里度过整整一个夏天呢。他们没有一时一刻不让其他人知道他们的存在。男孩子们不是在追赶青草蛇，在采沙场挖几个房间大小的沙窟，就是用猩红色的破衣烂袜捕捉青蛙，或者造木排。老两口老是很不放心地追在后面叫唤男孩子们——好天的时候，孩子们不许冒险到湖中太深的地方去；要是西边的天际变黄，这就意味着要起风暴啦——或者——他们最好还是留神点那些沙窟，万一沙墙塌下来会把他们埋在里头的；以及诸如此类之事等等。他们成天管教他们，保护他们，同时又惯坏他们。其实那些孩子都已经是不小的半大小子了。这真滑稽。就连那最小的现在至少也是二年级学生了。这本身几乎是不可思议的。湖岸别墅的花园里晒衣物的绳子上曾经凉满他们的尿布、粉红色和蓝色的连衣裤，在风中飘舞……这一切好象还是昨天的事呢。在那些年月里，他一直跟他叔父来这里度暑假，而叔父三年前去世了：他把他那一房一灶间的别墅遗赠给那些人，条件是他们只能火化，不能土葬他的尸体。岁月的迁移随着年龄的增长荒谬地加速得多么可怕呀。许多年前，他还是一个小学生的时候，暑假本身是无限长的；现在，一年——仅仅一分钟。

巴拉顿[①]湖懒洋洋地舒展着，八成是经历了昨日的大风

---

① 亦称"匈牙利海"。中欧最大的湖泊。湖北岸多山，湖滨有浴场，为风景区和疗养地。

之后正在歇息呢。蒂豪尼山和弗雷特山隐没在雾霭中，只能模糊猜到它们的所在——好天的征兆。

他两手划拉着水涉入湖中。水很凉。他承认，在他内心深处的某个角落，他着实想调头走回岸去。这可要不得——他来度暑假正是为了战胜发胖和凡事半心半意的态度。

水倒很不错，很清。湖底细细的弓形小丘是昨天风浪的功力。太阳还悬得老高；它温暖着他的肩膀和左半身，使他觉得很舒服；阳光耀眼，可是一个半小时以后，当它走下蒂豪尼山顶，就要被驯服成轮廓分明的桔黄色巨球。

水才没到他的腰，他便一头扎进水里，哆嗦了一下，赶快划拉几下。许多年前，在他学生时代，这点小意思只不过是他泳前准备活动的一部分，他会生龙活虎般地含着满满一口水，象鲸鱼那样把水喷出来。可是现在，只划拉了几下，呼吸就感到困难了，只好站下；现在由于一颗右上臼齿对凉水特别敏感，他已经不敢把水含在嘴里——他平日甚至不得不用微温的水漱口。那颗牙的牙龈有点萎缩了。

他有点呆傻：夜里他往往会吓一跳后醒过来，开始想象些最荒唐的事情。有时他便再也无法入睡。最近他一直绝望地听着闹钟的嘀嗒声和柯蒂微微的鼾声，不知是否该把她叫醒同她说话，或随她去打呼噜，这时他猛然想到——就在那一时刻也许他的一颗牙齿里有一个窟窿。她在轻轻地打呼噜，闹钟在嘀嗒嘀嗒地走着，就在那一瞬间，他所知道的只是他的一颗牙齿里出现了一个新窟窿！到那时为止，他的神经末梢没有记下知觉，什么信息也不传递……早晨，当然，他便

一笑了之。

他戴上游泳帽，开始每天的游泳日程。他一下水，便一口气击水五百下。他老留神不让湖水灌到嘴里；他的心脏跳动得很平稳。他仍然是个游泳能手哩。

他在数击水的次数。有时作为休息，他会仰面朝天，或肚皮朝下，用手掌打水，浮在水面，睁大眼睛朝下凝视荡漾着淡绿和金黄波光的湖水。他心不在焉地数着：他会用很不精确的方法估摸漂浮的时间，暂时忘却自己在做什么，当他接下去数的时候，他会多数五十或七十下。象他喜欢咒骂一样，他就是这样在欺骗自己。

一、二、三、……

关在监狱里时，除了品尝并狼吞虎咽地大嚼各式各样好菜的精神会餐是他最大的渴望外，他梦寐以求并常常谈论的是：在无边无际苍天的怀抱中，在灿烂的阳光下，在消失在遥远天边的宽阔水面上游泳或浮水。天空、湖海、太阳。只有淙淙的流水声——它本身是可以理解的寂静。在那里听不到预期的敲门声，永远没有随时准备发出刺耳痛哭声的海妖。

他经历了多少关于有孩子的激烈辩论呀！这些辩论是出自肺腑之言，还是仅仅泛泛的恼怒——无从知道。有时犯人们相互之间的关系就象野兽一般。不，比野兽更糟糕。他们平均每月得调换一次牢房。那情景就象一场恶梦：各层的犯人，每人拎着一个用毯子裹着的包袱，等候着叫自己的姓名和编号，连肠子都在打哆嗦。这是一切惩罚之最——鞭挞。没

有坐过牢的小伙子会以为囚徒只是被推进监狱关一段时间；他的牢房门开着收容他——他在那里同他的牢友一起一直呆到刑满。幼稚之见。他在牢里的四年，是在三个监狱的三十七个牢房度过的。牢房就是牢房嘛，作为自由人的小伙子会这么想。那可是地狱。朝北和朝南牢房之间的温差至少在摄氏八度。从三层东头最上面的铺位可以看到山丘的景致，而且每星期六晚上能听到从文化中心飘来的舞会的音乐声。从那里搬到底层朝北的牢房，几几乎等于从天堂被扔进地狱。更糟糕的是同你原来的牢房难友分开了，还得去适应新的看守。

在这种时候，他不得不怀着各式各样的焦虑和恐惧去进行一场特殊的战斗。“安多诺维奇763—253！”“有。”“二层，127号。快步跑！”接着是脚丫子一左一右踩着地板跑的声音；饭盒从楼梯砣玲哐琅滚下来……有拖着脚走的，有跺着脚走的……有叫喊的，有咒骂的……所有的声音都无限地增大，象在早期教堂的中殿堂里回响。在新牢房里点完名，牢房门上了锁后，他们便打开各自的包袱，头几个例行的探问是，“有孩子吗？”“没有。”他会回答。每换一次牢房，他的新难友都这么询问他，更为痛苦的是得回答“没……没有，我一个也没有。”“啊，那么，你就轻松啦。”他们会这样对他说，用的却是不以为然的腔调。开始他只是叽咕几句；但是有一次他被搞得非常狼狈，从那以后每到一个新牢房，他便怀着极大的怨恨和毫无作用的狂怒进行一场战役。“没有，我一个也没有。”他会说。“这正是我比你们这些家伙更困难的原因。我三十五

啦。有些家伙象我这个岁数早有十个八个孩子了。他们在这里为他们的孩子们发过愁吗？当然他们发过愁，可不是！不过他们知道他们有孩子。我呢，一个人在这里，为没儿没女日日夜夜在苦恼。也许我永远不会有孩子了。谁知道我还要在牢里蹲几年？或者还能活几年？我比所有的人更加没有把握。”那的确是真的。他被判六年徒刑，但是谁也说不准呀。他认识一个关在牢里的家伙，在第二次审讯的时候判三年刑，原因是他在给住在维也纳的姑妈写信时提到一公斤黄油的价格（这种消息在所有报纸的市场信息中都登载的）。信被窃拆后，在犯罪的段落下打了红杠杠并拍了照，影印的复本构成检举他的主要罪证。后来在一个秋天的夜晚，这人被通知收拾行李，带出牢房。一年半以后，他偶然得知关于那个人的最后一次判决被宣布无效，又改判一次——可不是三年，而是十二年。是的，你永远无法肯定任何事情。“一想到我永远当不了父亲就很丧气。”他对牢房友们说过。“即使有朝一日我当了父亲，也会因为自己的年龄不得不同孩子分开——年龄的差距使孩子同我在精神上的差距比同那些一般正常年龄离婚父母还要大得多。我现在倒轻松！不错。你们听我说，你们这些家伙才比我轻松得多。不管发生什么不测，你们终归知道还有人在延续你们的生命、你们的血液——虽然是最微不足道的，毕竟还有点东西——和你们的姓。有人，无论多么不经常或多么模糊，在你死去很久以后还会真正记起你们。谁会记得我呢？我妻子今年三十三——这个年龄的女人都不太愿意再等几年啰。她没准现在就在盘算明天去

找个律师，办理离婚手续……而我父亲和母亲已经七十啰。”

可是有许多白痴却不明白他的意思。有一次，他和一个叫布科的小矮个子在一间牢房里住了三个半星期。他从来没有见过比他更下流的畜生。这家伙专门拿他开心，有时捉弄他几个小时，甚至几天。最后他忍无可忍，便向那人扑过去。现在他的肌肉依然本能地记起那几个回合搏斗的剧痛，他终于把布科打翻在洋灰地上，然后象塞一捆无生命的东西似的，把他推到一张床底下。他被罚在暗室蹲三天禁闭，但是他至今仍认为那是值得的。那不仅是因为布科欺负他个人，还因为那家伙把好不容易从监狱图书馆交换来的稀有的书撕下来当卷烟纸用；他还从《哥萨克》“那部该死的俄国佬书”里撕下一大把书页当手纸用。“这一天会到来的，”布科常常说，“这些知识分子先生和有学问的理论工作者得面冲墙排成一行站着，然后——嗒—嗒—嗒—嗒。”他会站起来立在牢房中央，叉着两条腿，花白的头发可怕地蓬松竖立着，用假想的冲锋枪顶着自己的胯骨，作扫射动作。“等着吧，等到咱们劳动者真正当家作主的那一天！”然而，他对自己讲的“嗒—嗒—嗒—嗒”之后将会发生什么的想法通常是不说出来的。他有四台打谷机——成天吹嘘他有四台机器在转动——只要把他的机器归还给他，也许他愿意接受任何社会制度。其中最使人丧气的是可怕的混乱：每一件事都混乱得如此可怕——这些布科们同那些象把黄油价格写信告诉姑妈的家伙，或同那些因气量小的复仇心和“有钱的亲戚”被关进监牢的人们串通

一气。或者如同他本人，只因怀疑铁托的人会出于盲目的仇恨心把马铃薯甲虫扔过边境来的官方声明被关在牢里的。这一切都是麻烦、痛苦的混乱。

九十八、九十九、一百……

在那些年月里，以及从那以后他越来越多地考虑要孩子的问题。对这个问题有各式各样的观点。有些人说，生活唯一的意义是传宗接代，养儿育女；其他人则认为，在孩子或孩子们身上浪费青春的时光、精力和闲暇、钱财和才智是绝对没有意义的。有些人说，做父母的在西班牙修建城堡，本以为他们的孩子在外表和气质上都会象他们，并想象着他们又会"在自己的孩子中再生。"其实不然。一个孩子代表着一个不同的世界，他，在大多数情况下，同自己的父亲或母亲完全相反。何况孩子们都是忘恩负义的。看看动物——那些不懂虚伪的生物吧。一只母鸡是如何疼爱、保护并教养自己的小鸡的——唔，它甚至会拼死同老鹰进行一场毫无希望的搏斗！它在召唤自己的幼儿幼女们来啄食它找到的最味美的一小口食物时，咯咯地叫得多么可爱呀！可是等到这只母鸡老了或生病了，它的子女们，现在长大了，会群起而攻之，啄它，甚至会把它从找食的地方撵走。它们会这样做的，不是吗？啊，可是那时你应该看看那些带着幼仔的动物：它们——你甚至可能会说——多么宁静、多么安详！然后再观察观察那些不生育者的不安和忧愁吧。

他想，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的。不是说从这一年到下一

年之间会发生，而是无时无刻都会发生。不行，在拉科西时代发生的事情不会再重演了。那纯粹是不可能的。从上面放射出来的大气使这种事不可能再发生了。这并不等于说再也找不到不愿意用硬邦邦的小沙袋撞击他那些上着手铐的牢友们裸露在胸前的抑郁的人，直至……那种人还是找得到的。他们仍然大有人在。而且到那时，X射线也不可能一夜工夫就摧毁掉恶性肿瘤的牢房。

他们从来没有殴打过他。而且，事实上，他们从来没有对他进行逼供。他还满以为自己不会被判刑呢；因为归根结蒂，他的同事们的看法同他是一致的，而且他不怀疑他们会在审讯他的时候出来作证。可是他们却没有出来作证。起诉人问他们，倘若这个国家实行了完善的检疫制度，除非对方存心带进来，他们是否认为马铃薯甲虫会从南斯拉夫边界越过来。不，他们认为那是不可能的。更甚者，当他们望着在整个审讯过程中几次把他比作“放毒的脏东西”的起诉人时，他们便认为这种偶然性简直是难于置信的了。他当时觉得应该提醒他们想想事情是怎么提起来的。他要当众揭他们的老底。在他记忆的眼睛里，他看见留着稀疏小胡子的圆脸山陀尔在“金雉饭馆”俯在白餐桌上，虽然压低嗓门，却用意味深长的声音说：“顺便提一下，这根本不符合最起码的逻辑。不会有这种受过训练的马铃薯甲虫。它们一旦在匈牙利繁殖起来，反过来也会传到南斯拉夫的……天气暖和的时候，它们每小时能飞行八公里。比如在美国，它们每年以一百八十五公里的速度在扩散……那是根本不符合最起码的逻辑的……”

吉卜赛乐队正在演奏《地狱》①中《奥尔甫斯》②的序曲：这是他们最喜欢的曲子，每星期六开会回来，他们便走进这家酒店要一两杯淡色啤酒，用不着吩咐，乐队就会为他们演奏这支曲子……他们的作物保护队是一个良好的结合体：他们都是好伙伴和好同事……审讯的时候山陀尔却说，“那是绝对不可思议的”。他真想叫他们回忆那天晚上的情景，当面揭穿他们说过的话。不过这只是瞬间的想法。人是不应该做那种事的。这样做——不仅于自己——于任何人都没有好处。他所得到的只会是多几个人负罪。即使不为别人，为他自己着想，他也不能这么做。他不能。即便如此，在他来说也是一次可怕的失望。从那以后有个什么东西消失了——这是他一生中最大的失望；与此同时，一切事情几乎显得可怕地清楚起来：似乎晃眼的探照灯照射在法庭所有人的身上——照射在穿深灰色衣服的起诉人身上，照射在系猩红蝴蝶领结的白发法官身上，照射在陪审员身上，照射在所有人身上。他们叹息着，表示惋惜，他倒可怜起他们来。然后他开始说话。他谈到完善的作物保护！他告诉他们农民如何不被允许受到适当的训练，这些农民又如何被明确禁止照自己的意愿消灭虫害。当局干脆不相信农民挽救自己马铃薯作物的意图。所有的地方议会

① 但丁所作《神曲》的第一部。

② 希腊神话中的歌手，他的音乐能使顽石起舞，猛兽驯服。他妻子死后，他靠歌声和演奏，克服重重凶险，来到地府。受感动的冥后允许他把妻子带回尘世，条件是到阳世之前不得回头看妻子的幽灵，也不得与她交谈。他因违背这一规定而永远失去妻子。

都没有向前来索取的农民免费发给农药，却派喷药队坐着吉普车和摩托车到地里去，他们的车辆从甜菜地、玉米地和亚麻地(这些作物永远休想再立起来)、甚至麦地上开过去——且不提马铃薯地了。而且还叫他们喷洒六六六。结果三个州发霉的马铃薯不得不用来喂牲口，而城镇居民却在排长队买马铃薯喂家畜。尽管如此，第二年又接着使用六六六。那就是你们完善的作物保护！在种植树木的山坡、在葡萄藤覆盖的丘冈中间和在玉米地里见缝插针间种的几百行马铃薯，除了它们自己的主人之外没有任何人知道，而主人至今也不会揭发那些马铃薯的存在。更糟糕的是，工人是按他们喷洒农药的多寡来付工资的；比如，他们把农药成百公斤地倒进埋死动物的坑里，然后到背静的刺槐树丛下休息，或回到车子上睡个小觉：用这种方法他们至少可以免遭农民的咒骂。不信任只能产生更大的不信任。农民隐瞒地亩不是出自敌意——他们只是想吃自己花了那么多劳力去翻地、种植的作物。所有种植者的咒骂和发誓以及农艺师们的抗议全都无济于事。而且浪费被用来反对种植蒲公英的辩词。尽管人们提出抗议，还是成立了全国性的专门班子和庞大的车队。成千上万，不、亿万福林流进阴沟里，如同把一堆堆用一百福林票面卷成的烟卷放在火上焚烧一般。

起诉人愣愣地望着他，显然惊呆了；他的头，从他的衣领开始，慢慢变成紫红色：看上去他的皮肤是一种吸墨水纸，把倒在他脖子周围的墨水全吸进去了，而且一直往上吸到眉毛。

他被判坐六年牢。

二百二十三、二百二十四、二百二十五……

那些年代属于过去，永远不会复返的，他在想。它们不仅的确属于过去，而且现在还能公开谈论它们，它们已经退回到它们荒唐到几乎不可思议地出现的遥远的地方：似乎你从来没有经历过，仅仅是听说过或读到过它们。今天，你可以从电视新闻报道中看到批评某些州或农业合作社或某些单位把机器放在露天，任凭大雪覆盖的错误做法。在那些年月里，他掌握有第一手材料，说明人们愚钝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他认识一个在莫斯克当仓库保管员的年轻人。他买了一辆第一批容积为100升的切佩尔① 摩托车，从那以后每逢星期天，州里的所有犄角旮旯他都跑遍了。一天，这家伙同他聊起来。他说，以前他从来没有想过这种事；可是现在他如此喜爱自己这辆小小的摩托车，老给它上润滑油、加油、擦洗；因此看到那些拖拉机、打谷机、犁耙和中耕机在露天、在风里雨里锈烂了，即使有空仓库和空工棚闲放着，也不把机器搬进去，就连他的心都要哭泣。他不忍心看下去，不能不管，他说：他给党委写了信。没有得到答复。于是他拍下照片，并附上说明信，热情详述没有四壁的工棚可以用只花几分钱的芦苇或油毡来做墙的方法。他不期待为此受到表扬：正因为这样，当他看到这些现象的时候才那么心疼——如此而已。他是一个党员，可不是只有一张党票的同志。这

① 匈牙利著名的机车制造工厂。

些照片寄出去以后，国家保安队把他逮捕了。他被拘留了三个星期。他没有吃到特大的苦头；可是不久他被调到边远地区略差一点的农业合作社附近的火车站，几乎马上被开除出党。

他想，那种事情今天不复存在了。疾病——它们倒是有的。而他的四十六年和时间也不复存在了。心脏病、白血病、血管缩窄症和癌症却还存在。动物不知道它们总有一天会死去这一事实；它们仍然不珍惜自己的性命，豁出老命照看自己的后代。

他翻个身，仰面浮在水上；偶尔登登腿。他很不准确地数着数，总是多数了几下。在他头上老高的地方，海鸥展开土耳其军刀形的翅膀，在他视野里交叉翱翔。湛蓝的天上没有一丝云彩，可是太阳在远处的天际下沉的时候，苍天便逐渐清淡下来。

今年我要多游泳，他心里想着。提前完成来年的目标。他们明年夏天要去英国。柯蒂是对的：他们在伦敦有亲戚，至今还没有出过国，实在太亏了。她说从那里捎回几件衣服就可以把旅费捞回来。当然，这是相对而言的。那是她的说法。她似乎也喜欢使用“绝对化的措辞。”他可不喜欢这种表达方式。也许是因为他不再爱她了。他断然不喜欢她的这种说法：“在旅游回来的途中，到维也纳，咱们就闯进达尔瓦斯；我要穿上其中一件小山羊皮外套。”他不喜欢“闯进”这个词，他不喜欢她谈到那家声名狼藉的商店达尔瓦斯时的那副样子，好象她已经成了它多年的标准主顾似的。然而，可能那

绝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他不喜欢那些东西是因为他不再爱她了。不管怎么说，爱得很不够。

在那些年月里她倒没有去办离婚手续。当时她要去办是不会有困难的；不需要任何特殊理由，法院就会批准同政治犯的离婚案。他目睹不少这种事例。门上的锁啪地响了，传来一声叫唤：某某某，到办公室来一趟。十五分钟以后，那个某某某就回来了，脸色刷白，默不作声。咦，他们叫你去干什么呢？他们把一张纸扔到我脸上：我老婆要求离婚；我只好签字……头天晚上，这家伙还吹大牛，说他出狱以后他老婆会如此这般同他亲热呢。柯蒂没有走那一步实在太难得了。而且她邮去给他的包裹里总是装着最好的东西。诚然，包裹每隔半年才来一次——经常收到邮包是不许可的——那可不是她的过错。有一次，邮包到达的时候，看守便切开罂粟子糕：里头全是乌亮的葡萄干；看守长厉声叫骂："什么！我本不应该让你收这包裹的。解手纸之类的东西，你们明明知道是不允许邮来的。"说完他还是把包裹扔给了他——许多看守，跟对狱吏流行的信念相反，他们对待犯人是人道的，因此甘冒丢掉工作，甚至自由的风险——于是他冲回自己的牢房，热切地把纸包紧紧贴在胸口。每个邮包的到来总要引起他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的遐想和猜测。同牢房的难友们把葡萄干一粒一粒抠出来，专心致志地在细嚼慢咽，而且在以后一段很长的时间里，还记着这"解手纸"呢。许多犯人常收到机制饼干或蛋糕。他却没有。当图书馆助理员的柯蒂要从她仅有的八百五十福林月薪中拿出钱来买那些糕点想必是很

困难的，何况她还要资助她的母亲呢。

他没有坐完六年的牢：一九五五年末他得到赦免。

出狱的头几个月里他们好象再次度蜜月。监牢的经历是很有益的。在多瑙河畔监狱的纽扣车间的时候，他老坐在一位中学校长旁边干了近半年的活，他们忙着把扣子钉在长方形的硬纸片上。“如果任着我的性子的话，”中学校长会这样对他说，而且说得很大声，好让所有坐在长方形桌子旁的人，连同看守都能听到，“我会把所有的人都关他一次。唔，当然，时间不能太长——最多一个月或两个月。他们在最趾高气扬的时候，我会立即把他们关进牢里。但是不让他们知道这仅仅是一两个月的事。让他们知道就不起作用啦。我要把船弄得快翻的样子来回折腾我的犯人，而且长时间地划桨，把水哗啦哗啦溅起来，然后把他扔进海里，使他除了眼前一片汪洋大海之外什么也看不见，经过一段时间的挣扎以后，当他回头一看，原来海岸只离他划几下水的地方，这时他过去的一切会在他脑海里闪过，原因是我把他扔进海里。我不考虑他们的年龄，只根据他们的骄横程度来定。有些人我会象在他们把他们畏畏缩缩、不知所措的母亲推到一旁的时候扭住他们——在，比方说，他们二十二岁的时候。还有一些人，在他们五十岁，把胳膊肘撑在写字桌上，趁他们迷人的女秘书端着空咖啡托盘从他们身旁走过时，伸手去摸她们穿着玻璃丝袜的大腿，脑子里还在盘算一个好主意，晚上跳到这些小迷人精的床上共度春宵，而不是爬进已经变成老太婆的妻子的被窝里，睡在她们身旁，就在这个时候我去治他们。有

些人则在他们策划要用灼热的雷石打死那些在公共汽车或电车上不小心碰撞过他们的人的时候，我再收拾他们。关于那些——”他的奇妙想法是永无止境的。他一天接着一天在纺他的故事之纱，连看守人员也常常忍不住笑起来。这位中学校长很受欢迎。无疑他说的里头包含着某些东西。

三百零一、三百零二、三百零三……

他感到胳膊和大腿有一种舒服的疲劳：他的身躯好象长长了些。他游泳仍然游得很好，这是不容否认的。游泳使人心旷神怡。

任何人都应该在里头关他一两个月，他沉思着。他记得，以前有许多次，现在还记得——而且天晓得还会记到多长时间——他硬逼着柯蒂服奎宁①。嗯，他不是在肉体上逼迫她，而是使用高压的语言，这也许更坏。现在他在自言自语，正如当年他对她说的那样——那是发生马铃薯甲虫事件的时候，在他被捕前的四个月——那是因为他嗅到了麻烦；有人正在抓他的把柄。尽管那可能也是一个原因，事实是——他根本没有把侦探他的行动当一回事。他认为根据那些鸡毛蒜皮的琐事逮捕他是不可想象的。不错，他早就听说——谁没听说呀？——某某某和某某某挨罚，被抓走了；尽管如此他仍然加入了同情者的行列，常常在私下寻思，要是他们被判几年徒刑，其中必有原因。当时他对她爱得不够深。况且他养成太爱过舒适生活的习惯，虽然，现在回过头去看，他们谈不上有什么太舒适的生活：他们从二房东那里租来一个带

① 孕妇忌服药，会引起流产。

家具的房间，角落里有一只脸盆，不论他们怎么小心，每次洗涮完毕，地板上总溅着许多水。她想要一个孩子。那时她想孩子想得要命。

后来他进监狱了。于是发生了“你倒轻松，没有孩子”的事。接踵而来的是精神上的折磨、沉思和自我反省的痛苦。他获释以后的一段时间里，爱情仿佛又重新回到他们中间。其实这并不是真实的东西。在他这方面来说，这仅仅是感激和慰藉，在她那方面来说，也许仅仅为那些浪费掉的年月的绝望的自我证明——无疑也是为某些错过的机会的自我证明。他出狱的时候，她的爱也冷却了。放他出来的第一天，当他提到要孩子的话题时，她并不热忱。“我把咱们所有的东西几乎全卖光了，”她说，“咱们得先安顿下来。首先，咱们急需一个衣橱……”

他们就这样把要孩子的事年复一年地拖下去。在最近几年里，他们甚至不屑拖延了：他们干脆不提这当事。他获释三年以后，得到彻底的平反，被任命当作物保护局的负责人。他们分到一个单元——不错，是同另一家合住的——不过他们分到的是朝西拉治·伊丽莎白街很亮堂的两大间。还有一个花园呢。冬天，他们可以在阳台撒蛋糕屑喂画眉鸟。阳台很大，一株核桃树的树枝在阳台上架设成一个拱形，许多核桃噗噜噜地掉在阳台的石面上。他们家的街对过——几乎是正对面——有一个幼儿园。那是一所理想的儿童学校——有一座遮荫的大花园、铺着细沙的游玩场地、许多秋千、还有一个滑梯——从他们阳台的一角可以看到幼儿园的全貌。那

里每天都有这样的场面：一群手拉着手的孩子们围着穿白大褂的幼儿园老师在唱歌。显然是在唱歌。从他们房间里是听不到声音的；因为强劲的风把歌声抓住，再把它吹跑。他们很少到阳台去，因为他们俩都认为坐在阳台上是非常没有意思的，那是为放弃旅游的老头老太太们裹在毯子里，把皱皱巴巴的干瘪脸朝向太阳所准备的。天好的时候他们便去巴拉顿湖畔度周末。

是的，最近几年关于要孩子的事他们只字不提。虽然他们嘴上不说，这种想法却常常出现，占去他大部分的沉思默想。他认为，最近这种想法越来越占主导地位，颇象一只善战的狗，当它烦恼的时候，转了小半圈后，回到原来的地方，吠得更凶。有好长一段时间他在纳闷她到底真正想些什么，尽管她早声明过数次，"我可不要孩子。要是我送孩子上幼儿园或上学，人家还会以为我是孩子的奶奶呢。我可不要孩子哟。"去年他看见从她手提包里掉出几颗避孕药丸的时候真相就大白了。

思想也是错综复杂的。同一个人常常有不同的想法；两个人的想法就更复杂罗；想法是从不吐露出来的。话语也是如此。

他们要从伦敦捎回地道的英国服装。"纯羊毛的。"

英国博物馆……白金汉宫……海德公园……肯辛顿花园……一百一十米高的圣保罗大教堂……伦敦植物园里富丽堂皇的棕榈树温室……海格特墓地①的马克思墓……

① 英国大伦敦北郊的一个墓地。内有马克思及其家人的坟墓。

要孩子究竟有什么好处呢？

活的记忆到底能存活几代人？顶多两代人。

这还得父母在比较年轻的时候生孩子才行。生孩子越晚，同孩子的差距越大：孙子们充其量只在下陷的墓旁记得祖父母。只有在最特殊的情况下记忆才能加深；否则，谁想去加深它呢？

他们不能错过参观伦敦植物园里的威廉·钱伯塔……据说这是同类塔建筑艺术中最杰出的。

他们的卧室同洗澡间只有一薄门之隔。跟他们合住的住户的小女儿正在门那一边同住在一个楼里的小朋友大声说话，直言不讳的谈话——用孩子们惯常说话的方式。这事发生在前年，可是她们的谈话却铭刻在他的心中。那两个姑娘约莫九岁或十岁。她们边给玩具娃娃洗衣服，边聊天。开头，她们谈论如何躲避晚上洗脚和刷牙等琐事；接着话题转到另一个姑娘外祖母的死上。那小姑娘——两个脸蛋红得象两朵玫瑰的健壮、胖呼呼的孩子，他在门口的过道和楼道见过她几次——正在对这事发表她的见解呢。

"她死了，死就死了呗。"她说。"说实话，我一滴眼泪也没流。我用小手绢死劲揉眼睛，把眼圈揉得红红的，要是我妈发现我没哭，她会在家里让我吃点苦头的。我免不了要挨罚，她会扇我耳光。其实我干吗要哭呢？"

她们聊天的时候水龙头的水一直叮叮咚咚地流入脸盆里，接着盆里的水哗啦哗啦往外四溅的声音倒很象农妇们在溪边洗衣服。"为什么？因为每个人都得死。她现在死了，死

了就死了呗。再说，我对她什么也不知道。我们不常去看她。每次去，她老给我喝加奶的咖啡，还老穿着一身黑衣服；她房间里有一股怪味。我不想去看望她不是明摆的事嘛。我只知道她叫格罗姆伯伊·久拉太太。对她我知道的就这么些。其他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我干吗要哭呢？她的姓格罗姆伯伊后头有一个l和一个y。就这么些。但是，比方说我曾外祖母叫什么——我可一点也不知道。再说，我才不管它呢。也许我根本就没有过曾外祖母。”“你是一头笨驴！”另一个姑娘说。就在这个时候门铃响了两下：那是他的一位朋友，为公事来找他的，于是他不能再接着听她们的对话了。

当天他把自己如何偷听，并且把窃听到的话学给柯蒂听。他们俩都非常高兴，哈哈大笑起来——更确切地说，他们是用笑声在互相鼓励。这真是一件苦差事呀。

也许这关系不大。有没有人去墓地看你的坟或许无关紧要；他是不是在万灵节①那天带着菊花和插在铅支架上的蜡烛，并弄来一个以此为生的陌生人，花五十个福林打扫你的坟（或者包括铺草皮在内，花它一百二十个福林），也许都无关紧要。或许他们是不是记得你也无所谓。可是，你去了以后——是的，重要的是你活着的时候，你应该相信——你也许会相信——是不是有人会记着你又有什么关系呢。重要的是想法，以后会发生什么事就别去管它了。想法是很重要的。不过，要是没有孩子，就不会有这种有所寄托的想法罗，那

① 天主教为死亡的人定的扫墓日，在十一月二日。

时你在去世以前就死去了。两个老头老太太坐在自己房间里，或在巴拉顿湖畔别墅的凉台上相对而视。两个惨然一笑的人儿……

他今年四十六。比方说，他在四十七岁上可能当父亲。太晚罗。哎，是的；当然，太晚罗。他的切身体验告诉他，只有你过三十岁以后才逐渐真正深深地爱你的父母。大凡男子都是如此。或许妇女和姑娘有所不同。一个孩子的爱只不过是一只小动物对自己博识的主人的依恋。另一方面，到了青春时期，他便开始有主见了；十几岁孩子的眼睛是敏锐的，他们会看出父亲和母亲远不是全能的。接着，从二十岁到三十岁之间，女人又占据男人的整个思想，他甚至经常野心勃勃，想去闯世界．大干一番：大腿、嘴唇和雪白的牙齿是那么迷人……实际上，只有等他上了三十岁，头上第一次长出几根白发，回首往事他才理解自己的父母。也就是他们向他讲述他的童年时代，他的恶作剧，以及对其他人来说毫无意义的事情的时候——到那时候他才开始对他们抱有真挚、深刻的爱。他这才明白为什么十多年前他们不赞成他不顾一切地狂爱这个或那个女人的原因。只是进了监狱以后，他用一个小勺子从锅底迫不及待地刮稀粥的时候，他才明白自己做孩子的时候，父母从来不许他把一小口面包扔在桌上的意义。他才会发现，要是父母去世了，自己的童年也会随着逝去；他现在唯一能做的是把自己孩提时照的、已经褪色的相片拿出来给人看．那时他脸蛋上露出两个微笑的酒窝，坐在圣诞树下，面前摆着一台玩具蒸汽压路机；然而现在凡

是见到那张相片的人仅仅把它当一张画看待，如此而已。那小家伙同他父母一起去世了……四十六——如果他要得到他现在还是一个婴儿的儿子的爱，那么，他非得活到八十岁不可。

五百……现在可能不止五百下了，因为快结束的时候，他往往有意少数几下。

他一直在两个浮标之间游来游去，剩下最后一百多下的时候，他便转向湖岸游去。他现在停住了——水没到他的腰。太阳低低挂在蒂豪尼山上。他已经完成定额。他看了看被阳光映衬成金色的桥，觉得很晃眼。

他心想，明天会是一个好天。他猛地打了一个寒战：太阳不再那么暖洋洋的了。他加快脚步蹚水上岸的时候，把膝盖提得老高。在防波堤上，有一个妇女在洗头；在湖的这一带再见不到一个人影。在上班的日子，这里不常有人来。他正在享受水的阻力，水在他膝盖四周咕嘟咕嘟地冒着泡。突然，他感到有什么东西在碰撞他的腿，这东西不会比小橡子大。他觉察到了，却没有去理睬它。他想，一定是一小片芦苇。他跨了几步以后，那个东西又碰了他一下。他低头一看——原来是一只甲虫。它看上去象半个球体，圆屋顶形的；在它黄色的硬翅鞘上有许多黑条纹：每个翅鞘上有五条斑纹。他能辨认出匈牙利土生土长的几乎每一种寄生虫，而对这种则比对其他任何一种寄生虫更为熟悉——那是马铃薯甲虫。不错，拉丁学名就叫马铃薯瓢虫。他四下看了看：有几只漂浮在水面……它们想必是从很远的什么地方被昨天的

大风刮到水里来了，现在正向湖岸漂去。这没有什么新奇的：它们早已在全国各地繁衍——主要是因为初期虫害控制一向搞得太马虎所致。此外，由于种种原因它们变得相当难控制了。它们在整个夏天产卵，而且在所有地方都能看到它们处在虫卵、蛹、幼虫和甲虫的各个阶段。它们不仅吃马铃薯，还吃西红柿、烟叶、茄子以及其他十多种植物。当然，现在允许你说这些事了。明年，局里要用捕食生物昆虫向它们开战了。

他眼前的这只甲虫还活着。它们在水里居然能活那么长时间，真是令人难以置信。它们靠踢蹬着腿，把它们腹部的一侧稍稍抬出水面，这样它们就能呼吸了。他小时候，常常手里拿着沾汽油的一小块棉花放在锹形虫鼻子前，看到它们还活得很欢，感到非常吃惊。他正要往前走的时候，猛地记起蜘蛛在两个灌木丛中间织的网。他抓起甲虫放进游泳帽里。他常常去喂蜘蛛——作为偶尔疏忽毁了它的网的补偿；这几乎是每天都发生的事。然而，蜘蛛会在每天夜里准确无误地在原来的地方再织一张新网。

他现在已经走到离洗头的妇女很近的地方，他认识她。那是住在湖畔的那位老奶奶：一位六十开外的老者，身体还很硬朗。他向她打招呼；她从肥皂泡沫组成的小瀑布下回答说："我只好这个时候才洗头。那些小家伙从不让我有一点闲工夫。现在他们正在捡柴火，准备今晚点火熏蚊子，我就赶紧抽空洗个头。你简直一刻也不得安宁。"他没有看她的脸，不过从她抱怨的话语中，他听得出她的声音里深深包含着骄

傲与欢乐。他的邻居们这些日子里正在第二次修剪柳树篱笆：剪下的柳枝很好燃烧，就象烧油一样，可是要是枝条不太干，会熏得乌烟瘴气。

他从防波堤啪哒啪哒地走下来，顺着踩实了的小径跑回别墅。他感到冷了。

她依然坐在他出门时坐的地方：用一支铅笔在拍打自己的嘴角，看着他进屋。她的体形在毛烘烘的浴衣下没有显露出来，其实他也知道那体形并不非常美妙。

“你来的正好，”她说，“我苦思苦想了一个钟头，怎么也想不起这是谁：‘歌剧演员；其夫婿因同情左派遭德国人迫害。不畏折磨，誓不出卖丈夫。受刑时因伤致死。留下十一封信。’”

他不经思索便回答：

“萨波·伊伦卡。你不知道，那不可能……我得赶快去披上点什么。可冷啦。”

不一会工夫他就从房间走出来，身上穿着一件褐色的厚运动衫。

“我当然知道，”她说，“明天，也许，或者后天我会马上想起来。可是，有些事会常常突然想不起来。你没有觉察到吗？或者是不是只有我会这样呢？”

“绝不是那样。这种事在每个人身上都会发生的。”他走到他刚才把帽子扔在那里的帆布睡椅前。他捡起帽子，从里面提出甲虫。“瞧我抓到什么啦——一只马铃薯甲虫。”

“噢。”她没有太答理他：她的心思已经跑到其他事情上

头了。

"准是被昨天的风卷进湖里去的。"

"是的。"

"我把它拿去喂我的蜘蛛。不知道它会怎么对付这只带硬壳盖的甲虫。"他走下台阶，站在两个灌木丛前面，细细观察蜘蛛网——一码见方的织物——看什么地方织得最厚。

"你知道，"她说，似乎他们刚才一直在议论这个话题，"咱们得弄清楚八月里在伦敦科文特花园或阿伯特纪念堂到底上演些什么。咱们在英国至少得去看一场芭蕾舞呀。下次给史蒂夫舅舅写信千万要记着问这事。"

他轻手轻脚地把甲虫送进蜘蛛网里。网一颤动，缩在网边的蜘蛛象坐在弹簧上似的马上弹了起来；它的全身显然又紧张又兴奋；可是它暂时不动换，只是在等待，随时准备扑过去。

"要是没有演出，咱们就把旅游推迟到九月份。你说呢？"

"好吧。"

甲虫在踢蹬已经被缠在网里的腿：颤动传到蜘蛛那里，它似乎就是在等候这最新的、确实的信号，噌地蹿上去，用两双前腿支撑着身体，开始用两双后腿将从它腹部末端排出的丝线，令人难以置信地把比自身大得多的甲虫灵巧地捆成一个圆球。起先甲虫似乎被透明的纱线缠绕着，接着被罩上毛玻璃，最后好象被套在不透明的帆布袋里。现在甲虫看不见了；只剩下一个形状。

"它把甲虫吃了吗？"她问。

蜘蛛又检查一遍那一包东西，知道捆结实了以后，便走回网上方的边缘。

他知道她对这类事情不感兴趣，而且他也不想费劲去多加解释。“吃了。”他说。他从蜘蛛网前走回去，站在屋角，下面是一片柔软的灌木丛。他凝视着蒂豪尼山的方向。太阳西沉了；湖岸送来的凉风吹拂着他的脸。

不多一会，她便从扶手椅上站起来，走到他身旁，也凝视着蒂豪尼山的方向。“嗳！”她叹了一口气。“时间过得多快！我去煮点茶，咱们喝红茶就凉肉夹面包吧。怎么样？”

“好哇。”他说。

现在她又象浮想联翩似地，说：

“你瞧，人们对那个叫贝里奥佐娃的女人和皇家芭蕾总是赞不绝口。”他还没有张口回答，她又补了一句：“哪儿来的一股怪味。”

“他们在烧干草。”

“他们是谁？”

“湖岸下的那些孩子，”他说，然后赶紧加了一句，“我不会忘记的：咱们问问史蒂夫舅舅……”

张春风　译

曼蒂·伊万

电影院的早晨

〔**作者简介**〕 曼蒂·伊万(1918——)，匈牙利著名小说家。曾获尤若夫·阿蒂拉文学奖。早期作品描绘小资产阶级的人物世界，多以布达佩斯郊区为背景，后期创作主要反映作家、艺术家、知识分子和青年的生活与矛盾。他的写作手法颇似新现实主义，情节紧张而富于戏剧性，场景变换不定，叙述抒情，具有独特个人风格，很受青年读者欢迎。代表作有：《法国人的钥匙》、《陌生的房间》、《路旁》、《古时候的电影院》、《鼠警》、《从游泳池上来的姑娘》、《洒水车》等。他还写过剧本，其中《深水》在1978年已搬上银幕。

“我记得她头戴蒙着面纱的帽子，用一只手心托着下巴颏，两个手指中间还夹着一根长长的香烟烟嘴呢。”

“我记得他身穿燕尾服，头戴大礼帽。即使在屋顶上追捕盗贼的时候，他也穿着大氅。他手里拿着银头手杖，他会用那根手杖头对你投出一把匕首之类的东西。只要他高兴，还可以用那根手杖头射击呢。”

“波尔斯特·雷娜托”，围着灰披巾的女人点头肯定，“是的，她就叫那个名字。她的每一部片子我都看过，还把所有的片名抄在小本子里。连那些扮演她对手的男角的名字也记下了。”

“伦多·本恩，”公共汽车售票员说，“他是第一个演侦探片的。在他红极一时的时候，霍尔默斯·哈里还不知在哪儿呢。”他望着那个女人。“您知道，有一次他就是用那根银头手杖射出子弹，把一个盗贼打得全身都是窟窿。”

他们坐在影院门廊的黑色小安乐椅里。这地方颇象一个车库：你经常会看见他们身后有扇门突然打开了，一辆汽车缓慢而威严地驶进来。他们身旁响起纸张摩擦发出的沙沙声。一个遥远而清晰的声音，好象有人在说梦话似的讲起话来：

“看早场最合适。总能买到票。”

外面街上还是灰蒙蒙的一片；你时不时能看见一辆电车驶过，或者出现象棍子那么细长的人影。

那妇人揪着自己的披巾。长长的头发从她那顶花盆帽下垂下来，那张满是褶子的脸又接着说话了。“永远不会再有象波尔斯特·雷娜托那样的电影明星了。”

“泰勒呢？”售票员问，用手指背抹抹修剪得短短的白唇须。“泰勒·安妮托的名气也很大呢，我看您会同意的。”

一个引座员穿过门廊。她正在吃椒盐脆饼干，她所到之处都下了一场饼干屑雨。

“花生，”售票员说，“我老喜欢在电影院吃花生。不单我一个人爱吃——可不，整个电影院都撒满一层花生壳。”他停顿片刻：“大伙老得把广藿香塞在脖子底下，否则半场休息的时候，您知道，引座员会带着那种液体的喷雾器溜到您身边来，一眨眼工夫您身上就香极了。”

“泰勒！”围灰披巾的女人盯着售票员，如梦初醒。“您可能还不知道，其实那女人是在波尔斯特·雷娜托的一部片子里第一次上银幕的。当时她的戏很少。只不过是一个跑龙套的角色。”

“霍尔默斯·哈里戴的是花格布帽，”售票员说，一直在点头，“那不是什么上等的料子。谁都能买到一顶花格布帽，不过戴着大礼帽从烟囱下去，只有伦多·本恩才干得了。”

“大傻瓜才干那种事。”

售票员没有马上回答。他瞄了一眼休息室的酒吧间，那里空无一人，只有冰冷的杯子架。然后他转向穿绿外套的男人。

“看过伦多·本恩的片子吗？”他问。

“那真是虎口余生啊！”穿绿外套的男人回答。“想想看，他得穿着燕尾服，戴着大礼帽飞檐走壁哩！”

两个小男孩在他们周围钻来钻去。其中的一个举着两个手指做了一个用手枪射击的姿势。

“我是伦多·本恩，我要开枪了。”

"就是那个样子。"售票员说。

"完全不真实。"

"有一次，"围灰披巾的女人打了一个寒战——"是的，有一次波尔斯特·雷娜托从城堡主楼的窗户跳出去。她遭到克尔特茨·巴里的追击；克尔特茨·巴里原先在这里的市政剧院演话剧，后来才在那部片子里扮演强盗骑士的。"

"哧！"穿绿外套的人做了一个不耐烦的手势。

"波尔斯特·雷娜托从悬崖上一直滚下来，接着——门开了，波尔斯特·雷娜托便大摇大摆走了进去。"

"唔，我尊敬她，也佩服她！"穿绿外套的人鼓起两个腮帮子怒视着，好象有人正朝他开枪。

"我相信我看过那部电影，"售票员说，"叫《神秘之夜》。"

"《复仇之夜》。我还记在小本子里呢。诺曼·罗纳德演王子，克尔特茨·巴里演强盗骑士。"

两个男孩目瞪口呆地凝视着她。其中的一个冷不防用指尖顶着另外一个的胸口。

"你是强盗骑士！"

引座员打开一个旁门。一排排的空座位在灰白的灯光下隐隐可见。孩子们朝它们冲过去；一只书包左右抡了起来……练习本掉了一地。

"对不起，您们现在可不能进去。"门关上了。

围灰披巾的女人盯视着那扇门。

"有过一次舞会。"她说。

发现其他人都坐在安乐椅里，没有提任何问题，她只好

自言自语：

“有一次这里举行了一个舞会。”

她周围的寂静仍在延续，然后他们才慢慢转向她。开头是售票员，接着是正在大口大口使劲咬苹果的那个上岁数而有点发福的女人，最后是穿绿外套的男人。

“一个舞会？”公共汽车售票员问。

“有这种事！在这？在这电影院里？”那丰满的女人迟疑地拿着苹果，好象要递给某个人似的。

“难道找不出一个比这更好的地方了？”穿绿外套的人说，把嘴撅得老高。

围灰披巾的女人把手在空中一挥。

“乐队就在上面的顶层楼座，”她说，“这影院的老主顾都应邀参加了舞会，还分发礼品呢。”

“您刚才说什么？”穿绿外套的人询问；售票员再次问她：

“您是说一个舞会？”

“一次招待会，同名演员联合举办的。”她顿了一下。“当她走进来的时候，乐队吹起响亮的喇叭欢迎她。我们尽管知道她来了，可还是不敢相信。然而，当她站在那里，就在你眼前的时候，你几乎认不出她来。至少乍一看认不出来——她本人同在银幕上的样子太不一样了。”

公共汽车售票员向前凑了凑。丰满的女人不敢咬她的苹果。一个姑娘站在围灰披巾女人面前，连她也没有说话。

售票员终于问道：

"您刚才说谁在这儿来着?"

"波尔斯特·雷娜托。"

售票员站了起来:"不行!您别这么说，您要知道。"他环视了一遍门廊——越过写着"出口"的门，能看到隔壁屋子的隔墙。

"我从她的微笑就能认出她来。没有一个人有她那种独特的微笑——大名鼎鼎的波尔斯特·雷娜托的微笑!记得吗?有一阵大伙都把欧文·艾雷娜比作波尔斯特·雷娜托第二呢。瞎扯!"

"您可不能那么说,"售票员依然站着，"在这儿?就在这破影院里?……"

"怎么不能?"穿绿外套的人说,他脸上的表情就象咬了一口酸柠檬。"她该到什么地方呢?兴许该去音乐厅影院?或者是雷加松影院?再不……就是钟古尔影院，不能差于那个影院!他们直接把她带到这里来了。"

"是的."围灰披巾的女人说，点了点头，"波尔斯特·雷娜托本人要求带她到这里来。那是她的宿愿。"

"要求带到这里?"穿绿外套的男人退缩了。"这儿，带到这能闷死人的小地方来?"

"她最忠实的观众都来这里——她都知道。她的每一部片子都在这里上映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他们把这情况告诉她。不，她才不愿意去别的地方呢。"

"那她连布达佩斯也不愿去啰，对吗?"

"她是通过她的秘书事先安排的。他也来了，她的秘书。

他喝红酒，上楼到顶层楼座去看乐队。大伙都担心他会摔下来，因为他确实喝多了点。可是他没有摔下来，却跨坐在栏杆上，还在摇晃着一条腿呢。”

“波尔斯特·雷娜托！”老妇人说着，又咬了一口苹果。

“她还跳舞了呢。我记得，她跳了好几次舞。”

“不错。同国王公司的制帽商们跳舞来着。他们在影院隔壁有一个商号。”穿绿外套的人看了她一眼。“她还同伊德，那位专给绅士和贵夫人做头发的理发师跳了舞，波尔斯特·雷娜托是同他跳过舞，也同罗慕察伊餐馆的老板罗慕察伊跳过舞。还想听听更多的名字吗——或只提其中几个有名望的？”

公共汽车售票员这才坐下，呆呆地凝视着远方。“波尔斯特·雷娜托？就在这个破地方？”他仰起头。“这么说，伦多·本恩也该来过这里啰！”

穿绿外套的人一拍自己的膝盖：

“当然他也来过这里——尼格里·波拉、阿斯特尔·尼尔斯和诺瓦罗·拉蒙也都来过这里。”

售票员望着围灰披肩的女人。

“伦多·本恩怎么没来参加舞会呢？”

“我不知道，”她说，“不过波尔斯特·雷娜托来过，而且确确实实跳了许多次舞。她向人群散花，还给大伙签名留念。她总是笑吟吟的，不过我从她眼睛里看得出她很伤心。”

“真的？”又是穿绿外套的人问。“您真幸运，连这都看到了。恕我问一句，什么事使这位女演员那么伤心呢？”

其他人也都凑过去，急切想知道为她在这个电影院里举

行舞会的夜晚，什么事情使这了不起的波尔斯特·雷娜托那么烦恼。

引座员打开影院后部的一扇门。在刺目的灯光下露出一个铁梯子。

围灰披巾的女人把头朝那里转过去。好象那天夜里波尔斯特·雷娜托就是从那个梯子下来的，后来又消失得无影无踪。

“他们取消同她签定的合同。一个拍一部伟大历史片的合同。”

“噢，可怜的小人儿。”老妇人说，又从手提包里拿出一只苹果。

穿绿外套的人把手心撑在膝盖上，说：

“她告诉您那件事啦，是吗？但愿她是在一个角落里泣诉她的悲哀的。‘噢，亲爱的……我的片子完啦……’”

“是她秘书泄露出来的。”

“噢，我明白啦，”穿绿外套的人敲敲自己的脑门，“她的秘书，当然是他。”

“他们也该邀请伦多·本恩呀！”售票员环视四周后愤愤地说。“嗯，他在这儿也有最忠实的观众呀！”

“而且，”妇人接着说，“还是因为刚才说的那个泰勒·安妮托的缘故，她才被取消合同的。他们让安妮托演剧中示巴①女王这个角色——她从制片人那里巧妙地弄到演主角的

① 据《圣经·旧约》记载，示巴女王仰慕所罗门的名望，觐见所罗门，送他大量金银财宝和香料。所罗门也照格还礼。

合同。"她停住了；过了片刻后又说："波尔斯特·雷娜托从这里回去以后成了一颗陨落的星。她该责怪谁呢？泰勒·安妮托！这个她从贫民窟里搭救出来，起先在她主演的片子里只担任微不足道的角色的姑娘。"

她不说了，其他人也都缄默不语。唯有那丰满的女人贸然开了口：

"她怎么这样没良心呢！"

"在以后的一段时间里，波尔斯特·雷娜托还勉强支撑着，"围灰披巾的女人说："可是她演的角色越来越小。凡是有她参加的片子我都去看。我甚至去看那部她在里头演客厅女仆的片子，她的全部戏只是端着一个大浅盘子进来。有一次见到她，我还认定她是一个过路人呢。她正好小跑着横穿马路，从街这边跑到那边。以后——关于她就一点消息也没有了。"

"一点也没听说。"穿绿外套的人说。

一个小伙子和一个姑娘溜达着穿过门廊。他们冲围灰披巾的女人瞥了几眼，便朝后排走去。

"该开演了。"有人说。

"伦多·本恩也发生同样的事。"公共汽车售票员说着，还直点头。"他们完全中断了他的合同。"

"波尔斯特·雷娜托从电影界消失了。她回到家里。"

"她做什么？她回家啦？"穿绿外套的人的眼珠子几乎要从眼窝里瞪出来。

"她父亲在这儿，在洛沃尔德广场有一家门诊所。"

“我明白了，谢谢您！”穿绿外套的男人跳起来，冲到票房。不一会儿工夫就回来了，直挺挺站立在围灰披巾女人的面前。他向她俯下身去。他冷不防从衣兜掏出一个小本子，把它打开，递到她的鼻尖下。

“写在这儿！”他手里拿着小本子，一动不动地站着。见她仍然不吱声，便说：“给我们签个名吧！”

售票员也站起来了；其他人也都从安乐椅上站起来。一大群人围住那女人。她终于开口了：

“请别……”

“把您的名字签在这里！”小本子在那人手中颤动。“写下‘波尔斯特·雷那托’！”

有人在耳语。售票员已经晕头转向，用手指着她。

“哎呀！她……？”他跌坐在一张稍远一点的椅子里，仿佛被雷击了一下似的。

“我从来没有那么说，”那女人捂着脸一再重复着，“我从来没有那么说。”

“您应该说！您为什么不说。”

她站起身，朝出口处走去。

穿绿外套的男人手里拿着小本子跟着她。

“嗬！波尔斯特·雷娜托小姐！”

孩子们跳跃着把她围住，同声高呼：“波尔斯特小姐！波尔斯特小姐！”

她紧紧贴着墙，举起手提包挡住脸，好象要躲避拍新闻片的镜头似的。

门全开了。

穿绿外套的人仍注视着那女人好一会，然后把小本子揣进兜里，朝入口处走去。售票员跟在他的后面，围着灰披巾的女人走在最后。他们从旁门挨着走进放映厅。

张春风　译

查克·久拉

小偷与法官

〔**作者简介**〕 查克·久拉(1930——)，匈牙利作家，从事专业创作之前曾在地方报纸上当过新闻记者。曾获尤若夫·阿蒂拉文学奖和匈牙利总工会文学奖。1976年起当选匈作协书记至今。作品主要内容是探讨和反映当代匈牙利的各种社会问题。重要小说有：《两次圣诞节之间》、《梦的喧嚣》、《小偷与法官》(短篇小说集)、《常绿》、《最密集之中》等。

湖岸上有三个男子懒洋洋地躺着晒太阳。他们个个肌肉发达，皮肤晒成棕褐色。第四个男子在离湖滨不远的浅水滩蹚水，那里的四周有网围住，他小心翼翼，时不时提提腿，艰难地往前走着，鱼儿老咬他的腿，使他十分懊恼。

“这里又有人来过！”他冲那三个躺着晒太阳的人叫喊。

那三个人都立刻跳了起来，匆匆来到岸边。

“狗鱼还在吗？”那个看上去挺和气的内科医生问道，他是个白化病患者，白发悬垂在他清瘦的脸上，白眉毛下面一双安哥拉兔子般的红眼睛射出搜索的目光。“那是多好的一条狗鱼呀！”他说。“它是我上个星期抓到的最大的一条鱼。我本想把它煮来吃的。”

“全被捞走了。”那位长得很象吉卜赛人的机械工程师站在没膝的水里没精打彩地断言。

湖岸上的三个人无可奈何地直跺脚，用怀疑的目光注视着被搅混了的水面。

“这到底是谁干的？”工程师问。

“可能不是人干的，”律师接过话茬，“也许是别的什么动物干的。被狗叼走的可能性最大。”

其余两人分头在沙滩四周寻觅踪迹。

“什么痕迹也没有，”其中的一人说，“这家伙仿佛是从空中来的。”

“那可能是鸟……”

“没那么回事，”内科医生摇摇头，“既不是飞禽，也不是走兽。偷咱们的鱼的贼专挑好的。这说明他是一个智力相当发达的高级小偷。”

“可是他怎么能飞到这儿来呢？”

“是从水上来的，”医生继续说，“他从那边长青草的碎石浅滩蹚水过来，又从那儿溜走了。这家伙倒还有点头脑。”

* * *

他们中间有人提出建议：组织起来，晚间轮流看守。他们确定了换班的时间，还规定好看守的地点。这游戏使他们精神大为振奋；要知道，这是名符其实的狩猎：他们一下子全成了捕人的猎人。

* * *

第二天清晨，他们就把偷鱼的贼逮住了。听到值班的发出预先约好的暗号，呆在为垂钓者准备的一间茅屋里的三个伙伴立刻冲了出来，转眼工夫便把那个陌生人按倒在地。他是一个邋邋遢遢的矮个子男人，五十岁上下，肥胖的脸上胡子拉碴，一双似睡非睡的猫眼滴溜乱转。这次伏击来得那么突然，他只好束手就擒，被四条壮实的汉子团团围住，铁一般的手臂把他拽到湖岸边那间孤零零的茅屋里。他们把他按在一张凳子上，围着他站成一圈，很有兴味地观赏那个头脑简单的猎物。那家伙有些手足无措，坐立不安，困惑不解。

这一收获使他们顿时精神大振；他们象一群猛兽，把猎物放下，还没有饱餐一顿之前，沉醉在胜利的欢乐中，暂时忘却饥饿在袭击肠胃，全身还在微微颤抖。

第一个镇静下来的是内科医生，他是同伴们公认的头头，是他们当中的首脑人物。

“大家都坐好，”他用邀请就坐的优美姿势让同伴们围着那个家伙坐下，自己却神情严肃地在屋里踱起步来。

同伴们坐好以后，都带着好奇的目光注视着他，因为下一步该怎么办，他们都胸中无数。

“我们得先把情况弄清楚，”内科医生说。“这位先生，”他

指着那个小偷，“已经落在咱们手里，可他还不知道咱们都是些什么人呢。因此，咱们有必要向他作点自我介绍。拉比，你告诉他，我们是干什么的。”

拉比不情愿地站了起来，装出一副一本正经的样子，引得内科医生差点为他的那副傻相笑出声来。拉比是这个四人集体中最没有能耐的成员，在许多场合，他往往是同伴们取乐的对象。

“我们都是好朋友，”他说着，象个怯场的演员，用手去挠挠从敞开的花格衬衫露出来的浓密的红胸毛。他的头发是棕褐色的，但他那长得密密麻麻的硬胡子却是红的，而且长在上嘴唇的那一小撮毛刷胡子也是红的，每当在同伴们的唆使下偷偷摸摸做恶作剧时，他觉得自己很象一个地地道道的西班牙流浪汉。

“我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成为朋友的？”内科医生用新的提问来帮助拉比摆脱窘境。

“在我们念中学的时候。”

“好得很。”

“现在该告诉他：我们多大年纪？”

“三十二岁。”

“好极了。我们聚在一块时，都喜欢干什么？”

“步行疾走，或者坐车追逐女人。”

他不禁被那些愉快的回忆引得咧开嘴笑了起来。

“妙极了，”内科医生兴奋地说。“我认为，这番介绍已经足够了。现在，咱们再挨个做自我介绍吧。亲爱的拉比，你

是什么职业？”

“唔，……点牌者。”

“也就是说，玩牌的时候，总要有一个人最后负责计算输赢，你就是干这一行的，对吗？”

这种答非所问的回答使拉比自己也咧嘴笑了，连那个小偷也忍不住张嘴想笑呢。末了医生也乐了；茅屋里顿时爆发出长时间的哈哈笑声。

“瞧，我们就是这么一伙乐天派，”医生边说边用手背抹去脸上笑出的眼泪。“不过，靠他是计算不出输赢来的，对吗？”他又扭头问拉比。

“嘿，嘿……”拉比摇摇头。“我们可以用电子计算机算分呀。”

“妙极了！”外科医生高声叫好，用地地道道沿街吆喝的小贩腔调继续说：“电子计算机对他最适用！”随后，他突然又变得认真起来，指着那个吃惊的俘虏说：“朋友，您明白这个意思吗？”他自己接着立刻回答说：“很显然，您是不了解的，至少理解不了其中的奥妙。”他轻蔑地挥挥手，脑子里又闪过一个奇妙的主意，再次转向拉比：“我确信，你大概愿意让我们的朋友参与你的秘密。”

拉比不明白有什么必要这样做；可是他一向服从惯了，因此也就点头表示同意。

现在，医生又叫那个肤色有点黑的工程师，可是工程师对扮演丑角不太热心，喃喃地介绍自己是工程师。

“对，你是工程师。”内科医生重复了一遍，随即又转向第

四个伙伴。因为他看出工程师虽不想凑这个热闹，却也不想把这场游戏给搅和了，叫同伴们扫兴。“他呢，是法学家，换句话说是律师，他也许愿意?”他介绍那位胡子修剪得整整齐齐、身材魁梧的汉子；这位法学家立刻从椅子上蹦起来，在俘虏面前喀嚓一声立正，向他伸出手去。

“贝尔特奇博士。”他说着，狡猾地把手直朝那个蓬头垢面的俘虏的耳朵伸去，顺手使劲拧他的耳朵。小偷象野兽似的发出一声怒吼，由于疼痛和受辱，他挣扎着想站立起来，法学家便照着他的胸脯给他一拳，只听砰的一声，小偷又跌坐在椅子上。

“咱们得按照秩序来，”内科医生提醒他那位激动的朋友，把他推到一旁；然后，自己也推推那个还想重新站起来的俘虏。“少安毋躁，老兄。我们个个身强力壮，可不是好惹的；您可不要乱说乱动。”与此同时，他向法学家瞟了一眼。“您要知道，我们是仇视暴力的，因为我们大家都是有文化教养的知识分子。”

他沉默片刻，灵机一动，想出一个新点子，便说：“看来我们的自我介绍进行得很不错。现在，该轮到我们问您了，您是什么人？叫什么名字?”

这时，那个邋邋遢遢的小偷才明白原来这几个人远非开始看到的那样和蔼，他绞尽脑汁不知该怎样对付他们才好。他摸摸那只被拧得发红的耳朵，嘴里嗫嚅着：

“沙布·拉约什。”

“原来您叫沙布·拉约什。”内科医生说。“可是为什么长

着一颗贼脑袋，亲爱的拉约什？”

这时候，那个被定为贼的人着了慌。他冷不防用劲把医生推到一旁，向门口冲去。然而拉比反应很快，一步蹿过去把他绊倒，在法学家的协助下又把他拖回来，用一根皮带把他捆绑在椅子上。

“放开我！”他大喊大叫。“我六点钟得到堤坝哨所去呢！”

医生乜斜着眼睛，漫不经心地站在俘虏面前，说：

“拉约什，您就想这样溜啦？您既然敢来这里扰乱我们平静的休假，偷走我们的鱼，难道我们能不整您一下就让您走？”

“我赔！我身上有钱！”他高声叫喊。

“是的，您瞧，”医生虽然对钱无动于衷，却温和地说，“您有钱，可您还要偷东西，要是我们现在把您放走啰，您又可以再去偷啦。”

那个人带着阴沉、仇恨的目光打量着他们。他安静了一会儿，接着又大叫大闹：

“现在您们打算怎么处置我？难道要把我绞死不成？！”

“这个主意不坏。”法学家接上话茬儿。

他环顾四周，观察朋友们的脸色，看出他们同自己想到一块了，事态已经非常明朗，游戏也接近尾声。

然而内科医生又想出一个新花招。他装着心事重重的样子来回走着，象在作出重大决定似的，细声细气地说：

“亲爱的拉约什，您得接受治疗。您身患重病，给社会带来危害；因此，我们有责任治好您的病。”

“我什么病也没有！”拉约什大声叫喊。

内科医生收住脚步，显出怜悯的样子拍着“病人”，用谈论流浪艺人的那种腔调说：

“瞧，朋友们，如果一个人象他那样缺乏起码的智能，会落到何等地步！咱们要谴责这种现象！只要他是一个有教养的人，就应该明白，扰乱他人的宁静和偷窃他人的东西都是不允许的。可是这个不幸的流浪汉怎么能懂得这一切呢！在这里，我们不是要惩罚这种人，而是要教育他！因此，我们作为有文化修养的人不能眼看着这个无知的家伙遭受愚昧的折磨，而是要把他从黑暗的包围中拯救出来，让他领略光明的精神世界。”

拉比和法学家为他这一精辟的见解鼓掌，工程师却只象往常那样淡淡一笑。内科医生微微鞠了一躬，善意地拍拍那个人的肩膀。

“拉约什，您落到好人手里算您走运。为您的幸运祝福吧！我们马上开始教育您，然后您会作为一个新人离开我们。”

“咱们还是先吃早餐吧，”工程师站起来，伸了个懒腰，“不然我先去游泳。什么时候轮到我，就什么时候叫我好啦。”

“你打算对他讲授什么课程？”内科医生问。

“也许可以从初等数学开始吧，”工程师用那种对这种游戏已经感到厌倦的口吻说。然后，他走出茅屋游泳去了。

小偷不理解医生讲的那番话的含义，只是一个劲儿地叫喊，说他必须到堤坝哨所去，他是水利局的挖泥工人。

因为他叫喊得太凶，他们便把他的嘴堵住，把他捆得更紧，然后他们全都游泳去了。

*　　　*　　　*　　　*

他们用平底锅煎香肠，围躺在火堆旁吃了起来。

“今天又是一个大热天。”他们中间有人这么说了一句。

“咱们怎样处置他？”拉比朝茅屋那个方向翘翘下巴颏，问道。

“咱们得教育教育他。”内科医生边吃边说。

“把他放了算啰。”工程师喃喃地说。

“你的意见怎么样？”医生转身问法学家。

“那个家伙是个小偷，”法学家说，“依我看，他理应受到惩罚。”

“能私设法庭吗？”工程师提出反对。

“谁在这里私设法庭啦？”拉比问。

“咱们在这里使用了暴力。”工程师回答。

“你总是爱说漂亮话，”法学家说。

“那就把他交给公安局，”工程师口气强硬地说。

“怎么个交法？”内科医生问。“你无法把车子开进村子里去。这里离城四十公里。你是不是打算绑着他步行到村子里去？要是他在半路上叫喊，你是不是得堵住他的嘴？或者把他捆着塞进汽车，由你送他到城里去？”

“把他放了吧，”工程师轻轻地挥挥手，“他又没有偷走什么大不了的东西嘛。”

“满不是那么一回事。”内科医生说。“要是有机可乘，他

会偷走咱们的钱和衣物的，我从他的相貌一眼就看出他是存心作案的小偷。他就是那种在村子里游手好闲的二流子。瞧他那副鲁莽相。我就是讨厌这种人。这种人要是看着你不顺眼，两分钟之内就会把他的匕首插进你的肋骨。既然咱们逮住了他，是请求他原谅，放他走，还是教训他一顿，这两种处理方式究竟哪一种更符合道德呢？”

拉比胡思乱想起来。

“要是把他放了，他晚上会回来把咱们全宰啰。他准有一帮狐朋狗党。他对这里的道路了如指掌，在偷走咱们的狗鱼之前，对这里的情况显然进行过周密的侦察。放他走了以后，出于复仇或者畏罪，他随时都有可能回来杀死我们，因为他担心我们会去报案。这地方太偏僻，他们把我们杀了以后连痕迹也不会留下。也许咱们的尸首也找不到的。他们会把咱们扔进湖里去。”

他恐惧地凝视着在阳光下碧波粼粼的湖面。

“别胡说八道了，”法学家警告他说，“咱们是四条汉子啊。你还记得咱们在克拉科夫① 的酒馆里是怎样维持秩序的吧。”

“别说了．开始吧。”内科医生说完，站起身来。

* * *

首先是法学家给那家伙上关于罗马大法的课，讲解的时候声音洪亮，夹杂着使用了许多拉丁词汇，接着是拉比以老练的专家的口吻进行解释。

---

① 波兰的城市。

“拉约什，这么讲您明白吗？”内科医生不时地在一旁插话。而拉约什压根不予理睬，眼睛里放射出阴沉、仇恨的目光。

“咱们还是教他学英语吧。”拉比向医生提出建议，并把这个异想天开的想法告诉拉约什说，如果他肯学英语，他们就放他走。“跟我念，收－音－机，”他欠身把嘴凑近拉约什的脸，好让他看清楚自己讲英语时发音的嘴形。“注意听！我再重复一遍；只要您跟我学，我们就放您走。我们会放他走，对吗？”他转身问同伴们，他们都高兴地点头表示赞同。

拉约什尽管心怀疑虑，还是把学英语当作唯一的救命稻草紧紧抓住不放，两只眼睛看着地面，鹦鹉学舌似的胡念一气，根本不去模仿拉比发音时的嘴形，这又把大伙给逗乐了。

“您们把我放了吧！”拉约什恳求着，可是拉比否定地摇摇头。他又说出一个新词，接着又是一个新词，这等于给那个失望者留下一个又一个的希望。

“够了，别再折腾他了。”工程师站了起来。

“你不愿意参加教育拉约什？”法学家问。

“不愿意。”

“你放弃拯救一个人的义务？”医生问。

“是的。”

“你逃避共同的责任？”拉比问。

“是的。”

工程师抓起一本书，朝屋外走去。他走到门口，又回过

头来说：

“我再次向你们建议，要么把他放了，要么把他送到公安局。”

“这就是你的建议？”

“是的。”

工程师走了以后，医生转身对拉约什说：

“拉约什，您对这有什么看法？是不是希望我们把您放了？”

“是的，请您们放我走吧！”

“您保证以后不再来这里偷鱼？”

“要是我再到这里来，您们就打断我的腿好啦。”拉约什激动地嚷嚷。

“您用什么向我们保证呢？”

拉约什不明白他的意思，因此，医生又说：

“我们能相信您这一番话是诚实的么？”

“保证诚实，我说到做到……”

“不过，”法学家接过话头说，“您的行为本身恰好说明您是不诚实的。判断您将来的态度是否端正，只能在我们对您灌输诚实感之后，我们才能有把握。因此，请您注意，您必须继续学习，因为只有您的智力才是您获得自由的保证。”

“我向上帝发誓，我从此不再偷了！”拉约什叫喊起来，可是他们强迫他安静下来，让他继续听课。

他们对他谈论经济学、综合分析学，还尝试着教他学习

法语。他们还不断地向他提问，可是拉约什一个问题也不愿意回答，他们只好无限耐心地一再重复提问，直到拉约什不再反抗，低头喃喃回答，表示听课不是被迫时为止。

* * *

“大家休息休息。”医生提出建议。他们又把一个劲儿在挣扎的拉约什绑得更紧些，然后游泳去了。

这时，医生想起了工程师。工程师躺在离茅屋较远的草地上边晒太阳边看书。其他两人到深水区游泳去了。医生来到工程师身边躺下。

“你不觉得厌倦吗？”工程师问。

“我们现在刚开头。”医生说。“这可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

他们躺着晒太阳，过了好一会儿，他们才又交谈起来。

“你父亲过去是干什么的？”工程师问。“是药剂师，对吗？”

“是的。”

“你们家里曾经有过佣人吗？也就是说，给你们家洗衣服、打扫房间、做饭等等的人，是有过这样的佣人吧？”

“在我小的时候，也许有过。现在我们家里还雇着一个打杂的女工。可你问这种蠢事干什么？”

“我只是突然想起来问问。总之，你们跟拉约什的事还算顺利吗？”

“还可以。不过他的态度很顽固。”

这时，其他两个同伴也上了岸，来到他们身边躺下晒太阳。

“你们的方法不对头。”工程师说。

“为什么不对头?”医生问。

“要是有一个病人来找你看病，你得先诊断病情，对吗?”

“对于拉约什，我就是这样做的。他的病症是偷窃，因此必须进行治疗。”

“可是怎么个治法?”

“我们要启发他认识偷窃的危害性。”

“如果你诊断你的病人患的是心脏病，开方时你得考虑多方面的情况，比如怎么治疗，让他服用什么药更有效，而且你还必须了解患者的整个身体状况。但是，现在咱们只知道拉约什偷东西，却不知道他是什么人，采取什么方式对待他更有效，所有这些咱们全不了解。”

医生沉思片刻后，异常兴奋起来。

“老兄，你真伟大！你可说到点子上了！咱们得先弄清楚拉约什是什么人。”

“那还用说，”拉比瞧了法家学一眼，“公安局和法庭在审讯犯人时，也总是先调查违法者的背景。”

“咱们不用提问公安部门提的那种问题。”医生说着，站了起来。除了工程师，其他两人也跟着跳了起来。“你对盘问拉约什不感兴趣吗?”内科医生问工程师。

“我等一会儿再去吧。”工程师嘟哝着。

“难道说我们干的是一桩肮脏的勾当?”拉比问。“你尽说蠢话，”内科医生警告说，“咱们只不过向他提问，这有什么

见不得人的？刚才是咱们讲，现在该轮到拉约什说啦。”

*　　　*　　　*

他们朝茅屋走去。

“嘘，”拉比提醒同伴们注意，“咱们先偷偷地看看，他到底在干什么。”

他们蹑手蹑脚朝茅屋走去，然后分头从锁孔、窗户和门缝往屋里看。

拉约什已经不在原来的地方。他连同和他捆在一起的椅子都移动了位置，说准确些，连人带椅子翻倒在地，无法站起来。他象被翻了个的甲虫，挣扎着想站起来，但一切努力都是徒劳的。他的眼睛滴溜溜乱转，累得满头大汗。

他们三人欣赏罢这番景象，才进屋把拉约什从地上拉起来。

“瞧，您这是自作自受。”医生训斥他说。随后他们把塞在拉约什嘴里的布团取出来。“拉约什，看着我。以后别这样干了。您休想逃走。要是我们不答应，您也逃不了。看这儿，”他向拉约什显示自己强壮的手臂，然后又指一指身材魁梧的法学家，“看那儿！我们可象牛一样的壮实。”

“我不想伤害您们……”

拉比放声大笑。

“瞧他说的，他不想伤害咱们……”

“让我走吧，他们还在堤坝哨所等着我呢。”

“拉约什，他们不会等您的，”医生说，“要是到现在还看不到您，他们会认定您不会去了。”

“可是我得去呀，不然我就挣不到钱了。我正等着钱花呢。”

“您一天挣多少钱？”医生问。

“我们的劳动量是按立方土计算的，挖多少个立方土，就拿多少钱。”

“您一天能挣一百多个福林吗？”

“也就是一百上下。”

医生掏出一张一百福林的钞票，塞进拉约什装香烟的上衣口袋里。

“这是给您的工钱。您不用担心挣不到工钱啦。”

“我不要您们的钱。我要靠自己的劳动挣钱。”

“您就拿着吧，现在您也在劳动，就在我们这里劳动。”

“我不愿意在您们这儿劳动。我什么也不想要您们的！”

法学家推开医生，站到拉约什面前。

“拉约什，您听我说。您偷了我们的东西，我们当场把您抓住了。现在，您是作为小偷站在法官面前的。您得放规矩些，不然我就扇您的狗脸。”

他又去拧拉约什的耳朵，拉约什疼得大声叫喊。

“上帝救命呀！”

“至今我们还没有伤害您，”法学家接着说，“可是如果您不老老实实听话，小心我们把您揍瘪罗。”

内科医生又挤上前来说：

“要是您态度好，我们是不会伤害您的，我刚才说过了，我们不喜欢使用暴力。”

他用不赞成的目光瞥了法学家一眼；其实法学家也是不喜欢使用暴力的。

“您们想要我干吗？”拉约什叫喊，“就象那一位同志讲的，您们还是把我送到公安局去吧。”

“万一没有别的选择，我们会把您送去的。”医生往下说。“可是我们希望尽可能避免出现这种局面。我们愿意您改好，不要落入公安机关手里。”

“我没有什么好改的。”

“住嘴！”医生举起手威胁着说，吓得拉约什把脑袋直往后缩。“别害怕！我说过我们不会伤害您。我们只想同您谈谈。”

“您们想要跟我谈什么？”

这时，拉比抢前一步，对着拉约什吼叫：

“您叫什么名字？”

“我已经告诉过您们了。”

“您再重复一遍。”

“我叫沙布·拉约什。”

“多大岁数？”

“今年五十一。”

“住在哪里？”

“跟我娘住在一起。”

“地址！”

“就在这个村子里……最靠里的那排房子，门牌十四号……可是请您们千万别告诉我娘。”

“您有妻子吗？”

“有过，可是离婚了。”

同拉约什的谈话就象公安机关审问犯人似的一问一答地进行着。拉约什说他有一个儿子，在挖河工地干过活；在这之前，他的儿子到过米斯科尔茨，在那里的屠宰场干过活，现在下落不明。拉约什还说他没有兄弟，父亲八年前死于癌症，他念过小学五年级，如此等等。

“拉约什，您说说，”医生打断他的话，问道：“您恋爱过吗？”

拉约什被这一突如其来的提问弄得莫明其妙，由于医生一再追问，他就用挑衅的目光瞪了医生一眼。

“您干吗要问这样的事？”他怒气冲冲地反问。

“为什么不能问？难道您没有谈这类事的习惯？”

“没这种习惯。”

拉比忍不住了，用带启发性的口气插话：

“比方说，您爱上一个女人，您就把这件事告诉您的好朋友。您有好朋友吗？”

“没有。”

“那就让我们做您的朋友吧。”躺在离拉约什较远的干草堆上的法学家说。“您愿意不愿意我们做您的朋友？”

“对，做您的朋友。”医生肯定法学家的意见，以赞许的目光朝他看了一眼。“我们交个朋友，这样事情就会顺当得多。你好。”他把手伸给拉约什。“从这一分钟起，你我就象朋友那样以你相称了。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好啦，从现在起咱

们要彼此相亲相爱。”

“拉约什，爱我们吧！”拉比做出一副感人的可怜相恳求着。

看到拉约什毫无表情地眯缝着眼睛，也不把手伸出来，医生便强行同他握手。

“你别害怕，”医生说，“我不拧你的耳朵。你说，‘你好’，我求你啦。”

拉约什依然不吭声。医生失望地叹了一口气：

“拉约什，你真是个顽固不化的家伙。你这样做是不公正的。你这样对待我们是很不应该的。是你来这里偷我们的东西，可是我们原谅了你，还付给你日工资，我们想跟你交个朋友，你却对我们抱敌对态度。拉约什，这真叫我们非常伤心。”

他装出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耷拉着脑袋，象是不再抱任何希望似的。

他们面面相觑，坐了一会儿，这回倒是拉约什先开口了：

“唉！我有话要说。”

“你说吧，我们全听着呢，拉约什。”法学家说。

“你们放我走吧，因为我……要小便……”

“这可是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医生看了看同伴们。拉比早就有所准备，医生的话音刚落，他便蹦了起来。

“拉约什，我们带你去撒尿吧，就象朋友对待朋友那样。”

他从堆放杂物的角落找出一根长长的绳子，把绳子的一端紧紧绑住拉约什的一条腿，然后解开把他捆绑在椅子上的皮带，让他的手能自由活动。拉比象捆牲口似的捆住拉约什的腿后，当面警告他：

“拉约什，我可是使劲攥着绳子这一头的。你千万别干出蠢事来。反正你是逃不了的，要是你想试试，我可就对你不客气啦。”

说完，他领着拉约什往外走，在门口，医生挡住他们。

“对不起，拉约什，我要对你进行一次心理学上的测验，在你没有说你是我的朋友之前，你休想小便。”

“我是朋友。”沉默片刻后，拉约什喃喃地说。

“你不是朋友，这是另一个意思。你是我的朋友，你说，‘你是我的朋友’。”

“我是您的朋友。”

“说你……”

“我是你的朋友。”

“拉约什，我为你祝福。”医生说，吻了拉约什的额头，拉约什突然狞笑起来。

“别跟我开玩笑啦……”

这时，法学家又走到他面前，向他伸出手来。

“你说吧，你不会因为我拧过你的耳朵生我的气。这种事情在朋友之间是常有的。”

“我不生你的气。”拉约什喃喃地说，他看到长着一头金

黄头发的大个子朝他走来，下意识地把头往后靠。

"你说，我不生你的气。"

"我不生你的气……"

"拉约什，你也 跟我 交个 朋友 吧。"拉比恳求着。"你对我说，我的小兄弟。"

"我的小兄弟……"

"拉约什，你现在就生我的气吧，就象朋友生朋友的气那样。你说，小兄弟，你可要把绳子抓住哟，不然我扇你的嘴巴，揪下你的脑袋！"

"我要扇你的嘴巴，揪下你的脑袋，你等着吧！"

"要说得更气愤一些！"

拉约什吼叫起来：

"你可要把绳子攥住，不然我扇你的嘴巴，揪 下 你的脑袋！这下你们该让我走了吧！"

"你真是个非凡的人物。"医生说。他们三个人对这一新变化感到特别的满意。

*　　　*　　　*

拉比用绳子牵着俘虏出去，让他解完手后，又把他拽了回来。这时候，茅屋已经变了样。医生把食物和酒摆在一张凳子上，还拍了拍拉约什的胸脯。

"我们瞧得起你，你看，我们尽量满足你的需要。你吃吧，喝吧，尽情享受享受。"

"你说吧，"法学家插话说，"把你的恋 爱经 过跟我们讲讲。"

“可是我得提醒你注意，”拉比警告他说，“你瞧，除了腿，我们不再捆你了。”他把绑着拉约什腿的那根绳子的另一端牢牢拴在一根木头上。“你休想跑，除非你把绳子解开，不然你跑不了。”

“你说到哪儿去了。”医生摆了摆手。“咱们既然成了朋友，拉约什干吗要逃跑呢？他在什么地方比得上在这里、在我们中间那样心情舒畅呢？拉约什，你说对不？你就说，你在别的地方从来没有象在我们中间这样心情舒畅过。”

“欸，”看来，原先忐忑不安的拉约什现在变得从容多了，“要是你们不为那些鱼生我的气……”

“别提那条鱼啦！”法学家叫了起来。“谁也没有再提鱼的事呀？你到我们这里来，我们相会了，大家一见如故，彼此相亲相爱，现在，我们又一同喝酒，促膝谈心，有福共享。”

他端起酒杯同拉约什碰杯，大家痛痛快快地喝了起来。

“也许我还可以把绑在你腿上的绳子解开。”拉比兴奋得有点忘乎所以起来。可是医生装做生气的样子，不让他这么做。

“这不重要。绑与不绑都没关系。其实它只不过是把咱们联结在一起的友好之绳……吃呀，拉约什。晚餐咱们吃烧鱼。拉约什，你喜欢吃鱼吗？”

“喂，你说点什么吧，”法学家向他凑过去，“比方说，你是怎样失去你的童精的？”

拉约什不客气地动手拿东西吃，孩子般地边吃边咧着嘴傻笑。

“你为什么想要知道那种事?”

“拉约什，你要知道，今天咱们喝的可是交好的喜酒呀！我所以想要知道，是因为男子汉之间对这种事是从来不相互隐瞒的。不信我现在就把我的情况告诉你。”

他跳了起来，从手提包里取出一本色情画报。他翻开画报，指着一个裸体女人像说：

“你瞧见了没有?她叫沙柏希·罗兰。就是她拿走我的童精的。”

拉约什瞪大眼睛惊讶地看着，连嘴也不动了，一个劲地点头表示赞许。法学家又翻过一页，指着一个黑人女子的裸体像说：

“我同她也有过关系。”

“这可是个黑人呀!”拉约什吓了一跳。“噫，她的皮肤可真黑呀!”

“等你吃完东西，你就可以从头到尾看一遍。可是你得先说说你自己的情况。你第一次跟女人来的时候多大年纪?”

拉约什咧着嘴笑，露出一副狡猾相，却又有点羞涩地转动着眼珠子，然后象泄露天机似地说：

“那是在我服兵役的时候……那女人是上尉先生的心肝宝贝儿……”他稍稍停顿一下，象是回忆往事，然后如同宣布一个重要的事实，突然大声说道：“那女人的滋味可真过瘾。”

法学家又向他凑近些。

“你是怎么把她搞到手的?拉约什，当时你准是个英俊青年，对吗?”

“跟其他人差不多，说不上英俊。”拉约什耸耸肩膀。“不过我的运气好，有机会跟在上尉先生身旁……他可是个细皮嫩肉的上等人，就象……你们同志们。”他把他们的手逐个地仔细看了一遍。“有一次，我奉命从上尉先生的住所送那个女人回家，因为她得返回村子里去。到家后，那个女人招呼我进屋……我就……”

“就怎么啦？”

“把她绊倒了。”

“你真行，拉约什。”法学家说。“现在你再说详细些。她请你进屋，后来你们干什么啦！”

“就那么回事呗。”

“究竟怎么一回事？”

“就象人们常常做的那样呗。”

就在这时，工程师进来了。他带着探究的目光把他们审视了一遍，同时尽量掩饰自己的好奇。屋里的气氛是欢乐的，每个人的眼睛都闪烁出愉快的光芒。这使他暗暗吃惊。

“你想不到吧，”拉比喊道，“拉约什已经成了我们的朋友！拉约什，你说对吗？”

“是这样的。”拉约什傻笑着。

“那么你就说，你是我们的朋友！”

“我是你们的朋友。”

“你说，小兄弟，你这该死的家伙。”

“小兄弟，你这该死的家伙！”

拉比带着胜利的神色望着工程师。

“在我们中间，你已经感到心情很舒畅，对不？”医生问。

“从来没有这么舒畅过。”拉约什立刻应声道。

“喂，喂，”法学家举起手指提醒他说，“在你跟上尉先生的心肝宝贝儿调情的时候，滋味不错吧？”

“唔……是不错。”拉约什又傻笑了。

“你现在有情妇没有？”法学家穷追到底。

“有呀，”拉约什回答，显出骄傲的样子，“她还给我洗脚呢。”

“那才是顶刮刮的情妇。”法学家点点头。

“你瞧，我们的关系不错。”医生象作结论似地转身对工程师说，并递给他一杯酒。“你也跟拉约什碰碰杯吧，好让我们大家一起同乐。”

工程师作了一个拒绝的动作。

“我不跟小偷碰杯！”他直截了当地说。

“你他妈才是小偷！”拉约什大喊大叫起来。

工程师转过身，狠狠揍了拉约什一拳，把他从椅子上打落到地上。拉约什也不示弱，倏地站起来，想冲上去，可是接着又挨了两拳。法学家上来抓住拉约什，其他两人拦住工程师。

“冷静些，”法学家对他说，“别害怕，我们不会让他伤害你的。”

“你们放开我！马上放开我！”拉约什还在叫喊。

工程师尽量克制住自己，轻蔑地扫了大伙一眼，然后走出茅屋。

*　　　*　　　*

由于拉约什还在拼命大喊大叫，法学家只好又用布团堵住他的嘴，再把他捆在椅子上。

“那头公牛把一切全给搅和了。”医生愤愤地说。“咱们现在一切又得从头开始。”

拉比走到正在蠕动的俘虏面前，对他说：

“拉约什，你别害怕，我们不会让他再挨近你。我们会保护你的，别害怕。”

“咱们休息一会儿吧。”医生说。“等他们双方的气消了再说。”

*　　　*　　　*

工程师在岸边修理一只游船。他在拧紧套在划桨上的铁环。他的三个同伴蹑手蹑脚朝他走去，默不作声地站在他的周围。

“你可真有点神经质。”医生说。工程师不回答。“要是我没有理解错的话，”医生接着往下说，“开始的时候，你想把自己打扮成一个慈善家，对于你这种突然的转变，该作何种解释呢？”

“那家伙现在已经喜欢上我们了。”拉比激动地说。“我们接纳他作为我们的朋友。可是，你却把一切全给破坏了。”

工程师用生气的目光瞥了拉比一眼。他欲言又止，不吭声，闷头干活。

医生坐在一块石头上。

“难道我们不该得到任何解释？”他再次问道。

法学家也坐了下来。

“依我看，”他说，“你好象也在生我们的气。你对我们究竟有什么意见？”

“我不知道。”工程师说。

“至少也得让我们听听你的见解嘛。”

“我认为，你们全都是法西斯分子。”工程师说。

“噢，你这是……”法学家结结巴巴地说。“未免言过其实了吧。我认为你是懂得这句话的涵义的。虽然这是我个人第一次看到有人对他持如此粗暴态度；更遗憾的是，这个人恰恰是你。”

“你们不干这种事就活不成了？”工程师把脸一沉。“你们这是在糟踏自己。”

“那倒不至于活不成。他的自我感觉良好。他对你的态度作出不同的反应。”

“他不明白事情的真相。正因为如此，你们才是卑鄙的，因为你们利用了他。我再说一遍，你们把他放了吧。”

“这句话你不想再说一遍吧？”

“是的，不想再重复了。”

“要是我们不放他呢？”

“那我就去告发你们。”

“好厉害的威胁呀。”法学家也火了。“不过你会马上发现，你才是伤害这个不幸的、毫无自卫能力的家伙的人。我再强调一点：无故殴打。不论官司打到哪里他都会这样说，因为这是事实。而我们也不可能说别的。”

"你们全是白痴。"医生边说边站起身。"如果我们为这么一点小事争吵起来，传扬出去可是很丢脸啊。你们全都在胡说八道。"

"这可不是我挑起来的，"法学家说着，也站了起来。

"那么，我们现在是不是相互生气呢？"拉比问。

谁也不回答。医生和法学家又去游泳了，拉比跟在他们后面慢腾腾地走着。工程师接着修理游船。

* * *

法学家和医生躺在岸上晒太阳，拉比回去看望俘虏。他突然大声呼唤着他的同伴。

"他逃了！他逃了！"

其他两人立刻跳起来，朝茅屋冲去。屋里杯盘狼藉，椅子、桌子全翻倒在地。显然，拉约什在弄断捆绑他的绳索前，是经过一番挣扎的。

他们经过短暂的考虑，判断拉约什可能逃跑的路线之后，便——三个人分三路——出发追逐他们的俘虏去了。

旭遇桢　译

拉斯洛·安娜

现在才是真正的我

〔**作者简介**〕 拉斯洛·安娜，匈牙利年轻女小说家和戏剧史家。毕业于布达佩斯戏剧学院，专攻戏剧理论。在报刊杂志上发表过有关戏剧的专题文章，是当代匈牙利戏剧界青年评论家之一。1956年以后，出版过两部短篇小说集，以及长篇小说和戏剧等，并为儿童剧院改编上演《王子与乞丐》一剧。

我可以整夜整夜倾听亚当打呼噜了。我的神经经历了一联串的烦恼和紧张之后，他的鼾声对我来说是一种安宁的旋律。这是漆黑的夜的快乐之声。我现在才成为一个名符其实的女人，因此才有时间整夜倾听这种鼾声。这也仅仅是这个星期的事。下星期，我要么回大学念书，要么去找一个工作。亚当要我认真对待此事。尽管我应该再休息两三个月。要

是这样，我每天晚上都不睡觉，静静地倾听他的呼吸。早晨起床，我会给他煮咖啡，他在厨房喝咖啡的时候，我要把身子探过餐桌，冲着他，正对着他的脸，喋喋不休地说呀，说呀。喝完咖啡，他去上班了，我累得半死，便舒适地蜷伏在床上。我会一气睡他几个小时，一直睡到下午他下班回来。我会给他烧饭，等他吃完晚饭，我们双双出门逛大街，无忧无虑，完全沉醉在爱情之中；然后回家，他入睡以后，我仍醒着倾听他打呼噜。“你这小日子过得可真忙活哟！”人们都会这么说。是的，这日子过得多有趣呀！我终于逐渐认清，我们的星球在宇宙间只不过是尘埃里的一颗微粒。那么这一颗微粒中的无限小的一小部分的——小得无法用语言形容——我，为什么不能快活一下呢？为什么不能不仅两三个月，而且快活一辈子呢？

过去有一个时期，我曾经夜复一夜倾听远处的犬吠声。我还想过当一只狗也不赖：我会整夜狺狺狂吠，那就是我该做的一切。过后我又会训斥自己胡思乱想，接着嘀里嘟噜念起我的功课。我静静地读书的时候，又胡思乱想起来，而且比我低声念书的时间还要长。我的床铺好了，正在向我招手呢——白搭。妈妈是个明察秋毫的监视人：我的眼皮在晚八点一开始打架她就发现了。当我耷拉着的脑袋砰地一声磕在桌子上时，她会温和地劝我。“要是现在累了，齐拉，”她会这么说，“你就去先睡一会儿，亲爱的。到夜里一点你可以睡五个小时呢。睡完觉你精神就充沛啦，起来再接着念”。说完，她会把我们那只讨厌的闹钟报时指针拨到一点，于是那

坏东西会让我偷安片刻，然后再用它那丁零零的闹声把我从睡梦中惊醒。妈妈这还不放心，她会同父亲一起熬夜，好亲自及时把我叫起来。通常，爸爸和妈妈，他们都有挑灯夜读的习惯。爸爸的科技书简直多得不得了；至于妈妈，她去年完成了大学第四门课程——全优。他 们 俩 可 谓 人 老 心 不 老——爸爸和妈妈。“别唉声叹气的，亲爱的，别自找烦恼，”每次早晨我不太愿意起床穿衣服的时候，他们，他们俩总这么说。老头老太太收拾好东西，准备上床睡觉的时候，我才在桌旁坐下。在勤奋人的家庭里，人们就是这样倒班睡觉的。爸爸妈妈到卧室睡觉去了，我才坐直身子，边听远处的犬吠声，边抱着书本死记硬背。

我从亚当的脸上可以看出，他不满意我这种轻率地从家出走的方式。德斯德莫娜丢下父亲出走的方式，这太冷酷无情了。现在我才彻头彻尾彻里彻外了解自己，如同我对自己翻过来的衣兜里面装有什么东西的了解一样清楚。自知之明——这要追溯到大学里所受的熏陶，我们使自己养成有自知之明的习惯，也这样相互督促。“你必须了解自己。”我们常一再这么说。我非常清楚，就我的情况而言，我的问题是怨天尤人。我得穿上盔甲，去完成我决心要做的事情。上星期天晚上，我最害怕的不是我会把事情做绝，而是我会表现得太软弱，你知道，这表明我没有胆量去做我必须做的事。诚然，我穿盔甲穿得太快了些，不过我至今不后悔。

我真想自己快点怀孕。我有了小宝宝，我绝不会为他将来当什么操心。看着他按自己的规律和自己的方式发展，这

岂不更振奋人心。我还裹在襁褓里的时候，爸爸和妈妈就下定决心，要把我培养成一个登峰造极的人。这种情况在经济生活中也如此；计划过高，贪大求全是要付出代价的。既然他们不脚踏实地，就让他们现在去自食其果吧。

那天，为这次会面，亚当穿了一件海军蓝的西服，领带和鞋袜全是崭新的。以前我从没有见他这样打扮过。哎呀，瞧他那么拘谨、庄重——几乎到了装模作样的地步，不禁使我咯咯地笑起来。于是他的造访便以紧张的相互问候开始了。当我说“瞧你们二位活象一对暴发户”时，把事情弄得更糟了。我的话音刚落，客套的寒暄顿时终止了。这时亚当已经明白我父亲的回答将会是“不同意”；不久他就退到前厅去。他正要同我说声再见，并用手抚摩我的头发；就在那一刹那，父亲把门敞得大开，还用手指着街道。当时我要是能忍耐一下，哪怕忍耐它一两分钟，就足以消除那幕情景，使我清醒过来。那是一副不可饶恕的姿态。爸爸在亚当身后把门重重地关上，而且用手抓住门把，不让我跟着跑出去。我说，“我今天就站在这里啦，你要我站多久就站多久。咱们等着瞧，看谁站得过谁”。父亲做了一个绝望、气愤的手势，我便跟着亚当跑出去。

起先，我丈夫这头笨驴还唠唠叨叨地翻来复去讲了一大堆什么自尊心受伤害的问题，我不得不拼命向他解释他早该料到这一手——我没有办法。我扑过去，就站在街心亲吻他的脖子，然后直挺挺立在他的面前，使劲捶打他的胸脯，试图让他明白过来。他于是突然微微一笑，不加思索地说：“欧

芝[1]”。他喜欢我的时候就叫我那个名字。那是他想出来的名字。我也喜欢“欧芝”这个名字。我觉得齐拉这名字十分可憎，又很可疑。

他冷静下来以后却开始为我的家人辩护。现在倒是他提出各式各样的辩词。他坚持要我明白，古时候，所有野生的生物的生长和分株都是很自然的东西。他说，从前有一个穷小子，他一摆脱贫困后干的第一件事是胡思乱想，要千方百计把他的女儿教养成伯爵小姐。我们今天所说伯爵小姐指的是个人的事情。对有些人来说，她是一位时髦的女士；对另一些人来说，她又是一位博学多才的女子。顺便提一下，他可没有使用博学多才这个字眼——他不懂得这类词汇。他只是指类似那样的意思。

我想，如何区分我们看到的事物，关系到受教育的程度问题。亚当是个聪明的小伙子，但是由于他缺乏受到应有的教育，他就不会区分。对他来说，一名昔日的钢铁工人就是一名昔日的钢铁工人，他会把这个同最有阶级觉悟的优良品质联系起来。他一旦冷静下来，他又会很敬重我的父亲。他不在乎我家里的人都是些拼命往上爬的人。我父母要是早生二三十年，他们很可能已经变成工人贵族了；或许他们会开一个铺子，或天晓得他们会干什么行当，总而言之，他们都会出人头地。我的名字“齐拉”[2]就是一个暗示。二十年前，你

① 意为小鹿。

② 意为海葱，多年生草本，含有粘滑的液汁。

还看不出来：或许这名字期待着在上流社会出现一位才华横溢的未来贵夫人。他们可能一直用那种方法在拼命往上爬，我的家庭，就这样想把我推往那种十全十美的顶峰。后来战争结束了，世界起了变化——因此，我本应该闪耀出不同种类的登峰造极。躺在床上的时候，我把这一切全向亚当吐露了。他回答说我是一个值得向慕的年轻妻子，只是太多心了。他狠狠地批评我——我不知道这一切将会产生什么结果？他认为老人们对教育的热忱是某种有高度道德原则的表现，一种高尚的事情，至少可以这么说。他用这种崇敬的心情看待我们家人的学识，是因为他自己没有受过应有的教育。我对这一点倒不发愁。我丈夫是个男子汉，堂堂正正的男子汉。我嘛，充其量是个女人。

我还不习惯在缺乏新鲜空气的地方生活。透过上面一个小小的窗户，难得从厨房那个方向进来一口新鲜空气。在家时，我喜欢在我们花园里做深呼吸，吞食泥土的芳香。这里，要是我们把窗子开着，人们会从外面走廊探头探脑偷看我们。而院子里又散发着猫屎的臭气。人们为什么非要在关着门的院子里养猫不可呢？眼下我最不习惯的是到走廊去上厕所。常常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亚当和我的思想可能在遨游太空，这时我猛然想起该到走廊去了。为此我又得穿上衣服，梳理头发。我一出去，所有房客的眼睛都在跟踪我的脚步。虽然我不愿意想这扫兴的事，可是每当我真正很痛快的时候，这种想法便突然冒出来。嗯，这就是我一直独自一个人思考所谓老阶级斗争路线的一个原因。

我们家住的别墅原先是属于一个大资本家的。我们安装了现代化设备。现在这对我是大有用处的！我们的煤气锅炉从早到晚为我们提供热水。在家时我一直洗盐水浴。我一直渴望能够——哪怕只洗它一次！——在浴池里懒洋洋地躺上两个小时，一边欣赏电台播放的爵士音乐。可是我一次也没能花时间和精力去享受。我只洗了十五分钟的澡，母亲就敲浴室的门了。"你什么时候能洗完呀，我亲爱的？"她会这么说。我势必得起来把身子擦干。要是我对着镜子做一个蜂窝式发型，她会走到我身后，温和地同我谈："你有那么多时间呀，齐拉？"她会这么问："你做一个蜂窝式发型有什么用哇？你能把这告诉我吗？"我从来不告诉她。你当然不需要做一个蜂窝式发型罗。我只不过想摆弄一下自己的头发。我觉得这样好呗。买衣服料子也是如此。我每次去买东西，母亲总要跟着，好让我快点办完。她不让我慢慢挑选自己称心的丝绸、尼龙、天鹅绒和毛料，在我来说哪怕能在手提包里翻来翻去找东西或用手摩挲自己大腿上的丝袜也是很有意思的。我常常只能匆忙地在腿上摩挲两下。这已经成了我的第二性格。有时坐在公共汽车上，我便观察某种类型的女人。她们也喜欢拉开自己钱包的拉锁；或者时不时把她们胸前的项链弄得丁丁当当响。男人喜欢这种类型的女人，我十分肯定：她们也许并不漂亮，但是她们很性感。我不是一个难看的姑娘；可我也不是特别漂亮。而亚当的的确确很爱我。他常说我的脸象一只小鹿。要是我同我父母再住上几年，我就会失去我那张小鹿脸，变成干巴巴的小老太婆。我还会失去我对衣料

和各种物品的喜爱——因为没有时间。你要欣赏自己项链的丁当响声，你也得有时间才行呐。

父亲向我解释说，我会讲德语是非常好的，但还不够。我是不是仅仅打算依靠德文科技书籍？结果：星期二和星期五我得补习俄语，星期三和星期六补习英语。星期一——击剑（“恢复体力促进脑力”）。每星期天——歌剧或音乐会（“思想狭隘的专家总是剧中一个卑鄙的角色”）。父亲知道我只爱听轻音乐；庄重的音乐使我感到困乏（“你应受到真正美的熏陶”）。那么——星期四。星期四嘛，有客人（“你必须同人们保持接触。该同谁接触由我来挑，这样你可以从他们每一个人身上学到点东西。我会根据你的需要挑选他们”）。

有一个星期四，亚当和我一直在一棵板栗树下接吻，然后我匆忙赶回家去参加聚会。“她也很美，”父亲的一位朋友意味深长地说。那就是说，我除了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之外，也还长得很美！不对，我一点也不美——只是每次亚当和我接吻了一段时间以后我看上去才美。这是我从镜子里发现的。可是那个不寻常的星期四晚上却太煞风景了。由于倒霉的巧合，父亲的一个朋友竟一连提了四部我没有听说过的小说。这可把老头老太太吓得够呛。第二个星期他们便预定了三份文学期刊。因为要是一期一期地买，可能会漏掉几期。另一方面，要是我把这些杂志全看了，我就会知道其中的大部头小说。这倒是有好处的，现在我不必再阅读那里头已有的小说的单行本了。不过在这一切中，我大学里的功课又是首位的！而大学的功课所包括的范围不仅是各种课程——还

有自愿参加的社会工作，开会和一切类似那样的事情。

“青年时代是一个人一生中最有价值的时期。”父亲不厌其烦地重复着。“在青年时代你有能力去理解和做一切事情——而这些事情在你以后的年月里是很难有机会去做和理解的。我年轻时候要有这种机会该多好呀！你要尽最大努力来利用自己的青年时代，齐拉！”父亲还坚持让我整个暑假在花园里干活，而不是只干一个月。“这样对你将来的生活会容易得多。”

爸爸和妈妈去度假，但是我因花园里的活得留下。每天干完活我就回家睡觉；只我一个人，周围一个人也没有。我们的别墅变得阴森森的——有时简直可怕——我甚至不敢进去睡觉。一天晚上我回家发现信箱里有三张明信片：从索契①、巴拉顿湖和那不勒斯②邮来的。随后我便做开煤气自杀的想象游戏。我在想象爸爸和妈妈发现我死去时会是什么样子。他们会惊恐地失声痛哭：“噢，只要她还能活着！她就是成了洗碗碟的女仆或游手好闲的姑娘也没关系！”我老翻来复去地想，要是星球上的大多数父母一点也不懂得如何对待自己的子女，活着是不值得的……尽管如此，我并没有认真考虑过用煤气自杀——我只不过想着玩而已。自从我遇到亚当以后，这种想法——甚至连开玩笑——对我来说似乎荒谬到令人厌恶。

妈妈要不是被一块松动的镶木地板绊一跤，把脚脖子扭

① 苏联黑海东岸著名疗养地，海港。
② 意大利南部港市，著名风景游览区。

伤的话，很多年以后我们才会重修地板。而且要是房修公司守信用，早一个月派人来修整地板的话，母亲会在家处理这当事，我也就永远不会同他相逢了。再说，要是房修公司派的是另一个人，而不是亚当……说来也巧，来的正是他；爸爸妈妈正好在国外，因为要修理地板，我便鼓起勇气要求暂停地里的活。用这个方法我的确度了一星期的假——在尘土飞扬和亚当从地板下掏出来放在房间中央的垃圾堆度过的。这仍然，比方说，比我到威尼斯①的利多去旅游更好玩。看到亚当在地板上爬来爬去干活，我便爱上了他。他把镶木地板一块块取出来，把新的放进去，再把它铺平——老是跪在那里干。确实，他在干活的时候我的卖弄风情对他没有什么作用。放工以后，他会去冲个淋浴，穿上意大利式的夹克衫，那时他就会来亲吻我。

去年冬天，教授很恼火，而且不知该怎么办是好；他不太忍心让一个好姑娘，象我这样的小死用功来一个不及格。末了他还是给了我一个不及格，不过从他的脸上可以看出，他非常担心我会想不开。可爱的软心肠的小教授！要不是他让我数学不及格，我现在就不可能倾听亚当深沉的呼吸声了。数学上的失败是我已经负债的第一个明显迹象。考数学那天，我早晨四点就起床，把所有的公式再匆匆忙忙浏览了一遍。在过去的几个星期里，我对这个科目一直拼命死记硬背——要是其他学生费那么大的劲，准会考个优。在这决定

① 意大利驰名的旅游中心。

性的时刻，我拖着脚步走进教室，几乎已经睁不开眼睛。当然，如果我一口气喝它几杯咖啡，在教授面前埋头苦干一番；如果我苦思苦想，或许还能从脑子里挤出点什么。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对这整个自我折磨感到厌恶起来。我忘乎所以到惊人的地步，索性走出教室，脸上还流露出得意洋洋的样子，把焦急的教授甩在身后。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数学不及格！说得精确些，我敢于不及格，而责任完全在我自己。

晚上，可是……等该把这事告诉爸爸和妈妈的时候……那时，坦率地说，我又成了一个惊恐万状的小姑娘。尽管如此，挑战占据着我的心，我便把这意想不到的消息痛痛快快地喷射在他们身上。妈妈的第一个反应是让爸爸知道，我是个有骨气的孩子，而且自尊心很强。爸爸还说，即使是天才，有时也不免会出现瞬间的脑力过劳。一听完这话，不知为什么，我哇地一声哭了出来。老头老太太对我的眼泪是这么解释的："瞧她把自己的学习看得多么重。"夜晚，当我在电话里把这两可的一幕描述给亚当听的时候，他下了这样的评语："他们是真正讨人喜欢的人，你家的老头老太太。象他们这种人并不多。"

唔，第二天是星期日，我同亚当有约会。爸爸和妈妈态度都非常强硬：不行，他们不想听到我要出去的话。不行，那种可能性是极小的——双倍的不可能——尤其是在昨天发生数学不及格那档事后。然而，他们的拒绝同你所猜想的动机是颇不一样的。他们坚持把我软禁在家里，不是作为一种"惩罚"或出自任何对道德的关心。不是的，这仅仅关系到让

我如何充分利用时间的问题。既然我数学考砸了，把我所能省下来的每一分钟都用在数学上，便成了我义不容辞的责任。我气得血液直往头顶上涌。一直到现在，唯有星期天早晨是我能称之为自己合法的时间。其它时候，我只好被迫溜出去，才能同亚当相会。尽管很想念他，我还是控制住自己。去年冬天，我仍相信可以同他们讲道理。我就是用这种克制和感人肺腑的语言向他们呼吁的；我恳求他们设法理解，不管怎么样，考试的确使我心烦意乱；因此我需要一些补偿，一点轻松……听完我这番话后父亲对我说——大约是第一千遍了——他年轻的时候很苦。接着他便开始不厌其烦地详尽讲述——妈妈还不停地在一旁敲边鼓——他们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为我好。他们绝对相信他们的好意，于是他们的态度变得更加坚定起来。我奋力争辩，并向他们解释说，不是每一个人都适合做每一种工作的。"意志！你生活中的目标！"爸爸和妈妈异口同声地说。"你的目标——在生活中没有比这更高尚更现实的了！""可是我几乎不是在生活！"我反驳道。"大部分时间我仅仅是一台死记硬背的机器！"

我开始失去耐心。亚当正在街上等我，我担心他不会老站在那里没完没了地跺脚。我系上外衣扣子。"你给我呆在家里！看你敢挪动一步！"他们嚷嚷起来。我穿上我的毛皮镶边靴子。我父母的这一切进步至少对我是有一些好处的，因为威胁和殴打毕竟没有成为他们教育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

有一件事使我真正感到羞愧；我太喜欢我的衣服、鞋袜和珠宝了。要是我不在乎这些玩艺儿，我是永远不会再回家

的。浪费掉没有同亚当在一起的最后四个月是一个大罪过。他不愿意我同他私奔。"我要用诚实的方法争得你家人的同意。"他老是很自信地说。这个只会打呼噜的可爱的大傻蛋！

那个星期天我回家吃午餐的时候，我很胆怯。我以为争吵会再继续。相反，我发现爸爸和妈妈都在唉声叹气。他们在为他们生了个没出息的女儿而悲伤。看到他们就象头天我考试不及格时那样愁眉苦脸，我突然幸灾乐祸起来。我期望从现在开始我们的思想会一致起来。我告诉他们俩——因难过而声音变得柔和了——，亚当是个绝对可靠的小伙子，而且非他我是不嫁的。我不能说，老头老太太对亚当也抱有象亚当对他们那样的阶级感情。没想到他们仍然不肯罢休，还在大肆辱骂他。他们认为他只不过是一个匆匆的路人：今天在这儿，明天就走了。

星期六我们去登记结婚的时候我该穿什么衣裳呢？我只有一套灰色的西服和三件罩衫。那是当时亚当能买给我的一切。很遗憾，他来我家求婚的时候，我当时正穿着一条长及小腿的女裤①。穿着这种半长不短的裤子我连走廊都不敢去呢。在这栋房子里穿这种裤子是不相称的，而且也不必要叫人们多看几眼，害得他们几乎把眼珠子从眼窝里瞪出来呀。于是上厕所和上婚姻登记所我都穿这身灰西服。没关系，管结婚登记的人也不是没有他我们就活不成的东西。不管怎么说，亚当是我的丈夫。我们还是决定星期六就去登记，因为

① 那是当时最时髦的裤样。

那是他梦寐以求的。爸爸和妈妈是不会去的。

不拘如何，撇开实际的自身利益不谈，在我数学考砸以后，能在那个老家呆四个月不出门，于我也是很有益的。我有机会倾听我在父亲家要什么有什么，我辉煌的生活以及彻底解放的现代妇女的义务等等冗长的迭句。说来也滑稽，在一个星期之内他们就把我改变回去成为一个完美的女儿。包得严严实实的东西，是不会因为几次地震就松散开的。诚然，在这期间我以较优异的成绩通过了两门课程的考试，这又在某种程度上加强了他们的幻想。在有些夜晚，闹钟在半夜一点就闹了。有几次妈妈叫我不要再做蜂窝式发型。我还读英文原文小说，开始同我们的宾客谈小说的也是我。

春天来了，亚当行动的决心在增长。他穿着海军蓝的西服，系着崭新的领带，穿着崭新的鞋袜来造访。我穿着这条半长不短的裤子追出来。我来不及换衣服。

那天下午我们在床上躺到七点。起床以后，亚当坚持我回去同他们告别。“咱们不应该叫他们为你焦急。”他说。我本来没有那种心情去同他们告别。转念一想，也好，我至少有个机会回去取自己的东西。我告诉爸爸和妈妈是亚当要我回来的。他们都变老了，爸爸和妈妈。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们象现在这个样子：半天工夫他们竟变成了老人。我仍然用抚慰的心情劝他们来参加婚礼。“什么！你嫁给那个不配的小子？休想！”我话已到嘴边，正要说，“啊，妈妈，这太卑鄙了！”我赶紧把话咽下去。我想：吵架是毫无意义的。我还不如去收拾我的衣物。他们不让我上楼收拾东西。“我们把全部财产、

金钱和精力，全都花在你身上了。你已经做出自己的选择：现在你可以自己谋生了。”我没有坚持：我还是穿着半长不短的裤子，没有袖子的运动衫和凉鞋，离开了。现在白天虽然很暖，可是晚上还是很冷的。

我在前厅停下，就是爸爸今天上午站在那里赶亚当出去的地方。我回头看了看。门敞开着。厅里坐着的是一个老头和一个老太太。一个如此衰老的男人，你无法相信他就是我父亲，一向担负着如此重要的职务。而那个女人，你无法相信她去年竟以优异的成绩完成她第四门大学课程。“再见，”我说，他们却没有回报我的告别。

是亚当陪我来的；是他买的公共汽车票。我叫他先回家，免得在街上等很长时间。我本以为要花两个小时才能把我所有的东西收拾完呢。我们说好我要用父母的电话叫一辆出租汽车，司机会帮我把行李搬下楼。

在回来的路上，我已经坐在公共汽车上了，我这才想起自己身无分文。亚当和我都把这给忘了。只坐了一站，售票员就撵我下车。我拖着沉重的步子走的时候，起先感到好象在流亡似的——那是因为我裸露着的臂膀冷得直起鸡皮疙瘩，而且脚上又没有穿袜子的原故。我猛地奔跑起来，觉得身上发抖。等我身体暖和过来，我看看自己奔跑的方向，正是朝自己的家门跑。

我摔倒在厨房里。“没有衣服。只身一人！”我哭喊起来。亚当给我煮茶，还叫我喝点甜酒。他非要我把我家里人接待我的情形告诉他。我说他们都变老了。他叹了口气。“那是残

忍的。"他说。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他叹息。我不能肯定他是不是指发生的事件是残忍的。也许他指的是"残忍的姑娘。"从此以后我没有在他面前再提及我的父母。我倒想问问一些不偏不倚的陌生人，他们是否认为我的行为是残忍的。但是不论我是不是一个残忍的姑娘——现在我终于知道自己已成为真正的我，那是一件纯真的、地地道道的乐事。

明天，只要我高兴，我就可以睡到下午。现在我几乎睁不开眼睛了；不过我还要再听一会儿亚当沉闷的鼾声。

张春风　译

高尔·伊斯特万

伊 伦 卡

〔**作者简介**〕 高尔·伊斯特万（1931— ） 匈牙利著名作家。曾获柯苏特奖、尤若夫·阿蒂拉文学奖和匈总工会文学奖。他的小说广泛描绘社会生活画面，故事情节富于戏剧性。主要作品有：《双桨划桨能手的爱情》、《陷阱》、《太阳崇拜者》、《老人》、《马群的主人》（1979年搬上银幕）和《铁器时代》等。

许多年前，我在一个小镇上服役，那的确是个荒凉的地方，要辗转几次车才能到达那里。一九五〇年，去那里还没有直达火车。

我在佩斯西站圆顶大厅不耐烦地闲逛，一想到我得在候车室硬邦邦的板凳上，无所事事地消磨掉一夜的时光，就毛骨悚然。当时我是个年轻士兵，精力旺盛，看外表颇象个大

人，其实还是个冒冒失失的毛孩子。

我压根没想到要进城去逛逛。我对布达佩斯一无所知。在我的想象中，布达佩斯是一个所多玛①，一个道德败坏、狂热、漆黑的热带丛林，同我毫无共通之处。我到城里去干什么呢？

于是我便在大厅里踱来踱去，迈着同我的身份相称的平稳、坚定的步子。

我不停地踱步引起其他候车旅客的注意，他们都转身望着我。一位穿长裤的年轻车站女服务员同我闹着玩，故意撞了我一下后吃吃地笑起来。同时，在出口处一位被自己的行李包围得水泄不通的丰满的乡下女人，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我；当我朝她踱去时她盯着我的那副神态，好象要把一块柏油防水布往我头上扔过来似的，而她那又宽又结实的胸脯和臀部却一直在诱人地起伏着、抖动着。我身上挎着的行军粮袋在懒洋洋地晃悠，虽然尚未到吃饭时间，我还是溜出去喝了一杯啤酒。

我突然想起有一位老朋友现在住在佩斯，离车站不远的地方。他曾给我画过一张到他住处的路线图。自那次见面以后已经过去好几年；在我笔记本里只有他的地址——我把它全详细记在这个本子里。区名、街名、门牌号码和层数。地址旁边的括弧里只写着两个字：“情人”。天晓得“情人”到底是什么意思？噢，是的，想起来了。他在信中说过，那幢房子

① 据《圣经·旧约》记载，为约旦河谷的古城，因居民作恶、淫乱，被神毁灭。

的底层是一个咖啡馆(他在信里写的是"饮食店"，于是我便发现了它的含义)："情人咖啡馆"。只要找到这个咖啡馆，我就可以很顺当地找到那幢房子。我正在寻找那幢房子，在半明半暗的街上东张西望，行人熙来攘往，推推搡搡，人流有时停下，挡住我的去路；有时又往前移动，把我也捎带上。当我侥幸看到"情人"明亮的灯光时，我情不自禁地木然站在那里，后面的行人撞在我身上，把我推出马路，象一条被起伏的潮水冲到岸上的小船，我被扫出了人流。

我在三层昏暗的走廊找到房门，微弱的灯光从房门上蒙着一层水雾的玻璃透射出来。我过去按门铃。门里的灯灭了——一定是有人关掉了灯。我又按门铃，再按一次，又再按一次。他准在家，刚才灯还亮着呢。莫非门铃出了毛病啦？不对，我站在门外都能听到铃声呢。

门终于开了。

从门厅走出一个打扮入时的男人，他穿着一套裁剪得很合身的西服和花格子衬衫，脚登古巴鞋，用探索的目光望着我——这就是我的朋友。他惊讶不已，把我领进房间，让我在枝形灯架晃眼的灯光下坐定，递给我一杯烈性酒，询问了我的情况。一阵寒暄过后，我们都沉默不语。他的变化真大，可我又不敢直言，因为他神情紧张地一个劲儿在抽烟，还常常用眼睛偷看手上的表。

"我马上就走。"我不安地坐在扶手椅里。

"噢，不行，你无论如何得住下，"他吃惊地说，"你没有时间？"

"我那趟火车明天早上开。"

"你真叫我羡慕呀！瞧你这身衣服！在我这种老百姓眼里，你简直象一个警察。"

"这是新发的军装，"我很自豪地说，"我们在乡下早发这种军装了。很神气，是吗？"

他挤出一丝笑意，不过我从他的声调听出他很不耐烦。他蓦地站起来。

"要是你明天早上才走，咱们还会有很多时间聊聊的。谈谈过去，谈谈童年，啊？噢，亲爱的朋友！不要拘束，就象回到自己的家一样。我现在得马上走了，我有一些非办不可的事要办。"他用意味深长的目光望了我一眼。"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吧！你就在这儿等着我，我尽量早点回来。你来得正好。我一直在等候一个人，一个讨人嫌的客人。"

原来这就是他迟迟不来开门的原因，我在心中暗想。

"我等候的那个客人不认识你，你可以毫不费劲地把那个人打发走。尤其是你这身打扮，真象个军官。你会帮我办的，对吗，老兄？"他走到门口时转过脸来说，"如果那家伙开口要钱，你替我撵了出去。或者你爱怎么干就怎么干……"

房间里突然只剩下我一个人，我不免感到慌乱和窘迫。

我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审视着所有的东西——收音机、安乐椅和玻璃柜。我关掉枝形吊灯，拧开桌面上的小台灯，在一大摞希奇古怪的外文杂志里找点可读的东西。要是那个讨人嫌的家伙果真来了，我干脆挥手叫他滚蛋。他会马上发现自己在打扰我。我们不会变成好朋友的。我叫他出去，去

骗其他的人的钱去。就这么办。

我冷不防觉得从开着的门那里吹进来一股穿堂风。

一个姑娘站在门里，诧异地望着我。

“你是找我的朋友吗？”我问，心里巴望不得她不会再出去。

她战战兢兢地把身后的门关上。我把台灯抬高一点，好美美地看她一眼。她的肤色苍白，身体瘦弱得令人难以置信。我要是冲她哈一口气，可能会把她吹跑呢。一个城镇姑娘。昏黑的背景更衬托出她美丽的身影和两条雪白的秀腿。她的脸象陶瓷那样细腻。她下身穿一条紧身深色裙子，上身穿一件浅色罩衫。小脸蛋镶嵌在金发里，鼻子雕刻得非常精致，溜肩膀，一双小巧的手——她显得那么弱不经风，人们会把她当一个幽灵呢。

“这儿，或许……你愿意坐在这里？”我推一张扶手椅给她。

她显得很不安，迟疑地朝我走了一步，我可以肯定，她不是要到我面前来，她以为自己走错层了，因为我没有把门关上，她进错门了。

我应该问她点什么，或对她说点什么，可是——我却抓起酒瓶，往杯子里倒酒。

“可以吗？”

姑娘的嘴唇翕动了两下；她在我身旁坐下时，本想说点什么。我把酒杯递过去给她。她伸手接酒杯的时候那种索然寡味的样子，不禁使我一怔。我晃动着自己手中的杯子，很

想说为她的健康，为我见过的最美丽的姑娘健康干杯，而她已经……我把甜混合饮料一饮而尽，砰地一声把杯子放在桌子上，先用桌布擦拭两只粘糊糊的手后，再往自己的裤子上擦。姑娘先把舌尖伸进杯子里舔了舔，再把杯子放在手中握了片刻，然后举在自己胸前。

我着了魔似地直勾勾望着她

即使我告诉她，她漂亮极了，那又有什么关系呢？她是我遇见过的最美丽的姑娘！纵然在老家也有许多姑娘，每逢星期天，所有的年轻人都能找个姑娘去跳舞，下酒馆。可是她却比我老家所有的姑娘都漂亮。她同她们不一样；她是那么文静。而且那么美妙——美妙得简直形容不出来。我没有冒犯她吧……？

“你刚才是不是在等我？”她冷不防问道。

“不完全是……不过当然，是在等你。”

“我不是来了嘛。”她在耳语。

我现在该说什么呢？她把我当作别的什么人了。不过我得机灵点，我得把她留在这里。可是怎么个留法呢？她是这么温柔的小姑娘。我们应该谈点什么，然后我就可以慢慢想出点美丽的词句来……

姑娘笔直地坐在那里，观察着我的一举一动。但是当我们的眼睛相遇时，她就垂下脑袋。

“你住在这幢房子里吗？”

她摇头否认。

“你在这里工作？”

我的话一出口，我就意识到自己说了蠢话。这哪儿象聊天呀，纯粹是在审问。

“请别生气，我问只是因为——”

“是的，我知道，”她低声说，“我现在不工作。不要因为那样以为我是……不是的！请你听我说！”

我坐在那里，活象一根木桩。

“我以前工作过。真的，我工作过的！我当过打字员，我还上过打字训练班呢。可惜我从来没有实践过，因为——因为他们解雇了我。我也本想到别的地方去，我甚至还找到一个工作；明天我就去那里问问他们是不是还要我。我还没有去那里，是因为他——”

“你在什么地方认识我朋友的？”

“在‘情人咖啡馆’。”她吞吞吐吐地说。“我的一位女友介绍我们认识的。”

那么，这是爱情啰。我感到自尊心受到伤害。魔鬼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觉得自尊心受到伤害是因为这姑娘已经有了心上人。尽管那个流氓一点也不配她。

“我朋友是不是打算娶你？”我焦急地问。

她凝视了我片刻，脸上掠过一丝笑意。

“大概不会吧。”

“那么他干吗要认识你呢？”

她耸耸肩膀。

“你干吗不告诉我你要什么？”她用窒息的声音叫喊。“我知道是你的朋友要你来的！你准是警察之类的人。”

我突然抬起手的时候，酒杯在桌面上咣啷咣啷地滚动起来。姑娘缩回到扶手椅里；她的声音在颤抖：

“你要什么？这不是为了钱——我向他要钱不是真的。要是他这么说是他撒谎。我干这种事从来不是为了钱，明白了吗？从来没有要过钱！放我走吧！”

“请你留下！”

“如果那是你所要的，我就留下。不过完事了以后你得放我走，好吗？”

她低下脑袋，把裙子脱到膝盖下。我把身子探过桌子，拉着她的手。

“你叫什么名字？”

“伊伦卡。”

我心里慌乱极了，好象被放在陀螺上旋转似的。我什么也没听懂。我只是模模糊糊觉得在某个地方发生了道德败坏的事。我可怜起这姑娘来。

“告诉我，他欠你很多钱吗？”

她几乎从坐位上跳起来，我紧紧抓住她的手，她又跌坐在扶手椅里。

“没欠。”

“你干吗不告诉我实话？我要帮助你。”

“警察总说他们要帮助你。”

“胡扯，我不是警察。”

她把自己暖烘烘的小手抽回去。

“那么你干吗要审问我？你的制服又怎么解释呢？你到

底要从我这里得到什么呢？你在这里干什么？”

她没有好气地把上衣塞回到裙子里。

“你是谁？”

“我朋友的朋友，”我傻里傻气地说，“一名士兵。”

她撅着嘴，把身子扭过去。

“一名士兵——普通士兵？”

“我朋友欠你钱吗？你借给他一些钱吗？”

她不耐烦地摇晃着脑袋。

“你卖给他什么东西了吗？”我固执地接着问。

她开始笑起来，可是当她望着我，发现我热切地等待她的回答时，她变得严肃起来。

“就算我卖给他东西了，可他却威胁我说：要是我老来纠缠他，他就叫警察。”

“他欠你多少钱？”

她耸起双肩，身体向前倾，在漆得光鉴照人的桌面上用手指写了一个数目字。我抓住她的手指，把她的手握在自己的手里。这只纤细的小手似乎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在谋生。起先这些手指都很紧张、令人疑心，然后才松弛下来，变得柔软了。只有粉红色的小指甲盖从我的手中探出头来。但愿我能象抓住俘虏似的抓住这个姑娘。

“欠你许多，许多，太多钱了。”我难为情地喃喃自语。“我真想为我朋友还这笔钱，不过我身上没带那么多钱。我是一个士兵，真的——”

她笑吟吟地让我握着她的手。

"伊伦卡……"

她不看我，她笑得很勉强，几乎是令人很不舒服地在微笑。她的眼睛象凝视着水面，看着自己映在水中的面影，缺乏表情。

"你干吗来这里，伊伦卡？你说实话！"

她的声音疲倦而平淡：

"你真不知道？"

"永远别再来这里！你答应我？"

我兴奋得全身在哆嗦，还一直握着她的手，而她仿佛是很不情愿地在忍受着似的。

"永远别再来这里！你明白吗？请永远别再来！"

"难道你会喜欢我？"她用陌生、单调的声音问。"你喜欢我？真的？那好，吻我吧！"

她离我那么近，我能感到她的呼吸在拂煦着我的脸颊。

"我爱你。"我气喘吁吁地对她耳语。

"你真爱我？"

她把头往后一仰，脸上露出奇异的微笑。她任凭我抚摩和亲吻，她变得很柔弱，不象刚才似的冷漠，突然变得很热切。她把我的头贴在她的脸上，她在亲吻我的眼睛、额头和脖颈的时候，她的唇燃烧着我的脸。

"伊伦卡，咱们离开这里吧！我的朋友可能就要回来了，我想同你做爱……"

"我不就在这儿嘛。"她说得很轻巧。

"可是我为你担忧……你那么年轻。我爱你，我不愿意

你——别生我的气。”

她猛然抬眼看着我。

“你一你--你为那个担忧？你想从你手中拯救我？你想从你朋友手中拯救我？”

她的脸白得象一张纸，然后她慢慢闭上眼睛，仿佛无法忍受我在望着她。她的两臂无力地垂下，我从她的肩膀能够觉出她全身在颤抖。她的肩膀开始抖动，起先很轻微，后来抖得越来越厉害了，她把脸贴在我的胸口，不论我怎么劝她，她都不肯抬头看我。

“以前从来……没有人对我说过这种话。”

她走到门旁去开门。

“我现在该走了。”

“伊伦卡，我到哪里能找到你？你的住址……”

她的脸在发颤，她赶快离去，一句话也没有说。我惊愕地跳起来。

“你的住址，伊伦卡！等我！”

我跑出走廊，朝下看楼梯井。在二层我看到她的上衣，甚至还听到她跑下楼梯时噔噔噔的脚步声。

“等我，伊伦卡！”

我冲下去追她，我脚上钉着平头钉的靴子发出可怕的响声，可是当我跑到大门口时，姑娘已经不知去向。我盲目地向右转，急忙来到街上第一个拐角处，然而连她的影子也没有看到。我又返回去，其实我已料到再也找不到她了。可是由于激动，我仍在奔跑着，在行人中挤撞着、寻找着，就这

样在后街上徘徊了一个来钟头。我全身哆嗦，靠在一面墙上，呼哧呼哧地在喘息。她消失了。

有一个人站在我的面前。

“你喝醉啦？”一位中尉用锐利的目光望着我。

“嗯，不。”我结结巴巴地说。

“你不舒服？”

我点点头。

我在街上漫无目的地逛荡了很长时间。在昏暗中我逛完后街，来到灯火辉煌的林荫大道。我既不向右拐也不向左拐。我一个劲儿地朝前走，心中却空洞洞的。

张春风　译

莫勒托瓦·久尔吉

会说话的猪

〔**作者简介**〕 莫勒托瓦·久尔吉（1934——），匈牙利著名作家，曾获柯苏特奖、尤若夫·阿蒂拉文学奖和匈总工会文学奖。他当过矿工、建筑工人、服务员、石匠、锅炉工等，后毕业于艺术学院。1955年起在各种文学杂志上发表作品，1963年出版第一个短篇小说集《陌生的冠军》。他的作品反映近期匈牙利的各种重大事件，他的短篇小说和报告文学主要描绘城市人们，尤其是工人的生活，以题材新颖，反映问题尖锐著称。重要作品有：《忧郁的天使》、《孤独的游乐场》、《被解散了的军团》、《地狱里的磨房》、《四十个传道者》、《保持童贞》、《煤气灯下》、《糟透了的机关》等。《会说话的猪》被誉为近年来匈文坛最成功的短篇佳作。

晚上十一点半，费克特特里奇国营养猪场饲养员克勒克什喂完最后一次猪食后，顺手关上电灯，好让九号猪圈里的小猪能安静地睡个好觉。随后，他再次在宽敞的猪圈巡视一遍，检查了温度表，看看自动储水箱里的水是否够用。他发现一切正常。他正要跨出九号猪圈门槛时，突然听到背后有人叫骂：

“约耶，你这婊子养的！”

克勒克什的名字叫拉约什，可是听到这骂声，他还是回过头去。他本以为是他的某个同事喝醉了，蜷缩在猪圈角落里撒酒疯，可是不论他怎么看，也看不到猪圈里还有别的人。他踌躇了好一阵子，才恢复常态，自我解释说，不是有人在猪圈外面骂街，就是自己耳朵有毛病。

“等哪天有空，我得去找大夫看看，洗洗耳朵。”他在自言自语。

在克勒克什拿起铁杠子准备上门闩的时候，方才那个刺耳的声音又响了：

“约耶，你这婊子养的！”

现在，克勒克什可以确凿地认定，说话的人就在猪圈里，而且从声音的方向可以判断，是来自四号猪栏。这个猪栏里喂养着从个体户那里收购来的小猪，以补充由于最近发生猪瘟造成的小猪存栏数的减少。

克勒克什朝四号猪栏走去。那天晚上，四号猪栏里关着九只小猪，其中的八只挤成一堆躺在那里，这种怪现象是前所未有的，即使是经验丰富的屠夫也难以分清哪一条腿，哪一个脑袋是属于哪一只小猪的。而猪栏的大部分地盘却被一

只大摊开四肢酣睡的小猪所霸占。看来，这只横行霸道的小猪为了取得这块特殊的地盘，曾经进行了一场恶战，因为克勒克什用手电筒往它身上照时，发现它耳朵和脖子上血迹斑斑，一撮撮带血的猪毛还沾在伤口上呢。

克勒克什用胳膊肘支撑在栏杆上，屏息注视了好几分钟，等候那个声音再次出现。可是他等了好半天，除了那堆躺在一块的小猪在打呼噜，或者当它们中间某只小猪挪动身子，被搅醒的小猪发出一两声哼哼之外，再没有发现有任何异常。就在这时候，那只独霸一方的小猪冷不防说话了：

“约耶，你这婊子养的！”

克勒克什吓了一跳，过了好一会儿才镇静下来，拖着哆哆嗦嗦的双腿离开猪圈，还不时回头张望。他走出猪圈后才收住脚步，用攥在手中的手绢抹掉额头上的汗珠。他觉得应该立即把这一发现报告领导。

国营养猪场女经理庞诺什·艾蒂博士那天深夜还赶着给某个农业杂志撰写研究论文。正当她在辞源里查找“收获”一词的准确涵义时，克勒克什敲门进来，慌慌张张向她报告，有一只小猪会说话。女经理正了正鼻梁上的眼镜：

“克勒克什，您得注意啰，前些日子，您喝醉了酒去吃鱼粉，又把鼻子伸到自动饮水槽里去喝水，我都没有追究您。可是您别以为从此就可以胡作非为，三更半夜跑到这里来瞎说八道，那我只好开除您了。”

克勒克什一再发誓说，他讲的全是真话，并且再三恳求女经理跟他一起到猪圈去看看。

他们来到猪圈时，已经是半夜了。他们站在四号猪栏前。九只小猪中的八只仍在呼呼大睡，唯有那只摊开四肢躺着的小猪在手电筒的光照下站了起来，满嘴的白沫，睁大着布满血丝的眼睛，怀疑地注视着来访者。

"说吧，"克勒克什从栏杆探过身去，用鼓励的口吻说，"快说，约耶，你这婊子养的！"

"克勒克什，您怎么能当着我的面说这种话呢？"

"经理同志，您别生气。这句话是我从这只小猪嘴里听到的，也许它只会说这句话。喂，你再说一遍，约耶，你这婊子养的！"他鼓励般地挠挠它的脊背。

那只小猪不说话，只是在左右来回地摇晃着脑袋，冷不防一口咬住饲养员的手，把骨头咬得格格响。庞诺什·艾蒂博士轻蔑地瞪了那个疼得直跳脚的饲养员一眼：

"祝贺您，克勒克什！明天来取您的劳动手册吧，这样您就不会再同我开玩笑了。"

* * *

克勒克什忍痛洗掉手上的血迹，用纱布把被小猪尖利的牙齿咬破的伤口包扎好。然后他去找来一把菜刀，决心割断让他出丑的那只小猪的喉咙。

那只小猪正警惕地等着他呢，仿佛它已估计到克勒克什要转回来似的，看见他手里拿着家伙，便尖叫着拱进那堆熟睡的同伴中间。小猪们被惊醒了，嗷嗷的叫声震撼着整个猪圈，也惊动了其他猪圈的值班员和夜间巡逻人员，都纷纷赶来。克勒克什在慌忙中只来得及拽出那只用四条腿死死抓住

栏杆的小猪，用围裙一裹，拔腿就跑。

他冲出猪圈，来到饲料搅拌室，把小猪放下，这里晚上不会有人来，而且室内堆得老高的饲料袋也起了消声的作用。当克勒克什又把小猪夹在腋下，操起刀正准备结果它时，小猪又突然说起话来了：

“亲爱的拉约什大哥，我这样称呼您不知是否合适；咱们俩可能发生了一些误会。”

克勒克什现在对于这只小猪会说人话已经不再惊奇了，他手里紧紧攥着刀子，大声喝道：

“你这杂种，竟敢在女经理面前出我的丑！刚才我问你的时候，为什么不吭声?!”

“那场合不对嘛。如果您们把我从猪圈弄出来，我是非常乐意效劳的。拉约什大哥，您想想看，要是我在猪圈里吐露了一个字，那么所有的小猪就都知道我会说人话，而这正是要保密，无论如何不能让其它小猪知道的哇。”

“为什么?”

“拉约什大哥，请息怒，这个您就甭打听啦。”

克勒克什被小猪咬伤的右手还在突突地跳痛，一听这话，他全身的血液便轰地涌向头顶。

“你倒摆起臭架子来了。你把我毁了，就是因为你这个坏蛋，他们把我开除啦。可是你这个无赖还在这里装蒜!”

小猪显出一副老大不高兴的样子，仿佛懒得跟他多费口舌似的。

“拉约什大哥，别老那么梗着脖子好不好？我倒愿意陪您

到女经理那儿走一趟，把事情的经过原原本本告诉她。我向您保证，她会再起用您的。”

克勒克什半信半疑地说：

“要是你再糊弄我，你休想活。”

“那我有什么法子呢，拉约什大哥？反正刀把子攥在您手里呀。”

敲门声把庞诺什·艾蒂博士从睡梦中惊醒，这时已经过午夜了。女经理开门一看，原来克勒克什腋下还挟着那只小猪，不由得怒火中烧，指着门嚷道：

“给我滚出去！”

见势不妙，惊慌失措的克勒克什正要拔腿往回跑，小猪便从他的腋下挣脱下了地，站在女经理面前，清了清嗓子，必恭必敬地说：

“请原谅，我不得不为拉约什大哥说句公道话。他没有听错，我刚才是说梦话来着。请原谅，我的确说过‘约耶，你这婊子养的’这句话。”

女经理被弄得目瞪口呆，惊讶地扶了扶眼镜，问道：

“谁是约耶？”

“我就是。您知道，塞克伊大叔……”

“是不是以前的那个乡主席？”

“不错，他是我以前的主人，国营养猪场就是从他那儿把我买过来的。塞克伊大叔叫我约耶。不瞒您说，因为我喜欢四处乱窜，他就拿那话骂我。”

“可您怎样学会讲人话的？”

“塞克伊大叔在乡政府选举中落选了，他被迫退休时买的我；当时，我还只是一头刚断奶的小猪。塞克伊大叔的孩子们都上佩斯去了，老伴也死了，他一个人闷得慌，总想找点事来干干，打发日子，因此整天围着猪圈转悠，还老跟我说话，开头我只能听懂一两个词，后来我就慢慢能全听懂了。”

“您的主人知道您会说话吗？”

“不，塞克伊大叔是个聋子，请原谅我说话不恭。不过我也特别小心，以免暴露自己，他要是知道我会说话，也许他就不信任我了。塞克伊大叔过世后，他的儿子们都回老家来，把家里能卖的全卖咯，一点也没有留下，我就是这样从个体户来到您们这个发达的社会主义农业大企业。”

庞诺什·艾蒂博士听完约耶这番话，愣了好半天才说出话来。

“可您是从哪里学会这些话的呢？”

小猪谦逊地低下脑袋，笑眯眯地说：

“功夫不负有心人，只要肯用心，总能学到点东西。我这些话绝大部分是从塞克伊大叔那里学来的。我处处以他为榜样，当然，也得靠我自己的勤奋。说来也巧，就在我们猪圈的门上安着一个广播喇叭，用农民的话说——请原谅我的用词——叫做瞎嚼啵的话匣子。我什么节目都不放过，特别喜欢听政治报告，当然我也喜欢欣赏音乐。”说着，小猪唱起“你是骄傲的哥萨克……”这首歌曲来。

天麻麻亮了，原来已经是凌晨五点多钟。他们不得不提

防有个队长或技术员会推门进来向女经理请示工作，发现他们正在谈话，因此马上商定让克勒克什先把小猪送回猪圈，等晚上再把它带出来。

在返回猪圈的路上，小猪神气活现地躺在饲养员的围裙里说：

“拉约什大哥，您甭担心，我可不是那种忘恩负义的家伙。我有一个好主意，不过我还不想先瞎许愿，要是他们采纳我的意见，不仅于我，于您们也有好处。”

* * *

女经理为如何使用那头小猪的特殊天赋，整整动了一天的脑筋。她考虑能否让它到一个剧团表演特异功能?！到了晚上，她不知所措地询问约耶：

“现在我们让您做什么工作好呢？”

“我已经同拉约什大哥谈过了，我有一个对咱们彼此都有好处的主意……”

“您有什么好主意，亲爱的……”

小猪亲切地微微一笑，说：

“就叫我约耶吧，这可是个既普通又诚实的匈牙利人的名字。”

“那么，亲爱的约耶……”

“我想咱们得装成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那样，把我放回其他小猪中间去。我会留神听我的同伴们的谈话，把它们对伙食供应、猪圈，特别是对您们这些受我们大家尊敬的领导同志的意见统统收集上来。每隔一段时间，我会找个借口，好

让您们把我带到办公室来，听取我的口头汇报。至于用什么借口嘛，到时候我自有办法。”

小猪扬着圆鼓噜咚的鼻子，满腹狐疑地望着庞诺什·艾蒂博士；它还摸不透女经理沉思的目光，迟疑片刻后补充说：

“在人群中间有没有这种制度我不清楚，不过依我看，在猪群里建立这种制度倒是满合适的。”

女经理的眼睛终于在镜片后面闪亮起来：

“非常有意思！据我所知，这恐怕是大型养猪企业里的第一个试点，我们可以直接掌握被喂养对象的思想动态。”她瞟了小猪一眼。“您打算以什么作为交换条件？我记得，您刚才提到共同利益来着。”

“首先，我希望让拉约什大哥重返工作岗位，发给他五百，……不，六百福林的奖金。”

“解雇一事，我可以不坚持。不过奖金嘛，暂时还发不了，因为企业支配范围内的钱已经用光了。”

“发给参加志愿献血运动的人的奖励费不是还剩下吗，能不能动用这笔钱呢？”小猪问。

“这您是从哪里知道的！”

“前天您同队长从猪栏前走过时，您亲口对他说过还有这笔钱。关于这方面的规定我也是略知一二的。有一个时期，塞克伊大叔常常用《匈牙利公报》给我垫圈。”

庞诺什·艾蒂博士叹了一口气，只好同意了：

“就照您讲的办吧。除此之外您还有什么要求？我的意

思是指您个人的要求。”

“至于我个人嘛，暂时还没有什么要求。我得先干出点成绩来。我深信，那些为集体利益贡献最大者，受奖时理应得到头功。”

*　　*　　*

约耶在猪栏里的表现同其他小猪一样，整天吃呀，逛呀，还死乞白赖往猪群里挤，注意听同伴们嘟囔些什么。虽然它十分卖力气，可是收集到的尽是些鸡毛蒜皮的琐事，汇报小猪们不值一提的抱怨；什么关母猪的地方离它们太远啦，它们去吃奶的次数太少啦，饲养员在饮水槽里洗刷脏靴子啦，等等。这种差事根本满足不了约耶的勃勃野心。

看来，只有饲养年轻力壮的公猪圈才是它英雄用武之地。约耶自告奋勇要求到那里去。然而要把还是小猪的约耶平白无故地调到已经两、三岁的公猪栏里去，势必要引起怀疑，因此无论如何得找个借口。于是约耶便变着法子跟饲养员捣乱，有事没事冲他们吼叫，还咬他们的手。这么一来，大家都一致认为，非得把这调皮捣蛋的约耶从小猪圈弄走不可了。这消息传到公猪群里，它们的普遍看法是，约耶太放肆了，它的小蹄子早晚会被敲断的。话又说回来，约耶的激烈行动也博得公猪们的好感，它们把它当作信得过的伙伴，不论谈论什么都不回避它，因此，当大伙说话的时候，约耶总是谦卑地站在一旁，可是耳朵没有闲着，把它们的话一字不漏地装进去。

一头从英国约克郡进口的大公猪成天叨登它在英国度过

的童年生活，说什么那里的猪圈都装有空调和电视机啦，吃的又是搀和着桔子皮和香蕉的混合饲料啦，等等。约耶在最近一次汇报中建议，在那种西方猪圈舒适、饲料供应丰富的论调尚未在更大范围内扩散之前，火速将那头约克郡大公猪处理掉。

在公猪这个集体里，对那个所谓的"假母猪"的东西意见最大。起先，公猪是被领到真母猪身边进行交配的；饲养员把母猪赶到一个蒙着毛皮的木头架子下面，让母猪只露出后半截身子——这个木头架子就叫做假母猪——然后让公猪跳上去交配。后来，专家们认为人工交配怀胎率更高，因此就不再把母猪领到木头架下面去了，只让公猪趴在那具空空的木架子上，饲养员拿着玻璃杯在下面接精液。可是由于猪场不注意维修那具木制"假母猪"，日久天长，木头劈裂了，刺刺拉拉的扎得慌，而且那些羊羔皮上的毛也被蹭光了。

"哪怕在那东西的背上粘点毛，"公猪们愤愤然地说．"给我们造成一种错觉也好呀。以后就让克勒克什用他的大肚皮去蹭那只木头母猪吧。"公猪们果然不愿意再跳到那具木头母猪身上去了。

约耶把这一情况密告有关方面，不久，那些叫嚷得最凶的公猪都被带去阉割了。

约耶无时无刻都有被怀疑和被揭露的危险，因此他们不得不对输送情报的方法进行一番周密的布置。如果有要事报告，约耶就吞下一小块事先藏起来的肥皂，然后装着犯病的样子，四脚朝天地躺着，口里直吐白沫。见此情景，克勒克

什就把它从猪栏里提了起来，在伙伴们的同情和抱怨声中被带走了。

这个办法是约耶自己想出来的。对此女经理不得不打心眼里表示佩服：

“我真不明白，您的脑瓜子怎么会想出这种办法来?!”

“塞克伊大叔在世的时候，偶尔也把我带到他的房间去，让我躺在他的脚边看电视。有一次，我看到一部波兰的片子，里头那个打进犯人中间的坐探，也是装病跑出来告密的。”

庞诺什·艾蒂博士想不起电视台播放过这样一部电影。

“片名叫什么？里头的主角是谁?”

“我不知道，我只顾着看那密探了。他长得可精神啦：胖呼呼的，戴着一副眼镜，秃脑瓜子。我简直被他的表演迷住了。”

约耶干得非常出色，它的报告涉及面既广又详尽，甚至连肉猪们对掺肥猪粉的试验性混合饲料的意见也没有落下。费克特特里奇国营养猪场的生产计划和措施主要是在它汇报的基础上制定出来的，无怪乎生产成绩大大超过一般的养猪场。

催肥期过后，又有一项特殊的使命等待着约耶去完成。运送牲口到屠宰场往往是件艰巨的任务。肉猪一到屠宰场大门口，闻到血腥味，便慌作一团，吱哇乱叫，死活不肯从车上下来，往运送工人身上乱撞，有时还咬伤他们。约耶奉命去解决这一难题。

为了达到被送往屠宰场的目的，约耶明目张胆地向饲养员挑衅，转过身子冲他们放屁；这样，其他的猪也都认为，把这无法无天的小猪处理掉是无可非议的。

在卡车上，肉猪们带着敬慕的心情围着约耶，可是它却悲愤地高呼："与其卑贱地活着，不如光荣地死去。"它的豪言壮语深深打动了在场的肉猪们的心。

"这小猪真了不起，"它们说，"它本来可以成为一头大家伙的。"

大卡车来到屠宰场时，约耶昂首阔步第一个从车上跑下来，还没等其它猪看清楚，它已经跑进第一个甬道的拐角处，消失在一道旁门后面，克勒克什早已在那里等候着，立刻把它带回费克特特里奇国营养猪场。约耶的榜样激励着其它的猪，所有的肉猪都不再进行反抗，无一例外地自动置身于屠刀下而毫无怨言。这一天，数费克特特里奇养猪场运来的肉猪体重损耗最少，而屠宰场也超额完成了计划。

*　　*　　*

无论如何约耶得避开一个催肥期，它必须等到那些从小就跟它相识的猪们被运走以后再返回猪圈，不然，它们就有理由对唯独它能从屠宰场生还感到惊骇。

为了不让约耶虚度年华，他们教它学会写、读、算，还让它进各种各样的学习班继续深造。它的研究论文《从收集情报角度分析家中的垃圾》轰动了学术界。举个例子说，它在论文里研究了如何寻找一封被撕成九块后扔在三个不同类型垃圾筒里的碎信纸，并使其恢复原状的问题。为此校方建议

让它留下来当教员，约耶却婉言谢绝了：

"我觉得，做实际工作才是我真正的职业。"

人们在其它猪的登记卡上只写上该猪的出生日期，种类，最多再写上旧主人的名字。约耶的登记卡则不然，上面写满了各种秘密代号：8/1976/Ⅲ，口2411/9，XY/F，等等，用来表示它接受任务的范围，以及完成各种课程的性质。只有女经理和少数几个直接参与此事的工作人员才懂得这些标记的奥秘。

约耶成为国营养猪场正式职员的势头已不可挡。当然不能公开任命，便内定为猪场建材科砖瓦管理员。这样，它就理所当然地享有同职员身份相称的待遇。九月间，也就是它重新开始工作之前，它要求先到国营养猪场设在巴拉顿湖畔的疗养所休假两个星期。

一到疗养所，分配它住在一个有三张床位的房间，同房间的是一名助理会计师和一名拖拉机手。可是约耶实在无法忍受同屋缺乏教养的伙伴们身上的酸臭味，更何况他们俩酒后哇哇乱吐，而且还整个晚上不停地放臭屁呢。它去找管理员，要求调换房间。

"在群众性的疗养地，卫生条件差一些是允许的，"它说，"不过我想再差也应该保持象在家里，也就是在养猪场那样的水平。对伙食的质量我倒不在乎。不过我可以担保，在养猪场绝不会有任何一只小猪胆敢当着同伴们的面，同另一只小猪展开一场放屁竞赛，可这里的助理会计师哈吉马什同志和拖拉机手柯瓦茨同志就敢这么干。我只要求住单间，不管什

么地方都行。我看，他们反正也不用盥洗室，如果您允许，我宁愿搬到那里去。”

约耶的假期生活是严格按照作息时间表安排的。它发现自己开始发胖了，而且很难指望在下一个催肥期里会掉膘，因为到那时它正需要在饮食方面为其他小猪作出表率，因此，它要求疗养所为它提供减肥伙食，而且不管节食多么痛苦难忍，它还是规定每天只喝二十听它最喜爱的饮料百事可乐。每天清早它都在树林旁跑步一小时，为此还招来了各种危险——有一次，一个近视眼猎人朝它开了一枪；有时，在那里放牧的母猪会主动跑过来向它求爱，约耶则坚定而彬彬有礼地拒绝了它们。

白天，约耶关在自己房间里学习或休息。不过它觉得每天晚上参加疗养所的社交活动是自己的义务。为此，它在衣着上狠下功夫：白尼龙衬衫上配着波兰产的琥珀袖扣，再加上一条时髦的宽领带，前蹄上套着手套，后蹄登的是一双童鞋，唯有裤子是量着身材定做的，以适应用四条腿走路这一特殊要求。此外它还佩戴几件贵重的装饰品：金丝线镶边的领带上别一枚领针，鼻梁上架一副宽边玳瑁眼镜，奥地利产的自动打火机用一条链子穿着挂在脖子上。还往厚皮上费劲地涂抹上一层香喷喷的进口西方高级润肤霜。

头一天，约耶去疗养所的冷饮部喝百事可乐。其他顾客见它在那里，便故意唱起一些歌，公开侮辱它，什么“母猪领着九只小猪钻麦地”，“可悲的猪粪，你可真黑呀”，等等。那些打牌的讨厌它坐在他们近旁，每次扔牌，嘴里大声嚷嚷：

“瞧，我出一张橡子①”，或者“我出一张红猪②”。

约耶没法子，只好躲进电视室，看看节目，或者读读文艺书刊。一天晚上，约耶正在看书的时候，庞诺什·艾蒂博士走进电视室。原来女经理也在这个疗养所度假，她不屑跟猪场的职工来往——他们也不愿意跟她攀谈——，为了找个宁静的地方，便信步来到清静的电视室。

“晚安，约耶，您打扮得真漂亮呀！”她惊讶地说。

“我以为，我们自己先在仪表和精神上尊重自己，才能赢得他人的尊重。”

“您的见解非常正确。您在读什么书？”

“我正在读一本小说。”

“为了消遣？”

“不，我什么都想学，看小说也是为了学点东西。我读书的方法跟一般人不同，他们只随便翻几下，就象他们自己常说的，专挑那些爱情章节看，别的就跳过去。我可是带着批判的眼光看小说的。”约耶拿起放在书本旁边的圆珠笔。“我老在那些不堪入目或者粗俗的句子下面打杠杠，并且写了眉批：‘人类！’两个字。”

“人类！？兽类吧？”

“不，一头猪是绝对写不出这种玩艺儿的，只有人才写得出来。另外，最叫我反感的是书中对所有的猪都大肆进行污蔑之能事。这种诽谤之词俯拾即是，瞧，我都抄下来了。”约

① 猪饲料，又是纸牌牌花。

② 纸牌牌花。

耶掏出笔记本。"什么'躺在麦地里撒尿的猪，一声不吭'，什么'醉得象头猪'，什么'有了麸子不愁没有猪'，什么'长疥疮的小猪，坐卧不安'，还有什么'托尔达的小蠢猪，屁股对着猪槽'，等等，等等……。"

从维护猪的利益出发，约耶举起一只戴着手套的前蹄：

"虽然我不认为所有的猪都是十全十美的。不过刚才列举的那些诽谤的确是无稽之谈；比如说，要是叫那位作者出来证实一下托尔达的小猪是用屁股对着猪槽吃食的话，他肯定会很狼狈的。我正是为这种倾向感到懊恼。不要总是看到有个别的猪喜欢用鼻子在肮脏的垃圾堆里乱拱，而不看大多数纯洁的猪天天都在养猪场里规规矩矩地生活。那些可敬的作家和记者先生们为什么不更多地去表现它们呢?"

"约耶，我完全同意您的看法，"女经理说，"报刊杂志应对这一切负责。要是记者们天天写这类不利于团结的文章，国营养猪场能完成计划才怪呢。比方说，人们每天读到的尽是些叫人泄气的文章，哪儿还能有干劲呀。"

就在这时，电视屏幕上出现一部英国电影的片名，约耶指着屏幕说：

"我就不赞成在电视里播放那么多西方乌七八糟的东西。等年轻人受污染堕落了，到那时才大吃一惊就晚啰。因此，我不禁要问：电视向年轻人灌输的是什么玩艺儿?!"

"依您看，该拍摄些什么题材的电影呢?"

约耶拿眼睛去瞟女经理，发现她越来越迷人了。

"依我看，要是能拍一部以一位有才能的年轻女人如何

在国营养猪场的领导岗位上顽强奋战为题材的电影，那一定非常有意思。”

一听这话，庞诺什·艾蒂博士的脸颊不觉微微泛红。电视室里顿时出现令人困惑的寂静，从隔壁酒吧间传来的乐声显得更加清晰了。

“您喜欢跳舞吗？”约耶难为情地问，还动了动它那双套着童鞋的后蹄。

“不，您在想些什么呀？”

“没，什么也没想，只是随便问问。”

* * *

约耶又在几个猪圈的猪栏里呆了两个催肥期，继续收集猪群的情报，然而现在它对完成任务愈来愈感到困难了。原因很简单，国营养猪场发展迅猛，新盖了一排排的猪圈。约耶单枪匹马实在关照不过来，何况它的身体条件也显得日益不能适应新的工作需要了，不管它怎么节食，体重仍然接近四个马约①，看到它那肥头大耳的模样，那些最有阅历的老公猪不免要问：“这家伙还在这儿折腾什么呀，外面的屠宰场不是顶空的吗？！”

约耶也有自知之明，它征得国营养猪场领导的同意后，便着手进行发展组织的工作。它建立了一个情报网，从各个猪圈吸收一批可靠的小猪、壮猪、公猪和老母猪，把它们统统组织起来，向它报告收集到的情况——当然都论功得到一

---

① 匈牙利重量单位，一马约等于一百公斤。

点奖励。约耶自己只在特殊情况下才到猪群里露露面。

这个情报网完全掌握在约耶的手里，因为国营养猪场各级领导干部中唯有它听得懂那些被组织起来的猪的嗷嗷猪语。约耶既然担负了重要的任务，理所当然地得到一间单独使用的办公室。它就在那里分析、整理汇报上来的情报。

开头，约耶把收集到的材料原封不动地全转呈给女经理，连最微不足道的抱怨和不遵守纪律的情况也没有漏掉。它满以为会受到表扬并得到奖赏呢。事与愿违，有一次，女经理接过报告后面露愠色。

“约耶，您看到的怎么尽是些阴暗面，就象您在奶酪里只看见气泡一样。”她不满意地翻着打字材料。“您想，要是我再原封不动地把这些材料呈报给我的上级领导，他们看到猪场存在这么多问题和缺点，会对我的工作产生什么印象?!我不是要您美化这些材料，不过您也应该尽量写得全面些、客观些。辩证地，我亲爱的约耶，要辩证地看问题嘛!”

约耶终于悟出对它提出的要求，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在它那个专记新词汇的小本本上写道：辩证地=只要好的。从此以后，约耶上报的材料里就出现小猪们对一切都非常满意，模范遵守纪律之类的颂词。由它一手建立起来的情报网里的壮猪和肥猪还从下面发动猪们提出许多新倡议：“我们要求缩短催肥期，用节省下来的钱建造新猪圈!”或者是“为了减轻饲养员的工作量，我们要求集中在一个地方拉屎撒尿!”

现在，庞诺什·艾蒂博士对约耶的工作很满意，对它的

报告不经过目就签上同意二字往上报。约耶也从中得到不少教益，于是它准备了三份基本材料，轮流上报，竟没有任何人发现它上报的材料是重复的。

然而，约耶对自己情报网送上来的材料仍精心细读，并把那些值得注意的内容挑选出来，分门别类，加以保存。在短短的时间里，它掌握的国营养猪场各级领导的材料，足有几摞厚，仅庞诺什·艾蒂博士一个人的材料就有满满一个卷宗，上面的代号是“鞋匠”二字，不过这些材料它暂时还不想抛出去。

*　　　*　　　*

费克特特里奇国营养猪场新近盖了四个单元的职工住宅。约耶也要求分给它一套。按规定，申请人的名单要张贴在办公大楼的前大厅，以便群众评议。约耶的名字理所当然地也出现在名单上：“费克特特里奇·尤若夫[1]——它想，用出生地作为自己的姓，会给人留下深刻、美好的印象——，职务：科长，本人成份：工人。”

约耶通过各种渠道获悉，国营养猪场肉猪科科长兼住房分配委员会主任打算拒绝它的住房申请。它便把卷宗打开，挑出有关这位科长的材料，嘿，内容简直丰富极了，它满意地嘴里哼哼着，开始研究起这些材料来。

约耶敲了两下门，走进肉猪科科长办公室，一屁股坐在他的办公桌前，对方问它要喝点什么时，它只要一杯清咖啡，

---

① 约耶是尤若夫的爱称。

然后掏出一点糖精代替方糖，放进咖啡杯里，轻松愉快地拍拍自己的大肚皮：

“还是社会主义好哇！”

“亲爱的约耶，你到这里来有何指教？”

“昨天我听到一桩骗局，特地来告诉你，好让你也乐一乐。你知道怎样把一头才三个星期的小猪变成一头大肥猪的吗？”

“兴许是把它打肿的吧。”肉猪科科长的嘴角上露出一丝不自然的微笑。

约耶放声大笑：“打肿的？哪有这么容易！我听到的骗局可不这么简单，比这复杂多啦。有个国营养猪场——就象咱们这里的一样——在喂养期把猪分成三类：小猪、中猪和肥猪。有个科长就在这上头做手脚。比方说，一头母猪下了十一头小猪，可在登记时，他注明：新生小猪一头死亡——一般说来，这个数字的死亡率是允许的——，这么一来，他就有了一只编外小猪。”

“他把小猪卖了？”

“卖了能捞几个钱？撑死也就是百八十个福林。我谈的那个人可不象你这么本份，他的胃口大着哩。他又从小猪群里挑了一只个儿头最大的，放到中猪群里，再从中换出一头中猪；这样一来二去，他就白赚了一头中猪。以后的事，我不讲你也会猜到的！”

“一点也猜不着。”

“他又挑了一头最大的中猪赶到肥猪群里，再换出一头大肥猪，赶回家卖啰。这个办法妙吧，对不对？我记性不好，

许多有趣的事听了就忘，因此，这次我特地把这个骗局同那个科长的名字写在同一张卡片上。”说着，约耶晃一晃那张小卡片："你不想看看吗？”

“我当然很想看看。”科长眼巴巴地望着那张小卡片。“你要多少钱吧？”

“嗐，咱们之间的交情，瞧你想到哪儿去啦?!等我住上新房子了，再交给你吧。我热切地提前邀请你光临舍下。”

约耶把新居布置得十分讲究，充满家庭气氛。前厅摆着一架精致的挠痒机，高兴时可以去蹭两下解痒。房间里有一个从民主德国进口的大立柜和一张人造革大沙发，放摆设的小架子上有几件小巧玲珑的艺术品：一个具有民间风格的绿釉“米什卡”水瓶和几只杯子，一个驴形烟具，还有一个台灯，灯柱上雕着一个醉汉。

房间的正面墙上挂着情报工作学习班全体学员的照片和名牌。出于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所有学员用的都是假名，连照片也是假的。譬如说，约耶的名字叫特·阿尔巴德，名牌上贴的是一个留分头的高个子男人的照片。

为了省钱，约耶从国营养猪场弄到一两件家用电器。它从猪场买了一个处理的自动饮水槽，装在厨房里，此外，它还搞到一个处理的取暖用红外线灯炮。

约耶还买了一套封面是红、绿相间的精装《世界文学名著》，一溜齐摆在书架上，书旁竖着一张仿羊皮纸卡片，上面写着："恕不外借！”布置妥当之后，约耶左左右右端详着自己的新居，感到心满意足。

*　*　*

以前，约耶偶尔也在办公室里工作到深夜。今非昔比。现在它只在上班时间才呆在办公室里。从此它也不再参加义务劳动。有一次，大家请它星期六去国营养猪场托儿所工地干活，他毫不客气地拒绝了：

“一个星期我只有那么一个周末！”

“为了下一代，咱们应该作出点牺牲……”

“建设社会主义，首先是为我们自己造福，其次才轮到下一代。何况下一代为我们做了些什么呢，他们又有什么权利要求我们作出牺牲呢?!”

约耶参加了驾驶汽车的训练班。国营养猪场的领导照顾它，分配给它一部日古利①小卧车。从此，它每次外出都以汽车代步，也把全部业余时间都花在汽车上了。约耶每天晚上都戴上海绵手套，抱着一个加热器，拎着一只小塑料桶，用各种各样的油蜡把小汽车擦拭得锃亮。

约耶成了一位颇有影响的人物，只要它出面，不论多难办的事，都能得到圆满的解决。不久，它当选为邻城汽车俱乐部的书记。它便从这里打入更高一级的社交场合。从此，它更着意观察俱乐部成员的衣着、谈吐和风度，连一举一动都模仿他们。它把自己逐渐稀疏了的猪鬃剪成短短的运动头，养成喝威士忌的习惯，还买了一只狗。在汽车俱乐部里，拳击是一项最时髦的运动。约耶把这种运动同自己的身体条

---

① 苏联制造的名牌小汽车。

件作了一番比较，衡量利弊之后，死了这条心，只好割爱买了一只小牧羊狗玩玩。不幸的是，这只小牧羊狗身上依然保留了从祖先那里遗传下来的驱赶牲口的习性。因此当这条狗在列宁大街拼命追逐约耶，并咬伤它的蹄子时，费克特特里奇城顿时舆论哗然。

不久约耶就把那辆日古利卖了，换一辆达契亚① 小卧车。它驾驶新车作第一次郊游时，邀请庞诺什·艾蒂博士同行。自从在巴拉顿湖畔疗养所同女经理邂逅相逢之后，约耶同她的交情变得很不一般，它总抓住一切机会同她接近，同时它也觉得女经理对它是有好感的。约耶暗下决心，趁此郊游之际把问题给解决啰。

“咱们上哪儿?”约耶问，手里晃动着汽车起动钥匙。

“上哪儿都一样，只要人不多的地方就行。”

“最近在‘强人崖’新开了一家餐厅，咱们到那儿去看看怎么样? 听说，那里可以吃到下水之类的东西。”

“就照您说的办吧。”

到了餐厅，庞诺什·艾蒂博士要了一份炸猪肝，约耶踌躇了好一会儿，最后决定来一盘蘑菇煎鸡蛋。

“约耶，您准是出于原则方面的原因而不吃猪肉的吧?”

“艾蒂卡②，您这是想到那里去啦?”

“它们和您都是……”

“我不懂，我同那些猪到底有什么关系?！要是养猪场

① 罗马尼亚制造的名牌小卧车。

② 艾蒂的爱称。

出售新鲜猪肉，我也会带一两公斤回家煮着吃的。可惜我现在又得减肥啦。”说完，约耶拿起摆在桌子上的几块饼干，执意不肯去碰面包。

吃过晚餐，约耶问：

“咱们喝杯白兰地吧？”

“喝酒不影响您开车吗？”

约耶咧着大嘴笑了：

“早上一杯白兰地，晚上一杯白兰地，喝了精力充沛，生活轻松愉快。”

服务员给他们送来白兰地，约耶把满满一杯酒一饮而尽，喝完边转动着空杯子边说：

“艾蒂卡，我深知自己不是阿多尼斯[①]，但我掌握的权力，其价值要比他的重要得多。我出身普通家庭，来自下层，不象那些有钱人的子女，我不曾有过自己的儿童室，也没有人教过我外语，我历尽艰辛，付出了自己的青春，为的是给自己创造一个优越的生活环境。现在，即使说得谦逊些，我一切都有了，可是我仍然感到孤独。”它盯视着女经理的眼睛。“艾蒂卡，咱们结合起来吧，永远不分离。”

女经理转过头去：

“我不明白您的意思，您把话讲明确些。”

“艾蒂卡，您做我的妻子吧，我要用我的蹄子捧着您，使您幸福……”

---

① 希腊神话中的美男子。

女经理一下子从坐位上跳起来：

“您胡思乱想些什么？！不管我们怎么器重您，您总归还是一头猪呀！”

约耶感到很委屈，打断她的话：

“在美国，人们就是用这种腔调谈论黑人的！”

“要是您忘记了您是谁，原来是什么东西，那么我可以立刻叫您想起来。不错，是我把您从猪圈提拔起来的，不过明天早上我就可以叫人把您当一头肥猪赶回猪圈。等到在屠宰场割断您的喉咙时，看您还敢不敢如此放肆。您竟要我做您的妻子？下流的猪猡！”庞诺什·艾蒂博士说完，从餐桌旁跑了开去。

“咱们走着瞧，看究竟谁割断谁的喉咙！”约耶嘟哝着，独自钻进汽车，驱车回家。一到家，它马上从架子上取下标有“鞋匠”代号的卷宗，里面收藏着有关庞诺什·艾蒂博士的全部秘密材料。它先通读一遍，然后取出一张纸，开始写起来：

中央人民检察委员会：

我愿就费克特特里奇国营养猪场经理庞诺什·艾蒂博士一案告发如下：女经理因明显玩忽职守，并因缺乏起码的专业知识，致使国民经济蒙受巨大损失。该养猪场还把成百万资金投入将狗肉制成熏肉的试验……

“咱们走着瞧，看究竟谁割断谁的喉咙。”写完告发信后，

约耶面带喜色，一再重复着这句话。过了一会儿，它又上办公室去，拨通“R”专用线，直接给部里挂电话：

“久拉大叔，我向您报告……”

*　　　*　　　*

约耶打报告以后两个星期的某一天，州《人民报》刊登了如下一则消息：

费克特特里奇国营养猪场因违法乱纪，滥用职权，经上级批准，免去庞诺什·艾蒂博士的经理职务，并建议检察机关就她的案件提起公诉。现已任命著名专家费克特特里奇·尤若夫为该养猪场经理。新任经理在纲领性声明中提出，将把改进猪的饲养方法列为该猪场最重要的目标……。

冯植生　译

梅什特赫耶·拉约什

森皮特宁

〔**作者简介**〕 梅什特赫耶·拉约什（1916—1979），匈牙利当代著名作家，评论家。曾获柯苏特奖和尤若夫·阿蒂拉文学奖。他的作品广泛而深刻地描写了社会各阶层人们的思想情操和道德面貌，并力求从中找到解决当代社会问题的正确答案。代表作品有，小说：《人证》、《四条腿的狗》、《悲哀的小丑》、《闪光灯》、《父亲的心》、《第一人称单数》《无知的年代》、《离边界几步》、《普罗米修斯的奥秘》等；剧本：《佩斯的人们》、《第十一条戒律》等。《森皮特宁》是作者力作之一。

因为广场在施工，他只好绕道走。在临时板围后面，一台挖土机每隔一定时间便抬起它的龙头——涂着红、蓝、黄三色的钢嘴，以及牵制它的电缆和管子。这里正在兴建地铁。

他想，他将永远不能乘南北向的地铁了，尽管会有许许多多的人要乘坐这条路线的地铁，每天早上有成千的人拥挤在月台上。那座自动扶梯兴许就建在那台挖土机挖土的地方，可是它将永远不会运送他。

他做孩子的时候信教，常常做祷告，然而他的祷告往往是在绝望中进行的。上帝比谁都更清楚自己永恒祝福的价值。谁博得上帝的喜悦，上帝就满足谁的祈求；相反，谁的祈求就得不到实现。现在，他是怀着紧张而又绝望的心情在做祷告的，因为他非常需要他正在祈求的那种东西；这对他是生死攸关的大事。可是他又知道自己无论如何得不到它。

门房是新来的。他从小窗口往里通报姓名，可是他的姓名在门房听来却索然无味。门房要他出示身份证，然后把他的身份证仔细检查一遍，还下意识地在手中翻过来覆过去糊乱拨弄几下，又在桌子上翻找一阵后才往楼里打电话。经过这番折腾以后，他终于得以填写入门登记。对他来说真象是做了一场恶梦。其实，他退休还不到半年哩。他感到儿时绝望中祷告的痛苦，心里暗自思忖："噢，上帝！今天别让这'难缠的老头'考验我呵！那是毫无意义的……"

可是，斯迪里尼却用豪爽的风度问候他，还拍拍他的肩膀，说："我亲爱的贝拉，是什么风把你吹来……"

"一个要求……"

"说吧。坐呀……你能给我们来杯咖啡吗，泰丽卡？这次我也要一杯。"

既然来了，就得把话挑明。不然，他们难道非得从"你

好吗，今天天气怎么样”等套话开场不成？他想，还是开门见山为好。

“森皮特宁。”

斯迪里尼的脸上顿时蒙上一层焦虑的愁云，立即走回到自己办公桌后面的椅子坐下。他考虑得抢在斯迪里尼说“没有”之前，赶快把话接着说下去：

“中央医院的大夫答应为我治疗，可以马上给我安排一间病房。这是最好的机会。我只要带药去就行了。”

“只要！唔，我可以发誓……现在凡是打电话或者亲自上门找我的人，几乎毫不例外都要森皮特宁。你要知道，这种药已经严格冻结了。”

“所以我才来找你嘛。”

“可是你得把我的话理解为没有这种药。眼下没有，而且往后我也无法搞到。有过那么几千支吧，那是为中央机关准备的；在咱们这里也只有各部门的头头脑脑才能使用。再就是每一个州都有十五、二十名最重要的领导人——区一级就轮不上咯——，还有大约五十个大工厂、专业国营农场和非常出色的合作社的领导人——也只限于主席和总农艺师，而且他们得自付生产费用——，院士、名演员和名画家……就那么几千支。我就用不着告诉你少得多么可怜了。分配不过来呀。工厂的开工率倒是很足的，不过你肯定知道，咱们在国外也要承担义务呀——这是咱们向经互会提供的特产，至于在西方市场嘛，没有任何一种出口商品比这种药能给咱们挣到数量不受约束的外汇了……我们正逐步增加对国内的供

应，以便做到扩大分配。”

“我可是你们中的一员。我从这里退休还不到半年哩！是我主动提出退休的，不是他们要我退的呀。他们要留我，这你是知道的。”

“对，这我知道，我亲爱的贝拉。不过制度规定得非常明确，只供给在职的某些成员。”

“这我就不理解了！森皮特宁是什么药？难道这种药就那么复杂？生产这种药成本就那么昂贵？你刚才不是说开工率很足……”

“原则上说，生产这种药一点儿也不复杂。有某个人，具体说吧，就是格尔格依教授发明了这种药。正如我们很早以前就知道的，老化毕竟是特殊程序的结果：咱们肌体里的细胞不断地、成百万地死亡，同时又不断地为低劣的细胞所代替。正象一辆汽车需要经常换零件一样。这种程序必须予以改变，咱们肌体的组织得生产完善的替代物：咱们二十岁的时候，咱们呼吸的空气同样是现在的空气，咱们吃的和喝的也是现在咱们吃的和喝的，其实，咱们绝大部分人被剥夺了可爱的童年。整个工厂现在得重新规划生产质量不变的部件，正如一辆汽车上的每一件东西都要用原配件更新一样：原则上说，一千年以后这辆车还会是崭新的，不是吗？”

“后来呢？！我听说，后来是不是格尔格依免费发给咱们汽车执照啦？”

“我现在就来谈这个问题。从理论上讲，那是很简单的。可是在实践中，生产程序复杂，费用昂贵。首先，目前咱们

还不能合成原材料。他们正在攻关，实际上，他们甚至在放射物理领域搞这种研究。根据预测，要花二十年才能解决这个问题。你知道，情况是这样：没准有某个人明天就搞出个脑电波，或者也许还要二十年才能搞出来。眼下，咱们只好安于这样的现状：仅仅一个疗程就需要七十到八十只新生幼畜的松果体。制药厂在全国各地拥有庞大的养兔场，而且还跟合作社和个体户签定了饲养几千万只兔子的合同。——这是当今最大的火箭。这些兔子不是随便给点吃的就行，得用维生素和激素喂养它们，而且还得有兽医不断观察它们……然后才是精密的筛选和净化工序。你想想，光是婴儿激素的性抑制效能一项就得中和十一种不同的工序。然后是治疗本身。我真不明白，人们在谈论用这种药进行治疗的时候，比方说吧，竟然象谈论补牙那么简单。治疗必须住院两个月，接受严格的药物观察，出院六个月后还要去复查。”

“你进行过这种治疗？”

“是去年冬天的事。在咱们这个岁数，人人都开始患动脉硬化症。我也刚领教过这种治疗！静脉壁开始再生的时候我头疼得要命，而且有时候我全身疼得难以忍受，有两个星期只好靠止痛片过日子。”

“是呀，不过你毕竟还是换来了长生不老。”

斯迪里尼耸耸肩膀，说：

“原则上说是这样！可是事情并非那么简单……不过你会发现，不论是否考虑费用的昂贵或医院的床位紧张状况，对逐步扩大分配的问题将会采取极认真的态度。”

“我已经对你说过，我弄到医院的床位了。一切具备，只欠森皮特宁。”

“一支也没有。我是把你当我们中间的一员对你说的。此时此刻，我无法象变戏法似的给你变出一支来。”

“下一个分配期呢？”

“我不知道。这取决于许多因素，甚至取决于国家银行。如果咱们搞到这种药，根据上峰的命令，一部分要分配给真正在生产第一线的工人，首先是矿工和建筑工人，还有合作社的农民。咱们毕竟是工农当家作主的人民共和国嘛。再有一部分很自然要分配给年轻人和妇女。还有就是分配给最近一个时期涌现出来的成绩突出的单位。是的，在这期间我们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压力：从部队、从大学教师、从群众组织的干部，甚至从这里，也就是本工厂内部退休人员那里来的压力。我可以告诉你，我们得承受住怎样的压力呵。”

“相信我吧，要不是非常急需，我是不会来纠缠你的。我的高压220，低压140……我这才不得不退休。”

“我亲爱的贝拉！现在是压力过高！难道说还要我向你解释？这种症状就象患糖尿病嘛。这种病有几十种好药可供选择。只要你遵医嘱，服用医生开给你的药，包你可以高高兴兴活到八十岁！何况你现在已经退休了。至于谈到的治疗问题，你就别妒忌我们啦！接受森皮特宁治疗的人的工龄已经提高到150年。你明白吗？不是年龄，是工龄。暂时是这样！这就是说，拿我打比方吧，我可以在120年以后，也就是我达到成熟的年龄180岁时退休！你知道，如此而已。”

“告诉我，即使如此，我什么时候能指望……”

“我不想使你产生任何不切实际的希望，贝拉。别叫我做那种事。”

“只告诉我一个大概的时间吧。”

“‘大概’可以这么说，除非这种药剂的生产结构和治疗过程有显著的突破，全体居民才能森皮特宁化——当然是逐步的，——到下一个世纪的头十年吧。”

“下一个世纪？到那时我会在哪里呢？你说是全体居民。我能不能把这理解成我属于‘全体居民’？”

“嗯，你瞧……按文件规定，作为一名退休人员，应该说：是的。”

“可我……实际上我是你们中的一员呀。我是从这里退休的……还不到半年哩！”

“最后期限是今年的一月一日。凡是去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退休的，都属于‘退休人员’那一类。”

他绝望地尖叫起来：

“你休想说服我，为了那可怜的几个月，我竟然得付出长生不老的代价！”

斯迪里尼试图用自己的镇定态度使他平静下来。

“我亲爱的贝拉！你一直在这把交椅里坐了那么许多年。你清楚这需要受到什么样的约束。在这里，指导方针、规章制度和指示一概俱全。‘是’就是是，‘非’就是非，不能开后门，也不能搞邪门歪道。我只是做了要是你还在这个位子上时也会做的事。”

“‘要是他还在这个位子上……’斯迪里尼会在哪里呢？仍然会在区结核病中心工作，如果他——是的，他本人——没有发现斯迪里尼，而且没有把他提拔到布达佩斯来的话。在区里，斯迪里尼会是什么样子呢？充其量是一个部门的副手，也就弄不到森皮特宁——可以打赌，他弄不到。要是自己不退休，不把位子腾出来的话，斯迪里尼将一直是圈子之外的人！”他心里在想。

女秘书端着咖啡进来。“要不要法国白兰地？”斯迪里尼问。他摇摇头。他们各自往咖啡杯里加白糖，在杯子里搅动一阵之后开始喝起来。他现在该说点别的了。

“你现在身体怎么样？我的意思是，自从你接受治疗以后。”

斯迪里尼笑了起来。

“简直妙极了。非常之奇特。我已经是快六十的人了，突然变成一个二十、二十五岁的小伙子。外貌的再生——皮肤、头发的颜色——需要一两年时间。虽然你开始感觉得到各个方面的效果……我看得出，象其他所有的人一样，你在猜测性机能的再生问题吧。嗯，是的，性机能也在再生。明智的做法应该是：凡是有配偶的男子，妻子也应当接受这种治疗。这么一来，她们就用不着谴责丈夫永远年青，正等着老太婆死去呢；而且用不着一下子办五千起离婚案，尤其是不需要为我们圈子里头的人办。他们做得多么聪明。不过偶尔我也发现，有些该给妻子使用的森皮特宁没有用于妻子的。”他抿着嘴轻声一笑。“谈这些事不是我的本意……最首要的是感

觉。你会发现，年轻人看待事物是多么的不一样，你明白吗？不是看，而是看待。他们听觉、味觉和嗅觉同咱们中年人，管它咱们是什么样的中年人，都不一样。光谱不一样！有更细微的差别，而且范围更广些。其次，比方说，你的肌肉的感觉吧。每天早上我都发现自己没有停下来等电梯，而是顺着楼梯跑上去。三个台阶并作一个台阶走，我还特别喜欢这样蹦跳！明白了吧？仿佛很久以前的愉快的回忆又复活了。在任何事情上都如此：就拿从门道里飘进来的气味说吧，我已经有八辈子没闻到那种气味了；再拿晚霞来说吧，多少年来我看到的只是黑的和白的，或者说得更确切些，是黑色里头夹杂着讨厌的亮晶晶闪烁的东西……我把这些全记录下来，为一篇文章准备点材料。因为连格尔格依教授在他的报告中也没有写上这些。”

“真有意思。”

“想起来了，你知道格尔格依明年春天要回国来探亲吗？我们要举行一次关于森皮特宁的国际专题讨论会。我打算在会上宣读我的论文。不过……”说着，斯迪里尼捧腹大笑起来。

“怎么啦？”

“怎么啦？专题讨论会的组织者……”他笑得几乎说不出话来。“托马被委派为……你还不明白？”

“告诉我吧。”

“噢，这个，就是这个托马背地里整过格尔格依一家伙。正是因为他搞的鬼，格尔格依在1956年才叛逃的。格尔格依

原先在采格莱德医院当内科主治大夫。托马给内务部写了一封信，揭发他的父亲在沙约申特彼得的犹太人教堂当过唱诗班领唱人之类的职务……那时格尔格依在衬衣下面挂了一串穗子，就象咱们这里牧师都在披肩上套件无袖外衣之类的玩艺儿。更糟糕的是，他告发格尔格依在韦切什象富农似的有一个养兔场。这情况倒是属实。格尔格依那时就开始搞森皮特宁的试验了，是自己花钱养的兔子……”

“不可思议！”

“格尔格依承认了。为此进行了一次非常彻底的调查，可是科学院的人说，养兔场就是养兔场，而森皮特宁还只是个假想。于是这可怜的家伙在1956年逃走了……我是说‘可怜的家伙’，比我还傻……而现在托马竟然有脸主持这个讨论会！你说荒唐不荒唐？”

“是够荒唐的。”

“顺便说一下，我想这个专题讨论会一定非常有意思。不管怎么着，世界各地都派人来作报告。瑞士人的成果是阿塔那丁，荷兰人的成果是安提摩丁，西德人的成果是尼希斯丁，美国人的成果是里根纳林……”

“这我相信……你得承认，就因为这个原因，我才一直在那张办公桌旁坐了那么些年，而且我还知道所谓‘铁储备’指的是什么。连最稀有的药物也要有储备。这是不言而喻的。一位外国首脑，或者类似的人物来访……得啦……一支，只一支就行了！别再说一支也没有。”

“唔，是有。在那个意义上讲，有。当然有啰。不过这

掌握得很严。非常严啊！每一毫克都掌握得很严呐。比吗啡还严哩。我可是毫无办法。”

“得了吧，你没办法，谁有办法呀?!……对不起！”

“没关系。我能理解你的感情。不过你也得从我的角度想想。在我们这里，起作用的是最严格的计划经济和真正的社会主义观点。我可以向你保证，那是以绝对独一无二的公正和人道的方式进行的。比方说，你看看在西方他们是怎么干的吧。那里有两种方法。咱们就把它叫做英国式和美国式的吧。跟大多数共同体国家一样，英国人在市场上公开出售这类药，它的昂贵价格本身就残酷地缩小了服用它的人的圈子。一万美元一支。至于治疗嘛，那就要取决于医院啰，从一万五千到两万美元不等。谁有那么多钱呀？还需要我告诉你哪个阶级的人才买得起这种药吗？在美国，除了金钱之外还要加上政治过滤：分配是受联邦调查局监督的，而实际上是各州自己分发的。我几乎不需要补充说明，在五十个州的二十一个州里，有色人种、新去的移民或‘赤色嫌疑分子’是不能获得里根纳林的……在咱们这里怎么样？首先，森皮特宁几乎是免费供应的。我们甚至不要求支付通常工会社会保险所要求的百分比，因为一个普通工人连那种费用也付不起。住院治疗的费用是微不足道的。第一批五千支可以不予计算，因为从社会观点来考察，在行政机构内部分配的公正性是得到保证的，而且世界各国都以此作为维护内部秩序稳定性的过程。在有些国家，这类药被用来维护压迫的连续性；而在另一些国家，象在咱们这里，这种药为行政管理和经济计划

开辟了崭新的广阔前景。而且别忘略，我们，可以这么说，是试验的典型——作为整个社会活动的序曲，这是我们的义务。无论如何，现在只能如此！你耐心点听我讲完吧。我可不想为你举行一次讨论会，但是很明显，从这里显示出了我们制度的优越。直到现在，连最富有的资本主义国家都无法把为全民搞的这种治疗列入远景规划。你想想，这意味着什么样的一种新的社会紧张关系哟！在主人与仆人之间连跳死亡舞蹈①的平等权都没有哇。剥削者长生不老，死得最多的是被剥削者。象两种不同类型的动物，这已经超出单纯的阶级对抗！相反，在这里，咱们已经在制定一项为每一个公民都能长生不老的计划。你就想想这个吧。这不仅是关系到公正和人道的问题。这一次，人道主义将在更高水平、更广泛的意义上得以体现，而且只有在这里，只有在咱们的制度下才能体现！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呢？完全是为了有步骤地组成未来的、而且也是遥远的未来的人类。我还可以用另一个方式来说：实现一种严格的、科学的优生学。总而言之，通过森皮特宁我们都恢复了健康，在更广泛的意义上说，我们成了自己的接班人，就象我们当年那样！……不知我是不是把自己的意思说清楚了？"

"当然说清楚了。"

"那末，现在你该明白为什么要限制这种药了。

"归根结蒂是为了贮备吗？"

---

① 中世纪绘画题材，象征死亡的骷髅带领众人走向坟墓的舞蹈。

“这只是部分原因。然而主要原因是有一个科学委员会正在制定一项优先使用的标准。你瞧，在这个国家里，大概每三分钟有一个人死亡。换句话说，损失是不间断的。新出生的婴儿，当然在数量上填补了损失，不过对他们的质量如何是没有把握的．而且在许多年里他们还只是社会的负担，对吗？”

“你们到底能治疗多少人呢？”

“集中我们的全部力量，并建立配备有上过速成训练班的医护人员的紧急医院，扩大制药厂和养兔场，这样我可以说，两年时间以后一天能治疗一千人。可是你就想想，这样的组织工作是多么艰巨呀！如果把森皮特宁作为一种吸引物来提供，就不会产生任何劳动力短缺的问题了。”

“一天一千，那还是少得可怜哪……二十五年才一千万，这期间人口还在自然增长哩……”

“尽管是逐渐减少，总还是有些自然增长。”

“你这是什么意思？”

“显然，同长生不老相适应，必须实行越来越严格的人口计划。部分是通过规章制度——取消家庭津贴、提高儿童税收——．部分是通过自发的方式：那些永远二十五岁的人除了自身之外，几乎不想要其他后代了。”

“即便这样，还会有一定数量的婴儿出生呀……”

“所以我才说要等到下个世纪的头十年嘛。到那时候我们就可以给全体居民治疗完毕啦。而那些自然增长的人口在他们二十岁的时候，同样会得到森皮特宁，就象今天所有的

婴儿接种麻疹或萨宾疫苗①一样。”

“可是在这期间每三分钟死一个人哪。”

“这是消防工作。因此，这里谈的不是简单地挽救生命的问题，而是挽救社会价值。优先权得确定下来，以便从明天开始让具有社会价值的那一部分尽可能减少损失。”

“怎么个做法？”

“用机器呗。用电子计算机。现在，委员会正在制定一项标准呢。”

“什么样的标准？”

“社会有益标准呗。公共道德、智力商数、生物学价值，一切，一直到最微小的细节。我听说连美貌、甚至连美学价值都要加以考虑呢。当然，分工的需要也要考虑，以便在这个过程中不会发生任何故障……他们弄完以后就要搞规划啦，计算机就能接着运转。”

“对每一个公民的数据都要运算？”

“你想想看，这是何等惊人的工作量呀！现在你也该明白，我为什么要表现得那么冷漠，他们又为什么要最严格禁止钻任何形式的门路了……”

他明白了。他当然明白了。

“我本来是不会来找你的，要是……你知道高血压意味着什么。尽管你是对的，也许我可以拖到八十岁。但这是非常不可能的……我们这一代已经过时了，是肌体和各种神经

① 即小儿麻痹症疫苗，其发明者为美国医生萨宾(1907——),故以此命名。

系统已经衰竭、变形的一代……我可能活下来，可是没准哪天天气发生急剧变化的时候，我的冠心病会要了我的命。没准哪天一激动或者体力消耗过度，我就会中风死去。否则我是不会来找你的。凭我的学历、理论知识和实际经验……我还可以干许多事……”

“这些都将写在你的档案卡里！”

“除此之外，我还是一个党员呢。”

“噢，我亲爱的贝拉，你不是经常听说，而且你自己不是也经常说，党员仅仅意味着承担更多的责任，绝不是享受更多的权利！只有一个例外，那就是除非你能够成为党的一名干部。不过你只要想想，这会给本人造成什么样的政治上的紧张……”

“可是……不管怎么说，我是个老党员，老干部……”

“我真没想到你会说出这种话！”

“一般我是从来不讲这种话的。”

“你身上的任何一个优点都将记入你档案卡的道德品质栏里。何况……你是解放前入党的吧？我亲爱的贝拉，我可以坦率地告诉你：人们在一万年以后只会完成1945年以前在党内干过的工作，这种人对未来社会有什么好处呢?!我只对你说这点吧。要是你引用我的话，我就要否认说过这种话。”斯迪里尼笑了起来。

“每一个在私营部门工作的人都已经接受过治疗。”

“每一个人？这样说未免有点夸大了吧？”

“每一个工厂主。”

“噢，快说下去！”

“每一个车库的服务员。”

“不是‘每一个’。”

“每一个出售汽车轮胎的，每一个足球运动员，每一个流行歌曲的作者，每一个合作社主席，每一个摆摊子的和城里的每一个妓女。”

“哎哟哟，你可不要夸大其词！”

“医生们在家里开起私人医院来了。”

斯迪里尼做了一个毫无办法的手势：“这我们都知道。”

“他们屋子外面的马路被外国小卧车堵塞得水泄不通。”

“在维也纳他们用两个先令就能换到一个福林。这个我们知道。”

“外币商店的橱窗里摆着森皮特宁呢。”

“那是两码事。这就等于出口商品一样嘛。用这些钱咱们可以为紧急医院进口轻便结构房屋。你在这里工作过，这你还不明白?!”

“我不明白，在林荫大道的民族饭店门口，一支森皮特宁怎么能卖到四十万福林，还是工厂的原包装货呢。”

“你不明白！你多天真呀，我亲爱的贝拉！……遗憾的是，这是真的。我们知道这种情况。不过这一切仅仅是表面现象。”

“住在国外的亲友把里根纳林和阿塔那丁当礼物寄回来。就象他们从前送汽车一样。喂，你相信吗？那是真正的礼品吗?!”

“嗨，你过去相信汽车是礼品吗？难道在匈牙利有过那么一个傻瓜相信那种花招?!我们还有缺点嘛。我们从来不否认这一点呀。”

“在皇家饭店门口有一个真正的证券交易所。那里有森皮特宁、安提摩丁和里根纳林出售。每一个布达佩斯的孩子都知道尼希斯丁质量最好。它的价格也最昂贵：五十五万福林。”

“得啦，你不知道，那是天大的笑话。我不是在泄露尖端机密：尼希斯丁是在咱们国家，在新佩斯制造的，然后装在闷罐里用船运出去。西德人只是把它装进小瓶子里，再贴上商标：‘尼希斯丁　巴伐利亚造’。不过根据技术要求，他们又提炼了一次，这样就可以预防每三百例中间有一人产生药物过敏。至于有效成分和有效程度嘛，他妈的完全一样。那是好东西——‘尼希斯丁最好’。只是因为有西德商标!”

“那些人究竟怎么能弄到五十万福林呢?”

“要知道，这可是关系到生死的大事呀!许多人把全部家当都变卖咯。”

“我也打算这么做呀。卖掉我这辈子挣来的所有东西!要是我交好运，这些东西顶多能卖五万福林，可惜不是五十万福林。”

“不是每一个人都象你我。到处都是钱。都是钱。咱们见识过的。到目前为止，在每千辆小汽车当中，以匈牙利的梅尔切特什牌占的比例最高。其他的东西就不在话下啦……”

“工人、教员……这里所有诚实、流汗的劳动者都是绵

羊，他们都能忍受这个？”

“你别在这里煽风点火啦，我亲爱的贝拉。这有失你的身份。你可不能象某些教条主义维护者那样看待问题。你得用一个经济学家的眼光来看待问题。现在情况既然如此，首先我们就不必承担那么些许诺了。弄到森皮特宁的人，我们就不用给他了呗。其次，你只要想一想，这样一来，会有多少购买力从别的领域，尤其是私人住宅，转向森皮特宁。否则这五十万福林的大部分将投入在巴拉顿湖畔建造大小别墅啦。你不知道这是减轻其他方面的原材料和劳动生产率压力的方法吗？首先，这意味着我们可以完成造房计划！比方说吧……顺便提一下，这回你体会到了吧，我们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多大压力，我们周围有多少诱惑物，今天我们又是如何认真对待纪律的。你瞧，如果我们在某个环节稍一放松，如果在某个地方出现了小缝隙，这整个大规模运动就要告吹！”

“那么多钱我可没有，别说五十万福林，连四十万福林也没有；我也没有办法把福林兑换成硬通货。那我只好等明天倒毙街头啰。”

“你可不要这样——不要让自己这么激动。你想倒毙街头还得等很长时间呢，贝拉。可是千万不要这么激动。”

“好哇。这么说来，我应该乖乖地、不声不响、静静地死去。就因为我退休还不到半年这样简单的原因。”

斯迪里尼伸手去揿电钮。“你到底要不要一杯法国白兰地？……泰丽卡！……遗憾的是，我不能喝，但是你可以放心喝。用我的大夫的话说，喝少量酒对你没有任何害处……”

女秘书进来斟完酒走出去以后，斯迪里尼接着说："你知道，我亲爱的贝拉，别以为我在装模作样，现在我可是经常幻想那已经结束的昔日美好的人类生活。瞧，这里简直烦死人啦。为了另一个120年——就象现在这个情形。是的，人老了，累了，然后有一天会倒毙街头，这毕竟不是那么坏的事。其实是睡觉，只是睡觉而已。也就是'躺在我们祖 先 身旁休息'。我不明白，我真不明白，为什么大伙都抢着要这种灵丹妙药。你知道长生不老是什么吗？我对这种生活颇有怀疑。也许你还记得，关于这个问题恩格斯是这样写的：忧郁、年迈的烦恼……退休的年龄提高 了，要 达 到 150 年工龄 以后。目前嘛……我们知道那意味着什么……一种行政管理章程正在制定之中；根据这一章程，每隔五十年，学历就失去它的有效性；或者根据其他的建议是每隔三十年。我又得再去上学……然后……我甚至不想谈起这件事。森皮特宁解决不了脑力衰退和大脑萎缩的问题。这就是不准我喝酒、抽烟、服用镇静剂或安眠药的原因。嗨，那没关系。但是不久以后，脑力终究是要消耗光的。一千年以后？据有些人的意见，那是没有问题的：人类的大脑可以使用三千年到四千年。那么以后呢？我的眼睛和耳朵全好好的。可是我愣 是看 不见，也听不见。我只能有知觉，却不能理解事物。因为我的大脑只保持着记忆。我望着一棵鲜花盛开的树木，却看不到它，我对这棵树只有记忆。你明白吗？可怕极了！这比任何死亡 都 更可怕：被活埋在自身的躯体里……未来学的学者们说，五十年以后科学将解决大脑的问题。好吧，就算它五百年吧。可是万一解

决不了怎么办呢？即使解决了，那再生的脑子还会是我的吗？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那么'长生不老'这玩艺儿——仅仅是一种幻想吗？再生的肌体目前还不能抗中毒、失血和窒息。我同你一样也会死的，只不过我会暴死，因而死得更惨。甚至森皮特宁能抗辐射到什么程度还不肯定呢。我看报的方法同你不一样。今天这里冲突，明天那里危机。战争与和平的问题象是在我背上撒胡椒面，使我坐立不安。咱们在刮胡刀的刀刃上能跳多长时间的舞呀？你考虑的只是一代人的时间……叫我怎么向你解释清楚呢，贝拉？你知道你要死了。你唯一的赌注是'怎样死'和'什么时候死'。可是我呢，只有一个真正的选择：生或死。我是被指定要'长生不老'的；可是我呢，比方说，还不能够确保安全。你能想象我登上飞机的时候是什么心情吗？而在一年里我又至少得坐六次飞机哟。一个经常乘坐飞机的人能永远不会碰到飞机坠毁事件吗？或者再打个比方，一个人走在马路上能保险哪天不被一辆大卡车从身上压过去？即便这一切我都能神奇地逃脱了，我还能永远躲过地球在宇宙中的风化作用？不是吗？死亡，尽管它还很遥远，但毕竟是死亡呀。而且因为不知道会怎么个死，使人觉得更恐怖。"

他站了起来。因为他意识到在这里继续留下来已经不太合适，何况他还独自一人喝了法国白兰地呢。

"在我这短短的一生中，要是来得及，我会对你这种心情感到惋惜的。你知道这整个事情听起来是怎么样的吗？我好象坐在死囚室里等待着我的时刻的到来，而你，一个善良而

富于同情心的人却在抱怨肚子疼。”于是他忍不住又大声嚷嚷起来：“这一切都因为时间过了半年，还不到半年！否则我仍旧坐在那里，坐在你现在的交椅上。”

“我不明白你这是什么意思！”斯迪里尼也站了起来。“我不明白这整个世界出了什么事，你们是不是全都疯啦？‘死囚室’？你理智点，你这一辈子不就是生活在‘死囚室’里吗？难道你从来没有意识到死亡是不可避免的？难道你的父亲、母亲和千百万先辈，一直追溯到原生动物，都没有死？他们的命运不全都是那样？而且在很久很久以前，你不也是接受这种命运的安排么？难道你奢望过能长生不老么？有人在抽噎着讲出想要长生不老时，难道你不训斥他是疯子么？现在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是什么东西使这种不可能的要求在人们中间突然爆发出来，而且还那么强烈呢？为什么当有人耐心地、合情合理地向他们解释这办不到的时候，他们甚至还感到委屈呢？世界上最大的问题，真正最大的问题，难道仅仅是‘牢骚满腹’？……”

末了，斯迪里尼自然会这样说：“我尽量设法给你弄。”那是他一向把来访者打发走的妙方。

他感到紧张的绝望，童年做祈祷时紧张的绝望。当他知道没有任何指望的时候。

他在市中心转悠，呼吸点新鲜空气。他望着街上的行人。很明显，一个人起变化以后，连外表都那么不一样了。这种人在这个区里多得很。他们的动作、他们的外貌和他们的信心都不一样了。在那间魏勒什马尔蒂老咖啡馆里——至今他

仍叫它耶尔波咖啡馆——每张桌子都坐满了人。他们都是变化了的人。那些没有变化的人怎么能安详、冷静地坐在耶尔波咖啡馆的平台上呢？

回家的路上他又在工地旁站下。他在观看临时隔板后面红、蓝、黄三色的钢龙每隔一定时间抬起龙头。他将永远不乘南北向的地铁上班了。尽管许多人会，许多人会拥挤在月台上。月台将建在他现在站的地方。多少人呀！

他猛然感到自己孤独得象是正在死亡的物种中的最后一个标本。

张春风　译

贝尔哈·布勒曹

特殊使命

〔**作者简介**〕 贝尔哈·布勒曹(1935——　　)，匈牙利著名作家，多次获尤若夫·阿蒂拉文学奖和匈总工会文学奖。曾在各种地方报社当过新闻记者，1955年开始发表作品，1967年起定居布达佩斯从事专业创作。他的作品主要以当代匈牙利社会生活为题材，反映人们的思想风貌和道德问题。重要作品有：《阳光下的姑娘们》、《哈尔莱欣和他的情人》、《火球》、《大袋鼠》、《午后的谈话》、《你的一生就是如此》；另外，还著有剧本《澡堂经理》。

从早晨七点，他就一直站在镜子前刮胡子。他的动作缓慢。他头痛，而且每隔四分钟胆囊就要痉挛一阵子。每当这种时候，在他颤巍巍的手中的刮胡刀便抖动一下，随之脸上也划了一个口子。他觉得很痛苦。在疼痛过去之前，他一动

不动地站着，端详着镜中自己的面容。在镜子里，他看见一个五十出头的神经质男人瞋目而视。他的皮肤仍同以前一样是棕褐色的，很粗糙，这是常年累月在野外演习的结果，不过使他纳闷的是，他的皮肤已经不再是黑里透红，″而是蒙上一层青青的阴影。他的眼睛布满血丝。他记得，每次因胆囊炎发作不得不好几个星期放弃喝酒，眼睛充血的现象便消失了，不过他的白眼珠子依然是黄的。他没有留唇须，这倒叫人十分费解。一九六〇年，他把小胡子剃了，因为当时他可能返回部队的一切希望全都成了泡影。从那以后，他觉得自己跟从前大不一样了。这个波尔达茨·伊斯特万现在是工会的一名副科长，每天靠读读小报打发日子，有时竟在大白天去捏女打字员的屁股，显然跟原来的那个波尔达茨·伊斯特万判若两人。原先的那个波尔达茨·伊斯特万当过陆军上尉，在进行夏季演习时，他站在两座森林中间的空地上吼叫，连老鹰也被惊吓得离开巢穴。

他仍对着镜子端详着自己的面容。当胆囊的痉挛缓和下来时，他就把手伸到水龙头下面去摸啤酒瓶子，那是在半个小时以前他放在水龙头下的冷水里拔的。瓶子凉丝丝的，干渴的喉咙在撺掇他马上抓起瓶子来喝。可是转念一想，还是先耐心把脸刮干净，然后再开啤酒瓶为好，因为他明白，喝过酒以后，手可能抖得更厉害。他又拿起刮胡刀，小心地刮着脸上的胡子。卧室里的收音机正在播放歌曲，是马蒂·彼得唱的《枯叶飘零》。他的胆囊又是一阵痉挛。他放下刮胡刀，朝卧室走去。他把那台老掉牙的收音机音量放小，又走回盥

洗室。卖午餐券的玛察很崇拜马蒂·彼得和他唱的这首歌曲。现在，波尔达茨才开始意识到自己也充满着象玛察的那种多愁善感了。他朝镜子投去冷冷的目光，随即果敢地拿起刮胡刀。他这一次动作很成功。在一片唰唰声中胡子消失了。他象刈草似地大面积剃去左腮上的胡子。一不小心，他又在耳朵边划破了一个小口子，立刻冒出血来。他把刮胡刀从腮帮子上移开时，沾在刀片上的短须也跟着落下来。他的手又开始颤抖了。原来在耳朵边划破的那个口子足有一、二毫米长，可是渗出来的却是发暗的血。现在，剩下右腮还没有刮，但他再也刮不下去了。他望着自己的血。他不理解，为什么会流出这种粘糊糊、颜色发暗的血液来。他不免一怔。他担心某个早晨，在不知不觉中他的血液会突然凝固住。这是他连做梦也不敢想象的。他实在刮不下去了。得去让医生看看——他心里想。这时，他的模样看上去比死人还可怕。

突然他又把手伸到水龙头下面去摸那瓶酒。他的触觉告诉他啤酒已经变得同水温一样了，也就是说处于最佳状态。再凉是不可能的，因此必须立刻喝掉。他把啤酒瓶子从水龙头下面提起来；这时，他才发现右腮上还沾着白色的泡沫。“波尔达茨，请遵守纪律！我们究竟是军人还是磨刀工人?!”——房间里突然仿佛响起这样的声音。他狠狠地朝镜子瞪了一眼，把瓶子放回到水龙头下面，又开始摆弄起刮胡刀来。他又把脸刮出血来；这次他顾不上伤口了，大声吼叫：“那不勒斯长柄大弯刀，朝着我的腮帮子下手吧！”他手中的刮胡刀又动起来，大概是吓怕了，动作很缓慢。他的脸上

没有再划破口子。刮胡刀有节奏地发出唰唰的声音。在他的记忆里，他的手从来没有这么有力地握过刮胡刀，而且居然没有颤抖。他就在不知不觉中把脸刮干净了。这时候，小苏斯的音容又在他眼前显现，他看见小苏斯一跃跳到桌子上，大声叫喊:“我身上带着那不勒斯长柄大弯刀，谁也不许动，否则我就叫你们胸膛开花!”小苏斯原是边防部队里的一名上士，在霍尔蒂时代曾被派往西线驻扎，回国时成了一个有名的调皮鬼。他在那不勒斯买了一把长柄大弯刀，刀刃长34公分。这把刀非常吸引人。夏天，部队在佩奇附近演习，邻近村子里的人们常常邀请士兵去参加庆丰收的舞会。当地的年轻小伙子不免产生嫉妒，到了午夜，他们把一瓶苏打水扔进从酒馆屋顶伸出来的烟囱里，轰的一声爆炸了。于是，小苏斯就手执那把那不勒斯长柄大弯刀跳到桌子上。随之又有人把电灯关上，屋里一片混乱。

波尔达茨把脸颊上的泡沫洗去，又伸手到水龙头下面，提出那瓶啤酒，用澡盆的边沿启瓶盖。澡盆边上的珐琅质已经脱落，露出铁锈，他把瓶盖的齿边放在澡盆边沿生铁锈的坑洼处，用力一磕，瓶盖就掉下来了。他贪婪地喝着。今天早晨他第一次感觉到自己是一个人，一头普普通通的生物。他仰着脖子，咕嘟咕嘟地喝着。凉丝丝的、带点苦涩味的啤酒顿时止住他喉咙的干渴，增强了他的食欲。人是值得活下去的——他心里想，又拿起酒瓶。一瓶啤酒已经喝掉一半。这时，他感到脸上隐隐作疼。他又对着镜子端详自己，发现脸上划破了六个口子，伤口正在渗血呢。他把酒瓶子放在

澡盆中央，走进卧室。他找来卷烟纸，用它在每一处划破的地方小心地按一按，再擦一擦。收音机正在播放马赛曲。他抓起瓶子冲进卧室，放大收音机的音量。他留心倾听旋律，等待着，可是什么也没有等着。播音员用平淡的声调一再重复当天的主要新闻，这些新闻天一亮就来回播放好几次了。波尔达茨感到有点奇怪。他首先想到的是，这支马赛曲只不过是播放马蒂·彼得和苏茨·约蒂特歌曲间隙时播放的。可是他转念一想，又认为可能在播放马赛曲之前，已经播放过一些节目介绍，只因他刚才在盥洗室，没有听到。他在房间里失望地环顾四周。他双亲的照片从陈旧的镜框里板着面孔注视着他。他母亲叫切尼什·安娜，父亲叫波尔达茨·伊格纳茨。他们是来自东部平原地区的纺织女工和干体力活的工人，挤在首都郊区灰色顶棚的小房子里度过了一生。他还保存着他们在某个星期天照的一张全家福，可惜照片已经褪色，旧得都起斑点了。装着他双亲照片的镜框挂在卧室右边墙壁的正上方；镜框的左边，也就是他床头的上方，挂着他自己的照片，照片里的波尔达茨上尉蓄着唇须，看上去充满着自信心。紧挨着他自己照片的是一张长方形的照片，是夏天拍的；照片的背景是营帐，前面是连队的军官，其中有法尔柯什·米哈依，他正跟波尔达茨握手呢。同样大小的另一张夏天拍的照片挂在床对过的衣柜上方，背景不很清晰，看上去象是在一株橡树旁照的，橡树低矮的树枝垂挂在照片中央，许多军官站立着，正中的是穿着少校军服的普什卡什·费仑茨。也许是二十年前吧，波尔达茨曾经得到一张普什卡什亲

笔签名的名片，现在就贴在照片的下方。除此之外，房间里还有一张贴在衣柜上的照片，是从报纸上剪下来的，照片里安尼托·伊克布尔骑在一匹灰色种马的马背上，笑容可掬。

波尔达茨的目光在这些照片上面扫视了一遍，然后停留在桌面上；桌面上几只用过的杯子和空酒瓶中间，有三样东西不太吸引他的注意：一样是一副四个边角已经磨钝、油糊糊的匈牙利纸牌，装在一只开口的塑料套子里，其他两样是一把玳瑁梳子和一张精致的请柬。

他呷了一口啤酒，望着桌面。纸牌引不起他多大的兴趣。那把玳瑁梳子也一样，甚至还多少使他产生一种厌恶感。他又回想起那个卖午餐券的玛察闯进他生活里来的岁月。按照机关里的惯例，有些人，包括波尔达茨在内，每月二十号左右即可以向她借支一百福林的餐券；到下个月初，也是按照机关的惯例，还她一百二十福林。卖餐券的玛察可不是用自己的钱，而是拿其他工作人员的钱来作这种周转的。大多数职工在月初就买下全月的餐券，而食堂是一星期才结一次账，这样一来，玛察就可以在最迫近的那个星期才付账。月初收进的钱完全可以周转到月底。卖餐券的玛察是什么时候第一次闯到他家里来的，波尔达茨已经记不清了……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从那以后，他们之间的关系就一直没有断过。玛察从来不情愿回自己的家，即使是回去了，总把什么东西落下，这样第二天她又找到再来的借口。这是一个很妙的策略。在机关，她从不提起有什么东西落在波尔达茨家里，只是甜蜜蜜地、象个小姑娘似的冲他微微一笑。一到晚上，她就不

邀自来，径直走进他的房子，好象她是在半个钟头以前才发现，她把自己的吊袜带啦、梳子啦、手绢啦、扣子啦、爽身粉盒啦，或者什么内衣之类的物件落在波尔达茨房间里了。她有本事把这些东西神不知鬼不觉地留下来，而波尔达茨却从来没有留神她的这种小花招。当天他没有发现这些东西，只是到了第二天晚上，它们才不知从什么地方蹦出来，就在他看到它们的时候，卖餐券的玛察也在按门铃了。

波尔达茨匆匆地瞥了那把玳瑁梳子一眼，脸上掠过一丝怀疑的神情。他怎么在早晨就发现了这把梳子呢……这又引起他对往事的回忆。随后，他的心情又慢慢平静下来，因为他看到梳子是放在那张年久失修的褐色桌面上，夹杂在那些还没有洗刷的杯子和烟灰缸中间的。卖餐券的玛察想必不知道他有一天休假，能有时间久久地在房间里徘徊、细心地观察。如果是上班的日子，波尔达茨就得慌慌张张地刮脸，气呼呼地在盥洗室里洗个澡，急着要上班使他无暇收拾桌面上的杂物。那种时候，他就发现不了梳子，只有等晚上回家，无精打彩地洗刷杯子的时候，才会发现那把梳子。

那张精致的请柬就躺在那副纸牌、玳瑁梳子和烟灰缸的附近。它的白颜色在那些物件当中显得格外耀眼。这张请柬的确有些不寻常。转到工会工作以后，波尔达茨收到过许多请柬，然而他总是把大多数请柬立即扔进他眼前的字纸篓去。两天前送来的这张请柬，当时也被他连同其他物品一古脑儿推到桌子角上去，只是吃过午餐以后才瞟了它一眼。现在，他点燃一根香烟，便在请柬上动起脑筋来。当他考虑星期天

是去观看足球比赛还是去玩九柱游戏的时候，请柬上的字母突然映入他的眼帘："军官授衔典礼"。他把请柬从桌面上拿起来看了看。他象被电触了一下似的，手马上颤抖起来，只好把手中的香烟放下。早在一九五七年，他就同部队断绝了一切联系。从那以后，唯一的一次联系是后备役司令部把他召去，让他领走一张后备役军人证书。

在他脑海里出现了一线没有把握而又令人气恼的希望。也许他们要召他回去服现役。他想起了某个人。国防部里大概发生了什么变化……是派去什么人了吧。他又想起部队过去的一些军官，他们都是来自生产第一线的。他们原先都是精明强干的农民子弟。

他实在坐不住了，下楼到食品店去，在那里喝了半杯白酒。他在沉思：为什么请他去参加军官授衔典礼呢？……其中必有原故。这类事情总是事出有因的。部队里发生的事不会是没有原因的……是不是有人记起他了？也许是一位他过去认识的上级，显而易见，这位军官的军阶起码是少校或者中校；在典礼上他会向自己走过来，称呼他：波尔达茨同志……？

在他返回房间时，科长已经坐在那里等候他，催促他去看一个展览。现在他望着那张精致的白色请柬，又看看自己，一言不发地把它从桌面上拿起来，递到科长手里。科长看过以后，带着询问的目光望着他。——我明天请一天假——他的声音低得仿佛只有他自己才能听见。科长说：——您只管去吧！不过您花不了一天时间的，典礼结束后我到办公室去

看您……波尔达茨想了想，摇摇头，好象这样他会失去同姑娘们厮混一天的机会似的。

他把剩下的啤酒一饮而尽，然后以军人的风度把瓶子往桌子上一放，动作坚定、利落。瓶子砰地响了一声，差点打碎了。他走进盥洗室，洗了个淋浴，便站在镜子前梳头。镜子里出现的陌生、虚胖的面孔又使他大为恼火。他的面孔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从前，他的面孔可是另外一个模样呀！棕褐色的皮肤，威严、坚定的神情，面孔正中两撇整齐的唇须油光乌亮。他对于已经把唇须剃去感到十分懊丧……没有了唇须使他整个面容遭到了破坏。他顿时觉得浑身乏力，恨不得马上躺倒在床上。

近五年来，波尔达茨早晨的日子很不好过。刮脸、盥洗、穿衣这些事情把他搞得疲惫不堪，以至刚到工会上班，就感到这一天已经结束了似的，不愿走进办公室，想转身返回宿舍。有时他也想过到露天餐馆喝几杯啤酒解解乏。有时遇到某人的命名日或者在比较大的节日前夕，人们总把一箱箱的啤酒往他办公室里搬，于是他喝酒的愿望也就实现了；这时，他又觉得在工会工作是很开心的。

上午十点钟，广场的观礼台上宾客济济，他们既骄傲又激动。军乐队在演奏，喇叭在阳光下闪金光。在他周围站立的有人民军代表、警官、工人纠察队员和许多文职官员。有几个妇女哭了。他瞥了她们一眼。“她们是这次受衔军官的亲人”——他心里想。他非常欣赏同部队不可分割的军事口令和耀眼的白手套。当一些军阶比较高的军官从他的身旁鱼贯

而过时，他才从自我沉思中惊醒过来。当年轻军官的队伍精神抖擞从观礼台前通过时，他感到他的心都快跳到嗓子眼上来了。他几乎哭出声来。几天以后，他才明白过来，这种感情是指挥刀引起的。那把军刀由负责指挥的军官举着走在队列的前面。他回忆起一九五四年四月四日①，在英雄广场，他就是举着这样的指挥军刀走在队列前头通过检阅台的。二十年的时光逝去了，他仿佛仍然感到柔软、雪白的手套紧紧箍在他手上，还在他的手上留下一种紧压感，手握军刀所产生的那种特殊的美妙滋味，使他终生难忘。

他站在观礼台上，检阅结束时，不免感到有点茫然。军官们三三两两在交谈，或者到处走走。父母、兄弟姐妹、未婚妻簇拥着他们。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走到来宾中间，这么一来，观礼台便失去了意义。波尔达茨觉得再站在那里未免显得可笑了。他心神不定，又有点失望，正想移步的时候，突然听到有人向他招呼：

“波尔达茨同志，别忙着走……”

他转过身。一位体胖的军官站在他面前。里迪·格若，他原来所在连队的政治指导员。那时候里迪只是个连级军官，现在已经升到中校了。“我怎么办？怎么办？”——波尔达茨脑子里虽然闪过这样的念头，还是把手向他伸去。由于紧张，他的手指微微颤抖。

“向孩子表示祝贺吧。他是个杰出的小伙子，全校第一

---

① 匈牙利的国庆日。

名……"里迪说着，把一个棕褐色皮肤、一脸威严相的中尉和一个精瘦、近乎有点古怪的老妇人带到他面前。

波尔达茨脸上的肌肉抽搐了一下。他瞧瞧里迪，又看看那个老妇人。那老妇人嘴角上掠过一丝骄傲的笑意，犹犹豫豫地说：

"彼斯托……"

波尔达茨冷漠地注视着那个老妇人；突然间他意识到，站在他面前的就是瓦什·艾蒂尔。他想起来了，经过二十二年以后，上个月初第一次没有从他的工资里扣除孩子的扶养费。他还以为是会计室的人忘记了呢。他感到一阵恐惧，但两天来所抱的希望还没有从他心中破灭，看在里迪的面子上，他勉强露出笑容，说：

"艾蒂尔，你们都好吗？"

"我们谢谢你，彼斯托，我们勤劳地……"

这时候，那位年轻中尉向前跨了一步，脚后跟一并，对他行了个军礼：

"年轻的波尔达茨·伊斯特万中尉前来报到。"

"稍息。"波尔达茨说，拍拍年轻中尉的手臂。他没有碰他的肩膀。

里迪中校又重新开口了：

"这可是个大喜的日子，波尔达茨同志。现在咱们得先坐下来痛痛快快地喝上几杯。啤酒，一杯愉快的啤酒！"

"我明白了。"波尔达茨说着，也举手行一个军礼。可是当他意识到，现在他只是一个讨厌的平民百姓时，手臂立刻垂

了下来。

年轻的波尔达茨·伊斯特万中尉建议到“蓝色多瑙”餐厅去，因为那个餐厅离这儿最近，而且昨天他已经同他的未婚妻约好，在典礼结束后到那里去聚会。

多瑙河的上空清风徐来，吹拂着桌面上的桌布。波尔达茨要了三升啤酒和三大碟油炸猪肝。服务员送来啤酒后，便立即退走。

“多好的啤酒呀！”波尔达茨说，“真够味。”而他却在心里盘算着：这总共得花一百福林呢。如果一碟猪肝二十福林，三碟就是六十福林。再加上啤酒……三升啤酒够不够喝呢？……

“这里的啤酒很好，猪肝也是第一流的。”年轻中尉说。

“从这里眺望远景也十分惬意。”瓦什·艾蒂尔插上一句。

“只有装在木桶里的才是真正的啤酒。只要喝一口，就可以品出是不是装在木桶里的。”波尔达茨说着，又呷了一口啤酒。这时，他忽然想起：有一次，他利用划火柴的机会，搞了一个恶作剧，骗过他的密友，把一张五十福林的钞票偷偷塞进香烟盒里。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呢？是去年？是不是那次在酒馆里胡闹之后？管它呢。他小心翼翼地把食指伸进烟盒里去。果然，那张五十福林的钞票还在。他心里顿时一阵轻松。“我可能从此要走运了”——他寻思——“也许会出现意想不到的事。同他们回家去，或者……”

“齐拉也喜欢喝啤酒。她不喝别的酒。她至少可以喝满满

一杯啤酒。”

“齐拉是谁？”波尔达茨问。

“等一会您就认识了。她是个很好的姑娘……”

“那么咱们就为这美妙的事干一杯吧！”波尔达茨说着，举起杯子。他们也一起举杯表示祝贺。波尔达茨在眺望多瑙河湛蓝的河面。一艘旧式的轮船正顺流而下，没有发出任何声响。甲板上有十几个人在闲荡。他们在进行日光浴。一个男人坐在靠近栏杆的帆布椅上，手里托着一瓶烈性酒。波尔达茨也非常喜欢坐船。他带着羡慕的目光望着那艘白色的船和在甲板上闲聊的人们。“这些人晚上就到莫哈茨①了，”他想，“他们晚餐会吃些什么呢……辣鱼汤还是奶渣拌面条？……”

“我相信，您会再次穿上军装的。”

“什么？”

年轻中尉又重复一遍：

“我相信，您会再次穿上军装的。”

“我？……为什么？”

“我想，如果您回来……”

“是的，情况是这样……”波尔达茨开始作解释，但不容他把话说完，年轻中尉就把他的话打断了：

“妈妈说您负有特殊的使命……可是现在，经过这许多年以后，您可以回来了，我想……”

“从哪儿？”

---

① 匈牙利南部靠近南斯拉夫的边境城镇。

"就从您在的那儿呗……具体的我没有问。"

波尔达茨审视地端详着年轻中尉，觉得他的模样跟自己很相象。黑黑的头发，棕褐色的皮肤。波尔达茨每当回首往事时，脑子里总想着他会是个金发、瘦弱的孩子，因为弗什泽尔中尉是个金发的年轻人。一头金黄色头发，身体瘦弱的孩子；那时，人人都知道，这个金发的年轻军官还溜进厨房去过呢。

"我一九五七年就转业了。"

年轻中尉惊愕地说：

"妈妈总说您是负有特殊使命才离开的……"

这时，瓦什·艾蒂尔说话了：

"彼斯托，我这辈子的愿望就是要把我的儿子培养成军官，跟你一样的优秀军官。我早就……我觉得，再没有比当军官更重要的了。当军官，这是美好的职业，如果一位军官……"

波尔达茨吓了一跳，呆呆地望着瓦什·艾蒂尔。他在她脸上寻觅着他熟悉的那些特点。"我几乎认不出她的面容了，"他想，"要是在大街上遇见她，我会认不出她来呢。她今年大概四十八了，可是看上去比五十岁的人还见老哩。"她是一位工作过度劳累的勤劳妇女。他端详着眼前这个女人，记忆中突然闪现出在政治指导员办公室里发生的那一幕情景。里迪坐在桌子后面，抽着雪茄，模样很激动。波尔达茨正在野外进行夏季演习，人们就是从演习场把他叫回来的。他不知道里迪要他干什么，只管站在那里等候着。过了好一会儿，

里迪才从桌子后面的椅子上站起来，狠狠地吸了一口烟，来回踱步。最后终于开口了：

“欸，我们听说……”

波尔达茨毫无表情地站立在办公室中央。

“您报告吧！……”里迪又说话了。

波尔达茨现在已经记不清楚他的声调了，可是他的话却记忆犹新。

“波尔达茨上尉奉命前来……报告，我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

“瓦什·艾蒂尔。”

“瓦什·艾蒂尔？报告，我不明白。”

“瓦什·艾蒂尔在我们这里的厨房工作。她是洗碟子的姑娘。现在她怀孕了。我希望您清楚地懂得您自己的责任。”

“报告……”

“娶她做妻子。在匈牙利人民军里服役的一名共产党员军官……”

“教官同志，为什么认定是我呢？”

“瓦什·艾蒂尔说，您是孩子的父亲。”

“我？”

“七月十四日十点钟到佩奇市政厅礼堂举行婚礼。叫证婚人跟您一道去。我的话完了。”

“是。七月十四日十点钟举行婚礼。我可以离开了吗？”

“您可以走了，上尉同志。”

服务员把碟子放在桌子上，随后又去端来面包、盐和胡

椒。波尔达茨举举手指，向服务员示意还要三升啤酒。油炸猪肝很对他的口味。他用叉子叉起一块猪肝放进嘴里，边嚼边瞥了那个女人一眼。多年来他对这个女人的情形一无所知。他不清楚她是在乡下或者是在城里生活，现在又居住在什么地方。是住在佩斯这里呢，或是住在佩奇？她在做什么工作？

他不耐烦地把一片面包泡在汤盆的肉汤里。

“爸爸还活着吗？”他搭讪着问道。

“什么爸爸？”

“咦，……就是妈妈的丈夫呗！……要是我没有记错……”

“我是半个孤儿。”

“瞧，我给忘了……是的，住在柯瓦茨村。”

“彼斯托，谁住在柯瓦茨村？”

“妈妈不是住在柯瓦茨村吗？”

“不，……妈妈也早过世了。她原先是住在莫诺里村。我也是从那里来到上多瑙地区。”

“噢，莫诺里村，那是在东部大平原地区。”

那个女人高兴地说：

“是的，是在大平原地区。……那都是早年的事咯……”

波尔达茨咽下一大块蘸汁的猪肝。他发觉那个女人什么也不吃，只是一昧盯着他看，而且是带着一种哀求的稚气目光望着他。他拼命回忆这种目光。他是在哪里见到过这种目光的？她是在什么地方曾经这般望着他呢？

“吃吧，艾蒂尔，瞧，猪肝都快凉了……”他说。

“彼斯托，这一天对我来说是幸福的日子。我实在吃不下

东西。我的小彼斯托也当上军官了。军官……这是多么美好呀。我们在这里一道吃饭，又喝这么多啤酒……”

“吃吧，艾蒂尔……”

“齐拉该来了。”年轻中尉说，不安地往街道方向张望着。

波尔达茨突然放下叉子和正要往肉汁里蘸的面包。

“彼斯托，您也不吃了？”

“吃。我在等啤酒……”

这时，他记起来了，就在举行婚礼的那一天，在市政厅的走廊里，她就是这样望着他的。那是什么样的婚礼呀……他们汗流浃背，从夏季操练营地骑马来到佩奇。他们总共才三个人。他和两位证婚人，霍尔瓦特上尉和维多萨上士。他们用鲜花扎成花环，把马匹打扮得漂漂亮亮的，骑上马就出发了，准时来到目的地。一到十点，瓦什·艾蒂尔就焦虑地站在昏暗的走廊里等候着。他们一出现，她的脸上便露出希望的微笑，迎着他们走来。他现在还记得自己当时说的话：

“欸，艾蒂尔，您昨天晚上睡得踏实吗？”

“睡得很踏实。”

“现在该是办正事的时候了。”

别的什么话也来不及问，因为这时候门已经打开，人们招呼他们进去。仪式结束后，他们步出走廊，戴上帽子，一声不吭，也不打招呼便走下台阶。瓦什·艾蒂尔跟在他们背后奔跑。

“彼斯托……”她满怀希望地叫唤。

波尔达茨想起来了，当时，他在拐角处回头看了看那个

姑娘；他的目光是从她的脚下往上移动的，他看见她的肚子已经鼓起来了。那时，她就是以这种哀求的目光望着他的。可是波尔达茨并没有站住。军靴在台阶上发出冷漠的响声。他已经执行了命令。可是他没有向任何人说过，他是否愿意要那个孩子，或是否愿意娶瓦什·艾蒂尔做妻子。另外，他深信孩子不是他的。他是奉命结的婚，他最终执行了命令。难道说他有过没有完成交给他的任务的时候么？他是一个军人。他们骑马经过市政厅大楼前面时，从一群目瞪口呆的孩子中间穿过。他现在记得很清楚，当时他们一言不发地坐在马鞍上。他们谁也不说话，也不相互望一眼。他们在切尔柯蒂酒店前面下了马，把马拴在马棚里，免得过路行人见了马便知道他们在这里，然后才走进酒店喝酒。他们在酒店一直呆到第二天早晨。那个有日耳曼血统的酒店老板也是个嗜酒如命的家伙。这使他们大为高兴。那时候，全国各地都用玉米或者苹果酿酒。国家把葡萄弄到哪里去了，谁也不清楚，也不去打听。那个日耳曼血统的酒店老板给他们端来煎香肠和炒鸡蛋。到第二天早晨为止，他总共给他们端来六次食物。他们喝酒喝到下午两点。这时候，酒店院子里来了一个首饰匠，一个古里古怪的小个子老头。他身上散发出腥臭味。他在酒店后院摆上工具，又从口袋里把蜗牛倒在院子当中，用一根带环把的鞭子往牲口棚里驱赶那些蜗牛。

“那是我的牲口群，”老头喃喃自语，“让它们到牲口棚去同其它牲口呆在一起吧……”

老头大声地傻笑着。说来也怪，蜗牛从院子出发，在鞭

子的噼啪声中居然也往牲口棚那边缓缓爬去。那些蜗牛爬进牲口棚以后，他们才惊异地发现牲口棚里竟然有成千的蜗牛在蠕动。

“老头，它们会饿死的。”他们对老头说。

“不会，”首饰匠摇摇头，“我每隔两天把它们放出去一次。”

他们不再搭理老头，又走进酒店接着喝酒。

“那老头是个疯子。”他们对酒店老板说。

“他不是疯子，现在他养蜗牛比他打造金首饰更能赚钱哩。他把蜗牛卖给法国人。”

他们在认真考虑这桩事情。他们走出酒店门口商量时，霍尔瓦特上尉说，他判断老头是个间谍，得盯住他，看他搞什么名堂。上士也认为有必要对老头采取某种措施，因为他干的是一种罕见的买卖。他们一致同意把老头监视起来。其实，他们根本管不了那个老头，因为他们自己已经喝得酩酊大醉。后来，老头走进酒店时，他们冲他点头示意，要他坐在他们身边。他们还给他买了酒、大葱和抹猪油的面包。

“今天是我生活中最美好的日子。”老头告诉他们。

“就因为那些蜗牛？”

“不是。那是因为今天是五月九日。”

“那是什么日子？”他们问。

“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是在这一天结束的呗。我每年都庆祝这一天。”

“就因为这？……”

"我是这一天从集中营里获释的。"

"您是犹太人？"

"我不是犹太人。我不是因为信仰问题被关进集中营的。只因为我是那撒勒①地方的人。"

这时，上士突然记起那天不是五月九日，而是七月十四日。他们马上把这情况告诉酒店老板。酒店老板耸耸肩膀，要他们不要跟老头计较这些小事。要是老头认定今天是五月九日，就让他这么认为好啦，重要的是他总是当面付清酒钱，从不赊账……

他们再次走进院子去商量如何对付那个老头。但是他们得不出一致意见，便又走回酒店接着喝酒。后来从山上下来一帮农民，向酒店老板赊账喝酒。农民们坐在另外一张桌子旁。可以看出，酒店老板并不喜欢这帮农民。午夜时分，彼斯托他们向酒店老板要燕麦喂马。这时，他们发现老头已经在外面的牲口棚里睡着了。他们起先担心老头会惊动马匹，想撵他走。但是他们自己已经醉成一摊烂泥，也就无能为力了。以后的事他们什么也不记得了。

一位年轻漂亮的金发姑娘来到他们的桌子旁边。年轻中尉忙着介绍说：

"这是齐拉，我的未婚妻。她在教书……这是一桩学究式的爱情。"

姑娘坐下来，嫣然一笑。看样子，瓦什·艾蒂尔跟她早

---

① 巴勒斯坦北部古城。

已认识。这时，服务员把啤酒送来了。波尔达茨也为姑娘要了一升啤酒；就在他们喝酒时，服务员把盘子收走了；这场面一下子显得很尴尬，大家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才好。

“你明白学究式的爱情是什么意思吗？”波尔达茨问。

“因为我们俩都是……”

“今天不是提升你为军官了吗？”

“是的。不过我们同时也获得了教员的证书。”

波尔达茨紧锁眉头。他不吭声，但他觉得在他的生活中还不曾听到过这种胡说八道的事情。一个军人能象一个小学女教师那样去教低年级学生？……这种人将会成为什么样的军人？——他在思索着。一个人只能要么是军人，要么是教员……

“哎哟，能认识您，我感到很幸福。”姑娘的声音象小鸟叫唤似的悦耳。“皮曹对我讲过许多关于您的事。”

波尔达茨又吃了一惊：

“关于我的事？什么方面的？”

“您是一位多么特殊的人……我一直是这样想象，可是现在我看到的您却是另一个模样。”

“什么模样？”

“比我想象的还要烦躁……您打算什么时候回来？”

“您看，姑娘，能够跟您们在一起，我非常高兴……可是情况……”

“好极了。不过您别多心……我不过随便说说罢了。皮曹对我说过关于您的不少事，我现在才忍不住说几句。您总

是穿着便服，不觉得别扭吗？”

“是别扭。穿着便服我也不好受哩。”

姑娘、年轻的中尉和瓦什·艾蒂尔都骄傲而又幸福地冲着他笑。阳光普照大地，他们在喝着啤酒，多瑙河上又新来了许多船只，一些朝北边的维什克拉特开去，另一些却朝南边驶去。

黄昏时分，波尔达茨无精打彩地坐在房间里，独自一人慢慢地喝酒。瓶子里的酒已经喝掉一半了。酒杯旁边放着一碟酸黄瓜。他咬一口酸黄瓜，呷一口酒。他感到无所事事，只好边吃酸黄瓜，边喝酒解闷。卖午餐券的玛察按门铃时，暮色已经降临大地。他去开门让她进来，自己又坐回到桌子旁，接着边吃酸黄瓜，边喝酒。

“欸，波尔达茨，我把我的玳瑁梳子落在这里了……你瞧见了吗？”

“没瞧见。”

“我是把它落在这里了。瞧，就在桌子上。这把梳子还是我祖母的呢。他们在塞克沙尔杜做过买卖。这事我跟你说过了吧？”

“说过了。”

“她是杂货商。”

“唔……”

“你这是怎么啦？我祖父有自己的葡萄园，他种植的是有名的小红葡萄。”卖午餐券的玛察说着，一屁股坐到一张椅子上。

“你的梳子在那儿。”

这位体态丰满的金发姑娘边拿起梳子，边用眼睛去瞟波尔达茨：

“看样子你是喝醉了。出了什么事啦？”

“我儿子已经被提升为军官。”

“欧，原来毛病就出在这上面？……我还不知道你有这么大的儿子……”她说着，拿起酒瓶，往一只昨天用过还没有洗的杯子里给自己斟酒。

“哟，……这可是上等好酒呀。那儿来的？”

“从看门人那里买来的。”

“好喝极了。”说着，她又给自己斟上半杯，一仰脖子，喝干了。接着，她便动手解开裙子。这时候波尔达茨说话了：

“你别脱了。”

“我要睡在你这儿。”

“你还是乖乖地回家去吧。”

“波尔达茨，你不喜欢我了吗？”

“你乖乖地回去，把梳子也带走。”

“瞧你这样子，神气起来啦。儿子提升为军官，至于这样吗？”

波尔达茨站起来，把姑娘推出房门，随手把门从里面闩上。他重新坐回到桌子旁，又拿起一根酸黄瓜正要咬时，发现那把玳瑁梳子还呆在桌面上。他的脑袋好象撞在什么东西上似的，微微震动了一下。接着，他又伸手端起酒杯，喝了一口。

冯植生　译

编后记

这部选集共收入二十一位小说家的二十一个短篇小说。无一例外，这些作家都是匈牙利当代文坛上的佼佼者，他们中间既有在解放(1945年)前已经驰名国内外的老一辈作家，也有在解放后成长起来的优秀中年作者，还有在六、七十年代才脱颖而出的文苑新秀。这里选入的作品基本上代表了他们各自的艺术特点，其中有些篇还是他们那个时期的文学创作具有倾向性的代表作。就其内容来说，它们较广泛地反映和描绘了匈牙利解放后各个时期具有重大意义的矛盾与冲突，从而展现出各个阶层人们的生活、思想风貌，组成一幅幅颇有生活气息的社会生活画面。我们在编选这部书时，多少注意到了尽可能显示出不同作家的不同的艺术风格和流派。诚然，要真正认识匈牙利当代文学的全貌，仅靠一两部作品显然是做不到的；如果通过这部选集，能够帮助读者对于匈牙利从解放后到现在，跨度近四十年的文学创作情况及其社会背景，以及人民的生活有一个比较客观的侧面了解的话，也

就可以说是达到出版这部选集的目的了。

这部选集的中译文，除了根据一些作家的选集外，还从《匈牙利三十年(1945—1975)短篇小说选》(匈文版)和《四十四篇匈牙利短篇小说》(英文版)，以及《新匈牙利季刊》杂志(英文版)中选译了一部分。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匈牙利短篇小说选
作者＝张春风　　夏悦文　　旭遇桢译
页数＝４２４
ＳＳ号＝１０３３７８５７
出版日期＝１９８５年０５月第１版